

自传

—

我开始读罗斯金的《时至今日》，它增加了我对心灵研究及神秘主义的兴趣，这惹恼了我父亲——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信徒。一天夜里，因罗斯金我们争吵到这步田地：为把我弄出房间，他将我的后脑勺抵到了镜框上，打破了上面的玻璃。另一夜，我们又为罗斯金或是神秘主义争论起来，争的什么现在已无法记起，他追着我直到楼上我和弟弟同住的房间。摆开架势。要跟我拳击。我说我不能跟我自己的父亲打，他答道：“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不能。”我弟弟这之前已上床睡了，他蓦地起来，情绪恶劣，因为我们扰醒了他。我父亲一声未吭地溜了。弟弟转向我说：“记着，一句话也别搭理他，除非他道歉。”尽管父亲和我都很健谈，但是那几天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后来要么是我开了口，要么是他道了歉。

每一件事在我都成了某种道德的形式，在街上走着，我曾相信我可以准确无误地指明几世纪前的不良激情或道德空虚，这些造就了建筑物上的每一丑陋的细节。给我带来快乐的建筑只有汉普顿宫、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和新法院；我很难在它们中间分清彼此——我是个彻底的浪漫派——尽管新法院的体积、具有压迫感的重量曾使我一下午心情沉重。经过舰队街去拜访一位出版商时，我突然想：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如何抵抗重量和体积？那时我在心灵的眼中，唤起一个遍布青苔与荒草的伦敦、一个在远远的田野里祈祷的修士，我对自己说：“正义的声音能再次把伦敦清除一空”。许多年之后我也不能肯定。或许那时我对道德热情和道德激励估价过高，而这便是我父亲恼怒的原因。

礼拜日晚上，我去克姆斯各特厅（Kelmscott House）听社会主义演讲。经常去听讲的人组成了个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常被邀请到那高大的陈设简单的房间吃晚餐，房间的一面墙和天花板的一部分覆盖着一张美丽的波斯挂毯，另一面墙悬挂着加布里耶尔·罗赛蒂的《石榴》。我没再读过《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在我17岁时它曾使我快乐，而莫里斯还没写出那些几年之后将使我快乐的浪漫散文。有些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并且更多地把莫里斯看作一个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初次相见，他的某些举止让我想到我的祖父，这种印象消逝之后，我发现他身上有种孩子气的快乐的东西，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我心中的领袖。这些青年社会主义者有个行动计划。大概是一项什么使命要去巴黎，于是开了个法语班，我参加这个班学习了两三周，我非常用功，进步很大，作为老师的得意门生，我信心十足：我会很快拿下法语。然而我在家里谈到这个班时，父亲

在本《自传》前面，叶芝写到：“私人的。回忆录粗略的第一稿，作于1916—1917年，其中的大量内容现在，如果不是永远，不适合发表。回忆截止于1896年或其前后，W.B.Y，1921年3月”。

罗斯金（1819—1900），英国政论家、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被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公众的审美观点产生过重大影响。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实在。

罗赛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先拉斐尔派创始人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美术设计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诗集《地上乐园》等。

建议我的姐妹们也去参加。我找了种种借口，父亲发怒了，所以我只有离开，让她们进来，我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这事使我不能学下去。再也没有了夸奖，没有了那些陌生面孔带来的令人激动的新奇。我又一次成为家庭生活喜剧中的一个角色，不久便懒散而淡漠起来。

我的一个妹妹在梅·莫里斯那里做刺绣女工，就在克尔姆斯各特厅工作。她生性幽默、善于观察，在她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莫里斯是个坏脾气、可爱而无助的人。她描述莫里斯下午与送奶工吵架，那人总是在莫里斯睡觉的时候把围栏上的铁罐弄得当当响；还有那只鸚鵡，当他翻译荷马高声诵读时，它总是楼上楼下地跟着他摹仿那些低沉的诗行。“他老是怕”，一次她说，“他做的事哪不对头，而他一般来说正是这样。”

几个月过后，我已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辩论会时我总要解释说，“我必须学习讲话，在爱尔兰一个男人必须知道怎样讲话，正如旧时代的男人必须佩剑。”我不喜欢那些工人革命家，他们的永无休止的夸夸其谈，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宗教的攻击，终于在听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做了同样夸张不实的关于变化迟缓和财产平等的全部观念依赖于基督教的演讲之后，我不再参加这类的辩论会和演讲会。我的第一本书《奥依辛的漫游》这时已经发表，莫里斯在霍伯恩（Holborn）高架桥与我偶然相遇时曾夸赞说：“这是我写的那种诗”。他本可以说得更多些，可这时他一眼发现了一根带装饰的铁制灯柱（我想这些灯柱是联合公司那时才新建起的），他发狂地冲着灯柱挥舞起雨伞。如果我对他的那些工人革命家更耐心一点，我现在可能会从诗人和艺术家方面来理解他了，尽管当时的我困于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无法估计他的全部价值。

二

我初遇奥斯卡·王尔德是在哪一年？记得他似乎觉得我在伦敦只是孤单一人，因为他叫我去他家去吃圣诞晚餐。他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还有那葛德文设计的美丽房间，让我快活。他拥有一间白色的餐厅——这样的房间我第一次看到——椅子、墙壁、垫子都是白的，而餐桌中央却饰以红布桌心，中心有一尊赤陶雕塑，它的上方是一盏红色吊灯。我从来没有也不会再遇见有谁能够比得上王尔德的谈话。因为缺少镇定自若的风度、随意而谦恭的谈吐，我自惭形秽，茫然不知所措。我惊异于这位学者身为尘世之人却如此完美。那时他还没有写出一部成功的剧作并且仍是个穷人，我看不到那也许是日后才养成的傲慢。“啊，叶芝，”他在那个圣诞之日说——他一直在给我读他尚未发表的《说谎的堕落》的校样——“我们爱尔兰人太诗意了以致不能成为诗人；我们是一个富于光荣失败的民族。”

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对他所写的东西都不很在意，我在意的是那种机智——我仰慕的是这样的人：他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他对智性如此地忠诚。“他是我们的错生在这个世纪中的18世纪的决斗士”，我常常对某些诋毁他的舞文弄墨的青年谈到他，当这种诋毁在我们中间成为时髦的时候；“在骑兵冲锋的队列中，他会是一个出色的先导”。或者我当时会这样说：“他像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葛德文（Edward William Godwin，1833—1886），建筑师及舞台设计家。

切利尼一样，发现不可能与米开朗基罗抗衡，便在他艺术的自尊中摒弃了众人的喝彩。王尔德被斯温伯恩和布朗宁吓倒了。”然而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王尔德也曾向佩特学习，但在他那里节奏变得过于细腻和肿滞，措词也欠一些准确，在那篇他为我读过的充满智慧的奇幻之作中，他从哈姆莱特那里获得了德国哲学的悲观主义，当他读到“世界变得悲伤，因为有只小狗曾经忧郁”，我说：“你为什么换了一个词，悲伤和忧郁不是一样吗？”他所能说的就是他想要一个饱满的声音来结束这一句。

他说话时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缓慢，有人告诉我，这种慢吞吞的语气是从沃尔特·佩特那里摹仿来的，而这已成为一种艺术常规，使他获得了语言上的更大自由。话说得高兴，他便尽情发挥，一点没有做作的感觉。“我不喜欢《李尔王》，给我《冬天的故事》——‘黄色的水仙先已到来，在燕子有此胆量之前’。《李尔王》讲的什么，只是那蹒跚于雾霭中可怜的生命？”不一会这种想法就遭到敏捷的反驳——机智漩涡般的随意涌流。“无论游向何处，我都要带着佩特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这是我的宝书，不过最后的号声应该庄它写成的那一刻吹响——这是真正的颓废之花。”“但是”，有人说，“你原本就没给我们时间读它，不是吗，王尔德先生？”“噢，是的。以后有的是时间，不管在哪个世界”。

三

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通神论者，已转离都柏林炼金术研究会（Hermetic Society）。如同社会主义者。他们很少考虑到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们，滔滔不绝于他们所谓的唯物主义。他们坚信，所有有益的工作，不论实际的或艺术方面的，都是为改进人类这一自觉目的而做的，他们对达到那种目的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我要说，生命的大部本无目的，它只是它自己。那时经常举办的是争论晚会，我开始以论辩的方式看待一切，并对我的诗歌才能感到忧虑。

我是这个组织的秘传小组成员，这是由一些虔诚的门生组成的骨干分子小圈子，每周聚会一次，研究东方象征主义的谱系。人体的每一器官在天上都有其对应物，天空中的七大原素使得人的心灵与肉体应和着七种色彩、七个星体及音阶的七种音符。我生活在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作为象征体现在这七大原素中的一种上面的就是靛蓝，它以某种特殊方式提取于能产生这种颜色的植物。我费了些周折弄到一瓶靛蓝，并以身体的不同器官做试验：将属于这些器官各个不同的精神在瓶上加以混合，然后随之游荡。它们得到山野的感觉，我于是依据那七种原素将性质不同的地貌分门别类，这样在我念及它们之时便可从星际逃离。

我一直渴望得到证据，但又羞于承认这种渴望，我从西布刊的《星占学》读到，如果把花烧成灰烬，将这些灰烬放在月光下的钟形罩下边，花的幽灵就会在你面前升起，于是我说服我们小组中的那些生活得比我更孤单的成员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其《帕尔修斯》雕像被认为是米开朗琪罗之后佛罗伦萨最杰出的雕刻作品。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散文作家，唯美主义批评家。

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

来做这个试验，他们可以不被打扰地烧掉许多花瓣。不久我被叫到小组中一位管事那里，这位管事非常礼貌地让我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我搅扰了这里的平静。我说，“传授一个抽象体系而没有实验和证据，你会使弟子们成为只懂背教义的呆子，使他们脱离生活。你的弟子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与生活的普遍联系，与所有的别的东西相比，这种联系更能丰富他的心灵。他们不结婚，这对他们的禁欲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个聪明人，曾自修不少数学知识并写过大批平庸的诗，他承认我说的一切，但又说“勃拉瓦茨基夫人告诉他们，1897年某个周期或别的什么完结之后，再不会有超自然的救助降临。个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须向世界推行他们的宗旨，直至那个日子来临”。我脱离了组织，后来发现那个管事是在一位狂热的女人催促下办事的——女人在抽象事物面前一向神志不清。

我像崇拜威廉·莫里斯一样崇拜勃拉瓦茨基夫人，其中的缘由是一样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具人性，至少很难被猜透，不合常理、难以把握。或许当我走近他们时，便可逃离内心的焦虑。整个晚上她就坐在那儿和每一来访者交谈。她身材庞大，体形欠佳，永远转动着手中的纸烟，幽默而沉静，时时透露出一种诚实的超越了所有人的心灵。这跟那些有关她的说法很不一样，我曾仔细地读过心理研究会认为她是变魔术的骗子的指控。亨利告诉我说：“她是个超凡的人物，而超凡之人一定会干点什么——萨拉·贝恩哈特就睡在她的棺材里。”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觉得那些言之凿凿的指控与我的所见所闻不相符合，我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一种新的解释。对她的信徒来说，她绝非常人——某人告诉我他如何常常在夜半时分听见她那教主之铃的响声，铃声虽柔细悦耳却震动了整个房屋；另有一个向我耳语道：“她根本就不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真身30年前已在什么战场发现”。我记不清那战场的俄文名称。

我从未见她鼓励狂热，却见她劝阻某些狂热行为。一天夜里她去海峡的一个岛上察寻空气的变化，回到家后坐在她那绿呢台面桌前的椅子上——她在那儿永远表现得非常耐心，打开一个棕色庄包着的大包裹。“这是送给我的女仆的礼物”，她说着拿出一本大大的《圣经》家庭读本。一个在场的女人议论道：“还是没有注释过的呢”。得到的回答是：“唉，我的孩子，送柠檬给想要桔子的人，有什么用呢？”另一个夜晚我发现她情绪低落，因为无法劝服那个女仆让她的孩子受洗。她时常警告我不要过度的信仰或实践。一夜我静坐于一群正在交谈的人们中间，注意到一束奇异的红光落在我通过折门能够看到的一间屋子里的一幅画上。我走向那幅画，而当我走近时红光消失了。我回到我的位置，她说，“那是什么？”“是‘一幅画，’我说。“叫它离开。”“它已经消失了。”“那就好，”她说：“我原以为是显灵，不过是超视力”。“有什么不同吗？”我说。“如果是显灵，尽管有你它也会留在那里。当心点，那是一种执迷，我曾经经历过”。

有时我觉得她做梦时醒着，当她谈论某个灵魂或躯体的历险时，正睁着眼睡觉。”一次”她说，“我的膝盖疼得非常利害，医生说我会终身残废。

勃拉瓦茨基 (Blavatsky, 1831—1891)，俄国女通神学家，著述家。

威廉·欧内斯特·亨利 (1849—1903)，诗人，《民族观察家》编辑。

萨拉·贝恩哈特 (1844—1923)，法国女演员，曾饰小仲马《茶花女》中玛格丽特，以嗓音优美，表情动人著称。

但是半夜里主来了，双手之中有一条活着被劈开的狗，他把狗放在我的膝上让内脏覆在膝盖上，到了早晨我就好了。”她具有丰富的中世纪的知识，一种为中世纪的医生们所知的疗法，带着他们关于生命力转移的观念，可能已在她的一个梦中浮现——除那些实际的梦之外，曾经的真实事件，在精神世界中徘徊不去，或许就成了治疗的工具。或许她的那些现代奇迹，其中有人为的迹象，就是梦的作品，或是被梦一样的景象所攫获的心灵的作品。“她会为我做出一项奇迹。”“噢，不是”，当贝让特夫人要求她做时她说，“要从记忆中回忆”。

有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也跟我谈文学、谈她年轻时的事情，好像那些经常谈论的话题已使她厌倦。一天晚上她说，“我像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一样不停地写。我曾经责备并同情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们，现在我只同情他们——他们那样做是为让别人站在他们一边。”于是就谈起缪塞，她认识他但不喜欢；谈起巴尔扎克，她见过他但只有一面；还有乔治·桑，她曾与她一起涉猎魔术，“我们两个谁都不懂那东西怎么回事。”尽管我听说，关系到她的活动时，她会无情地让人们放弃工作而将他们派往天涯海角，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慈爱和宽宏。我记得她如何关心身边的年轻人不要工作过量。我曾远远地听到她对一个粗鲁地指责我活太多的陌生人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很敏感。”

四

我被引见给希伯来神秘哲学信徒麦克格莱格·马瑟斯，好像是在费茨罗伊大街的一个工作室，那时他尚未娶哲学家柏格森的妹妹为妻。接受他的邀请，我加入了基督教神秘教义者教派的“炼金术研习生”（Hermetic Students）。尽管很少参加活动，我现在仍是这个教派的成员，很看重充满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象征主义的仪式，当然这仪式增加了后来的内容。一个人上下求索之后所追求的智慧仍遥不可及，这里不会有什么告诫来提醒他注意尊严，也没有任何抽象教义使心灵的神经失去感觉。“我们仅仅给你一些象征”，麦克格莱格·马瑟斯曾这样对我说，“因为我们尊重你的自由”。那时我有个令人好奇的发现，为仪式所动，我心里出现了一些计划，我要采取各种行动，我希望回爱尔兰去为公众做些工作。由于刚从秘传小组退出，我并没有什么欲望，只是为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讨论。

那时我还学会了一种沉思冥想的形式，一种方法，这或许是对我的生活产生主要影响的智性活动，这种影响大约持续到我40岁的时候。麦克格莱格这时已经结婚，是离伦敦不远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一教派的成员，她去拜访麦克格莱格带回一个绝妙的消息。他让她将注意力固定在某个象征物之上，经过一段她无法描述的过程，她面前升起一片海滩和飞翔的海鸥。后来轮到我去拜访他。我被要求观看一个彩色几何形体，然后闭上眼睛，用心灵的眼睛再度观看。他引导我如何随那象征物的暗示让自己的幻想任意漂流。我看见一片沙漠，一个巨大的黑人在巨石中间抬起他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的作者。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以浪漫主义小说及风流韵事闻名。

的头和肩。就我的判断而言，此象征物的内涵不足以唤出这样的结果，假如它与意念有关联，这些意念也是极细微而不能察觉的。经观察我发现这位神秘教义者的几何象征体是一个系列，根据四大元素和古人所称第十五元素及其亚属我可以把这个系列加以分类。

现在我开始自己试验，发觉许多人将注意力固定在象征物之后并不像我那样有幻想漂过，而是或部分或整个进入催眠状态。我后来发现这种状态足以使他们产生合乎我的意愿的视像——如果我在自己的心灵之目唤出这样的象征物。我的心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心灵。我注意到激发、指令或者祈求的各种不同的体系更为有力，因为这诸种体系比那些彼此孤立的象征物要求更长久的注意力。我还注意到我可以在那些按我的转令出现的象征物中间偶尔我到某种我从未听到过的东西，尽管这种东西有着历史的根基，不会是毫无缘由的。我任凭心灵从形象漂到形象，这些形象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使之更有感觉、更有生气。我相信，伴随着这些形象，更深沉久远的灵魂之境终将迎来。而这就活在没有结果的希望中。

五

父亲把我引见给他的一个老朋友，画家兼诗人艾德文·艾利斯。他是我父亲“兄弟会”中最年轻的一个。那些60年代后期的青年画家发现自己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死了，另一个无力诞生”。他已大约50岁。他的画毫无趣味，学院派的形式，不是色彩缺少魅力，就是线条没有意味，而且常常有些俗气，大大的眼睛和平常的美貌。我发现，他的心灵丧失了力量和真诚，这种丧失与其接近日常环境、接近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程度恰好一致；然而，当这个心灵游于以象征或是抽象形式表达出的诗意或是哲学的直觉中时，就变得敏锐与深邃，比我所见所闻的任何人都要迅捷、都要丰富。他有时谈到他自己说：“我是个没有数学的数学家”。他还具有巫师的敏感，在人开口之前，他总能察觉别人的想法或感觉，凭借着绝对的洞察力，他常常能说出似乎已超出对他人内心的纯粹理解的东西。

他有一个半疯的外国妻子，她的猜忌如此之强使他长期以来如果没有她的陪同就不能走出他家窗子的视域。他总是陪我最远走到我回家必经街道拐角处的那个邮筒，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妻子要生气的”。他没有多少钱，大约每年一百，而她有几百的样子；他常常谈到一个男人对比他富有的妻子的责任，间或也解释说她曾聪颖过人，但被一次高烧毁掉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从一位美国丈夫身边拐来的，那位美国丈夫在他们私奔后把艾利斯说成最愚蠢的唐·吉珂德式的人物。而他的第二个妻子曾守候在第一个妻子临终的病榻前。在第一次婚姻之前，他有过不少次随随便便的经历——和那些模特及城中别的女人。他的极其机智的谈话全都是有关宗教与性的。然而一旦涉及女人的品格，这是他屡次谈及的话题，他就十分明显地用他现在的妻子评判所有的女人。在他的眼中，她是个标准的女人。他如此心满意足，总是设法让人明白：在这位夏娃的造物之前，他应当别无所求才是。

他在房子的顶层有一间工作室，尽管艾利斯夫人时常说：“多么遗憾呀，艾德文不会为生活增加色彩”，他在那里也还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生活。艾德文还是一名攻读艺术的学生时，吉尔克里斯特(Gilchrist)受罗赛蒂影响发

表《生命》，他成了威廉·布莱克的热心研究者。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样的热情。在那间工作室翻阅一本诗集时，我发现一张纸条上记着伦敦不同街区的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特点，它们一一对应着人的不同官能和命运。我认出那些基本点的某些特点，我在神秘教义者那里曾听到过。于是艾利斯和我开始了四年几乎从未中断的研究，其结果就是我们对预言书（Prophetic Books）的神秘主义哲学的解释。

凭着年轻人对家庭互尊互让的藐视，我成了这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的保护者。他每天都必须有大量时间用于工作，他必须得到自由以便去大英博物馆借阅书籍。如此等等。有时我几个礼拜才露面，艾利斯和我就不得不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充气面包店（Aera- ted Bread Shop）那类的地方会面。艾利斯最长的一次放逐，是在他妻子忽然确信我给她施了魔咒之后——我有为脑子里想的诗句打拍子的习惯，而这对她竟如同那些象征物发挥的作用。这时我便受到原谅，还能享受涂有杏仁酱的丰美蛋糕，这既不合我的口味，也不利于消化。神志清醒的时候，这种清醒似乎伴着疲惫，她具有理解力和某种令人担忧的善意。一次在我比平常经济更为窘迫之时，收到一份未具名的礼物：两英镑，几年以后我才发现是她送的。

那四年却是对我们自身的神秘真实的连续发现。我们相信，他感到有神力相助，他自己就经历了各种奇异的境界而不断上升。一次，我们探究布莱克关于两性起源的理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他放下调色板和笔，说：“我们到街上去吧，我必须来回走动一下”。转了两三圈后，他说：“如果我在房间呆得再久一点，就会进入昏睡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亲属们就会知道，那样我们的合作也就完了。”傍晚时分，我又提起那个问题，谈话当中我的思路变得格外清晰。我感到很有信心。此时光线昏暗，艾利斯躺在沙发上听着。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有微弱的光影摇动，意识模糊地纳闷是什么东西，这时艾利斯夫人进来了，问道：“你们为什么黑乎乎地坐着？”艾利斯说：“为什么？天黑了，我躺了下来，我想这之前我一直是在这光线明亮的屋子里坐着的”。

我将我对于神圣幻景和上帝的本质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保佑我研究活生生的经验——归功于艾利斯同我做过的多次讨论，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但我觉得这种清醒紧挨着癫狂，或许我诗中的神秘也归功于他。在我为他赢得的自由里，他写作并发表大量诗歌，这些诗我现在看来仍旧有着非同寻常的美和智慧。他写作从来速度极快，如果你指出某个错处，他就会把已经完成的全部推翻以全新的方式重写。他不会修改自己的东西，然而对别人作品技巧的批评却是深刻的，对于他的哲学，没有任何细节是微不足道的。而我的思维习惯仍然有些褊狭，想象力固定于大作品以致忽视细节。——我的《奥依辛的漫游》不过是第一篇完整的长时期传奇（Legende des Siecles），如此等等——然而我却第一次认识到，我可以在音调的安排方面找到完美的自

亚历山大·吉尔克里斯特的布莱克传记于1863年面世。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生前未引起足够重视，死后一百多年来声誉日渐隆盛。重要作品有诗集《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诗，象征与批评：威廉·布莱克作品集》，E. J. 艾利利斯和W. B. 叶芝编辑（伦敦，伯纳德·科里奇，1893。

原文含义不明。

我表达。他抱怨说，我早期诗作中的一句，“门前的羞怯”（Shy in the doorway）令人厌恶，因为“Shyin”是一个中国佬的名字。尽管我没有修改这句诗，却更敏感地注意到声音。

六

由于挣不到钱，我陷入困境。我本应进艺术学校，但一想到都柏林的那些艺术学校，事情就被推迟了。我想干点什么，能马上弄到钱，因为家境贫穷，我看见父亲时常阴沉地坐在炉火旁。然而我根本没有挣钱的本事。后来我们的邻居约克·鲍威尔愿推荐我去做我想做的《曼彻斯特信使报》的助理编辑，为此我考虑了几天。这意味着立刻有一笔收入，但那是一家统一党的报刊。最后我告诉父亲我不能接受这个职位，他说：“你让我松下一口气”。父亲建议我写小说，一部分在伦敦，一部分在斯莱戈——我住在舅舅乔治·波莱克斯芬那里——我完成了《多亚》（Dhoya），一篇英雄时代的幻想故事。父亲不满意地说，他指的是一种写现实人物的小说，于是我开始写作《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小说倾注了我对斯莱戈的怀念与渴望。写作的那段时间里，我走在河滨路上，经过一家商店，橱窗里一个小球在水流的喷射下不停地跳动。我想到斯莱戈的水，空然感到一阵激动，这便形成了《茵纳斯弗里岛》。

为了钱的缘故，我最好在研究我称之为“爱尔兰传统”的同时挣钱，我编辑了流行的卡尔顿系列故事，还有一卷爱尔兰神话故事——现在想起来，卡尔顿的故事挣了七个畿尼，神话故事得到十二个畿尼。我常常从贝德福德公园（Bedford Park）步行到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不花钱溜进去做我的事情，省出几先令，下午好喝杯咖啡。我差不多都是把午餐装在衣袋里带去。记得我把长袜染黑以便遮住靴子上的裂缝。然而我并不在意这些裂缝或长途行走，因为我已定下以苦行主义为理想。不管变得多么富有，我坚信我会一直走着去工作、极少吃肉、穿旧衣服。我像纨绔子弟那样有意选择贫穷。

我在感觉方面遇到很多麻烦，因为我没有与生俱来的纯洁而且我还年轻。我认识的那些年轻人过着艾德文·艾利斯告诉我的那种生活，而我却从浪漫主义诗歌里获得一种完美的爱情理想。也许我永远不会在教堂结婚，但我会终生爱一个女人。我给凯瑟琳·蒂楠写了许多书信。她是个很普通的女人。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她是那种会因为男人弄得她自己极为不快的女人，我开始怀疑她是否爱我，我是否有义务娶她。往往当她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在伦敦会想我或许该娶她，然而一旦她过来呆在我身边，或者我去爱尔兰看她，事情就又变得不可能了。尽管如此，我们总是非常好的朋友，我没有理由认为她会把我成别的什么。

我同自己感觉的斗争，使我惧怕谈到性的问题，每当艾利斯开始说起他

斯莱戈（Sligo），爱尔兰斯莱戈郡海港和首府。

）波莱克斯芬，叶芝的舅舅（1839—1910）：“一个忧郁的男人 / 他结束于他呼吸开始的地方。”
叶芝早期代表作之一，见卷一袁可嘉译作。

卡尔顿（William Carleton, 1794—1869），爱尔兰作家，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爱尔兰农村生活。

《爱尔兰农民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叶芝编选（伦敦，汪尔特·斯科特。

往日的那些经历，我总试图改变话题。我常常被艾利斯夫人弄得不舒服，因为我很瘦弱，她便假定我生活放荡。一次约克·鲍威尔正开始介绍几个朋友，我也在他们中间，一些法国著名演员拙劣地模仿着巴黎夜生活的派头，我离开桌子，在房间的一端踱来踱去。而女人让我充满好奇，我的心灵似从不渴望逃离我那被搅扰的感觉，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的头脑里满是罗赛蒂的神秘女性和伯恩-琼斯的艺术撞那些迟疑不定的面容，她们似乎总热切期待着长长的旅行完结之时会遇到某个复仇精灵(Alastor)。而在我几乎承受不住的紧张的感觉之上，我又进一步确信，我既不勤奋，又缺少意志。看见父亲从早画到晚，日复一日，我也试图去工作，时间不如他那样长，一天只四、五个小时。只是最近几年，尽管工作很稳定，然而一旦创作超过两小时，我的神经几乎立刻就垮了。几乎我家的每一个人都多少有些神经脆弱。

七

我总是觉得自己什么地方无用或许甚至是极不可靠。一旦我赞同某些人，我在这些人中间便不能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些观点盲他们的看法。我总是指责自己对某个不在眼前的朋友不忠实。我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怯懦。这种怯懦时常变得莫明其妙，现在回忆起来仍令我费解和痛苦。一个周日，某位研究17世纪法国诗歌的学者，叫我和他一起在圣殿(the Temple)吃早餐，在座的还有他同屋的一位牛津大学的青年。饭后我却无法让自己离去，尽管我想走，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暗示我，开始聊起教堂，对此他们也许并不喜欢；我痛苦不堪，可就是走不了。我曾拜访某位妇人，一位我父亲的老朋友，发现她的安排满得像个委员会。我明确感到不应留下，然而我的话却说个没完，甚至做起象征或是别的什么试验，等聚会——不管是什么——结束，起身离开之时，我觉得难过极了。此后我不敢再去登门。

当时有一件事，由于固执的良心不肯放过，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最令我痛苦——甚至现在要写到它时，我还希望把它放在最后。我发现，一种痛苦的思想在它进入意识之前，或无须进入，将不时地影响人的心灵——它像月亮或太阳那样影响着我们，还处在地平线的下面，就向上投出它们的光亮。我曾介绍一位都柏林朋友加入我所属的教派，他是我在艺术学校时的同学。被接纳之后，有人告诉他，需交几英镑的进入费。他说：“好吧，如果一个人接受一样东西，我想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然后把钱放在小桌上。我知道他穷，而穷人从不被要求付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就像一个恶梦中的人，渴求动一下而不能。我同那个收钱的女人很熟，只要我一句话。钱就会被退还，但我没说。夜间，那一刻在我的思想里一次又一次地复现，带着苦涩的自我责备。我不停地想象他在巴黎的情景（他要去那儿学习艺术），因为那次损失而肖吃俭用。我想给他寄些钱，但是我从未有过两英镑，而最近我听说他死了。

八

伯恩-琼斯(Burne Jones, 1833—1898)，英国画家，工艺设计家，绘画风格受罗赛蒂影响。圣殿，位于伦敦舰队街，因圣殿骑士团而得名。

我开始在经常光顾大英博物馆的人中结交朋友。某些时候，麦格雷戈·马瑟斯跟我一起去惠登饭馆昏暗的烟雾弥漫的屋子喝咖啡（这家饭馆早已不在了），他那棕色的棉绒夹克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早在我们会面之前就已引起我的兴趣。另一些时候，一起喝咖啡的则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身份是莫里斯的秘书，并和梅·莫里斯订了婚。他常说：“她很美，莫里斯也这么说。”有时是欧内斯特·里斯，爱好空想、和蔼可亲、意志薄弱，他老是说：“我在伦敦已经十年了，我离开采矿工程转向写作，可是一本书也不曾动笔。”莱昂内尔·约翰逊住在附近，但我想他从没进过这个图书馆——所需要的书在他那位于费茨罗伊大街的长长的低屋顶房间里似乎都有。他有一笔私产，所以他的藏书不断增长，为数众多。他说：“当一个人四十岁的时候，他应读完世上所有的好书，那以后，有六、七本就可以满足了”。他已经极其博学，我们常谈论他精通多少种语言。书将构成他的世界，他对此感到满足。

在朋友——大概是欧内斯特·里斯——的建议下，一天下午五点钟我第一次拜访约翰逊，开门的是一个男仆。后来成为研究波提切利的伟大权威的霍恩，现在是斯莱德教授的塞尔温·伊米奇还有建筑师麦克莫多，同约翰逊共用这座房子和仆人。“约翰逊先生在吗？”我问。“在，先生。”“我可以见他吗？”“他还没有起来，先生。”“他病了？”“噢，不是，先生。”好像被主人的功绩感动而生景仰，他以带些感情的语调说：“他总是七点起来吃晚餐”。约翰逊的这种习惯始于失眠，而现在却是有意去做了。整个欢愉的白天他都在睡觉——这时一个人可能会被女士们的谈话或公园的绿荫所引诱，等我们全都上床时，他便开始工作。他时常在七点到十一、二点之间接待我们，而我常常感到这样见面不公平，一天的工作已使我疲劳，另一个头脑正处于早晨的充沛状态。

几年里他是最我的朋友。吸引我的是其精神上的某种优雅气质，这优雅看来与他小巧的体态正相吻合，相貌平平之中却透出希腊雕塑的个性特征。他是我见过的沃尔特·佩特的第一追随者，他从沃尔特那里借来的话对我来说意味深长：“生命应是一种仪式”，它的“壮丽”和那全部的“神圣”。我们应加以珍重。他对我的思索不以为然，尽管对于引发这些思索的焦虑深表理解，因为所有这些已被探讨了几个世纪，所有能被了解的在书中全有记载。“我需要在荒芜中呆上十年”。他常对我说，“而你需要在图书馆呆上十年”。一次，发觉我心情不快，误解了他此后的用意，他援引据我所知并非天主教圣贤的话说：“上帝对即便最高尚的灵魂也一无所求，他要求的只是专注”。他还不是天主教徒，我也还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宗教，虽已向那儿接近——我想那不过是文字上的装模作样。那时我已成立诗人俱乐部（Rhymers' club），每周或两周侍人们在切希尔乳酪店的一间楼上的房间聚会一次。在一次聚会中，有人说：“我听说，约翰逊是个新天主教派”。我问那是怎么回事，回答是“没有上帝，圣母玛利亚是他的母亲。”

正是在俱乐部的聚会上我认识了与我同时代的那些人。阿瑟·西蒙斯获得了我的友谊，以后的几年里，那时约翰逊听从医生的建议为治疗失眠症喝起酒来，成为一个落落寡合的醉汉，我与西恩斯间的友谊便日益坚固。最

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作品有《春》、《维纳斯的诞》等。

西蒙斯（1865—1945），英国诗人、评论家、著有《象征派文学运动》（1899）。

初我遭到西蒙斯的拒绝，其中原因，就我从《马里厄斯》（Marius）中“安尼姆拉·瓦古拉”（Animula Vagula）一章所做的表面推论而言（我认为《马里厄斯》是我们时代的唯一经典），他在文学中别无所见，只是一个印象的系列。在我看来，他那精心取自音乐厅及爱情冒险经历的诗句，应该具有种种的生动印象。与约翰逊厌恶一切有关性的思考不同，我不反对西蒙斯的性爱描写。我知道生命对我有多么艰难，然而我知道那种最伟大的文学是激情。我寻求激情，尤其是宗教激情，视之为生命中的至善，我平素怀有一种隐秘的希望，能亲历某种神秘的入教仪式。他想尽其生涯，目前看来是艺术生涯，制造毫无瑕疵的银镜，而我想见到它熔化、发光。我们彼此相知是几年以后的事了，那时他已放弃他的理论，力图获得激情的表达，我们终于情深意笃。关于欧洲大陆文学我所知道的无不是从他那里学来，因为这方面约翰逊除古典作品外没有读过什么。他有女性的同情心与理解力，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倾听者，但他只是到后来才走进我的生活。

约翰·戴维森，比我们都年长，戴着假发以隐瞒些年岁；欧内斯特·道森，对约翰逊和西蒙斯比对我更亲密；艾德文·艾利斯经常来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一共有十二个固定成员。一些我们敬佩或容忍的人物偶尔也来这里。记得，我熟识的奥斯卡·王尔德来过一回，霍恩则来得很勤。我们朗读自己的诗作，彼此批评，但谈话缺少生气，这样，熟悉巴黎及其善谈者的西蒙斯渐渐地不来了。一种观念上的怀疑倾向——也许是我自己惧怕抽象的一种形式——以及所有那些令人兴奋的真假半掺、偶然而发的言论开始激起不信任。谈话只有由爱尔兰成员——希勒（Hillier）、罗尔斯顿 或者我——引导时才令人兴奋；而约翰逊不以为然的沉默常使我们觉得自己是褊狭的乡下人。一次沉闷不堪的晚间聚会之后，我听到约翰逊说：“啊，是的，非常沉闷，不过倒也有趣。”

当晚间聚会结束我回家去睡觉时，一种生动得多的生活才开始。一天我听说，欧内斯特·道森和阿瑟·西蒙斯被从驿站赶了出来，因为在车夫们的眼里道森太不体面了。

九

W.E.亨利 是我的主要雇主。他位于贝德福德公园不远处的那所房子聚集下一伙朋友，我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周还是两周一次打开他的大门？），这伙人日后成为他的《苏格兰观察家》及《国民观察家》的同仁。他给我的警策、留下的印象与那般被称为亨利的年轻人的完全一样，即便今日与这些人中的某位相遇——或许已显露老年的最初迹象——我们立刻就能认出当年将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印记。就好像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秘密：我们认识一个人，他的力量他人无法知晓，因为这种力量还未找到言词上的表达。我从不在意

戴维森（John Davidson，1857—1909），苏格兰诗人和剧作家。

道森（Ernest Dowson，1867—1900）19世纪末英国颓废派的杰出诗人。

罗尔斯顿（Thomas William Rolliston，1857—1920），希腊、德国和爱尔兰文学学者。

亨利（William Ernest，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在爱丁堡主编《苏格兰观察家》，后移至伦敦出版，改名《国民观察家》，曾刊登哈代，萧伯纳、威尔斯、巴里和吉卜林的早期作品。

亨利的诗；早期那些带着维永 的特点的欢快诗句除外，我知道那些诗句的魅力在于与另一人的面貌酷似。我认为他的言辞激烈而且过于用心，但是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已做好准备在此人直率的目光中检验我自身和我的所做所为。我极少赞同他的观点，而后来我听到他对人说，“我不知道叶芝是在上升还是下降，”弄得我也搞不懂自己了。他的迟疑可能是因为他的鉴赏力从来没有欺骗过他，如果他希望谁走运就不会是奉承。这并不能丝毫改变我与他在判定其他人方面的分歧。除《有福的达莫泽尔》（The Blessed Damozel），罗赛蒂的作品他一概看不上，从不谈论佩特，很可能不喜欢他，赞扬印象主义绘画，而这对我尚无意义，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与我不是同一派，他还创建了帝制拥护者报刊中的雄辩派。因梅毒而致残，总是苦恼不安，由于不能自然地驾驭书面语言，他或许试图在我们身上找到他的表达方式，因此几乎把我们爱得如同他自己。

他修改我的诗就像他修改吉卜林的早期诗句一样，尽管我不认为我是一成不变地接受他的实际语言，但我总是知道他已发现某个错处。他的政治见解中带有他本性的宽容，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反对我寄托于爱尔兰的一切希望，但这种反对丝毫没有损害我的尊严。我记得他说：“不是我认为爱尔兰不适合于自治，它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适合”——爱尔兰不适合之说是他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帝国。有必要劝诫那些年轻人，这个伟大事物必须存在下去。”这样一位才智之人的态度使人感到慰藉，而且他能够跟我一样去欣赏海德 才发现的那些民间传说和民歌，还准备写一写巴涅尔， “他在这个国家面前已经 18 年，我们只知道他高傲，对他的性格却一无所知，”他还这样描述过，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巴涅尔对大英帝国的憎恨是“高贵的”。他想要在爱尔兰创办一份报纸，碰碰机会。我不怀疑我被他吸引了：他的贵族态度，他对于大众、对于逻辑现实主义的憎恶——后者只是大众修辞，可以说，冰冷而僵硬。我没帮他写那种评论和社论性文章，那类文章在单纯敏感的写作者及公众趣味的奉承者中间，我们相信将会引起、或许已经引起极大的惊慌，因为以我 20 多岁时的清教徒式的习惯，我反对匿名；但我为他写了不少诗和有关爱尔兰的随笔，并逐渐感觉到，有必要将所有的评价清除出去，以此作为我写作创造性散文的第一戒律。《梦回仙境的人》发表后，记不起他对谁说过：“我的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写了一篇多好的东西，你看见了吗？”我在他家第一次遇见 R. A. M. 斯蒂文森，他是小说家斯蒂文森的表子，大家习惯于把他视为王尔德的谈话对手。他毫无哲人的机智，他那快乐的，奇异的智慧总是消失在他的声音里，而他毫不自我中心；在王尔德逼迫他人的地方他使用魅力，所有人几乎都暗地里想法让他把谈话继续下去之时，却看不出他有垄断谈话的意思。亨利常常得意于沉默，满足于他那不可分解的天才；使所有他近旁的人保持紧张，送走所有那些因长时间贡献他们的精华而耗尽精神的人。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见王尔德，后来他对我说，“我得拉紧每根神经才能最终与那个人抗衡”，

维水（F. Villon，1431—1463 以后），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

海德（Douglas Hyde，1860—1949），诗人、翻译家、学者，盖尔人联盟的缔造者和第一任主席，爱尔兰总统（1937—1945）。

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爱尔兰自治党领袖：“爱尔兰的无冕之王”。

刊于《国民观察家》，1891 年 2 月 7 日。

而实际上王尔德自己说出了所有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亨利除了听就没干什么。谈论他已是我的习惯：“他是个派演糟糕角色的伟大演员。萨尔维尼在台上，谁还去看别人呢？即便他说的只是个廉价文人写出的台词”。我也常常谈论他，我发现他是个梦游者，而这正是我对于伟大的检验方式，我引用维克多·雨果对滑铁卢之后被囚的拿破仑的描述：在梦中回到了战场。

十

我 23 岁时生活的烦恼开始了。从约翰·奥利里 (John O'Leary) 的姐姐奥利里小姐的信中，我曾一次又一次听到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因为都柏林民族主义离开了总督府的社交圈。以后的几年里，我使自己相信，第一次读到她的名字我便感觉到一种预兆性的激动。现在她驾车来到贝德福德公园街的我们家，带着约翰·奥利里给我父亲的引荐信。我从来没想到会在一个活着的女人身上看到这样超凡的美。这样的美属于名画，属于诗，属于某个过去的传说时代。苹果花一样的肤色，脸庞和身体有着布莱克称为最高贵的轮廓之美，因为它从青春至老年很少改变，而体态如此绝妙，使她看上去非同凡俗。她的举动同她的体形恰好相合，我终于懂得为什么古代诗歌，在我们爱上某位女士谈到面容与体形的地方，吟诵她的步态有如女神。我想不起她说过的话，只记得她因赞美战争惹恼了我父亲，她也热衷浪漫主义运动并形成一套不容置辩的维多利亚式的推理方式，这似乎使所宣告的那么光辉的未来有点灰暗，我感到那些日子里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因为那时我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一种适中的浅谈色调，宛如缅甸皿型钟的声响，一阵不可抗拒的骚动，带着丰富的悦耳的共鸣。

她请我去伊伯里 (Ebury) 大街她的房间吃饭，我想，在她逗留伦敦的大约九天里我几乎每天和她一起吃饭，她似被什么充盈得那样饱满，自然每一时刻都应四处洋溢她的丰足。她听奥利里谈论过我。他夸赞了我，她自然就应对我任情褒贬。她的生活被一笼笼数不清的唱歌的鸟儿包围着，她走到哪儿，这些鸟儿就跟到哪儿，即便是短途旅行，现在这些鸟儿和她要回巴黎的家去了。

她跟我说起她希望在都柏林演的一部戏。有人曾建议她演托德汉特的《海伦娜在特洛阿斯》(Helena in Troas)，他不同意。我给她讲了个故事，那是我编《爱尔兰农民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时得到的，并主动要求为她写一部我称之为《凯瑟琳伯爵小姐》的剧作。当我告诉她我希望成为爱尔兰的雨果，是出于全部的真诚吗？——因为尽管一卷雨果诗集的糟糕译本伴随了我的学生生活，我曾以极大的艰辛使自己变得简单，在她的桌上我看见一本《莱昂尼斯的特里斯特拉姆》(Tristrarm of Lyoness)，还有一本《沉思录》(Les Contemplations)，面对这样的书，为博得好印象我自然要自称具有真正的社会才能，因为她的美，就我那几天的理解，看来与隐秘的个人生活是不能相容的。

萨尔维尼 (1829—1916)，意大利演员、以演奥赛罗著称。

1889 年叶芝爱上了毛特·岗，他的第一部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以岗为原型的、此剧初次上演时，由岗扮演主角。

托德汉特 (John Tod hunter, 1839—1916)，诗人、戏剧家、学者。

像我一样，她接受了戴维斯的政治传统外加一些奥利里的强硬及英雄主义。谈到威廉·奥布赖恩——他在狱中为反对穿号衣进行了长期斗争，她说：“曾几何时人们为了国家牺牲他们的生命，而现在他们牺牲他们的尊严。”同对人类生活中永恒事物的这种感觉混合在一起的是某种雄辩的——拉丁语的贬义用法——或许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东西。她说到她对权利的欲望，显而易见是为了权利自身的缘故，而当我们谈起政治时，涉及的主要是纯粹效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赢得这次那次的选举。我想，22岁的她曾仿效法国布朗热主义的（Boulangisi）冒险家和报界上的暴发户。这些人她见得太多了，她已经出于他们的利益在俄国有过那么一次政治旅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安尼姆拉·瓦古拉”那一章，一位年轻的婆罗门来都柏林时，我曾恭聆其中的内容，“只有手段能够证明目标的正确”。照她的意思，她的目标不含私欲，但她所想的几乎全是以成败论手段。我寻求的是不同的东西：她，某种值得纪念的行动以便最终奉献她的青春，而我，到头来不过是去发现和传达一种生存的状态。或许即便在政治上最后也就是满足于曾经热切地生活过、思想过，并且像奥利里一样，拥有一颗值一枚罗马钱币的脑袋。

关于我的精神哲学观我说了许多。这一切在我是何等的重要，鉴于她可能丝毫不差地思虑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我有什么本不应给予的呢？一切都已模糊不清，只有那一刻除外：当时她走过窗前，穿着白衣裳，去修整花瓶里的花枝。十二年后，我把那个印象写进诗里：

花已暗淡，她摘下暗淡的花
在飞蛾的时节，把它藏进怀里。

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种伟大的宽容和勇气，一颗不宁的心灵，当她和她的所有那些唱歌的鸟儿离去，我的忧郁已不单是爱的忧郁。我的那种曾认为是“具有洞察力的”知觉，现在能够看清了，只不过是某种对即将临头的灾难的浅显推断。我曾给一个美国出版商编一本爱尔兰小说家的选集，现在我仍记得，故事里主人公们的所有苦难唤起我的只有那个畏惧。依照维多利亚早期的写作风范，他们也常被丢弃在这个谎言的世界上，没有父亲、母亲或保护人，并且他们也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已陷入爱情，但不曾谈起过爱字也从来无意谈起，几个月过后，我又可以主宰自己了。“她能成为什么样的妻子，”我曾想，“在一个学生的生活里她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十一

某次去斯莱戈的途中，我一定是在都柏林耽搁了一段时间。我那帮老朋友、老相识，一度因她屈尊来到他们中间而受宠若惊，开始起而攻击。甚至老约翰·奥利里也表示愤怒。威廉·奥布赖恩和约翰·狄龙才劝服与土地持有者争吵的蒂珀雷里市民在临近地带建一座新城，而又发现那个老土地持有者，凭契约上某项被遗忘的条款，一定程度上仍旧控制着新城，还可把他们逐出新居。奥利里自己在老城拥有财产，但即便没有他也肯定同样不喜欢这

托马斯·戴维斯（1814—1845），青年爱尔兰运动领袖，出版于1842年的《民族》的创办者之一。

项冒险，因为他最恨那两个政客。“他们此时想影响英国舆论，他们认为一项住房制度法案会在他们被识破之前出台。他们是在用别人的生命赌博。”他常这么说，或诸如此类。毛特·岗曾参加新城的开城仪式。“她根本不是我的门生，”他说，“她去那儿为的是炫耀她的那些新帽子。”另有人传说她去巴涅尔委员会时像个伤感的英国同情者，绿色的礼服缀着白花酢浆草。还有一个爱尔兰自治反对者散布另一种传闻——我气愤的是，它同样令人难以置信——说她身着薄纱去猎捕水獭，不久便满身污泥。

在都柏林我家的朋友中有一位艺术家，萨拉·珀泽小姐。如此聪明的一个女子使人艰难相信却是一个蹩脚的画家。她总是随身携带她的家族荣誉：拥有过几位伟大学者，但未发表任何著作；几位因思想明澈、广有建树而著称的科学家，但未做出任何发现。她自己，尽管动心之时宽厚而善解人意，以残忍为双翼来传播那不大的、家传纯正的才智。她画过一幅毛特·岗的肖像，而这幅肖像看来只是大路思想的象征化。当时某个叫玛丽·巴什克特赛夫的日记由于格拉德斯通的举荐刚刚走红，那里面表现的是一个女孩充斥着自我中心、耸人听闻的种种想法，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兴趣的才情。而珀泽小姐的肖像画在姿态与表情方面都是对那本日记的卷首插图的不自觉模仿。她见到我说，“所以，毛特·岗就要死在法国南部，而她的肖像画只能廉价出售了，”接着又谈起她如何在巴黎与毛特·岗共进午餐，在座的有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法国男子——我想她是看在我的份上才着重谈到有这么个男人的——还有一位医生，这个医生曾告诉她，“他们俩个都会在六个月内死去。”

到达斯莱戈的时候，我陷于那般爱尔兰自治反对者之中。某个迟钝而并非刻薄的年轻房东说他如何从旅店的窗子窥视一次被称为支持房客对抗他的公众会议。听众席有人叫道，“枪毙他，”讲台上的一位漂亮姑娘，他相信她就是毛特·岗，却拍起手来。我的舅舅乔治·波利克斯芬，不愿说我任何一个朋友的坏话，显然很不情愿地暗示道，他自己了解到的某些事情对她很不利。“有一次我看见她”，他停下来解释他怎么去的都柏林，“在格雷沙姆旅店的大厅里和威廉·雷德蒙说话。为了名声女人什么事干不出来？”他认为议会下院中的所有民族主义者都不能为社会所容忍。所有这些传闻令我愤怒不已，此时我便默诵布莱克的《玛丽》：

她想不起人类那有如天神的面容。
所有的面容是妒忌，可爱的玛丽，只有你的不同；
你的面容是绝望的甜蜜的爱慕，
你的面容是温柔的忧伤和眷顾；
你的面容是无边的敬畏和恐怖，
永远不会平静直到安睡在坟墓。

我得知，实际上她病倒以前一直与民族同盟（National League）的各个成员，特别是与它的书记蒂姆·哈林顿协同工作，并且成为有影响的人物。

十二

白花酢浆草，爱尔兰国花。

《全集》（Complete Writings），凯恩斯编，第429页。

几个月以后我再次回到爱尔兰，听说她在都柏林。我前去探望，在纳索街一家小旅店的一间朝向学院公园的房间里等她（这个旅店已不复存在）。一见她走进房门，高大的身材似乎把门填满，我便被一种感情、一阵陶醉的怜惜压倒了。再也不见了美丽，她面容憔悴，骨格凸起，举止间全无生气。我们的谈话变得亲密随便起来后，她隐隐地说到她的某种不幸和幻灭。过去的那股回应他人时的强硬气势已经不见，她已变得柔和、与世无争了。我又一次陷入对她的爱而再也不想抗拒。我再也不去想这个女人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妻子，想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保护和安宁。

然而第二天，我还是离开都柏林，和一位我那都柏林老学校的才华横溢的学生查尔斯·约翰斯顿还有他的哥哥一起去奥奇林·厄尔斯特的某个地方呆了一周或十天，做火气球（fire balloons）玩。我们用棉纸做成这些火气球，然后在田野里追逐它们，随着制造技术的提高，我们的追逐变得越来越长久。看来我没有——完全没有——被俘获；然而不久来了她的一封信，信中略微触及到她的忧伤，诉说她梦中的某一过去的生活。她和我曾是兄妹，住在阿拉伯沙漠边上的一个地方，一起被卖为奴。她还留有在茫无边际的沙漠中长途跋涉的印象。我立即返回都柏林——那天晚上仅仅相见几分钟之后——求她嫁给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不可思议。我走进房间，脑子里装着那件事，没顾上看她一眼也没想到她的美，坐在那儿抓着她的手激动不已地说着。她一直没有抽回她的手。我停止了讲话，默默地坐着，突然感觉到她离我这样近，感觉到她的美。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信心消失了，不片刻她便将手抽走了。不，她不能嫁人——有种种理由——她永远不会嫁人；只是用语言，没有通常使用的戒指，她请求得到我的友谊。我们在豪斯的山崖小路上度过第二天的时光，在贝利灯塔附近的农家小屋用餐，她的老保姆住在那儿，我无意中听到那个老保姆问她我们是不是已经订婚。一天下来我发现我花掉了十个先令，这对我来说可是笔大数目。

我和她天天见面。我给她读我尚未完成的《凯瑟琳伯爵小姐》，注意到她被这段话打动了：“那失去欢乐、放弃一切抵抗的欢乐

有一种欢乐
在丢掉希望，在失去欢乐
在放弃一切抵抗的时候

我想，她已被责任感压得疲惫不堪。我告诉她，自从在伦敦见到她，我开始懂得那个故事的含义：一个女人卖掉她的灵魂买食物给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这个女人象征着所有为政治事业或是失去宁静、或是失去优雅、或是失去精神之美的那些灵魂，而主要是她的灵魂、它看上去那样的不能安宁。那一段时间她没有任何政治工作或计划，我们得以持续相见。突然她被召回法国，她悄悄告诉我，她加入了一个秘密政治社团，尽管她认为其成员都是些自我追求的冒险家，但她无法违抗它向她发出的第一声明确的召唤。我继续留在爱尔兰，多半是在斯莱戈和我舅舅乔治·波利克斯芬在一起，完成《凯瑟琳伯爵小姐》的写作，它已成为象征我那怜惜之情的歌唱。这时来了一封悲哀欲绝的信，她告诉我，三年前她曾收养一个小孩而现在这孩子死了，在她断断续续的悲诉当中，穿插着对一只死去的鸟的叙述，它生病的那天还在

啄育儿室的窗子，及她如何一眼见到之后连忙一个又一个地请医生。

十三

她和巴涅尔的遗体同船回到爱尔兰，早晨六点多抵达金斯敦。我去码头接她，一起去她住的旅店，在那儿我们吃了早饭。人们觉得她为巴涅尔穿的丧服过于正式，觉得她太夸张。我们说到那个孩子的死，她建了一个纪念室，用去她一些资金。“钱现在对她还有什么用？”后来我从另一个人那里得知，她将孩子尸体做了防腐处理。那天和以后的几天里，她再次谈起孩子死的细节——谈话对她是一种解脱。很明显她病得不轻。她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悲伤她有几天丧失了讲法语的能力——她的法语几乎讲得与英语一样好，同时养成依赖氯仿入睡的习惯，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才克服掉。我们一直守在一起，我的精神哲学对她明显是一种安慰，我们常谈到死的境界，很清楚，她在想着她的“乔其纱”（Georgette）的灵魂。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我在基尔代尔街艺术学校时结识的朋友，他就是乔治·罗素。他已放弃艺术，现在是一家布店的会计，因为他意志脆弱，情感性的职业会使之更加脆弱。他见到过许多幻象，其中的一些幻象蕴含的信息后来得到事实的证实；然而，尽管他个人的启示能力常常具有原创性而且作同寻常，他还是在主要方面接受了通神论的结论。他谈到人的再生，毛特·岗问他：“一个孩子要多久才能再生？如果再生，在什么地方？”他说：“可能就在同一个家庭。”我能看出，毛特·岗被深深触动了，而我却让我那更具怀疑的心智缄默不语，就像我在她面前常常做的那样。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一阵良心的刺痛。难道我不该说出“灵魂再生的全部说法都是假定的。它是对世界的一种听起来最有道理的解释，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或类似的话？

我已做出决定，不表露我的怀疑主义。她此时向我讲述一个女幽灵的事，那幽灵穿着灰色的衣服，灰色的面纱遮住脸的下半部分，这形象在她童年时就曾出现过。也许一个人在恋爱时头脑不清醒，否则也许能看穿——凭着突来的直觉——面纱后边的东西。我决定让这个女人随意显现出来。我开始相信，她是个邪恶的鬼魂，暗中打扰毛特·岗的生活，削弱爱的情感而最终制造追求权力和刺激的欲望。不过，如果它得以显现，它就会讲话，它就会把它的诱惑形诸言语，那样她就可以用她的理智面对它，并最终将它破除。依据我所属的教派规则，我制作了一件象征物，将那鬼魂认作是带有另一从属原素的第十五原素的居民，几乎同时鬼魂便显形了。我当然除了头脑中的一个不确定的印象什么也看不见，但毛特·岗几乎活灵活现地看见了它。它讲述它的身世，继续着大概是她沙漠之梦后来发生的事情。它是她过去的一部分存在，现在正寻求同她重新合并。她曾在埃及某处的一座神庙做过女祭司，在某位曾是她情人的祭司的影响下为了钱发布假神谕，为此，其生命的那一部分存在便从这个灵魂分离出去，保留一个半死不活的影子。我原本会将这一切看作仅仅是一个象征事件，表达了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这难道不是威廉·布莱克的“不朽之邦”雷哈布？），仅仅是一种巧合。在通神会（Theosophical Society）的秘传小组（Esoteric Section）时，我学过的秘传之一是，一个与此相同的被分离、半死不活的人形会去纠缠已获新生命的灵魂，寻求那一定是屡遭拒绝的重新合并，我那时还不具备我现在具备的根

据，一种最深奥的认识：对于所有穿过我们的心灵以及甚至我们与之极少联系的那些人的心灵的一切，对于他们的那部分存在我只知道，他们是无形的，难以捉摸的，或许充满着窃窃的笑声，除此我一无所知。

看来她开始需要我了，我毫不怀疑，这种需要会变成爱，它已经在变了。我看着她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残酷的感觉，好像我是个猎手，捕获了某种美丽的野生动物。我们去伦敦加入了“炼金术研习生”，我开始构想我们的献身于神秘主义真理的生活计划，并跟她谈到尼科勒斯·弗拉梅尔和他的妻子珀尼拉。在一个秘密的、专门寻找最深奥微妙的心灵的传道组织看来，超凡的美对他人会是，正如对我总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和神秘的。我注意到，一天晚上我对她说了些恭维话，她的脸色变得暗淡下来。她回巴黎去了，她的表亲，一个年龄与她相仿的年轻女子，在街上碰见我，问我“我为什么不在巴黎”。我没钱。在爱尔兰我花光了我的全部收入，我现在不是尽快地多挣些钱，而是把多半时间花在给她写信上面。可以肯定，如果我把我所有的思想、我所有的希望和志向都告诉她，她就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的确知道，精力还会恢复，我必须为她安排一些工作——一个秘密的神秘宣传机构是不够的。而今巴奈尔的死，如我所想，已给我指出那工作会是什么。我还是同父母在伦敦的时候，这个想法就伴随着我：“哪天回来发起某种类似青年爱尔兰的运动，尽管直接的政治色彩较少。那时我没有想出具体内容，在伦敦的几年里我开始想到某些团体和运动用以鼓励荒诞的文学，或在没有它的地方把它创造出来——艺术家不总是寂寞的吗？——然而现在我想建立团体、影响报纸。我开始对那个新的虚假自我为这项计划辩护，说爱尔兰，它不能支持一种批评性报刊，必须找到替代，不刻那个新的自我又会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虚伪，指出我是在寻找一种不会败坏人心的工作，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即使最必要的政治也不是为了所有人，而多半是为了她——对她的灵魂，我部分是基于她体貌之美来判断的，部分是知道那是高贵的和微妙的。凭着一种感觉，似乎从外部进入我的内心，来得如此突然，我知道爱尔兰公众生活的浪漫气氛已经失去，青年人，也许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将寻求民族感情的某种非政治形式。

我偶尔给索思沃克的爱尔兰青年男女的一个爱国会演讲，听者大部分是职员，以及他们的姐妹和情人。我约见他们中一个精力最旺的人，向他讲述我的新计划。他非常愿意参与，因为他的社团已停止活动。女人喜欢在演讲会上嘻嘻哈哈——她们总是这样，演讲她们听得太多了——而没人能做出另一种演讲。我邀请那些男人在贝德福德公园我的书房会面，谋划一个新的宣传机构，我还邀请一个人与他们相见，我是在都柏林遇到他的，当时他在编辑《都柏林大学评论》。他实际上是在我的提议下被委以此任的，我曾看过他的令人赞佩的翻自德语的译文。他的体形美也曾给我留下印象，就像希腊雕塑。这个人，T.W·罗莱斯顿，结果是罗素(Russell)所谓“亲密的敌人”；没有激情，尽管在心灵和体格方面他看起来是盛放烈火之用的容器，我开始用本·约翰逊的后来考虑他，“一个空虚的形象”，然而在25年之后我不断地默念他的诗句，“在一片平静的灌溉的国土”。他是爱尔兰文学协会的真正创建者——尽管最初的大略设想是我的——懂得所有有关决议与修正案之类的东西。

参见卷一《巴奈尔》一诗的注释。

我有个计划，像戴维斯的老民族书库那样，出一套丛书，而且我发现查尔斯·戈文·杜菲爵士曾向一两个青年“索思沃克爱尔兰人”建议过一个类似的计划。我们决定把这两项计划并在一起，并通过伦敦的爱尔兰文学协会和将在都柏林建立的类似协会组织销售。我派罗莱斯顿去那里，而他召集了一帮学者，许多是我们的政敌，他们决定真正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为他们从属的某个学会筹集更多的钱。我没有考虑过学者，激怒之中来到都柏林，我找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黄油商，他的名字我在索思沃克就已得知，一个协会便在一块黄油桶上酝酿出来，这就是民族文学协会，如今这个组织以其持久与沉闷苦恼着我，与它那如火的青年期相去甚远。

十四

对我将要工作的领域我部分上是熟悉的：那些我离开都柏林前在我父亲的工作室或在青年爱尔兰协会以及奥利里的家遇见过的民族主义者，那些总体意义上的新教徒，还有现在第一次见到的稍年轻一辈的许多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最重要的、确实必不可少的一个人，是约翰·奥利里自己，对于他的支持我确定无疑。他的长期监禁、他与过去的那些著名人物的联系、他的高尚人格以及或许是他那杰出的头脑都曾给了他极大的权威。我不会觉得他是个容易得到的同盟者，也许我根本就不该让他成为同盟者，假如他不曾建议我在那破旧的18世纪房子里订一处同样破旧的住所。在那里我常用整天的功夫让他相信我想要去通过的某项决议的正确性，以及我希望出版的某部书稿的合乎需要。他那曾经激情洋溢的心灵，在监禁与放逐的隔绝状态下，似乎已干枯、硬化成某些不断重复的程式，岩石般地缺乏灵性，当然这些程式终归是他自己的，是他生活经验的结果。我很少否认这些程式的真实，然而它们的实施问题把许多天浪费在争论中。

在重要性方面排第二位的是他的门生，雄辩家J.F.泰勒，一个瘦削、笨拙的人，他的头脑永远被热烈的争论占据着，在有关民族事业的正义问题的争论中，他表现出渊深博大的历史学识。他似乎以数学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由于不善妥协，他恨而且会继续恨爱尔兰的那些实际领导者。如果不是奥利里比他所有的同事都长寿并成为另一代批评家，他们的友谊是不可能的。他具有一种神秘的信念，来自天主教正统观念，逻辑上达到了它最后的极端。他愤怒于——他有时看起来生活在愤怒里——我引用布莱克的话：“那些不能为真理辩护的人注定要为错误辩护——热情和生命也不能让此事停住。”错误不会有任何正当理由。他对诗或绘画一窍不通，尽管他看来能够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以及弥尔顿所有比较有名的片段，而且精通18世纪文学。他懂得的只有雄辩术，一种激情洋溢的抗辩。有时他给我一种精神不正常的印象。

当时还有约翰·奥利里的朋友西格森大夫，他年轻时编过一份爱国主义报纸并因为他的某些神学观点失去了病人。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

约翰·弗朗西斯·泰勒，（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他于1901年10月24日在法律学生辩论协会的一次演讲中为学习爱尔兰语辩护，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阅报室（news room）一章对此有详尽叙述。

“他不愿为真理辩护可能被迫为谎言 / 辩护：他可能陷入套索而被擒陷入套索而被缚： / 热情和生命也不能让此事停住；升起来忧惧，升起来！”布莱克：《耶路撒冷》，见《全集》第628页。

象，尽管一直伴随着一种喜剧感。他说话带有一种奇特的不规则的口音，头发好像是仿照萨尔特·雷萨特斯的卷首插画修剪的，给我一种在无知的人面前表演高贵仆人——一个高贵的外国仆人——的角色的印象。某报当时的确刚刚发表过一篇有关某位丹麦的西格森的文章，因为，该报编辑告诉我，那是他的一位表亲，他将会为入侵爱尔兰的丹麦侵略者积极辩护，否认他们曾焚烧教堂。他家祖上9世纪随那些侵略者来到爱尔兰，此外与丹麦毫无瓜葛。他活跃于每一场论辩，总是回避论辩的思想，有人很快发现，他从不透露他自己的任何信念，而且他在行动方面极其胆怯。“很早以前他吃过自由天主教的亏，”人们这样说。我一向觉得他善良甚至大度，但很快发现——只要我注意——他博学而无学术见地，历史见闻的当中是一个孩童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个艺术鉴赏家，他出访欧洲大陆没有几回，而归来之后文件包里总是装满了赝品。

那些与我长期保持共同感受的无例外地都是在这坚硬的逻辑世界里影响力最小、荣誉最少的。一个叫理查德·阿什·金的小说家，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他住在金斯敦附近的一间小屋，为《真实》写评论。他为人温和，容易接触，是奥利里常说的“我所见过的唯一承认他意志脆弱的人”。我从没听说过他同别人争论，他给人一种幸福的印象。“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如果你不结婚的话”，他说。我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让他写以及说出不受欢迎的真实，当看到他的东西那么不受欢迎，他显得不知所措。一个人因为一种观念而不被喜爱，这使他惊奇不已。

对未来最为重要的当然是道格拉斯·海德博士。还是在伦敦的时候我曾为他的《火边》和《康纳特爱情歌曲》找到出版商，这是在文学里首次使用康纳特（Connacht）农民的英语方言，它唤起了我对这些书的想象。他的才能天生的属于叙述和抒情，在我们的委员会上，无论怎样，只要泰勒或奥利里争辩起来，他便给我一种羞怯或困惑的印象。他同农民的长期关系，他童年在厨房的地板上跟一个老人学爱尔兰语时在农舍里记下的那些歌曲和故事，给了他——即便一个强壮男子——那样一种狡猾，那就是弱小者的力量。他总是施展外交手腕尽可能避开显要的位置及同伴的亲昵，那样可以使他逃离妒忌与贬损。一次我在他那里作短暂停留，他告诉我，我是在他家呆过的唯一的来自都柏林的人。“他们总是想把我引入他们的争吵，”他说。他也从不谈及他的真实思想，但与西格森不同，或许是不能，因为他的头脑是随图像运转的，的确这本身就是一种前提，但永远不是争论。以后的几年里，盖尔人的政治需要毁掉了他的风格感，损害了他自身的直觉。他停止使用那细腻的、情感的方言写作，而以粗糙的推理作为写作和讲话——当他公开讲话时——的起点。

我依稀记得两个人的形象：科菲博士，天主教医学院院长，现为那所新大学的名誉校长，还有理查德·奥多纳文，现在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某种官员，他俩都是受人爱戴和尊重的人。

我印象中当时曾推荐某个音乐家进入委员会，他们明显地露出难色，原因是某种决定性的理由反对他入选，但那理由他们都不愿说出口。最后一位委员私下告诉我，那个音乐家曾拐跑别人的老婆。“对，”我说，“许多年之前，那个男人阳痿，并且精神错乱，以为邻居们正在他房子下面挖洞要把它炸掉。”这个话题马上就被转移了，即便在私下里也“没人愿意谈那事”。

那时有两个青年小组，一个是政治小组，这个小组支持我，甚至在我攻

击他们喜爱的政治文学时也是——奥利里的友谊对他们就是足够的保荐，而我本人也不是他们的竞争敌手；一个是文学小组，由所谓“泛凯尔特协会”成员组成。这个协会遭到公众嘲笑而消亡，因为它有一项规定，其成员如不在他们名下署协会名称就不能发表任何东西。他们的诗作主要见于乡村报纸，没有令人激动的赞扬。我几乎从一开始就对这些诗人怀有敌意，这种敌意很可能得自某次激愤时刻的无谓批评。

那时还有 C. H. 奥尔德汉姆，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加入我的协会，但没担任正式角色，“巴涅尔死后，我就失去了信念，”他说。他有许多幅毛特·岗的照片，挂在星期六晚上他主持的讨论会会舍的墙上。他以后作为她的朋友在实施书库计划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在重重阻力中为委员会收集大量的图书。他一向粗鲁，没有恶意或坏脾气，只是由于神经粗糙，然而他自己却极度敏感。每当有人指出这点，我便习惯性地引用一本魔术书上的话来回答，“这只蛤蟆如此胆怯，只要你对它皱眉一刻钟，它就会死去”，而当我回首往事时，他留下的是一段愉快的记忆。他有一个精力旺盛且相当漂亮的脑袋，由于比周围与他兴趣相同的那些人更清醒，他在那好斗的人群中显得最为平和适意。有时被古道热肠之人弄得不知所从，他那孤助无奈的样子惹人怜爱。

凌晨三点讨论会后步行回家，他曾看见邻居家厕所的低矮屋顶上有块毯子似的东西。“邻居蓄水箱的盖子被刮掉了，”他说，然后找来一只耙子，动手把它耙下。它站了起来，是邻居的女儿，她从卧室的窗户爬上厕所的屋顶看星星。另一夜，他回来见邻居家女佣人放一青年男子出来，立即写了一封道德劝诫的信寄给她。他第二天接近中午时起来，自信做了件好事，却见邻居家正门外停了一驾出租马车，那姑娘的箱子吊在上面。因为不识字，她把那信拿给了她的女主人。我最后的记忆来自一个朋友的描述。我的朋友在西部的一个小港市，住一家小旅店，那旅店刚到了一批受某政治团体之邀的法国来访者。我的朋友听到下面大门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向窗外望去，看见奥尔德汉姆和一个男孩，怒气冲冲的女店主正宣讲说她这辈子从未受到如此非礼。奥尔德汉姆和那男孩肩上挂了两根绳子，前后吊着许多很少在白天带着走街串巷的瓦器。奥尔德汉姆解释说，这批突然到来的访问者一定感到这家旅店设备简陋：“我必须考虑”，他说，“我的国家的名誉。”

或许我这样写那些终究是帮助完成一项重要工作的人们，看起来不够友好，毫无疑问，他们向他们桌边的常客显示了他们不曾向我显示的美德。而多年之后回想往事，知道把他们关在他们的坟墓里有多难，我愿雕刻一块石碑放在他们头的上方，那样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来烦扰下一代人。他们的爱国主义极其伟大，这项未竟之业驱使他们对于超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事情发表意见。一个人并非总表现得完美无缺，当他说“我必须考虑我的国家的名誉”这话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们总体上是敌对之人，尽管为一些临时理由是同盟者，他们是令人生畏的，因为他们能够凭借某些似乎除我以外人人接受的前提做出的不可抗拒的推论将我的真实逼退。因为我如何能够以争辩证实，比如说，某些犹豫不定的节律比政治演讲的坚决的节律更接近心灵，或进一步说，这样一个问题的意义？热衷于宣传，我疏远了艺术家唯一的朋友——

“尽管掘墓人操劳不断，铁铲尖利，肌肉强健，/ 他们只把他们埋葬的人 / 又一次塞进人类的内心。”出自诗篇《本布尔本山下》，参见卷一全诗译文。

时间——它的旁边聚集了人们的纯净的感觉。

十五

《联合爱尔兰》是份巴涅尔的追随者办的报纸——那里总能发我写的东西，也总能找到对于重要文学作品的讨论。那个曾写过一本童话故事的愉快而懒惰的编辑，将报纸的主要控制权交给了约翰·麦克格拉斯，一位25岁上下的青年，以一篇著名文章为人知晓，文中指责那些反对追随巴涅尔的人是巴涅尔的谋杀者。为帮助我，他以“都柏林是爱尔兰民族的理性之都吗？”为题发起一场论争，决定要探讨的不是那种最有能力的爱尔兰人是否住在都柏林的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视都柏林为理性之都，而后永远接受它的领导，这难道不是爱尔兰人的责任吗？”我们得到所有民族主义报刊的支持，一个新爱尔兰，他们告诉他们的读者，诞生米切尔（Michel）和戴维斯（Davis）的爱尔兰回来了。

海德博士的一篇演讲《爱尔兰非英国化的必要性》，导致民族文学协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形成，而不久之后这个小组委员会，如我所料，被理事会忽视，蜕变成盖尔人联盟。我们把一个晶体丢进化学溶液，这引起整个液体丢弃它的晶体。伦敦社交界没有谁具备道格拉斯·海德博士的影响力，但有许多能够在英国和美国报刊上赞颂我们的工作的青年撰稿人。我们的信心无可限量；我们首次会议几个月后，我们的运动史就被写成书出版了，一次去伦敦，为阻止我们那里的小组委员会采用一条通告，我颇费口舌，此通告是这样开头的：“爱尔兰，尽管有着富于戏剧天赋的人民，还没有一位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家，但爱尔兰文学协会一小组委员会坚决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来临。”

毛特·岗能做的工作，我从开始就很明确。她应走遍爱尔兰建立分支机构。她拥有美貌、口才和足够的旅行资金，在生活单调的乡村小镇谁能限制她的影响？“成为这场理性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代曾对她说。一位律师事务所里的年轻人，亨利·狄克森——没准他的孙子或孙女可能会在我的读者行列之中——想出一个很好的计划并允许我把这计划当作我自己的。我们将把它发送给那些要成立分支机构收集爱尔兰文学书籍的男男女女。作为对这些书籍的回报——我们决定，朋友们的赠送之外，收集品中还应包含价值几英镑的新书——他们将安排一次公开演讲，门票收入的半数归中心协会。那样一来，这项计划就会部分地做到自我支持，而那些协会将会成为出版物的销售中心，不久之后他们也许就会受到我计划中的旅行剧团的光顾。我打算以一部关于罗伯特·埃米特 的生活与死亡的戏作为开始。

我一生绝无仅有的一次成为大众名流，我的名字为众人所知晓，也受到贤入学者的厚爱而被提及。斯坦迪什·奥格雷迪，他的《爱尔兰的历史：英雄时代》激发过我们所有人，他给我看他正在写的一本新书 中的一段——面

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

斯坦迪什·奥格雷迪（O'Grady, 1846—1928），爱尔兰历史小说家和文学史家。所著爱尔兰英雄故事很受欢迎，获“爱尔兰文艺复兴之父”称号。

《天使的飞翔》（1897）。

对斯利夫·富埃德（Slieve Fuad）山的沉思。他说，里边谈到的青年——他曾是那么不值一提，现已强大起来，扶助或者征服——很适合我的情形。一次为建立分支去阿尔斯特考察，在那儿他们让我访问某位工人的妻子，一份儿童报纸的爱国主义故事的作者。我发现她以及她的四个孩子都穿着节目的漂亮衣服，向我致简短欢迎辞之后，她转向她的孩子，说：“等你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要告诉他们，你们曾经见到过这个人。”

十六

我在制订这些计划——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爱国主义内容与对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的更强烈的欲望——并等待它们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而此时毛特·岗已找到更令人激动的工作。巴奈尔死后，土地战争（Land War）中遭驱逐的承租人被他们的领导抛弃，或者看起来如此。美国那边的财源已经断绝，爱尔兰的政治能量已被巴奈尔的追随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吸收。她一定感到对这些承租人员有责任，因为她曾是劝他们参加运动计划（Plan of Campaign）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她开始在法国为他们的利益演讲。她谈到爱尔兰的冤屈，更谈到那些因试图作毁公共建筑入狱的爱尔兰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服刑多年，健康状况不好，据说已有7人或17人精神失常。没有一个爱尔兰党派愿意管他们的案子，怕导致自治运动向英国选民做出退让。或许她的演讲，除为被驱逐的承租人带来一些钱外，会使得英国因担心她在法国的好名声而释放一些人。

她的演讲首先在巴黎而后在法国各地举行，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迈克尔·达维特伸出援助之手，他来信说：麦格纳德已将《费加罗报》供她使用。无论在哪里，从年老的报界人士到青年学生都在谈论英国的残酷，英国使馆开始表现出不安。她的成功让我感动，我高兴地读到她的“神秘的眼睛”：它引得某位报界人士说，那里边蕴含着尚未到来的胜利的阴影。我也知道这眼中的冷漠神情，常捉摸它的含义——是心定与其象征体同在的智慧，是她的美，抑或思想空洞？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那是对大众感情的掌握，下院议员们经过将近9年的争吵把它抛弃了，却要交到她的手里。那一时刻，我妒忌所有那些安排她演讲的不知名的帮助者——她也不曾对我讲过一个法国朋友，见她不快，建议她搞了第一次演讲？而当时对如此之劳苦我看不出足够的回报——多几个承租人得以返回，或许有几个炸药犯获得释放——开始梦想知识分子与政界力量之间的协和。她的辩才，以其富于情感的力量，感染了她自己，也感染了某种不可控制的东西，某种从来不可能协作的东西。就像海德后来做得更加成功的那样，我也开始争取那被抛弃的领导地位。

我在都柏林圈子的人更是没有鉴别力。奥利里只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在寻求刺激，萨拉·珀瑟小姐展开了她的形象化解释，说道：“毛特·岗在巴黎

叶芝把古利安（Gullion）误作富埃德（Fuad）。富埃德是《天使的飞翔》中提到的迈尔西安·德鲁伊德国王，斯利夫·古利安是一座由“恐怖三王后”守护的山。那个青年被描写为“用他的右手扶助弱小，用他的左手屈服强权，而暴君们颤抖于他那柔和的目光之前”。斯坦迪什·奥格雷迪《文章及作品片段选集》（都柏林，1917）第339页。

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土地联盟创始人。

弗朗西斯·麦格纳德（1837—1894），维尔梅桑死后任《费加罗报》编辑。

谈政治，跟你谈文学，到马匹展览会上她就会把一群牝马说得呱呱叫。”我总是替她辩护，尽管非常不安，常说，“你们谁也不理解她人格的力量。”她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爱尔兰，常常去西部，那里由于她的努力及影响，所有参加某个联合体的承租人重新获得他们的住宅与农场。在都柏林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一起，她为我们的乡村分支收集图书，我想，七个分支有三个是她建立的，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全部。然而她再也不可能成为那种“热心的支持者”。到某个政治计划进入她头脑之前，她一直是我爱的女人。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被狗和马包围着，我却渐渐知道了她的许多善行——超过工作年龄的老年男女总来找她，并且开始注意到她侍弄鸟或其他动物的耐心是我所不及的。我可以陪鸟兽玩上半天，但对它们的冥顽缺少耐心。

十七

她看来理解我艺术上的每一细微之处，特别是我的全部精神哲学，我还是整个沉浸于威廉·布莱克，有时她说我把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我们做了大量象征实验，她总能立刻进入半迷睡状态，一切都看得非常分明。我总是通过象征手段试图把她的心灵同灵魂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首先是同灵魂的平静结合起来。有两幅幻象令我吃惊，它们预示着在她生命中尚未显现其身的几种精神状态。我告诉她，有生之年我们在某些特定时刻能够进入天国的不同境界。我们会永生栖居在那里。我召来一个适当的大使形体，问她有几重境界。她说：“他正跟我说我是在地狱里，但有一天我将能进入三重境界，尽管我现在还不能。”而后他向她显示三重境界：一座花园，欲望几乎已被满足的境界；有一棵歪倒的树的林中之地，“永恒的安宁之地。这对所有人的灵魂都十分短暂”；一座高山，山上有蜿蜒的路和一个十字架，“神圣之爱的劳作境界”。

几个月后，她又一次来到都柏林，我发现她连那些境界的数目都忘了，这时有人向她显示了她曾跌入的地狱：一片茫茫大海，像溺水者伸出的手臂——也许是对布莱克的绘画的回忆——欲望未满足的境界；一座巨大的悬崖，群龙徒劳地往上爬着——连续不断的攀爬与跌落，渴望未满足的境界；然后是一片巨大的空寂之地与被扯落的玫瑰花瓣，报复的境界。我宣读我做的原始幻象的记录并指出它们的对应物。”永恒的安宁”是未满足的渴望的对立，是对“神圣之爱的劳作”的报复。

现在又是那个灰女人，非常邪恶的样于；而毛特·岗曾认为她仅仅是忧伤。她突然对……夫人——一位朋友，毛特·岗处于半迷睡时她正在场——开口说话，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杀害儿童的凶手。另有一次，这位朋友，一个虔诚的女人，在毛特·岗的幻象显示中途突然尖声叫起来。她发现自己正在地狱的火焰之中，以后几天里她觉得到处都是硫磺的气味——她说早晨她的毛巾闻上去也是这个味。她非常爱毛特·岗，当然不怀疑我们搞的是恶魔的勾当。她想这是对她的一种警告，因为她没有加入天主教会。几年后她以天主教徒的身分辞世。我现在相信毛特·岗下意识里深信不疑她灵魂已经丢失，

“我将不再谈论书本或是那长久的战争 / 只是走在枯干的荆棘旁直到我发现 / 免遭风吹的穷人，在那儿 / 应付着谈话直到她的名字出现。 / 如果有足够的衣穿他就会知道她的姓名 / 并且很愿意回忆过去的事情……”
出自《她的礼赞》，《诗集》第 169 页。

尽管在意识层她的心灵排斥它所有的伴随象征体，但在那些与她的心灵和谐密切的心灵中。这些象征体却能够显现出来。或许真有两派不同的精神在为控制她的心灵进行着一场较量，向上帝推进的一派使得另一派具有了恶魔的外形。我在那个女人间到硫磺味时使用的名字是神圣的天使长和大使的名字，这些名字联系着神秘教义三个最高的塞菲罗斯。

我听到大量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比较粗俗的立即予以驳回，而一条经久不断的传闻我以这种想法把它打发掉：“如果这是真的，她早就告诉我了。”我们的心灵仿佛最亲密不过了，对于我们的婚姻看似已悄悄地远去的事实，我以自己的不成熟和缺乏成就来解释。一夜正要去睡觉时，我突然看见一支套管和一个不成形的白乎乎的东西，感到疑惑了解。第二天路过一家烟草商店，我看见那是一块尚未制成烟斗的海泡石。她是完满无缺了；我不是。

十八

我开始厌恶她的政治，把它当作我的一个看得见的竞争对手。一天，她把一整天的功夫花在玩一只某人从多尼戈尔送来的鹰，我感到挺高兴，为了玩，她放弃了一次政治决策会议。她所感兴趣的那个候选人因六张选票之差败北。“但是为了你”，她说，“他原本会回来的。”我们拥有的时日如此可怜，我对一个爱尔兰议员应该值得我们毁掉更多时间的想法嗤之以鼻。我想，我已开始组织的力量，以及类似的力量，可以解决所有那些事情，这里需要的只是时间。我们有过一次争吵，甚至在她去法国再次返回之后，仍有一些疏远的感觉。我这里深为感动的是，她看来对我的工作，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争吵，看得太淡。在她这不过是朋友间司空见惯的惹人心烦的争执，她以其落落大方的老练从不介入。我相信爱尔兰的理性未来正在存亡攸关的时刻。

查尔斯·戈文·杜菲爵士此时已经到来，我发现他不是我所期望的一个平等条件下的助手，却有一股盛气凌人的固执，全然没有我看得出来的修养。他想出版的书都是那些由于时机不对在他青年时期未能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政治伙伴或早已死去的朋友的著作。一段长长的争吵之后，我使得海德博士和T.W.罗莱斯顿在戈文·杜菲下面任命几名编辑代表两个团体，并通过这些编辑，或通过我劝伦敦协会选举、我自己恰好也是一个成员的咨询委员会，开始发出许多建议。海德博士的《盖尔文学史》、斯坦迪什·奥格雷迪的《沼泽和星星》以及某些关于斯威夫特、戈德史密斯的传记就是经此途径加入这套丛书的，这套丛书如果不是因主编另选的那些书而于几年后天亡的话，将会为大众教育做大量工作。查尔斯·戈文·杜菲执意于托马斯·戴维斯的一部精采而未发表的历史著作——其精采之处在于那是一篇某学会的活动记录，而我们的计划如此成功，人们来得及读此书之前我们已卖出一万册。不幸的是，他们读了以后，便打定主意同我们或我们的书不再有任何关联提些建议，我还有个不大体面的任务：阻止戈文·杜菲决心已定的那些书的出版。西格森大夫和J.F.泰勒站在戈文·杜菲一边反对我，这个运动很快就分裂了，年轻人总体上支持我的立场。同杜菲一样，在西格森和泰勒看来，

塞菲罗斯 (Sephiroth)：“神秘教义的哲学中的十个人格化的同性或发散物，据此上帝与常人建立起联系。”《牛津大辞典》。

爱尔兰或许在一场争论中只有一方。我希望用出色的写作将此变成一种体验，并能说出沃尔特·惠特曼那样的话：“我令人信服，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那样令人信服，”而这如此容易办到，难道爱尔兰不需要变得难对付些吗？而且，泰勒那具有骑士气概的想象力被一位老人的景象所触动：这位老人在生命的尽头转过身再次肩负起他年轻时的爱国工作。我充满着太多的年轻人的不耐烦，绝难触动，于是发起对青年爱尔兰的文学——首先是诗——的攻击。在某些委员会的会议上，大概是有关《民族精神》——一本当时已出第十五版的政治诗集——的功过问题，常常使得我们撇下该做的事情，而泰勒和我——奥利里站在我一边——之间有时闹得如此之凶，我看出房间里有一些陌生人，他们为消遣或同情被吸引进来，却没人顾得上把他们清理出去。

在反对我的人中间那些比较聪明、受过较好教育的，并不认为青年爱尔兰文学十分令人满意，但他们说，那是爱尔兰的全部所有，如果我们承认它的缺点，英国就会利用这种承认。这类论调让我愤怒；英国曾只限制了爱尔兰的手脚，他们要泯灭她的智力。其他人或许相信，如成千上万的人所确信的那样，《民族精神》的伟大程度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抒情诗等同，他们说我不喜欢它是因为我受英国人影响，或许是英国颓废诗人的影响，而我要说正是他们，那些生活就是在错与对之间争论的人，即使在睡梦中也逃不出英国去。我是以一种认真的态度理解这一切的，这种态度为我那几年更易忍受的日子增添了乐趣，使自己相信，就像若干年前在某个学校辩论会一样，我是同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站在一起的。或许对泰勒、对西格森而言，我不过是一个日空一切的年轻人，打扰了献给一位处于职业生涯尽头的政治家的美好敬意。而我这边，却因妒忌而恼怒——每一个走近毛特·岗的人都让我妒忌，因那纠缠不清的求爱引起的精神紧张而恼怒。为乡村书库选书的小组委员会上的讨论很快就将自己的面目展露出来，有时会议在她的起居室举行，那些会就长得没完没了。

十九

我觉得泰勒和我常常表现欠佳，我毫不怀疑自己因为年纪轻，少有约束，情况更糟。我注意到，他的坏脾气，这点尽人皆知，只会给他的头脑增添活力，而我，结论不是来源于合乎逻辑的论辩，而是一系列细致的感受，总是陷入混乱和自相矛盾，或者由于夸大其辞使自己的事业受损。就连奥利里——尽管在他的高贵中占有一半份量的高傲使他拒不认为他的事业对二流文学或者半吊子批评或者甚至对自觉的辩护有任何需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细节上反对我。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不安的。我发觉如果许多人指责一个人虚荣、做作、无知，他就被塑造成一个可耻的形象，因为不易察觉的自我厌恶，他的灵魂很难获得解脱。

不久我与毛特·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吵。争吵的前因后果在记忆中已模糊不清，但某些盘留心头的意象格外分明，我记得她搬进那套对我们将是那么不幸的住所。这些房间由两个不大整洁的女人照料，她们以极端谄媚的方式接待她，把一间屋子里的几扇窗户都挂上厚厚的窗帘，桌上铺了四周悬垂、色调暗淡的台布。我记得她看上去多么的漂亮，我在泰勒面前的表现多么的糟糕——我才跟他争吵过，而那只是开始，争吵的是老问题。我想当时我反对他为乡村书库选出的大量爱尔兰演讲著作，当着他的面。我对那似乎

在某个方面触及到他的才能的浮华文字坚持提出我的反对意见。我本来就恼怒不堪，又加上对他的妒忌，并非由于我认为他是个求婚者，而是因为他似乎要在有些事情上影响她的心——我相信那里本应由我来单独发挥影响的；但我接受她所说的一切，并在她的责备之上加上我自己的责备。

数日之后，她患了一次感冒，结果发展成肺充血，我还是不能被西格森大夫容纳，我和他不久前因查尔斯·戈文·杜菲爵士吵过一次。同时她的慈善对象之一，一个失去健康的面色如土、双手潮湿的女人，发现那两个老妇人让门开着以省去她们听到铃响还要开门的麻烦，就楼上楼下地跑，自己承担起保姆的职责。因为需要更好的帮助，医生收下了她，我安排好每晚在一处公园同她见面，从她那里我得到我每日的消息。近来的消息变得令人吃惊。我将不再去想毛特·岗——她在找岔吵架——她爱上另外一个，实际上也许是两个人，因为病成这样她仍决定赶回法国以出席他们的决斗。毛特·岗甚至不许他们在她到达之前或在她客厅以外的任何地方决斗。在其他场合她总告我再也见不到毛特·岗了。

不久梅·岗来到都柏林，从她那里我得到了更加可靠的消息。毛特·岗就要走了——她病得那样利害，将被抬到火车上，医生也写信反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听不到，后来听说——不再是谣传——这位被保护人（我是第一个对她不够热情亲切的人）曾反复传说我的事情，显然不如那些她亲口对我讲的事情让人觉得具有戏剧性。近来我发觉到处都在流传一个可怕的故事。说我是毛特·岗的情人，曾有过一次非法手术，手术中间我一直在场。这个被保护人属于那种离开刺激就活不成的邪恶女人，她可以在她自己的心里找到需要的那些刺激。后来毛特·岗亲口对我说，她如何半夜醒来发现那双眼睛——我记得那双呆滞、总是潮乎乎的眼睛——正俯视于她脸上的上方。她曾叫她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不，我不能走，”她答道，“西格森大夫说你随时会死，我要等到你死的那一刻。”一次来了另一位客人，一位老爱国起义者，这回是他发现大门开着，也曾爬上楼梯，他坐在这个生病的女人躺着的沙发旁、不禁感到悲伤，这悲伤里交织着众人参加葬礼的景象。

二十

我去斯莱戈寻求再度唤起我的勇气，凭着《进入黎明》中的诗句：难道露水不再闪耀，尽管爱已衰退，“燃烧在中伤之舌的火焰里？”当我在最近或早些时候的访问之后到达斯莱戈之时，奥利里用这些话来迎接我：“喂，我警告过你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现在都在嫉妒你。你早应该听从我的劝告。”他竭力劝我不要接近那些年轻人，而我带着我父亲的民主观念，他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沃尔特·惠特曼的记忆——为了一种半下意识的引导，却哪儿都和他们在一起。如同他们中的一个。和这些年轻政治家在一起没有任何害处，他们支持我直到最后，但现在我发现那些写诗或写文章的全都反对我。他们曾欢迎我对“青年爱尔兰”的攻击，因为他们一向坚持我们对于新文学的需要，然而由于现在同杜菲不合作，他们成了我的批评者。他们拒绝把毛

毛特·岗的表亲。

“你的母亲埃拉总是年轻，露水永远闪耀，黎明也已发灰；尽管希望将你背弃，爱情也已衰退，燃烧在中伤之舌的火焰里。”出自诗篇《进入黎明》，首次发表于1893年7月29日《民族评论家》。

特·岗和我收集并选入中心协会书库的一批图书转文给那些乡村协会——那些协会对他们有什么用？他们不断重复泰勒对我的无知做出的攻击。他的那些作者我知道得很少——洛克、斯威夫特、格拉顿——并对历史一无所知，而我真正了解的作者——布莱克、济慈、雪莱，所有的浪漫派——他却予以忽视或不屑一顾。

和那帮耗去大量时间、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而别无所得的始终支持我的政治青年一起去某家酒吧时，在那儿我想我什么都没喝，我震惊于他们在女招待跟前谈后的猥亵。那个最聪明的，表面上最无礼、说话最放纵，这看来就是他总不刷洗的衣服及其总也不刮的下巴的一部分。

我给民族文学协会的一个小型会议带去艾利斯和我刚编辑出版的威廉·布莱克的三卷注释本。我很骄傲；终于有了本重要的书；甚至显得有点博学的样子也未可知。西格森大夫拿起第三卷，里边出现预言书的复制品，他向所有在场的人解释说，这本著作里的许多粗野形象是绝对出于艺术的理由而复制的。

莱昂内尔·纳翰逊来到爱尔兰，我带他去同代人俱乐部，这地方我回爱尔兰之前已向他描述过，说那是个谈话的绝妙去处，而他拒绝讲话，说那里里外外的每一个人都对他讲一些糟糕的话。自从我离开伦敦，他染上了喝酒的习惯，而当他住在我的住所时很快又有一种习惯：和约翰·麦克格拉斯以及与我同住的房客另外还有六七个人一起坐在桌边谈论政治和宗教直至早晨四五点钟。记得一天凌晨四点我离开他去睡觉，当时他的滔滔不绝看来不比任何人逊色。他笔直地坐在一群姿式各异、懒洋洋地或躺卧或倚靠的处于陶醉状态的人中间，我离开时他正说道：“除了神圣罗马天主教，我什么也不信奉。”

一天夜里接近凌晨一点，我去同代人俱乐部时发现我的朋友酩酊大醉，他热切地挥舞着手臂对所有那些政治家——他们中几乎没有哪个知道报纸以外的任何散文——说：“你们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8 世纪结束后就没有了英语散文？”

二十一

我那时有个水晶石，我给许多人演示，教他们怎样往里看。我还让更多的人按我的仪式要求的方法看幻景。大部分人都出神了，栩栩如生地看到我所说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那些幻景常体现出了我自己的思绪——常有些女人看到我和一个美人结婚。我自己的预言却从没有那样幸运，因为塔罗特牌常常预言灾难；年轻的博士有一种幻觉，似乎朦胧地预示了我后来的生活。代们住在一起后，他要我答应永远不再让他看幻像，也永远不许他这么做。一天晚上我正在让另一个人看，他求我也让他看看。我拒绝了。几天后我又当着他的面做实验，突然发现他入神了。我询问他，他说在一个小希腊庙宇，一个女人，许是女神南吧，从庙里走向他。她带他进另一建筑

此话含义不明。

占卜用的牌，共 22 张。——译者注

在初稿中叶芝这样写道（后删去）：“我每周最多花一英镑，先和一群神学家一起住，后和约翰·奥勒利（John O'Leary）同住，后来是和一个小年轻博士住，他管家。”

物的大门。这时他觉得自己站在一间白色的大房子里，屋里一头放着一个空空的宝座，另一头有扇门吱吱嘎嘎地响。显然有人刚刚从门口走过。我说，“跟上去”。他进了门发现自己站在另一个相似的房间里，门也吱吱嘎嘎地响，再走进去发现第三间白色的房子，第三个吱吱嘎嘎的门。他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我说“光明”他则站在一个空荡的坟墓前，刻有铭文的墓碑靠在墙上。我让他念铭文，可他正要念时却回到了第一间房子里，看到宝座和一些椅子都翻倒过来，乱作一团。他醒过来我问他看见了什么，他答道：“一个女人从庙里出来给了我一杯酒，别的我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了他他所描绘的景象，还说他刚才并没有提到一杯酒，然后问道：“你认为这些意味着什么？”他说：“也许是女王去世吧。”他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可对于我来说含义不是这样的；尽管不管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懂这些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我正要到公园里见歇斯底里的保姆。然而为什么出现敞开的、刻有铭文的墓碑？我真的找寻过除了坟墓我必须找寻的东西么？

二十二

谋生愈发艰难。我每周最多花一英镑，可如今我却很少挣到这么多，心里很是着急。由于缺钱，我的工作受到干扰，不得不听任伦敦社团做我反对的事情。因为我付不起去伦敦的车票。帕奈尔运动失败后爱尔兰党分裂，各派均有一份报，各自也只有原来一半的发行量，因此不能登载诗，甚至评论也不行。我出外了一趟，回来发现一个叫梅由（Mayo）的小伙子住在我的房间了。那位年轻的博士对他显然像以前对我一样宠爱。我收拾了一些书和报纸（我仅有的财产），去了伦敦。我在贝德福德公园的家里和家人呆了一阵，老是跟妹妹吵架。

二十三

我受性欲的折磨，好多年都如此。我常想有一天我要把它全写在一本书上，聪明的年轻人不去像我一样认为这种羞耻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那是从我15岁时开始的。当时我游完泳，躺在第三罗西斯的沙滩上，用沙子覆盖身体进行日光浴。沙子的重量顿时刺激了性器，尽管起先我并不知道这种愈来愈强烈的奇异的感觉从何而来，直到高潮时我记起别的男孩的描述和我祖父的百科全书中的描写才明白是怎样回事。许多天后我方知如何重新获得那种美妙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常常努力克制自己，而最终还是回回精疲力竭。正常的性行为对我的影响并不比别人更大，只是对于我来说十分稀少，而且回回都糟透了。这让我讨厌自己，最初由于骄傲，也许还有些因为缺少机会，那时爱也使我抱定独身的念头。

27岁我回到伦敦时，我觉得我的爱几乎是无望的了。我也知道我的朋友们都有了情妇，大多数还在需要的时候带妓女回家过夜。亨利（当然啰）嘲讽另外的任何一种生活。自孩提时代起我从未亲吻过任何一个女人。在哈默史密斯我在空旷的地铁站里看到一个妓女在来回走动，我想到过要她，但是

1890年12月后。

斯莱戈的罗西斯波因特（Rosses point）。

那个念头又回到我脑海中，“不，我爱的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二十四

在一次有五、六十位客人参加的作家晚会上，我注意到对面两位著名小说家中间坐着一位大美人。她长着标致的希腊式的脸蛋（尽管肤色较希腊人稍黑一点），一头秀发乌黑发亮。她胸前装饰的花边似乎很旧，但显得十分别致。她与我曾仰慕过的伊娃·戈尔—布思有着同样叫人心动的超凡脱俗的美。她看起来像是与我年纪相仿，然而我觉得她的美绝世无双。没有人介绍我们认识，我发现她与诗人俱乐部的一个成员熟识，并且曾问起过我的姓名。

我开始写《心愿之乡》，半是支持我的一位新朋友，佛罗伦斯·法尔小姐的侄女，同时也写进了自己的沮丧。我不明白毛特·岗为什么要离我而去，除非她这样做是出于某种不明确的愿望，正如我剧本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想要过一种不现实的生活，追求一种永恒的刺激。还未写完该剧我就去了巴黎，与麦克格萝格·马瑟住在一起。他娶了柏格森的妹妹。他尚未变得颓丧，但我已注意到他的召唤带着一种危险的倾向。一天他和妻子关起门来一起召唤，努力想要影响世界政治（我现在这么想），按他们的宏伟梦想重新划分国家。那天我注意到他要咯血。他收入微薄，一年只有某位神职人员提供的三四百镑，还要供应和他住在一起的所谓的兄弟姐妹。当然，我感兴趣的主要还是毛特·岗。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离开法国。我得知她又病了，我去看了她。我们很友好，但已没有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了。还记得和她一起拜访朋友时，我看到她爬楼梯时步履艰难。她已经没有继续参加神秘主义团体的活动了，她说十分厌烦，很快就全部放弃了我们所深陷入的圣经的象征主义。可麦克格萝格·马瑟是她忠实的崇拜者。时间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走来走去默念着剧本时，柏格森来访了，穿得十分考究而得体。他只是位不知名的教授，麦克格萝格·马瑟很不耐烦。我给他看了所有的魔法。可他就是无动于衷。有时夜晚我们玩一种四人玩的怪棋，我和马瑟太太配对。马瑟说他有分身术，下他对家的棋时他要么用手蒙着眼睛要么盯着对角的空椅子。我觉得他十分快乐、随和，专业很精通，可不算个标准的学者。有时他下楼时手捧贺拉斯的诗，或是麦克弗森的欧辛集，要是你怀疑欧辛集是否新颖他就生气。

二十五

1894年初。

《纪念伊娃·戈尔—布思和康马基维茨伯爵》中的妹妹；天生丽质，“一只瞪羚”。伊娃（Eval870—1926）献身于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1894年底叶芝才遇见她，不过曾在斯莱戈见过她。

删去了“她进来戴着的帽子上写着马格丽特·维隆”。

演员爱德华·埃默里之妻。1899年首演《凯瑟琳伯爵小姐》时，她主演阿丽尔。1890年时芝认识她时她在演托得坦特的《一个西西里传说》。她是金色黎明社中的主要成员，后来她退出舞台去了锡兰，在一个吠陀派神学院任教，于1917年4月29日在那里去世。叶芝写了《众魂之夜》纪念她。约翰·叶芝在《佛罗伦斯·法尔、肖伯纳和W.B.叶芝》一书中的序言中这样写到叶芝和佛罗伦斯·法尔的关系：“他们短暂的恋情因她感到厌倦而中止”。

1894年2月。

从法国回来时我的一部戏上演了，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的朋友佛罗伦斯·法尔管理得当，演出持续了近七周。当时一个诗人俱乐部的成员介绍我认识了曾见到的、当时坐在两个著名小说家之间的那位女士，并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渴望这种友谊能保持到有生之年。这本书里我不能给出她的真实姓名——戴安娜·维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也挺适合她。我去见她时她说：“某某人似乎不愿介绍我们认识；看了你的戏后我决心给你写信，要是没有别的方式认识你的话。”她知识渊博，懂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看上去总是十分从容；性情温柔好思考，似乎只喜欢闲适的生活以及与朋友聊天。她丈夫我只见过一次，比她大得多，像是有些肥胖而没有一点生气。那时我还不知他们关系根本不好。我向她讲述了我的苦恋，那时这的确日夜萦绕在我心头。

二十六

生计还是个问题。我去斯莱戈在桑希尔与舅舅一起呆了六个月。回想起来，在拜访之初，我能服侍他，并且对那些未知的力量更坚定了信心。有传言说山上某处流行天花，后来知道传闻是假的。舅舅一向怕死，于是决定重新接痘。我不相信传言，也不在乎是否真实，但出于好奇心，我也接痘了。看来接痘做得很糟。舅舅血中毒，我也恢复得很慢，幸好没有大病一场。不久舅舅昏迷不醒，家庭医生叫了其他主治医生会诊。一天晚上病情加剧，大约在十一点钟，我走进舅舅房间坐在他床边。他神志昏迷发着高烧。我问他看到什么了，他说是有“红色的影子在跳动”。我没告诉他我在干什么，我用了水的符号和喀巴拉系统中与月亮相联系的神的名字。一会儿他说看到一条河流过屋子把红色的影子都冲走了。我就告诉他我干了什么并呆在他身旁直至他说觉得能入睡了。于是我告诉他要是那些影子再回来了就喊报喜天使加百列的名字驱赶他们。加百列和月亮天使一样能控制河流。我没有权利给他我用的名字，尽管他参与了我的仪式，但程度还很低。早上家庭医生来见我舅舅跟他说晚上睡得很好，还说我教给了他一句秘语赶走了红色的影子。“我猜想”，他说，“是一种催眠术吧”。

记不清是在舅舅病情好转后或是在生病前，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及我表妹露茜，或者一个壮实的工厂职员常在晚饭后过来，我就让他们三个看幻像。银行职员在一次幻像中出现了伊甸园，我在一篇关于魔术的随笔中提到过，但未提及他不让继续下主。“要是相信这个，”他说，“会毁了一生的。生意人得做不寻常的事，要是他相信，他就做不下去。”“可你是个基督徒”我说。“噢，是嘛，可基督教是象征的。”他也许有爱尔兰常见的纯洁的想象力和高尚的感情，使守护神有可能在幻像中靠近他，同时又保持着高度的

《心愿之乡》，最初在伦敦的林荫道剧院于1894年3月29日上演。佛罗伦斯·法尔的侄女多萝茜·派吉特扮演小仙女。

奥莉维亚·莎士比亚（Olivia Shakespeare）夫人，闺名奥莉弗·塔克尔（Olive Tucker）是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的表妹。她死于1938年。戴安娜·维隆（Diana Vernon）是司各特的《罗伯·罗伊》中的女主人公。

霍普·莎士比亚。（Hope Shakespeare），一个律师。

理智及清醒的头脑。工厂职员很容易见到幻像，但毫无价值——他看的太普通；表妹露茜看到的没有银行职员那样有象征意义——他在平日并不知象征为何物——但对能证实的事情更有洞察力。她主要的能力是偶尔能预言。在她那里我首先印证了古老魔术的说法，名字有一种除了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以外的尤其是除了显而易见的联系之外的力量。我试图唤起“乔治·波勒克斯芬的化身”，期待着最晚发生在18世纪的某种事件出现。显然她见到的是一个英印人。舅舅记得世上有另外一个叫乔治·波勒克斯芬的，一位退休的英印人。露茜·米德尔顿从来不知道这个人，他属于一个世纪前与斯莱戈的波勒克斯芬家族分开的一支，乔治从未见过也不认识这一支的任何一个成员。

我发现我得了一个魔术师的称号，村民们传说我一眨眼功夫就能到五英里外的地方，同样一眨眼就把我表妹从她第一罗西斯的家送到第三罗西斯的岩石上——事实上，我是在幻像中把她送过去的。我记不清是那时还是后来我去拜访的时候，在我的一次对水的召唤后，她家的一个仆人在睡了很久后出现了幻像。夜里她看到美人鱼把她浸泡在海水里。我还记得一天晚上召唤后我上楼时听到舅舅的一位有预见力的老仆人在恶梦中喃喃自语。显然我们的思绪（我们一直不确信是否还远不止这些）影响了周围所有敏感的人。

也许由于《心愿之乡》的实际舞台经验，我在重写《凯瑟琳伯爵小姐》，仔细推敲了死的一幕，加上了越来越控制我的想象力的爱尔兰神话。很可能就在那时我拜访了丽莎德尔，亨利·戈尔—布斯爵士，他的夫人及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住在那里。我舅舅总觉得我有天赋，而如今想起来到那时我母亲的所剩无几的亲戚才开始第一次认为我并没有浪费生命了。孩提时期我常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外祖母家的后山上，从我们乘坐的驶向本·布尔本的马车上或从罗西斯光滑的草坡上眺望掩映于树丛中的丽莎德尔灰色的石墙。我们是镇上的商人，不管我们变得多富有，不管我们的磨坊或船只一年赚多少钱，我们从来都成不了“村民”，事实上我们也并不想变成“村民”。在大陪审团中我们能遇见住在大房子——林中的丽莎德尔家，湖畔的哈泽尔伍德家，重山环绕中的玛克力城堡里的那些人，我们从不背地里说他们闲话，知道我们也同样受尊重。然而爱尔兰长久以来形成的定居生活在我们中形成了一堵墙。有一个人，事实上是镇那头的一个人，有时能打入这种社会。可我们因之瞧不起他，就像瞧不起他们家看上去华而不实的房子一样，那房子是这一带唯一重修过的；一些五光十色的长廊显得与朝向湖边的窗户不伦不类。可我去戈尔—布斯家却不是这样的。我写过一些书，写书是我自己的事，想和那些你喜欢他们书的人谈话也很自然，再说我不再属于外祖父家了。我不能再说，“我们做某某事或我们认为怎么样了。”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首次见到戈尔—布斯小姐的，也不知我是怎样被请去的。少年时代康·戈尔—布斯一直令我心驰神往，不止一次地我看着灰色的墙和屋顶，心里反复默念着弥尔顿的诗句：

……在林木繁茂之际，

康斯坦斯·戈尔—布斯（Constance Gore-Booth, 1868—1927），她于1898年去巴黎学绘画，在那里结识并嫁给画家卡西米尔·德·马基维茨伯爵。1916年她在都柏林复活节周中领导支持圣·斯蒂芬的绿色团体的武装力量。

引自殷宝书译《弥尔顿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

那里也许有美人居住，
牵惹着邻村少年的眼目。

她常在去打猎或归来时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是县里公认的美人。我不时听到她的顽皮的事及骑马的莽撞，但总的印象是大家都尊重她，羡慕她。乡里人一直称她戈尔小姐，因为他们从来不说带有英国商人血统的布斯这个姓。我想他们的祖先常常服侍或服从过一个姓戈尔的。第一次见她时我很吃惊，因为她有点像毛特·岗，尽管矮小得多，声音也很像。后来她的声音变尖变高了，而我所写的那个时候却低而温柔。也许我是第一个说到某个人 停她的细节，而她是一个当时将要被判无期徒刑而如今正在服刑的人。

很快我与她妹妹伊娃更能谈得来，她那种柔弱、瞪羚似的美反映出她的心细而出众。我们成为密友度过了快乐的几个星期。我向她倾诉了我苦恋的不幸；我们那样友好以至于我差一点立即对她说（就像威廉·布莱克对凯斯琳·鲍彻那样）“你怜爱我，因而我爱你。”“可是不能”，我想，“这家人永远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求婚者。”而且，我仍然深爱着另外一个人，还刚刚为她写过“一切丑恶而破碎”。我扔塔罗特牌，看到意味着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小丑出来了时，我就改变了念头。然而我仍渴望自由，想要摆脱那种吞噬我的心灵，并开始影响我的健康的情感。

我在舅舅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与舅舅关系十分密切。他从来不怎么把我当一个成年人，而且他像所有的老光棍一样自私——我至今记得，想起来还愤愤然，早餐的熏肉里哪怕只有一只腰子他总是二话不说就夹走了——他还总不停地抱怨他身体不好。当时我觉得他性格如此，我也就不在意了，并渐渐地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某种意义上说斯莱戈一直是我的家。

二十七

我回到伦敦时王尔德的案子尚未了结。一回来父亲就说该去看看王尔德问问能帮什么忙。“他对你不错，也许他想让你做个证人什么的。”第二天我去了奥克莱街，带去了乔治·拉塞尔及别的人写给我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的信件。刚刚结束的第一次审判中他表现出来的勇气令我对他愈发钦佩。我不久就发现我周围有很多关于他的勇敢和沉着的故事，这里由于司空见惯，大家并不像英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那样如此深恶痛绝他的劣迹。在斯莱戈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他的传闻时正喝着格伦的科克伦上好的葡萄酒，我对这位老人说：“他会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的”。我常常能感觉到他的男子汉气概。如果说他狂妄自大的话，他的智慧就是他吹嘘的资本。我到了奥克莱街，由一位十分严肃的仆人领进去见到了奥斯卡的弟弟，威利·王尔德一个人。我把信都给了他。他说：“我把信件转交他之前你得告诉我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毛特·岗。

马基维茨伯爵夫人于 1916 年 4 月 30 日被捕，于 1916 年 5 月 6 日被判终身监禁，但于 1917 年 6 月 18 日被释放。

《爱人讲着心中的玫瑰花》，最先出版时名为《心中的玫瑰》，《民族观察家》，1892 年 12 月 12 日。王尔德那时住在切尔西，奥克莱街 146 号是他母亲家。

1895 年 5 月 1 日。王尔德于 5 月 7 日被保释，5 月 20 日第二次审讯开始。

你们叫他逃走吗？所有的朋友都让他这么做，而我们打定主意若有必要他得去坐牢”。我说，“不，我当然不会建议他逃走。”我怀疑他头脑是否清醒，我不久就注意到他的泪水已打湿了双颊。“噢，是的，他可以逃走，”他说，“有艘游艇抛锚在泰晤士河里，还有5000镑可作保释金，对了，要不是在泰晤士阿里抛锚了他还可以逃走——是的，如果我得自己在后花园里给一个气球充气的话。可他决心要正视困难，像基督一样。”他然后告诉我王尔德觉得为了妻子儿女他有责任尽一切努力争取获释，哪怕可能性再小。如果被无罪释放，他将在英格兰以外呆一阵，然后回来“重聚众友”，如果被宣判有罪他将洗清他的罪过。

我不打算去见他，他在一位聪颖的犹太女士、莱弗森夫人家里。这位女士给《笨拙》周刊撰文，聚集了一班艺术家及文人。我在那里时威利·王尔德夫人刚看了王尔德回来，她如释重负地坐下说：“现在好了，他决定有必要就去坐牢了。”可怜的威利·王尔德看上去十分感激我的拜访。我的那包信——那包来自他的同胞的信件，他要说——将激励着王尔德。“他和我以前不是朋友，”他说，“我不必多说，你也明白。可他像一个受伤的鹿来到我面前，我收留了他。”然后他告诉我王尔德在诽谤昆士伯里爵士的行为结束后是如何被一个又一个的旅馆赶出去的。不心假装说他是无罪的。“都怪他虚荣，使他鬼迷心窍。”我离开时，威利·王尔德送我到门口，答应让我给他的《每日电讯报》写稿。我还收到了另一包信件，这些我送到了法庭，但我从此再未见过王尔德。

二十八

亨利的小女儿是那时死的吗？亨利和他妻子关系不太好，孩子使他们维系着，而这时亨利年轻时的放荡导致的疾病毁掉了她。亨利的心碎了。“她长大了一定是个美人，也是个才女。”他这样跟我说。一天晚上我们一群朋友在莫特莱克他的家里聚会。他的一事无成的弟弟也来了。他那时刚开始裱画，像干别的什么事一样，又失败了。我记得亨利说，“我年轻时夜里害怕的是梅毒。”一向是家中的道学家的裱画者答道：“一点不错”。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个方桌边，他说：“听着，这位叶芝先生相信巫术——可笑极了。”亨利说，“噢，不，一点不可笑，巴黎如今处处都是巫术。”然后他对我说，“只是玩玩，不是吗？”我想岔开话题，像平常在他面一样只好小心地说：“噢，要是一个人有一种幻像他还想有另一个”。过了一会儿，亨利的话使我们肃静了下来。“我想知道怎样能见到我的女儿。有天晚上我坐在这里，她进来了满屋子里跑来跑去，直到我看到门是关上的我才意识到这只是幻觉。”

二十九

埃达·莱弗森 (AdaLeverson1862—1933) 她与王尔德的友谊见《奥斯卡·E 尔德至斯芬克斯的书信集》，(伦敦，达克沃斯出版社，1930年)。

亨利唯一的孩子马格丽特死于1894年12月11日，时年6岁。

安东尼·亨利。

在斯特兰德的某个咖啡厅我见到了 T.W. 罗尔斯顿先生。有段时间我们关系一度比较疏远。我曾写信许诺在梅由郡给他一个对帕奈尔党很安全的位置——我的朋友、年轻的梅由医生在那里很有影响。他拒绝了，指望靠加万·达菲的影响“回到党派联席会议”中去。当时两个党派正彼此拆台存心搞垮对方。我看不起这个人，因为他自己根本没有热情，完全看不到生命力。不久我认为他出卖了我。我离开伦敦去创建民族文学社时，已与出版商费希尔·昂温先生商议好通过他的读者爱德华·加民特给我出版一系列爱尔兰书籍，要是我与加万·达菲的交涉失败的话。我把此事告诉了一同在伦敦团体的同事罗尔斯顿。当我在爱尔兰时意外地听说他已经把加万·达菲带到出版商那里。我好不容易凑足钱回到伦敦，发现达菲的请求计划已被批准，昂温先生的读者以为那是我的计划。我想，他没有热情，缺乏信念，是一个公认的似乎更忠于他的想象而不是诺言的人。而那时，年轻的我看到他彬彬有礼长着漂亮的古典式的面孔便又再次相信他了。

他跟我讲起所谓的“新运动”。新近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来继续芬尼亚运动的宣传和议会运动。他邀请我参加。我已开始害怕芬尼亚共和主义的复兴了。迄今，什么时候宪党力量削弱，芬尼亚共和主义就复兴，我们老在说像钟摆，用英国用于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变化的一个惯用的词。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左右摇摆带来的是死亡、失败和长久的沮丧。当我抓住这种摇摆不定的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时，我曾寄希望于一个青年爱尔兰政治的复兴，将与绝望的危险作斗争，就像戴维斯准备寄希望于危险一样。我感到失望，我觉得是被一些老人的联合力量打败了，也许因为毛特·岗在致力于她自己的计划。

接受了罗尔斯顿的邀请我行动时第一次没有想起她。我也早已需要兴奋、需要忘却了。我记得我清楚地看到他所说的这种运动可能被一些无知的人引入歧途，使我们卷入野蛮的阴谋中。我想我得作好牺牲的准备。罗尔斯顿把我介绍给一个马克·瑞安博士，这个新组织的领袖，一位伦敦的医生；美国的金钱不再到议员手中而由他控制。他带我看了另一个已记不起名字的医生。我们坐在这人靠近托特纳姆路的小药房时，他给我们讲起了一个刚出去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刚同妻子从音乐厅出来就被指控酗酒而被捕。他曾愚弄了警察。事情都发生在那一刹。他需要一个清醒的证明。“他头脑清醒吗？”瑞安博士问。“噢，清醒极了。”“你给他证明了吗？”“噢没有，这些警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觉得他将继续跟我们一块儿工作，但我发现马克·瑞安先生的仁慈之心十分感人。他并不很有能力，但因为他一生中许多爱尔兰人交朋友，常给钱帮他们创办企业因而影响很大。我这些年中最好的朋友莱昂内尔·约翰逊和我一起来看他，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因为他秉性宽大太容易容忍傻瓜了。我觉得他天真而叫人感动地相信是受过更好教育的人，那时他还没有陷入一个聪明而有些发狂的恶棍的影响之中。他

爱尔兰民族阵线，有时称为爱尔兰民族同盟，是在 1895 年前后从爱尔兰共和同盟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叶芝于 1886 年左右是爱尔兰共和同盟成员。

马克·F·瑞安（Mark F. Ryan 1844—1940），死后出版有《芬尼亚运动回忆录》。他介绍罗尔斯顿参加爱尔兰共和同盟。一份 1899 年 10 月 7 日都柏林城堡警察局的报告中写道：“W.B. 叶芝是一个激进文人，多少是个革命者，是马克·瑞安博士的同党，对这些总监察员的叙述戈斯林市长也限于此。”（都柏林城堡文件）

的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医生、农民或前半生是农民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很有学问。爱尔兰只有这些人（尽管年轻一些）才懂得我的主张。罗尔斯顿、约翰逊和我似乎拥有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工具。

然而，我开始干了几个星期——也不是很正式——罗尔斯顿辞职了。一个年轻女诗人，爱丽斯·米利根小姐曾在一天晚上梦见他有被捕的危险——无疑是他英俊的面庞使她做这样的梦。他并不是很相信梦的，但显而易见他对事业的信念愈加动摇了。我甚至把他给我写过的每一个字都还给了他，担心他的快乐而单纯的通信中会有任何政府可用来对付他的把柄。

在爱尔兰文学社的辩论中我作了激进的演讲。这个团体应该是非政治性的，这曾是我自己的决定，因为我考虑到鉴于都柏林社团不景气，不带政治性的伦敦团体就能成为爱尔兰人国外最好的集会场所。我从来违反这一原则（此原则只适合于当时的政治），而几乎在我的所有谈话中都隐含了政治。我不仅与年长一些的人吵了起来，对爱尔兰统一党也十分恼火。他们以漠不关心来反对我们的运动，在文章中或口头上都认为似乎爱尔兰最优秀的文学——一些用英文写成的古老歌谣，凯尔特英雄传说，埃伊和约翰，斯坦迪什·奥格雷迪或我本人的新文学——本身都是狭隘的、粗俗的。我一再重复，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对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感兴趣，而是对他们只读过的英国三流小说家的东西感兴趣。我再三重复，文学的动态代表了整个国家的生活动态。模仿一些国外人的思考习惯、性格、行为方式和观点——并且不是他们中最好的——正阻碍着民族特征的自然形成。这种模仿由一个我称之为“贿赂”的系统蔓延开来。这些模仿的成功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民族生命源泉的枯竭。

我发现自己很不受欢迎，意识到一段时间内如果人们都说你的不是，你的自我印象也受到影响——而自我印象是你活在世上的唯一心理支柱——你好像也会以恶意的目光审视自己，因而我十分难过。我记得在我演讲结束后有位法官从委员会辞职了。我还没有意识到美好的事物是无法从仇恨的网中解出来而只有用灵巧的手指慢慢地分离开来。使事情更糟的是我只是出于一时的狂热，完完全全的罗曼蒂克。在那篇导致法官辞职的演说中我描绘了斯威福特声讨伍德的一文中不真实的数据，指出因为正常人都允许故意撒谎，上帝使一些人发了疯，正是这些人——我称之为魔鬼拥有的人——才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疯话”中饱含真理。

在闲谈中如果谈起政治或者谈到我的运动中的一些隐含政治的话题，我就要发脾气，而且还要难受许久，另一方面委员会的会议的形式让我有时间仔细推敲，在那里我的影响不小，几乎是核心人物。我让莱昂内尔·约翰逊评论一下我在那里的行为，他说，“只有一个欠缺，有点太温和了。”

三十

在斯莱戈时我收到过戴安娜·维隆的许多来信，亲切的话语使我不自觉地有些兴奋。我记得在一封信后她请某位农妇为我撒茶叶，我因不甚明白这个寓意而十分失望。（我想舅舅的有预见力的仆人马丽·巴托是因又生病而

小说家、诗人、戏剧家（1866—1953），乔治·拉塞尔（埃伊）的朋友，编辑了《英雄诗集》（都柏林，茅塞尔出版社，1908年）。

离开了。)后来她告诉我,我的信都是情书,只是我未意识到,她这么说我十分惊讶。我不知道这次在我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谈话是在我回去后过了多久。我发现了曾介绍我的那位诗人,他喝醉了酒,言语含糊,踉踉跄跄。我们谈话时这刚逝去的记忆又闪现在眼前。她说起她的异教徒的生活,让我觉得她曾有过许多的情人而开始厌恶这种生活。我觉得她和那个年轻人是如此相似。两人之间有着相同的缺点;两个灵魂都是如此出色,如此乐于思考,以至于凡俗世界似乎是空空的了。除了神圣或某种使人温馨的爱或者放荡,这世间还剩什么呢?——“放荡是最好的安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人这样说。她的黑而沉静的美有着一种被征服的高贵,怎么能不叫我痛心呢?我花了两周时间考虑该怎么办。

我十分穷困,若是我让她跟我生活一定很艰难,也许只是增加她的痛苦。因为她也许会回到那种不幸的生活中去。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既然得不到我爱的女人,暂时把自己的爱献给另一个女人也是一点安慰吧。毫无疑问我兴奋的神经也参与了思辨,只是无意识的。两周后我请她跟我一块儿出走。她变得神采奕奕,几天后称赞我说当时我只给了她一个兄长般的吻真是漂亮之举。无疑当时我是得意忘形了,可我不知道该怎样吻更好,因为第一次我们一块乘火车旅游时——我们打算在基尤呆一天——她给了我一个长长的热吻,我吃了一惊。

这两周内我告诉了她我的一些想法,她很困惑,也为我没有她那样的想象力而感到遗憾。她的放荡一直是在心里的,我是她的初恋情人。我们商定在她能离家以前一直保持朋友关系,但同意等到她年迈的母亲死后才行动。我们决定各找一个女友商量,让她们作我们冒险的保证人以便能坚守这些决定。近一年时间内我们在火车包厢、画廊或偶尔在她家里约会。在达利奇美术馆她叫我注意瓦都的画——她自己也属于裴特尔派——在国家美术馆,让我注意她最喜欢的画家曼特尼亚。我给她写了几首格式上费尽心思的诗,如《虚幻的马群》,还有——和——,觉得我再次堕入爱河了。我觉得她像我剧中温柔的女主角,她似乎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注意到她并不像刚认识时那样谈吐不凡了。她似乎心事多起来了,但举止往往显露出意想不到的年轻;像是回到了20来岁的时候。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我想是几个月吧,我跟亚瑟·塞门兹合住坦鲁尔的一套公寓。塞门兹知道我有这样一位朋友,也知道我们的计划,只是不知道她的芳名。他不知在哪里的集会上见到了她,问他能否前去拜访。归来时对她赞不绝口。最后她和她的保证人要来吃茶了。我记得我没有请塞门兹,因为我是自己去买蛋糕的。拎着包裹回来时开始想起毛特·岗,直到发现门锁了我的思绪才被打断。我忘带钥匙了,这一点点小事却让我怒火中烧。去找锁匠,但只找到了一个帮忙的人,爬过屋顶,从一个阁楼的窗户翻进去了。

那天晚上12点钟时塞门兹刚回来,我问他“你听说过毛特·岗吗?”直

删掉了“药片”。

指戴安娜·维隆。

海德公园,波尔谢什特广场18号。

《他要他的爱人安静》,《诗集》,第69页。

《他给他爱人的诗韵》和《诗人致他的爱人》,《诗集》第集71和70页。

坦普尔中区第二喷泉街。于1895年秋。

到清晨二、三点钟我还在给他讲我对她的感情。在我认识的所有男人中他是最忠实的听众；他能像一个女人那样听，从来不像其他男人一样好与人唱对台戏，而是听取你的意见并稍加补充，并且说得恰到好处。几天后我收到了毛特·岗的一封有些潦草的、乱七八糟的信。她在都柏林。“我病了吗？出什么事了吗？”我想起来有一天，就是我请客又丢了钥匙的那天，我曾走进了她的旅馆，她正和一群朋友在一起。起先她以为我真的在那里，而不久发现别的人都没看到我时就知道去的是我的灵魂。她让我那晚 12 点再来，我于是就消失了。

12 点钟我穿着一件怪怪的像神甫袍子似的衣服站在她床边，把她的灵魂带走了。我们绕着许多年前一道去过的豪斯的悬崖漫步。我清楚地记得一句话，“太令人悲哀了，所有的海鸥都在沉睡，”我的旧情复发，与新的恋情发生了斗争。

不久我被请去见我朋友的保证人。她谴责了我们一道离家的主意。她列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我不能说出来因为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说出戴安娜·维隆的真实姓名。我的保证人来看我用了同样的理由。而且这两个局外人都建议我们干脆同居算了。于是戴安娜·维隆争取与丈夫分居，她觉得他讨厌她而且对她漠不关心。“从结婚那天起他就不再爱我了。”她这样说。他很痛苦，生了一场病。她就放弃了这一计划，还对我说：“最好骗他一下也许更人道一些。那时我们说是分手，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在理智上我们订婚了。我当时住在沃本 大楼，我买了点很蹩脚的家具，等将来有钱了扔掉他们一点也不会感到可惜。我买每一件东西她都陪着我。记得有一次当着托特纳姆街商店的人的面讨论床的宽度我们感到很难堪——因为每多一英寸就要贵一些。

最后她于我 30 岁那年元月份 来到我身边，我紧张而兴奋结果不能行房。第二天我们在大英博物馆约会——我们一起研究——我感到奇怪似乎彼此一点都没变。一周后她又来了，我又太紧张兴奋，结果只好坐着喝茶、聊天，除了告别外，我们没有亲吻过。她十分理解我；而不是像另外一个那样以怨报德——她只是为我的困难而忧虑。后来我不再紧张，我们一块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我常常很悲哀，我不能给予她和她的姿色相称的足够的爱。然而她太贴近我的灵魂，对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大有益太完美了。如达·芬奇所说的，我们毕生部在追求自身的毁灭，以为自己只在追求月亮。当我们在最美的女人那里遇到它时，我们怎么能不为了她而远离其他所有的呢？我们不是在她的双唇上寻找死亡吗？

“我的旧情复燃，许多年后她告诉我那些日子里她曾希望选我做她的丈夫”被 删掉。

沃本大楼 18 号，后来改为沃本路 5 号，现在并入新大使旅馆。叶芝大约是在 1896 年 3 月 25 日租了这套房。

如果是 1806 年就是 31 岁；如果地点是沃本大楼的话，所说的“一月”不准确。

“看吧，怀着永恒的希望，欣喜憧憬着每一个春去秋来，月月年年等待着每一个新的时刻。总觉得盼望的事情来得太晚，如令重归故里或回到原始混沌的希望如同飞蛾扑火，不知他所期盼的只是自我毁灭。而这种憧憬本质上是各种元素之精华、蕴藏于人体欲望之生命中，不停地要回到自己的本原。”“我还想提醒你们这同样的憧憬本原上是从自然中继承的，人是自然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手记》，爱德华·麦柯迪译，第一卷。参阅叶芝的诗《巨轮》。

我们的幽会只持续了一年，中间她去了一趟意大利我亦去了巴黎。我谋生十分艰辛，当时更甚，因为她一来我就给迷住了。接着毛特·岗来信了。说她在伦敦，问我能不能去吃饭？我们共进晚餐，而我的烦恼更重了——她当然想不到她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最后，一天早上我没有像平常调剂心情时一样读许多情诗，而是写了几封信。我的朋友看出来我的心情与她反差很大，于是落下泪来。“你心中有另一个人，”她说。从此我们分手了许多年。

三十一

《萨沃伊》杂志是我住到沃本大楼一年之前创办的，那时我尚在达利奇美术馆和火车上与戴安娜·维隆约会，尚与亚瑟·塞门兹同住一套房子。对王尔德的判罪导致了艺术和文学整个运动的毁灭。诗人俱乐部没有受到多大冲击；我们一直都在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圈人写作，没有受到大众情绪的影响。在那些不读我们的作品中的人中，我们越发不受欢迎了；有必要比以前更小心地避开在军校学习的年轻人以及一般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然而我们的新书还是能卖三百册。可是有很大一批小说家、散文家及艺术家弄得沸沸扬扬的，他们大多数为《黄书》撰稿（Yellow Book），写出大胆的故事或者把呆板的谚语颠倒过来说，从而公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清规戒律挑战，结果他们的读者全然反对他们。我们之间谈起他们时就像今天的年轻诗人或散文家们谈到他们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承者贝内特和韦尔斯，当广大读者重新严肃地审视这一切时他们就流行起来了。

奥布里·比尔德斯莱和马克斯·比尔博姆几乎总出现在《黄书》的编辑人员名单中，我们十分羡慕他们，然而奥布里·比尔德斯莱尤其激怒了众愤。他被《黄书》开除了美术编辑的职位，当时的情况令我们十分气愤。爱德华·戈斯先生说汉弗莱·沃德夫人给他看了一封她正要邮给该杂志出版商约翰·莱恩的信，要求开除比尔德斯莱。爱德华·戈斯指出仅仅因为英国读者认为比尔德斯莱的画是不道德的还不足以采取这种行动，这样一来就会让读者误认为确有其事，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恶习。她说是威廉·沃森让她写的——这位诗人常常神经错乱，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补充说：“我在广大英国读者中的声誉使我有心想写这封信，”他相信自己成功地阻止了她发那封信，但奥布里的妹妹（她垂危之际我常去探望）坚持说她的确发了信。沃森自然是写了信，结局是比尔德斯莱给开除了，尽管他和王尔德不熟，也从不喜欢他，可他仍然变得声名狼藉。以前他总是引人注目的。“我还是个孩子时，”他老说：“我是个音乐天才，我一进屋子大家就都注视着我。”我仍希望别人能注视我。”没有那种刺激他就没法工作，于是他变得十分颓丧，她妹妹后来告诉我说他是因失意而死。

一天早上臭名昭著的伦纳德·史密瑟斯来到方廷街请亚瑟塞门兹给他编辑一份杂志。他解释说他希望能借此改变他的形象，哪怕赔钱也成，只要赔

巴黎之行，1896年12月——1897年1月。

参阅《爱人悲悼着爱的丧失》，《诗集》，第68页——原编者注。

第一期于1896年1月发行。

梅布尔·比尔德斯莱：1912年诊断为癌症，死于1916年。

伦纳德·查尔斯·史密瑟斯（1861—1907），初为律师，后改作出版商。

得不太多。塞门兹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是史密瑟斯必须放弃倒卖淫书，第二是转定奥布里·比尔德斯莱做艺术编辑。我猜塞门兹与比尔德斯莱从未谋面。两个条件他都接受了，我们开始在众心所背时与英国公众展开了交锋。我们的出版商的名字当然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些不论是由于美德或由于恶行引起愤怒而被排斥在外的人很快发现，如果他们不相互支持的话就不会有人支持他们。塞门兹求我帮助他，我答应了，条件是首期的庆祝晚餐结束后我不再会见出版商，也不再进他的家门一步。塞门兹见到比尔德斯莱坐在沙发上咯血，显然病得很重，但见又有了工作，他似乎变得有生气些了。

晚宴上我口袋里装有两封信，都是抗议我为这样的杂志撰稿的，一封来信是埃伊的，称杂志为“淫棍与娼妓的喉舌”，另一封是 T·W·罗勒斯顿写来的。塞门兹把两封信都借去以戏谑的口气念给出版商听。我听见出版商人说：“把信给我：我要控告他。告诉你我要去控告他。”那是罗勒斯顿的信，塞门兹收了回去藏在衣袋里并开始念埃伊的信。这封信措词更加激烈，却让大家都安静下来了。比尔德斯莱随后向我走来说：“你一定奇怪我会这么跟你说。我同意你的朋友观点。我一直被精神生活困扰。小时候我在壁炉台上看到了流血的基督。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工作时有一种道德准则支配他，即使他更想做别的事情。”

晚餐后我想要离开。塞门兹说：“不行，我们得去史密瑟斯家看看，要是我们不去他会不高兴的；以后你再也用不着去了。”史密瑟斯和比尔德斯莱已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到时比尔德斯莱躺在屋中间的两把椅子上，史密瑟斯在他的绞弦琴上大汗淋漓。平时他的琴是用电的，但那时电源被切断了，或者由于他没交电费，他只好转动摇把，比尔德斯莱连连称赞美妙的旋律、不可比拟的高超演奏手法——曲中停顿时常去卫生间咯血——而史密瑟斯很得意，继续坐在那里挥汗如雨。

在比尔德斯莱身上我发现了一种可贵的勇气，在我看来，不论男女，这是人的一种最了不起的能力。在他的所作所为中，在他极有逻辑条理的谈话中，在他明快的艺术线条中我都看到了这一点。他的病常使他思想中出现淫乱的意象（这也是这种病的表现之一），他吸取了这些画面的恐怖和魔力，成为英国艺术史上第一个讽刺之魂。有一次我对他说：“比尔德斯莱、昨晚我在为你辩护，我说你是因嫉恶如仇而作画的。”“我要是这样作画的话，”他说：“那也就没什么了。”他就是这样为他的真诚而骄傲。当然我所写的那个时候没有愤怒，只有追求现实的纯粹的热情。他曾有一个漂亮的情妇，我记得有天早上他带了个浓妆的女人来到我们房间，我猜他跟那个女人一起过夜的，然而因为病情他的性欲变得不可遏制，听说他临死时手淫加速了死神的降临。也许他天性那样放荡不羁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觉得他比同龄人

还有一封埃伊写给叶芝的未署明日期的信（1896年9月？）这样写道：“我从未看《萨沃伊》，也从不碰它。我想等到你的作品以别的方式出版。我不想与比尔德斯莱、塞门兹之流的性欲狂为伍。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任何纯洁的思想溶于其中都会被玷污。”《埃伊致叶芝书信段落选编》（邓德拉、库阿拉出版社，1936年），第4页。

“而她的心脏怎会停止跳动/疾病怎会摧毁她的坚强/有她死去的兄长作英勇的榜样”，《给一位垂危的女士》，《诗集》第179页。奥布里·比尔德斯莱死于1898年，时年26岁。

“她说起她哥哥，他讨厌那些否认邪恶存在的人，于是由于年轻，他在绘画中处处表现邪恶。他热爱现实生活。”选自叶芝1913年2月11日至格雷戈里夫人的信。

更有能力。我想象不出来从事哪个职业他不会成为最出色的人物。

道生常来玩，不过大多数在迪普或附近的一个诺曼底村庄；他那时在给《萨沃伊》写诗，给史密瑟斯做翻译，和其他两三个跟史密瑟斯有联系但没有责任（不甚清楚）——一个没有人喜欢的工作——的人一起每周拿两英镑。道生表情漠然而放任自流，老让我觉得有一种常与和蔼、谦恭等美德相伴的柔弱。我想象不出他在哪儿能获得成功。最好的结局只是（如果能称之为最好的话），他本应能摆脱对餐馆主人的女儿的不幸激情，以及戒掉酗酒的恶习（不久他就因酗酒早逝）及放荡行为，从而过上一种对身体无害的、受庇护的哪怕是沉默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还写了精美的诗句极尽柔美之词祝贺所有他称之为和他一样“愤世嫉俗而快乐”的人。我在方廷街时，塞门兹收到了一封抗议信，他曾为他的过于坦率的文章列出证据辩护。“我住在一个小诺曼底村庄里，过着勤劳而单纯的生活”，信中这样写道。还未收到信就先收到了一封电报（尽管电报是后发的）。“卖戒指汇钱来，被捕”。他曾把戒指留给了塞门兹以防万一。他醉了与村里的面包师打起来了。他的钱后来没有派上用场，一个同情他的村民说他是个“杰出的英国诗人”，法国法官听到后就说，“那好吧，那我就把面包师关起来。”

我对道生了解不深，是通过烧门兹知道的——我避免去他知名度最高的地方。塞门兹常说，道生清醒时从不理睬女人——他不是属于餐馆主人的女儿吗？然而一旦醉了，任何女人都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不管干净与否。他在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花大约三便士租了一张床位，有时住在那儿，有时不住在那儿，他对那里的糟糕的饭食感到满足，与其说是因为穷困不如说是因为无所谓。

一杯葡萄酒，或者苦艾酒，不就可以把一切都变得美好吗？经过迪普饭店时，他们进去用餐，道生拉着塞门兹的大衣指着陪他喝过酒的妓女说：“塞门兹，她会写诗呢，像布朗宁夫妇的诗。”就在我搬到方廷街之前，一天晚上他带来了一个女人，兴许就是塞门兹称之为“一便士的姿色，两便士的打扮”或简称为“一便士姿色”的那个女人。另一两个文学青年也来拜访，大家围坐在火边，那妓女早就脱光了衣服（想必那样更利于烤火），开始讲她的罗曼史：她第一次对性的感觉认识——她曾试图拔掉第一根阴毛——她的诱惑力，还讲起这位那位嫖客，特别是一个老人常给她用篮子装两只鸽子带来，看到她扭鸽了的脖子才能激起性冲动。有两三次她中断了讲话，和这位或那位文学青年去卧室，只有塞门兹瞧不起她，对自己的挑剔感到自豪。一想起这场景就让我想到道生从不挑剔，对什么都来者不拒。放纵自己的感情不加约束，他所创作的是没有修饰、没有重点、没有任何自我中心的纯粹的

《诗人之路》：道生的《诗作集》第74页。

亚瑟·塞门兹的《文学随笔：评一本诗集》见《萨沃伊》第4期，1896年8月，第91—93页。塞门兹未注明道生，但显而易见：“一位我有幸熟识的年轻诗人……看上去楚楚可人，脸庞长得像济慈，只是有些堕落了……渐渐地滑入更深的忘泉之水……有着天才的那种敏捷的、灾难性的自我毁灭的精力……我喜欢在他只喝咖啡或茶来换换口味时见到他。我觉得在牛津时他最喜欢的刺激就是大麻酒；后来他放弃了这种故意的视觉实验方式转向更为直接的遗忘方式；然而他又转回去了，我记得至少有一天下午是这样的，那天我作东邀集了一帮朋友。实验没有成功……”

道生没有抗议，那封信只是建议塞门兹敲定去掉一些有些言过其实的句子。

删去了“我去看比尔德斯莱或去给史密瑟斯带信时常在那儿的那个人”。

音乐。

我也常听莱昂内尔·约翰逊谈起道生，他与道生的关系甚至比塞门兹与道生更好。塞门兹和约翰逊素不相识，因为约翰逊可以原谅一个无赖却不能容忍一个异教徒，而塞门兹充满激情的诗句称颂了约翰逊一无所知的性欲。有一次塞门兹告诉我：“听说约翰逊相信他是为了道生好。想象得出他俩在一起的情景：他俩摇摇晃晃地走在牛津大街上，约翰逊在列举并讲解着教堂的神甫；或者坐在格雷酒店中约翰逊租的房间里，道生总是不耐烦，站起身来说，“我想去东区找个十便士的妓女’，可约翰逊轻轻地按他坐下说，‘不，不，再来一杯’”。

我和约翰逊渐渐疏远。他来看我，要是不给他喝一杯，他就阴沉着脸在那里闷声不响，要是给他喝他准醉。我若是去看他，他肯定会酩酊大醉。我觉得一见他我就有责任管他，可我一劝他去一家苏格兰戒酒机构他就说：“我不想治好。”有段时间他对我们爱尔兰各团体影响都很大，我认为是18世纪堂皇的英语把他们的思绪带到了格拉顿和爱尔兰议会。起初他不喜欢毛特·岗，但有一次在公共晚宴中他坐在她身旁，打那以后他就改变了看法。晚宴结束后他对我说，“以前我以为她可能是爱出风头才这么做，现在才明白不是，是由于责任感。我看见她讲话时手在颤抖，觉得她在逼自己说话。”我带他参加了这些会议、讲演和公共晚宴很可能就是他见到的所有积极的生活。他过去一直放弃了世俗生活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他常常说：“叶芝需要在图书馆呆上20年，而我得在荒野里呆上20年。”

我觉得在《文艺复兴史研究》的跋和“变化的生命”一章中他对派特尔的哲学用了一种过于文学化的形式，看得出对他来说最美好的印象来自于他对此很满意的那些书本。他不到日落几乎不起床，静夜里他整夜读书工作，仅为了发现没有预料的偶然事件，没有自然界的混沌我们就没法生活。像诗人马拉梅一样，他“读遍了所有的书”，剩下唯一的一件事来自他兴奋时的心情。由于独居寂寞的需要，他构思了与许多从未谋面的人的无数次谈话，并把他们当成真实的事情写下来，到最后我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些“事实”。最开始在大学里设想的是与格拉德斯通的谈话，我刚认识他时他不停地引用他说是与曼宁红衣主教的谈话。我们都相信了。“一开始见到他”他说，“他问我是否想要选择宗教生涯。我说不，我要从事写作。‘噢’，他说，‘我常认为写作是宗教生涯的一个较低的层次。’”这些与曼宁的谈话录变得十分有名，以至曼宁死时《十九世纪》的编辑索要一篇回忆录。我现在相信约翰逊和曼宁从未谋面。私人谈话录出版时约翰逊十分愤然，我对此十分费解。他不愿因为曼宁的死而造成什么影响。

最后只要一提到一个有名望的人他就会说“我以前和他过从甚密”，然后开始写一篇看上去总是合情合理且很有启迪的回忆录。一方面他是真的不喜欢出版私人谈话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一切私生活都漠然。就像塞巴斯蒂安·凡·斯托克一样在16岁或17岁之后就拒绝让人画像。在极度兴奋之

选自《享乐者马里厄斯》。

纽曼红衣大主教。纽曼死于1890年，曼宁死于1892年。

派特尔的《假想的肖像》（1887）中的一个角色：“托马斯·德·凯泽对这种从废盐碱沼泽里传入世间的古怪的新雅典的风格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想找到就他而知的最优秀的一种。最终他在一个叫塞巴斯蒂安·凡·斯托克的人身上发现了，想给他画像。有点让他吃惊的是这位年轻人拒绝了他的好意，并且很不

后的黯然把他与同类截然分开之前，他认识许多的画家，他们只想把他的小小的著名的脑袋画得与大英博物馆的某个古希腊的头像一分不差。就理论上而言，他是个极端的苦行者。相知之初，我们在贝德福德公园碰头之后一同去一个便宜的餐馆吃饭，餐桌上各道菜味道都不错，布丁也不赖，我看见他每喝一杯他的说教都变得愈发崇高，结束时他为圣杰罗姆作了一首颂词，说他阉割了自己，从而可以过灵魂不受干扰的生活。还有一次他给我念了一首他永远都不会付梓的小说，写某位学者因总是向往死后的生活而最终导致自杀。那篇小说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位学者的遗言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极力地歌颂辉煌和壮观。

从他那里我学会了一种高尚的风格，以及热爱生活中一切“神圣”（拿他最喜欢的字眼）的东西。他的思想似乎使灵魂变得永恒而神圣，（事情上亦如此），做圣事时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从他身上比从其他任何人身上能更多地研究他那一代人的悲剧。当人的精神从实际转入沉思，当它停止被整个机器带着一起转动时，它就只能自行承受一个无法忍受的重负。尚未准备好接收神意的印象，灵魂在介于自然与超自然的等级之间的自然虚空里飘荡。约翰逊与其说是活不下去不如说是拒绝活下去，他在迷醉中猝死之后，一位验尸官发现在他的身体里与大脑相连的躯体其他器官没有发育健全，如孩子的躯体一般。

在方廷街及后来的沃本大楼居住时，塞门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事事与我商量，也是我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似乎有些“颓废”（用当时一个最受欢迎但毫无意义的词来说）。他似乎不可能饮酒过量，比我们中任何一个更能过派特尔所称颂的那种有节制的生活。周围有节制的人太少了，依稀记得我们讨论我俩可能缺乏某种东西。我们决定每晚 12 点喝两瓶威士忌看看是不是想喝第三瓶，两周结束时我们仍像以前一样喝起了大杯的热酒，我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塞门兹，要是我们觉得有酗酒的倾向，也许我们能成为更好的诗人。”我常对他说：“你太遵守道德准则了，但是特萨利的道德。”他有个情妇，是个芭蕾舞演员（他是像给杂志挑选稿件那样认真挑选出来的）。有时我们弄不清他是否受了不好的影响。显然他太喜欢与一切有名望有趣的人谈话。有一次他参观了杂耍剧院之后我听见他说：“噢，叶芝，我从前从未爱上一个耍蛇的人。”

他 20 多岁时来到伦敦，10 年里他的生活中常常都有女人，却从未动过真情。他那时生活在伤感之中，自制力使他容易珍爱这种柔情。后来他因为一次虚幻的恋情（像女孩子那种），因为激情而受到震撼。这次虚幻的恋情是和一个他从未说过话的合唱团女孩之间的。他每晚都去看她的表演，很长时间内努力地想结识她，但都是徒劳。虽然合唱团每一个人都知道了这段罗曼史，但她还是拒绝了他，因为她是私生子，由一个教女孩子们跳舞的老太太抚养成人，她认为她得结婚然后生一大堆孩子使之合法化，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不行，不行，”其他的女孩子总对她说：“和亚瑟·塞门兹在一起你不会有一大堆孩子的。”等到他们真的认识了，也仅仅只是一起坐了一次轻便马车。后来他真挚地爱上了一个芭蕾舞演员，那女孩做了他几年的情妇，特别喜欢他。一天晚上他神情沮丧地来找我。一位富翁向她求婚，她请他来

礼貌”。

于 1902 年。

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他的一个朋友来看我，敦促我利用自己的威信来劝他结婚。我不想插手此事，因为我对她了解甚少（虽然这一点了解足以使她增色）。他放过了她，如今她是一个乡绅的妻子。一次争执后分手时我用一系列粗糙的标题形式记录了他与我关于爱的痛苦的谈话，早上三四点钟他去坐火车时我送给了他。他躲进了一个小村庄，他把这些写进了《痛苦的爱》。在这次或另外某次和好时他对我说：“她的感情如此真挚，叶芝，她得有个人陪着，她知道我会嫉妒一个男人，于是她选择了一个女人。”

他的评论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智慧并且具有天才的同情心，有根有据，不过根据只在朋友们的谈话中。每次访问法国他都会带来一些先是龚古尔特后来是马拉梅的谈话，我有时能辨认出一些我听过或参加过的谈话，例如他评论比尔德斯莱的那篇随笔。他后来结婚了，不再来故地，作品也就失去了好奇心和活力。只有当一篇评论或一位学识渊博的行家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他之后，他的诗才会十分优美，我怀疑纯粹生活本身是否深深地使他感动过。在那个圈子中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他的确毁了他自己的话），这样做不像别人是出于感情需要，而是不注意地这样做了。

三十二

王尔德后来获释了，不久收到他的信，那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流浪，他寄语所有的朋友，“我要活着挽回名誉”，然而他身体垮了，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道生声称在迪普曾试图改造他，给他健康的感受。他俩能凑齐钱来让其中的一个去逛妓院，结果决定让王尔德去。他去了，一路陪同的有道生和一群热情高涨的人。道生和那群人一直等到他出来。“不，”他说，“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就和冷羊肉没什么两样。不过告诉英国人吧。这样完全恢复了我的心。”

（接下去写奥尔瑟·盖尔斯）。

三十三

《萨沃伊》杂志正在付印时，我和他去了爱尔兰，在斯莱戈的本布尔本山坡上呆了几天，然后定下来要住很长一段时间，中间去游了一趟阿兰群岛。同行的有图利拉堡的爱德华·马丁。他是一位新朋友，大概是通过塞门兹的朋友乔治·摩尔认识的。我们出发前戴安娜·维隆在入神时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她对我当时颇为流行的神秘主义一无所知，却被我的符号深深地影响了。在这种影响下，她能掌握与我的仪式完全一致的一些知识之源。我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

《奥布里·比尔德斯莱》（伦敦，独角兽出版社，1898）。

于1897年5月19日释放。

叶芝没有接下去讲奥尔瑟·盖尔斯，奥尔瑟·盖尔斯是一位封面设计者兼诗人（1868—1949），是塞门兹及道生的朋友，1899年11月成为史密瑟斯（Smuhers）的情妇。

指塞门兹。

1896年8—9月。

爱德华·马丁（1859—1924），戏剧家，爱尔兰文学剧院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领略到她真正的洞察力是关于一些希腊文单词。我记得她叫阿波罗 euceladon，解释说是“公正的”。“公正的”适用于我的仪式中的一个古埃及太阳神，我查了一下希腊文词典发现“euceladon”的意思是“和谐的”。我的仪式很少用希腊文。

有一阵于我的作品令我十分烦恼。我已经写了《炼金术的玫瑰》和许多写得慢并且注重技巧的诗，觉得我失去了在《凯瑟琳伯爵小姐》和早期诗作中的那种原有的乡土之情。我的新作在我曾制定的把爱尔兰神话精神化方面没有多大进展。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我该写没有源头的刻意的神秘主义的东西。我没有投入到我的思想的深渊，而也许在睡梦中把自己当成一只具象征意义的野兽或一只鸟，并且只把另一个人的预言作补充。我征求了戴安娜·维隆的意见。她说出一席话，但自己并不明白：“他受太阳影响太大了。他该住得离水近一些，不要离太阳威力集中的森林近。”

心里想着这些话我来到了图利拉。爱德华·马丁身体笨拙（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像今天一般的教区神甫那样，显示出他母亲出身农家），并没有让我觉得房子宽敞有气派，虽然新修的那部分是很糟糕的哥特式的。在火车上我向塞门兹描绘了我所设想的那幢简陋的两层楼房，那里有个赤脚的仆人会娴熟地服侍我们，并且忠心耿耿。一大排破房子、方形的旧塔、中世纪战士曾经操练过的大院子打动了我们浪漫的神经。塞门兹说了我一大通没有礼貌，因为马丁给我们参观两间房子让我们挑选时，我建议用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我想他是认为在那里不应该开玩笑。

在图利拉我决定召唤月亮的力量。我那时相信月亮的力量是我的灵感的主要来源。我召唤了九个晚上没有多少结果，而在第九天深夜我正要入睡时我先是看见一个人首马身的怪物，后来又看到一个美丽的裸体女人在用箭射星星。她站在一个台座上像个雕像，她的肌肤的色泽能让所有的人类的皮肤看上去像是病态的，跟人首马身怪物一样她在闪闪的光中移动。塞门兹（他对我的幻像一无所知）吃早饭时给我朗诵了一首诗，那是他第一次记录梦的诗，说的是有位大美人来看她，不过穿着衣服，“噢，众诗人诗歌的源泉”，他这样称呼她，或者用的是相似的字眼。那所房子里还住着一位法国老伯爵名叫弗拉里芒·德·巴斯特罗，他在海边有地。他说几天之前的夜里他梦见了海神内普丘恩，如此活灵活现他不得不下床锁上了门——我当时为我的幻像感到太兴奋了，不能再继续保密下去。这么栩栩如生的梦，看到用锁门的方法来防范那么一定是真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十分严肃。

马丁真的因我几次召唤而生气了，我承认，我在他住的古堡旧塔里的空房中召唤过几回，这空房子正好在礼拜堂上面。我不知道教堂上面的房子必须空着，像我这样的行动会被看成妨害了祈祷者与上帝交流。他甚至禁止我提及召唤，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知道我与马丁一定有不少相通之处，他

怀疑有误。

删掉了“俄赛里斯（Osiris）”。

叶芝在 1896 年 8 月给威廉·夏普的信中描述过这一幻觉。

“Seraphila（《塞莎菲塔》，巴尔扎克著）中有些段落中与我年轻时知道的一种超越睡眠状态有些相似，常常是一个大美人闪闪的光中缓缓地出现时到达，用语言和行动来形成某种意念，如此美而富有光泽，以至于使所有的人的肌肤显得病态”。摘自 1934 年 7 月路易丝·兰伯特伦敦《信使》周刊，在《随笔与介绍》中重印，第 439 页。

每天在我们都已上床之后还要读几小时的《圣克里索斯托姆》。我的召唤是一种形式的祈祷，伴随着对特殊结果的一种积极的期望，也许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更有意识的训练。

几天之后我的新朋友格雷戈里夫人 来访并邀请我到柯尔庄园小住，甚至在我去之前就开始为我收集神仙传说故事。当时我相信或猜测——我们不能评判那些阴影的力量——她是应我的召唤而来的，因为受月亮影响的不是只具有普通智慧的普通人，而她的房子恰恰在湖边。但为什么有那些森林呢？我不是受到警告不能靠近森林吗？我只召唤了月亮和水。我最终发现我常常在寻找一种有秩序的劳动的生活，其中一切外在的事物不过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在外祖母家 我学会了爱精巧的房屋、花园和树林；而那些灰色的乡间房屋如丽莎得尔、哈兹伍德，还有很远的几乎看不清的玛克利塔，常常让我想起一种在自然美景中及仆人们、劳动者们活动中的生活，而仆人们、劳动者们看上去本身就像是自然的，像鸟像树一样自然。镇上的房子，甚至不连着菜地、感受不到野兽的不同季节活动的“偏僻”的房子，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牧羊人的帐篷”。外祖母家的房子是新的；我的高外祖父 搬运财产到斯莱戈时帆船翻了，财产中有他的宝剑还有一只相当的了不起的钟，我外祖父说那是“绝世无双”的。然而在这里许多代文明人都在家具上、雕像上、画像中、树林、田野的轮廓上都留下了他们劳作的印迹。我想这里转的不是主人而是仆人；看到用分析的方法才能把需要我们劳作的事物分解我很难过，因而所有劳作的印象对我来说都十分可贵。

我对格雷戈里夫人本人了解甚少；女人们都怕她，这是老马丁夫人告诉我的。我看她当然十分善良能干，但善良能干到什么程度呢？我才进她的图书馆，几分钟后她就开始问我问题，问我能不能把我们文化运动的活儿派一点给她干。从18世纪30年代她丈夫家就开始藏书，有用牛皮纸包着的装帧精美的古典名著，有关于种树和农业方面的书，还有四代以来最受欢迎的英国书籍。有时她自我解嘲地提醒我说除了读我们的作品外她什么都干不了。我记得我说：“要是你得到了我们的书，看我们在做什么，你马上就知道该干什么了。”在那里时，事实上是后来一次住在她家时，我几乎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我身体不佳，她常带我到人们的小屋里去。后来我发现我什么都没写令她十分失望。

塞门兹回伦敦时发现威廉·夏普写了一篇故事（或者署名菲奥娜·麦克劳德），在他的书中似乎有一篇名叫《射手》。其中写到有人在幻像中看到一个女人向空中射箭，接着另一个射手向一只小鹿开弓，箭射中了小鹿，带着射穿的鹿心撞入树干。夏普在写作时似乎不可能听说过我的幻像，而且他

Augusta, Lady Gregory (1852—1932), 戏剧家, 和叶芝、沁一起管理阿贝剧院。

Elizabeth Pollexfen (伊丽莎白·波勒克斯芬) 的房子在斯莱戈默维尔 (Merville) 镇, 如今的纳扎勒斯大楼。

威廉·米德尔顿 (William Middleton)。

在格雷戈里夫人的《柯尔庄园》(1913年) 中有描写。

威廉·夏普 (1855—1905), 苏格兰诗人。从1894年起他以菲奥娜·麦克劳德为笔名写作。《射手》(The Archer) 中相关文字如下: “他在观察时, 惊奇地发现一个高高的朦胧的女影经过。她停下来, 取下背着的弓, 射出一支箭……箭恰恰射中鹿……鹿呜咽地跛着跳入夜幕。而它的被箭刺穿的心脏停在一株银桦的白色树干上……可这些是我想象出来的: 只是我见到的一个幻象, 那鹿是可怜的基督的受伤的心, 那射手

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是全新的。我主拜访喀巴拉派的温·韦斯科特博士，向他请教象征意义。他打开一只抽屉给我看了两幅画，一幅上是一个女人射星星，另一幅是人首马身兽。他们都是我还没达到的一个喀巴拉级别的象征，是一种秘密的意象。接着他指着说那个看上去像颗星星的东西事实上是一颗小小的燃烧着的心脏，他说那颗心脏是苔菲勒斯，喀巴拉树的中心，也是基督的心脏。女射手和人首马身怪物分别是耶索得通往苔菲勒斯，从太阳到月亮的萨麦克路上的高级或低级神怪。我记起来基督常常被看成是神秘的鹿。

后来参与我的仪式活动的一个姐妹告诉我她的孩子说过：“噢，妈妈，我见到一个女人往天空中射箭，我好害怕她杀了上帝。”我问戴安娜·维隆时她宣布：“有四个人见过；孩子会夭折的；他们将获得比蛇还要古老的智慧。”孩子真的死了吗？我不知道；很奇怪一时疏忽我竟然忘了他母亲的名字。那个孩子是像具有象征意义的孩子，也许是伊阿柯斯那样死的吗？另外三个人又是谁呢？蛇的寓意很清楚，尽管直到一个喀巴拉给我看之前我才第一次见到。萨麦克是条直路，是被赛沙·皮罗多称为人的标记、智慧的意愿之路的一条直路，蛇是喀巴拉蛇，即弯曲的自然。是阴影用幻象接收了我，把它当成他们的痛苦的纽带了吗？亨利·摩尔说，众神像我们钓鱼一样甩开他们的线，用梦做诱饵，我们怎样才能避开他们？幻象当然不是我身上的某一部分，因为一种闯入我每天的思想、而又与之迥异的思绪有着超自然的知识或貌似如此的东西，能创造出即便真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更愿意认为这种同一性不会比一个人和他的守护神关系更密切。是一种不为我所知的思想和愿望在徒劳地警告我远离这种永不停歇的流浪。

三十四

我去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在靠近卢森堡旅馆附近的柯利耶饭店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约翰·沁。我喜欢他的真诚与学识，但并不觉得

是射猎星星的朦胧的射手星座。因为那夜过后在清晨的黑暗中我呆在柯罗克—那一哈利其（Cnoc-na-Hurich），我看见个女人在那里向星星射出一支又一支的箭。”《悲剧罗曼斯》。

kabala，一个神秘主义体系。

伦敦的验尸官，他同麦克格雷·马瑟兹和威廉·伍德曼一起创建金晨派秘密社团。

Iacchus，即巴柯斯（酒神戴奥莱索斯），常被当成一个小孩受到崇拜，尤其在德尔斐（Delphi）。

“许多年前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行到一个绝代佳人在向天空射箭。从我第一次猜测她的寓意时我想到了许多自然的蜿蜒变迁和直路之间的差异，这直路在巴尔扎克的《塞莎菲塔》中被称为‘人的印迹’，但称之为圣迹更为恰当”，选自《人之灵魂》（1917年2月25日）。

叶芝在背诵《永恒的灵魂》中的一段，也许记得不甚清晰：“于是这些精灵，尽管它们对我们没有善意，然而它们用身体的冲突伤害不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伤害到我们身体上太难了），用艺术和工业也只能伤害极少数人。“因为空想哲学家卡丹（Cardan）只让他们试图诱惑我们就像我们钓鱼一样，用诱饵、网、捕鳗叉，或有用发动机之类的我们投入水底的东西。于是，他说，这些伊丽尔（Aereal）神怪呆在空中的第三级中（就像我们垂钓时坐在河岸上、或在海舟之中一样用梦或幻象也许能缠住某些人，于是即使在远处，他们也会因恐惧或干扰而走向毁灭。”卡丹是杰罗摩·卡丹罗（Geronimo Cardano）（1501—1576），内科医生兼观相家，《算命》（Metoposcopia）一书的作者，作品中谈到星相学和观相术。

1896年12月。

他是个天才。是一位正巧来访的客人介绍我们相识的。他说：“有个爱尔兰人住在顶楼。”他在读法国文学，主要研究拉辛，并且以靠在英国报纸上写关于拉辛的评论为主。我劝他找个冷门，因为塞门兹是个更好的评论家，他应该去爱尔兰——他懂爱尔兰文；我给他讲了我刚刚去过的阿兰群岛的见闻。不久我和麦格雷戈一家人呆在一起，在“盖尔特运动”（类似我们的运动在英格兰的名称）冲击下，他们去掉了马瑟斯，只叫麦格雷戈了。

那时我常见到毛特·岗，我的希望复燃了。要是我去她那里把手放进火里直到烧坏了才拿开，不就可以让她理解我的感情是了会轻易抛弃的吗？去她那里时我常带着这个念头，我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怕疼而是怕变疯。有时我不知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一天早晨我开始对自己讲些别的事（我记不清了），可我的胳膊受了伤，不是烫伤，也许是骨折，因为我想象自己挎着吊带。早饭前我就起床去取报纸，回来时发现麦格雷戈夫妇站在台阶上。“你胳膊怎么了？”麦格雷戈夫人问。“好端端的呀；可‘骨头’说它给上了夹板。”一瞬间我凝思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幻觉。

这些事件的具体日期我都不记得了。我去过巴黎许多次，但常常记不起来哪次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天吃早饭时麦格雷戈对我说：“昨夜我看见一个人站在一个拱廊里，他穿着一件上面写着麦克劳德字样的褶叠短裙和一件格子衣服。”下午我开始打寒颤，时断时续地打了几个小时，一打颤我就想起威廉·夏普和菲奥娜·麦克劳德。我告诉了麦格雷戈，而他变得有洞察力了。他说夏普很需要帮助。“是疯狂，”他说，“但是像神那种疯狂。”我们都被那住在遥远的海岛上的富有灵感的美人菲奥娜的神话迷住了。接着他说：“这是我妻子的事，”我就跟她进了内室。进门时我说：“真奇怪，刚才我心中一直都在想着夏普和菲奥娜，可现在似乎空荡荡的。”“我用了一个公式，”她说：“把你的灵魂送出去了。”我傻透了，居然给夏普写信了，简直不敢叫人相信居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海边旅馆的信，是关于美丽的菲奥娜和他本人的。他说自己一直病重，神经严重紊乱，突然我的灵魂去治愈了他的病。同时他找到了菲奥娜，告诉她他给治好了——我想我是化作一只巨大的白鸟去的。然而，后来我从夏普夫人那里得知，当时他的确是一个人在那里，但发疯了。他离开家去和疯狂作斗争。

麦格雷戈本人生活在幻象之中。他常说自己碰到了一个人，也许是在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他心里若是一阵紧张他就能辨别出那不是一个人。这些陌生人都是他的老师。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产生幻觉了呢？”他说：“有天夜里我跟着一个陌生人走那条路，”他指着从他的花园通往街上的那条窄窄的小路，“我撞倒了送牛奶的孩子。孩子说：‘太糟了，让你们俩给撞倒了。’”他性格的分裂已经开始了，很快就使他从我的神秘团体中退出去了。渐渐地他因“盖尔特运动”和瓦特·司各特爵士而丧失斗志。尽管他从未去过高地，而且他的苏格兰祖先是——他开始穿高地服装，看到每个年轻人都喊“小伙子”（“lad”），喝大量的白兰地，他说白兰地时常常像是英裔爱尔兰人诗歌中称呼威士忌一样。他想要扮演一个“罗伯·罗伊”那样的角色，幻想在某个高地王国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他常常期待着，的确像他同时代的所有人见到的幻象一样，盼望着一个宇宙大战。他

“他当初非常勤劳，非常勇敢，那时孤独还没把他逼疯；”——《众魂之夜》，参见卷三《幻象》终诗。撕了一页；掉了一两个单词。

让妻子学救护工作，因为他们可能会一起加入一班流浪汉的队伍。他让我看他手腕上的刀伤，解释说他和妻子参加了一次学生运动，希望广泛的流血事件从此开始。

为了帮助毛特·岗的工作我当时帮助在巴黎组建“青年爱尔兰社团”，还把沁介绍加入了，但后来他辞职了。毛特·岗对这个组织进行了一次芬尼亚运动转变，我记得沁说他认为只有爱尔兰感觉到安全时英国才算对爱尔兰做了件好事，这是我从他口中听到的唯一一句政治性的话。

三十五

好多年里毛特·岗都忙于赦免爱尔兰政治犯的运动。当时这些政治犯被判无期徒刑，大多数在波特兰和达特摩尔两处监狱服刑。他们使她身上的母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是因为“头戴星星皇冠的爱尔兰母亲”而是因为她曾保护过 27 个犯人。我留意到一种与日俱增的单纯，一种对自我的屈服；如果她恨英国的话，我觉得还不是痛恨，她的仁慈比恨更为伟大。每次探望犯人她都深深地感动。有一次，恻隐之心似乎使她具有清晰的预见性。那时，她给我讲了她的经历，后来我又核对了细节，很可惜没有当时的记录。她去过波特兰监狱，那儿有许多犯人；她已探视过三四位了，接着又来了一个，他的一只眼已失明，另一只眼也快要失明了。她被放在一个囚笼里，犯人在另一个囚笼中，隔了三四英尺远，中间坐了一个看守。跟她一同去的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她记得像是与哪家报纸有联系。她带他来的目的是能给犯人带来政治信息而不需要回答禁止询问的问题，因为监狱的管理人员不能打扰探视者之间的谈话。那个犯人十分伤心，力图给她讲自己是怎样失明的。看守不许他提这些，否则就要送他回牢房。然而那个犯人扒在栅栏上讲起了他的经历——似乎是由于监狱管理不善或不注意造成的。毛特·岗突然说，连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脱口而出：“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你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别伤心，六个月后你就会获释。”接着别的犯人也都被带来见她，她告诉了每个人他将获释，何时释放也讲得清清楚楚；然而显然她是在梦幻中，因为只是到后来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临走时艺术家说：“我相信你是出于好意，但你做了一件很残酷的事。你告诉那些人说他们都将获释，还跟每一个人都说了只须等多长时间，要知道他们都是判的无期徒刑呀。”她答道：“我几乎什么都记不起来，但我知道这会变成现实。”然后他跟她谈起她告诉每个人获释的时间——一年、两年、六个月之后，或者诸如此类的。她告诉我每个预言都不折不扣地灵验了。当然她努力地工作才使之得以实现的。莫利没能遵守他的诺言于是失去

叶芝邀请沁到这个团体当副主席。

删去了“共计 27 人”。

1893 年的《赦免协会纪念刊》列出了 23 名犯人名单。

彼得·卡拉汉（Peter Callaghan），爱丁堡人，1883 年 12 月被判终身监禁。

自此叶芝中止页码编排。

约翰·莫利（John Morley 1838—1923），1892—1895 年任爱尔兰的总书记，是支持廷恩新堡（Newcastle-on-Tyne）的议员，1895 年失去议席。传说他曾发誓要支持赦免爱尔兰政治犯运动，但 1894 年 10 月 29 日他接见为此事而来的都柏林政府代表团时他拒绝作出行动。

了席位，因为她提名了一个工党候选人反对他，使爱尔兰选票投向了工党候选人并且分裂了自由党的多数。我记得她告诉过我，有段时间她一天花八小时写信联络。

三十六

我们一道开始了一项于我最最无益的工作。她告诉我，她想去美国筹款，建提议过的都柏林沃尔夫·托恩纪念碑，可是她发现从都柏林社团得到授权却遇到了某种解释不清的困难。我主动提出了授权，并在我的住所召开了“新运动”领导人会议。我们通过了授权，我本应认为我的工作已经划上句号，可我却发现了一种很有趣的情形。有段时间我很少关注新运动，我发现其中只有一个受过足够教育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或者说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他的名字可能是塞勒斯吧，他是一个报春花团（一个极端的统一党团体）的成员，却满足于某种和芬尼亚运动相联系的虚假的爱。他不再继续参加我们的会议。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这个团体代表了爱尔兰裔美国革命者分裂成的两个极端仇恨的派别中的一个。这两派一派被称为三角派，另一派即德沃伊派。

他们之所以分裂是因为德沃伊派指控三角派谋杀了一位克朗宁博士。都柏林委员会代表德沃伊派，我的朋友们则支持谋杀者们。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法庭宣判被告苏利文无罪，我们不可能隔海重新审理此案。也许要是我允许自己当选英国委员会主席的话，我能制止这个运动的分裂，我被选上了，却发现任务艰巨。

后来我没有考虑我的合作者就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就像我在写一篇小说一样。都柏林委员会是个很大的团体，可能有二三百人，我们渐渐为散布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许多社团说话，有权向都柏林委员会送去许多代表。很快就有一个很大的组织支持都柏林委员会，我听传闻说，正式奠基时将有两万美籍爱尔兰人参加——包租了许多特殊的船只。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尚未改变他们的计划或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委员会改成爱尔兰议会式的呢？爱尔兰当时有四个党派：帕奈尔派和反帕奈尔派。官方统一派和以卡斯尔敦爵士为首的新统一派，都想谋求同英国建立更为公平的财政关系。奠基之后，为什么不邀请这些党派在我们面前发言呢？前两派不敢拒绝，我知道卡斯尔敦也要来参加，因为我很快得到了一个允诺，虽然不很确定。官方统一派我们只需要形式上邀请一下。我以为我将提出自己的政策，如果可能的话提出像英国沃尔夫·汤恩协会的那种正式的政策。就这样办。在更为精心组织正式选举之后，我们的委员会将永远坐阵，而爱尔兰各党派代表仅仅

毛特·岗于 1897 年 10 月 24 日在美国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为建沃尔夫·托恩纪念碑和爱尔兰赦免组织筹集基金。

删去了“中心设在芝加哥”。

删去了“中心在纽约”。约翰·德沃伊（1842—1928），美籍爱尔兰人的芬尼亚组织（Clan na Gael）克兰·拉·盖尔的领袖，是一个支持爱尔兰独立的周报《凯尔族美国人》（the Gaelic American）的编辑。

亚历山大·苏利文（Alexander Sullivan）于 1889 年 5 月因被控谋杀帕特里克·克朗宁（Patrick Cronin）博士而被捕。

叶芝被选为百年纪念组织行政委员会（含英国和法国）主席，马克·莱恩（Mark Ryan）为财政部长，杰弗里·拉韦尔（Geoffrey Lavelie）为书记。

在我们认为一个关于爱尔兰前途命运的问题提上日程时仅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威斯敏斯特议会。对于国家来说他们代价更小，因为英国各党派将以新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冷不丁地不时出席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委员会应当阐明，任何时候只要有成功的希望它都准备采用非宪法的手段，因而以整个国家（芬尼亚派也好宪法派也好）作为基础。我本应检查一下令我如此恐惧的钟摆。

一系列的细节浮现于眼前。首先是我只是在思想上有十足的勇敢。我和另一代表一同去都柏林，他简直是个疯子、无赖。他在会上不合时宜地吵起来了，等我站起来想要说明真相却被会议主席奥勒利制止，他不知我想干什么。回来后我让那个无赖在小型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了个报告，他完全歪曲事实，我没有抗议也未作解释。对于我来说他仍然陌生，我被不熟悉的性格吓住了。那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干，只是纠正了印象。

记得有位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每次我们每周例会将近尾声时他就进来呆一会，跟秘书说几句话就出去了。我询问他是谁，原来他是个校长，早年发誓不吸烟不喝酒攒下钱献给爱尔兰的革命事业。每周他都捐半克朗，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有力地鞭笞了我们的铺张浪费。

记得有一个制一个银质奖章的倡议，上面打算刻上纪念章中常出现的圆塔、狼狗、十字架和竖琴。我们委员会（除了政治之外，所有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决定去掉十字架。因为对民族事业十分有害，既然巴奈尔事件刚刚过去。我们派了一位代表去和艺术家交涉，但艺术家解释说十字架不能去掉，要不然竖琴就没有依傍，我们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记得一个醉鬼在赛马节那天来向我们道歉，因有些年轻人没认出我们而对我们很粗鲁，可他看了看我们这些人，迟疑片刻然后说：“不，不，我不想道歉。现在除了维纳斯、阿多尼斯和天上的其他行星我谁都不喜欢。”

记得毛特·岗宣读了一系列意在激起广泛热情的绝妙的请愿书，其中绝大部分观点为我们所接受。后来她告诉我：“早上我躺在床上有一声音向我口授了那篇文章。后来我发现钟就在那个声音响起时停了。”

记得有次走进设在多利埃街的都柏林委员会办公室，发现前门、办公室的门、橱柜的门都洞开，房间空空如也，架子上放着十八英镑的金币。

记得1897年的狂欢节暴动，很有自我解嘲的意味。毛特·岗曾经答应当时一个工党基层领导人詹姆斯·康诺利（后因参加1916年暴动而被处死）在他的社会主义派一个小型例会上讲演。我们到达都柏林参加会员会的一次会议时，她发现满街贴着告示说社会主义派要在戴姆街集会，她将是主要发言人。她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从未在都柏林露天集会上做过演说，因而写信回绝。康诺利来访时我在场。他说要是她拒绝的话他就完蛋了，因为谁都不会相信他曾得到过她的许诺。她态度坚定，他就走了，但是他是那么绝望，事后我不得不劝说她。她开车去了他的住所，回来时动情地描述着他的妻子、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房子。

删掉了“[弗兰克·休·奥唐奈尔](#)（Frank Hugh O'Donnell）”几个字。奥唐奈尔（1848—1916），是1874年高尔韦议会成员，1877年邓加议会的成员，为大不列颠的自治联邦副主席。

地《一个演员皇后》（The Player Queen）中塞普蒂默斯（Septimus）说（第101—2行）：“现在除了维纳斯、阿多尼斯和天上别的行星外我还喜欢谁呢？”

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 1870—1916），创办《爱尔兰工人》杂志，组织了市民军，成为复活节起义的一个领导人。叶芝在“1916年的复活节”和“玫瑰树”中纪念他。

第二天戴姆街上拥挤不堪，毛特·岗演讲时一位老妇不停在她面前挥动着一张小画像，那是在大暴动中的一位烈士的画像，是某家神龛中的宝物。她不停地喊道：“她出生以前我就参加了。”毛特·岗讲述着在头一天的周年纪念日，她按老习惯去装饰烈士的坟墓时，一个墓地管理员（也许是圣米奇安墓）怎样阻止她进去，因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纪念日。接着，她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缓缓地说：“因为维多利亚女王要庆典，我们烈士的墓坟就不能装饰了吗？”人群狂怒。

那天晚上我们委员会在市政大厅开会，会毕出来时人群在等我们，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要去坐落在拉特兰广场的民族俱乐部，他们也去了。民族俱乐部外面准备了一个幻灯，把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由于饥饿逃亡和死亡的人数之类的数字显示在一个白色屏幕上。在我们面前是毛特·岗设计的摹拟葬礼，有一个印有“大英帝国”字样的棺材，旁边插着的黑旗上写着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因叛国罪被绞死者的名字。后来人们开始砸有饰物的窗玻璃。毛特·岗走动，面带喜悦的笑容；她心里信任所有人。我知道她不会干涉。我了解她的原则。要是是一大群人干违法的事而你去制止，你有可能成功，但你看上去一定像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才这样做的。我试图劝阻但声音太弱，我在委员会的一场乱哄哄的辩论中说得太多了，结果嗓子哑了。于是我也顺从了，感受到了那时的兴奋，那种兴高采烈的不责任和群众的力量。

我们在民族俱乐部里吃茶点，我坐在一张长桌边上，在那儿我曾整天写着与政治无关的主题。这时跑进来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这样激动过，以后也从未见过。他嚷着：“噢，糟了，糟了。外面警察在用警棍打人。糟透了，”诸如此类的话。毛特·岗站起身要出去，另一人说她会受伤的。我让他们锁上门把她关在里面。我反应很迟钝，记得茶凉了，我觉得怪遗憾的。要是她没给我解释她想干什么，我不让她出去时她生气恐怕是对的。“我没出去怎么知道呢？”她说。我主动要求自己出去，只要她在开门时不试图出去的话，虽然我并不知我嘶哑着嗓子能干得了什么，她却不答应。后来她说我让她做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胆小鬼。那天夜里我去了每家报馆声明对此事负责。我印象中有200人住进了医院。一位老妇人死了。

三十七

记得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我想就是那次纪念节会议吧）她成功地从反对派中赢得了那么多的支持——我们原来在二三百个代表中只有很少几个支持者——她只得限制每周的开支：花销太大了。群情激昂，尽管那些秘密团体四处暗中破坏，可她仪态万方，声音常常低沉而甜美，使得不论敌人还是

发生在都柏林的教堂街：约翰·亨利·希尔斯（Johnand Henry Sheares）、威廉·奥尔（William Orr）几个统一爱尔兰人都埋在教堂地下室里。

于1897年6月22日。

删去了“并且请求编辑们不要攻击警方。我的想法是警方可以争取过来”。原编者注。

在7月3日的《统一爱尔兰报》上登载了关于菲茨西蒙斯太太之死的调查报告，这位老妇于纪念节晚上在拉特兰广场被警察用警棍击伤后在杰维斯街医院去世。6月23日的《爱尔兰时报》报道说“多达两百人因受伤而接受治疗。”

朋友部为她鼓掌。骚乱后一年奠基了，一支比自奥康奈尔百年纪念（20年前吗？）以来任何一次都壮观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穿过都柏林，我一直以为那次游行是爱尔兰党重新统一的直接结果。游行队伍的前列是都柏林委员会的多数派以及他们的朋友。我和毛特·岗坐在马车上跟在他们后面，再后面是爱尔兰各党人士，像暴风雨中的牛群似地并肩前进。我听见约翰·雷德蒙德对反帕奈尔派领导人约翰·狄龙说：“我刚才走到队伍前面去了，一个司仪对我说：‘你的位置远在后面呢，雷德蒙德先生。’我说：‘我就呆在这里吧。’他接着说：

‘要是那样的话，雷德蒙德先生，我就得领你到后面去。’”奠基时我觉得游行是人们对爱尔兰大众生活中的争论的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说：“人民自己掀起了这场运动。”然而人群中响遍了这样的呼声：“不，不，是毛特·岗掀起的。”

然而从所有这些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是鄙视争论不休的党派——他们的争论尽管卑劣、无节制，却是值得的，是为了事业——而是瞧不起他们单独进行政治训练。不，我的宏伟计划当然不可能实现；都柏林委员会绝对成不了爱尔兰议会。

三十八

我要求一家都柏林报纸将有关新运动的文章开一个星期专栏，得到了许可。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应称之为同行会议代表的疯子加骗子先生（对其没有一点好感）提及此事。几天之后，我还没来得及在委员会会议上说起，在此专栏就出现了关于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社团活动的一篇大张旗鼓并有点罗曼蒂克的报告。它肯定不是新运动，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存在。不久，我被派去看骗子先生，他因公寓里的煤气爆炸而住院。一周后，我的谈话作为反映一个想象中的派别——我想是“香农庭”的报告发表了。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个月以来他都一直将这个专栏攥在手中。他将成为我的敌人，并给我安了一个有反大主教偏见的罪名，至今我还没有消除掉。

几个月前在伦敦有人给我看过一份恶语中伤米切尔·达维特的传单。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在造谣攻击他的母亲或某位亲人，我还注意到签的是新

于 1898 年 8 月 15 日。

于 1875 年 8 月 6 日。

约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 1856—1918），爱尔兰议会的民族主义成员，1900 年当选重新联合的爱尔兰党主席，是自治运动领导人，反对暴力和革命，为复活节起义所震惊。

“对一位他后来的敌人”，《自传》第 365 页。

1927 年叶芝口授给妻子的一份打字稿的自传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请我给某些英国组织的几个很有影响的成员在每周的《统一爱尔兰报》，即当时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报纸中争取一个专栏。在去霍利黑德（Hoyhead）的船上我告诉了奥唐奈尔此事。他当时与我一道同作为代表出席一个会议，大约一周之后我发现，那个专栏里登的不是我的朋友关于组织会议的文章，而是一个秘密组织的几个分支的报告，每个分支都被称为一个审判厅，整个或有几部分由一位领导（应该是吧）模仿红衣大主教签名“仆人之仆”。我看出了那是谁的手笔，但这文章是如此逼真、煞有其事，我差一点相信是真的了，要不是几周后我的一些话被作为“香农庭”的报告发表而揭穿这一骗局的话。”（打字稿为米切尔·叶芝议员所有）

删去了“然而如今异端的指控众所周知。我曾得罪了弗朗克·休·奥康奈尔；他找到机会报复了。”

运动官员用的“笔名”。我打算去巴黎，就带上了这份传单，却发现毛特·岗早已看到过并决定也要坚决驳斥。我们都表态要是不撤回谣言并公开道歉的话，我们都决不再参加新运动组织的任何会议。我们正争议此事时，第二份传单又出来了，署名为都柏林“笔名”，攻击的大概是被误认为写了第一份传单的一位伦敦医生，谩骂他的母亲或某位亲人。我们的伦敦朋友们说：“现在我们是无计可施了。”我却勃然大怒，写了篇文章驳斥，称二位作者都是奸诈小人，并要奥勒利令伦敦各界接受，而毛特·岗使之通过并在伦敦正式接受了。我们得到的承诺是，只要那些传单散发过的地方这篇文章一定发送到；我们没有过多地详细询问是否真的做到了，因为感到十分满足，毕竟得到了这两个秘密组织的签名并且以他们的经费印发这样一份文件撤回他们曾当作自己的文件的两篇文章。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份战利品般的文件。

差不多快结束时我们发现那位疯子加骗子先生是传单作者。他阴险狡诈，能耐得很，不是被某种邪恶的激情控制，而是比我所见的任何一个人更符合传统的关于被毁坏的灵魂的看法。他一度曾在公众生活中引人注目，但被帕奈尔赶出去了，谁也说不清他因什么宿怨要报复米切尔·达维特。与其说他是个人不如说他是架机器，仇恨嫉妒的冲动总是准确无误地转动着轮子。很快他就报复我了。后来他被判罪，一方面由于偷窃，把巴尔干共和党在巴尔干战争期间送来用于支持爱尔兰革命运动的两万英镑看作自己政治影响的报酬而中饱私囊，另一方面还因为把法国作战部（其政策与外交部不同、派来从事间谍活动并与我国人民谈判的一位法国官员出卖给了德尔卡瑟。他开始印一系列攻击毛特·岗的传单，我没有让他在爱尔兰党中得到一个席位的阴谋得逞，在爱尔兰党中他会常拿些证据给约翰·狄龙看，会成为更危险的造谣分子。约翰·狄龙跟我不熟，但他的行为光明磊落。爱尔兰归还了一百英镑的捐款，那是我们的骗子先生作为党的基金而带来的巴尔干捐款。

三十九

我有时是从格雷戈里夫人家出发去参加这些会议的，开完会后再回到那里，我在1897年、1898年以及以后每年夏天都呆在她家里。1897年的一天，我和德·巴斯特罗伯爵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每年初夏他都从巴黎过来，住在离柯尔庄园八九英里的海滨一所两层楼的小房子里。他来时一大群鸭呀、

原文用的是法文。

删去了“弗朗克·休·奥康奈尔是第一份传单的作者”。奥康奈尔后来指控达维特“不诚实”。

这一事件在毛特·岗·迈克布赖德的《女王之仆》（都柏林，金鹰书局，1950年版）第292—293页有述，虽然未写奥康奈尔的名字。相关内容是写给一个“英国代理人”，显然指的是奥康奈尔。

这段话在1927年叶芝口述给妻子的话中描述得更清楚：“他还犯了其他的罪，其中最严重的是出卖了一个法国官员。当时爱尔兰在法国作战部中很有影响。没让外交部的德尔卡瑟知道他们派了一个官员来做点间谍工作，他请我们在伦敦的人给他配一个秘书……奥康奈尔一直是澳大利亚有名的代理人，这时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法国特工因为他告诉了德尔卡瑟，这个官员受辱。”（打字稿由米切尔·叶芝所有）。

泰奥菲尔·德尔卡瑟（Theophile De classe 1852—1923），法国外交部长，任职期为1898—1908，1914—1915年。

在高尔韦县的杜拉士。

鸡呀在门前跑来跑去，秋天等他去了罗马就无一剩下。年轻时纵欲过度导致了他从腰部以下瘫痪，老年他则从事宗教事务及做礼拜，我觉得格雷戈里夫人是他最好的爱尔兰朋友。在他家我说起旧有的建一个爱尔兰剧院的计划，并说现在放弃了，因为在爱尔兰上哪儿能弄得到钱呢？然而我寄希望于在伦敦能得到捐资建剧院。只要我的戏写得不错，最后会传到爱尔兰的。德·巴斯特罗伯爵是一个统一派成员，我觉得在图利拉会议上他讨厌我，但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了。格雷戈里夫人写过一份反对格拉斯通的自治法案的传单，我觉得她仍是一个统一派，她答应为首场演出募捐。

法律方面出现了麻烦，得修改一项法案，于是耽搁了一年时间。同时决定上演爱德华·马丁的《石楠园》和我的《凯瑟琳伯爵小姐》。贝特利·鲍尔弗夫人帮助我们的计划，打算安排在总书记寓所取《凯瑟琳伯爵小姐》中的真实场景。她问我是否要排练，我解释说我不能进一个官员的房间，她就问我是否认为刚来爱尔兰居住的T·W·罗尔斯顿和一位民族主义博物学家会演得好魔鬼。我说他们长相不错，她就邀请了他俩。他们想到我同意就答应了，并且觉得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我生活在暴力之中。几个月后他们得到了正式的职位。那位博物学家是一家博物馆馆长，谁也能为说他违反原则——他的政治热情与这些不相干；然而没有人为罗尔斯顿辩护，他得到职位似是由于一份敦促都柏林热情接待维多利亚女王的传单。我个人认为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交易。他发现了他真正的政治观点，他的统一派信仰一直只是孩子的玩具，只要开饭铃一响就马上把它扔到一边去。还有他的诗“在一片寂静的灌溉过的田野里，长满了玫瑰”！我曾以为他会成为爱尔兰民族领袖呢！

我常去看乔治·摩尔，他关于演出的知识十分有用。他是爱德华·马丁的密友，与马丁的关系甚至超过斯滕博克伯爵，这位伯爵讨人喜欢，而且好色，刚刚死于酗酒。我在其他一些具有非凡美德的人身上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他们往往选择那些具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已抹去的缺点的人为友。马丁学识渊博，谦虚而明智，但我觉得宗教上的谨慎一直使他站在世界的边缘，用不甚

该匿名传单以《一个幽灵的历程，或自治法案》为标题发表（伦敦，里奇韦，1893年）。幽灵格拉斯通回到人间，要在爱尔兰的任何阶级中找一个因自治法案而生活水平提高的人。对此寓言的争论是统一派的和反天主教的。

1898年7月11日，爱尔兰地方政府法案的一个修正案被接收，由都柏林国民委员会申请，授权代总督颁发在任何被批准的建筑物内偶尔上演戏剧的许可证。

1899年1月。

乔治·科菲（George Coffey 1857—1916），《爱尔兰史前饰物起源》和《爱尔兰的青铜时代》的作者。叶芝对科菲的指责没有依据。科菲是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当时已被任命为国家科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建馆内爱尔兰皇家学会的收藏物、爱尔兰文物管理员。他于1894年7月6日被委任此职，任职直至1914年3月31日辞职。

这份标题《爱尔兰——帝国与战争》的传单（都柏林，西利，布赖尔斯和沃克尔出版社，1900年），基本如叶芝所述，但并不专指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一份署名“库古安”（即亚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的评论是这样开头的（见《统一爱尔兰人》1900年3月24日）：“罗尔斯顿先生的传单公然撤回了直到他访问维塞加利尔大楼前的原则。”罗尔斯顿在1900年的新职位是农业部组织者。

斯坦尼斯劳斯·埃里克·斯滕博克伯爵（1860—1895），诗人，《死亡之影》的作者。1895年4月26日死于布赖顿。

情愿的感情上的纯真来设想肉体上的纯洁，他对生活毫无兴趣常使他的学识黯然失色。他对女人不感兴趣，摩尔指责他迷恋同性。他曾对马丁说：“我相信，你觉得男人之间的性交比女人之间的更自然。”答语不知是否是摩尔杜撰的：“是吧，不管怎么说并不很丑恶。”另一方面摩尔的理智完全被征服了。他总是不停地屈服于新的印象，和他接触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不认为这种新印象重要他就要和他争论。就像一个女人说抛弃了她的情人的坏话一样，他咒骂一切其他的印象，对他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印象同样不遗余力地咒骂。法律、体面、社会标准、科学、宗教、连同他的过去都成了他的敌人。除了他得出一个结论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

他和马丁彼此不存幻想，对对方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透彻。“不，叶芝，”有一次我说起摩尔的一些优点时马丁说：“我认识摩尔的时间比你长，他一塌糊涂。”“马丁最自私不过了，”大约一周之后摩尔跟我说：“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他觉得我该死，他压根都不在乎我。”他俩常常一同进餐，一道在欧洲大陆长途旅行。

突然我们的计划受到威胁，即将化为乌有。有传言说《凯瑟琳伯爵小姐》离经叛道，一个神甫宣布它是异端邪说，马丁本来准备付第一期费用可他不打算付了（最终他全付了）。当时我已见过乔治·摩尔好几次，我和格雷戈里夫人马上看出他是危险之所在。我去见了他要他答应不要会见马丁也不要给他写信，除非先把信给格雷戈里夫人过目，因为除了两个神甫之外谁也帮不了我们。这出戏得有大多数人投票说是符合正统的才行，那么就等几天。我收到了耶稣会的芬利神甫和著名作家巴里神甫的信，把它们送给了在爱尔兰的马丁。马丁写信来说一切重新好转，于是我去见了摩尔。他的脸猛地往下一沉。“噢，叶芝，”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多好的机会呀！我给《十九世纪》的文章几乎快写成了。我命名为爱德华·马丁的灵魂，本来会轰动全欧洲的。谁都没有这样写过他最亲密的朋友的。多好的机会呀！”

我和佛罗伦斯·法尔（她被选为经理）那天晚上去了都柏林，去预订古典音乐剧院，我们在拿骚旅馆（毛特·岗常在那里下榻）快吃完早餐时爱德华·马丁进来了，告诉我他又不干了。他前额上满是豆大的汗珠，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擦。摩尔把那篇文章写在一封信里寄给他了。我们不理睬摩尔，把马丁说服了。

那位疯了加骗子先生正是选中了这一时机，他一直想要通过“新运动”重新登上舞台。这时他正转向宗教，然而几个月后他又在一本最胆大妄为的反宗教的册子中攻击教会。攻击《凯瑟琳伯爵小姐》既是报复义算得上一笔好的投机买卖。他写了份名为《出卖灵魂》的小册子，引用魔鬼商人的话当成我本人的话，用描绘妇女出卖灵魂的那个场景来攻击爱尔兰妇女。我不知

在《戏剧人物》的打字稿中写马丁的段落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次他说大多数堕落的灵魂是由性的失落造成的，如摩尔认为的那样，把父亲的本能通过压抑或通过生育转换成常常受抵制的同性性行为”（莫里斯图书馆，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卡本代尔。）

1899年3月。

T·A·芬利神甫。

威廉·巴里神甫，《新安蒂冈妮》（The Now Antigone）的作者。

《出卖灵魂！都柏林的假凯尔特戏剧》（Souls for Gold！Pseudo-Celtic Drama in Dublin）（1899年，伦敦）。

道这是否纯粹出于不诚实，也不知是否是辩论并没有使他精神错乱，使他推论到我们都变成了一个似乎一切重新从亚当开始的那种单纯的前提。每个现存的真理（如同活着的人），不都有无数的祖先吗？这份小册子分发到了都柏林居民区的每一个信箱里，一家报纸还登载了很长的措辞激烈的社论。

最后红衣主教洛格，一个阴郁而虔诚的老人被某种密谋所煽动，发表了一份天真的信，说这出戏如果真像传单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承认自己没有读过）的话，天主教徒都不应该去看。爱德华·马丁不为所动——既然红衣大主教并未读过这出戏，而且这样做也打消了他对宗教权威的信仰，再说他对公众和报纸一点都不在乎。然而其他的天主教朋友知开始消失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写信给报社只可能导致更多的误解，即使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也无济于事。谁又会去理会这些解释呢？另外，本身的确有些特别之处看上去比较灰暗，如今又被恶意地夸大了。我曾说过我们用符号来理解看不见的东西，故我也许说过圣母玛丽亚是一个符号。而且我的戏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人用脚踩碎了神龛。我的确只想要说明他是个坏人。我不曾知道对于许多单纯的天主教徒来说，这种不敬的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令人羞辱的，如同赤身裸体一般。当然，对于我来说，剧场和书斋就是一切，我只不过对于这些中世纪的信仰行如此神圣的东西作为画面装饰。

我只得请求警方保卫，首场演出的晚上我看见大厅里有 20 个左右的警察。警官解释说他们告诉他们时机到了时他们才能行动。我转而向我的朋友、那位梅由医生说：“你得帮我；我没有经验”，这时 20 位警察脸上都失去了微笑。我记得他们中曾有传言说是我筹划的狂欢节骚乱，为之从伦敦带来了 200 英镑。我们不必动用他们：尽管演出时十分喧哗，但跟后来上演的《花花公子》一样，并没有人企图打断演出，因为寥寥无几的观众中大多数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而反对派也不想完全让自己听不见演出；来自码头边某个地方的一些反教会者是由一个革命者送来的，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一听到有任何与教会不一致的地方就鼓掌”。真正的反对者还呆在家里。各种新的话题听起来对每一幕部颇有微辞。当魔鬼让凯瑟琳伯爵小姐用一支持殊的笔签约放弃自己的灵魂时，台下一片嘘声，因为那是支羽毛笔，并且是从圣彼得拒绝他的主人时啼叫的一只公鸡身上拔下的羽毛做的。这也许也是在攻击天主教吧。一个天主教朋友对我说：“这就像你要冲着富商，一个市政府成员——也许是市长大人——喊道：‘我记得你当年在马车后为半便士奔忙的时候’一样。”

要说这出戏是否成功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它亵渎了上帝。然而马丁的《石楠园》无疑获得了成功，我们开始把他当天才了。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第二场演出，订了一个戏院，对他那部还没见到的戏充满了信心。手稿送来时我和格雷戈里夫人一起呆在柯尔庄园，粗糙而措辞偏激，完全像出自一个孩子——甚至还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之手，设法上演。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摩尔写信让我们不要责备，他会让马丁修改的；不久他去了图利拉，从那里

1899 年 5 月 9 日，叶芝在 1899 年 5 月 13 日的《领袖晨报》中答复。

这出戏中对谢姆斯·鲁阿的叙述印在《诗集》（1895 年）中。

“亚瑟·格里菲思”，见《自传》第 416 页。

删去了“新的反对论点出现了”。

“马车”，是公共汽车的前身。

回来时说马丁在写一部杰作，特别是其中有段话是现代戏剧中最有影响力的对话。他再来时带来了同样的话；很快一切都会与那不可比拟的一幕相得益彰了。他又来了一次，神情沮丧，说得单独跟我谈一谈。原来是他自己在重写那无与伦比的场面。他曾为那出戏激起极大的热忱，马丁也警告过他说他应该写自己的戏。“他写不了剧本，”摩尔说：“他找得到主题，我找不到；但他压根儿不会写。我给他构思了《石楠园》，还打算给他写很多很多的戏而不告诉任何人。来试着劝劝他吧，要不他就要完了。”

我试着劝马丁，但他由于诚实而感到不安；马丁对这出戏的期望值忽高忽低，想签名又发誓决不签，经过长时间的争执最后终于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而剧本的确糟透了。不过，我也帮着写了，因之还去过图利拉，因为当地的有关该主题的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工作因摩尔和马丁的争执而受到干扰，他们对摩尔的自传性（也许是幻想的）爱情历险和去做弥撒的故事而争论不休。马丁只是想请他理解他去做弥撒但很不乐意，特别是要驱车去一个很远的教堂。他不敢去附近的教堂，因为许多年前摩尔把教区的神甫写进了一篇小说，于是神甫许下诺言只要见得着他，一定要叫人把他扔到水里呛几口水。摩尔尽量由着自己睡过头，忘记时间，并且干脆拒绝，可都没有用。“叶芝不去教堂，”我记得他这样说，回答是：“不，摩尔，你一定得去。我不管叶芝；他是个新教徒。”“可我不是天主教徒。”“不，你是的。”“天啊，难道就没有办法脱离教会吗？”“转而信新教吧。”“没有别的办法吗？”“没有。”这些谈话被老管家给传了出去，让方圆几英里家喻户晓。

剧院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对此我并不关注。我记得一次彩排我和摩尔合写的《迪尔玛伊德和格拉尼娅》时，我正在想着这些都是在浪费生命，对自己说我们中唯一有意识的动物是那只不慌不忙等待在一幕田园场景中出场的山羊，突然就听到一个演员说：“看啊，那只山羊在吃用作道具的长春藤呢！”

四十

一次去拜访海德博士时我看到了位于钥匙海湾（Lough key）的名为岩石堡（the Castle Rock）的一个城堡。这里是个小岛，上面建着一个至今可供人居住的空城堡。最后一个住在那里的人是海德博士的父亲，他在年轻时在那儿住过几个星期。四周的海岸上有树林和小山，风景美不胜收。我相信租这个城堡几乎不花什么钱，而且我一直幻想着把它建成一个爱尔兰的伊利欧西斯（Eleusis）或萨莫色雷斯（Samothrace）。除了我的情人之外的常萦绕在我脑海里的东西即是需要一个神秘的地方——一套召唤和冥想的仪式——来把对神灵、圣物和自然之美的感悟溶为一体。我认为我们不应把朱迪尔圣化，而应认为我们自己的祖国神圣，最美的地方最神圣。商业和制造业使世界变得丑恶；异教徒自然崇拜的消失剥夺了不可亵渎的神圣的可见的美。我深信所有的偏远的美丽的地方都有许多看不见的生灵，与它们联系是有可

《小镇故事》：由摩尔改写并最后命名为《压弯的树枝》于1900年2月20日在都柏林快乐剧院首演。由F.R.本森公司于1901年10月21日在都柏林快乐剧院首演。

judca，昔日罗马所统治之南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能的。我意在向青年人倡导这种崇拜，这样可以把基督教的与一个更古老的世界的根本真理相结合，并且把岩石堡当作他们偶尔在尘世中休息的场所。

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在思想中（与在许多作品中一样）寻求把这些古老的圣址重新带到想象世界之中——如斯利夫纳曼山，诺克纳利及特别是环绕着引人注目的小山的那些古老而受人敬重的圣址。而我期望用我的作品及我们这一派的作品与这些圣地建立一种秘密的、象征的联系，因为那样，我想不用夸张和修辞就会使灵魂之爱的教义更丰富、更有说服力。宗教不也应该藏在艺术作品之中，如同上帝存在于他的世界之中吗？而且译者除了轻轻耳语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不想像建剧院一样建圣址。它们的轮廓必须是由无形的手来完成的。

我想我自己的预言是不充分的，它应该由毛特·岗和我来共同完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到一起去。难道在矛盾之时就不存在和谐吗？我外在的性格是消极的——除非为了她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书桌——而我深知我的灵魂本质上是充满激情的甚至是狂热的。对她来说一切恰恰相反，她只在灵魂上是温柔的、被动的，充满美妙的幻想，似乎只用灵魂的指尖夹接触这个世界。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曾用死的象征做过测试，我在脑海里设想了一下，但不想惊吓她，于是请求不用人的颅骨而用狗的颅骨。她说：“我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颅骨。不，手上有伤，不过我不得不说是个颅骨。”我不能影响她的行动，却能控制她的内心世界，故此我能利用她的洞察力来创造出从两个灵魂里产生的意象（尽管主要只能被一个人看见），因而逃避仅仅个人的东西。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灵魂里将有一个精神的产物，事实上亦如此。我知道这种不可理喻的生命可以从我们的记忆中选择，我相信，亦可从我们种族自己的记忆里选择；能超越个人偏好的需要，实现我们的自身，实现象征和神话。

毛特·岗完全赞同这些观点，我不再怀疑要是实施它们我会赢得她。政治可以是我们相会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是最好的联系方式，哪怕刚刚争吵过也会马上重归那种亲密的感觉。闲暇之中每时每刻我们在幻象中都能得到长长的一列符号。各种树都与鲜红的点相对应，古老的神和英雄渐渐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织物上各就各位，那个织物的中心有塔萨·德·达南的四个护身符：剑、石头、梭镖和罐子，在我心中与几组塔罗待牌相关。乔治·波勒克斯芬尽管已经老了，却也赞成我的计划，而他缓慢而困难的洞察力增添了一定的符号。他只见到毛特·岗一次——在政治上他是个极端的统一派——可他俩能用彼此的符号，在他家里我做了许多这种工作。在我的思结里这些意象变得连续不断，埃伊米呆在柯尔庄园时他问我，他在走廊周围看到的小丑是谁。那是我用来联系英格斯神的一个意象。

那时候我肉体上受到很大的压力，也十分忧伤。我的情人离开了我，别的女人都还没有到我的生活里来，几乎七年里没有一个女人。我受到性欲和失意的折磨。在柯尔庄园散步时我常常大叫，这让我放松了一些。要是这种欲望变得无法忍受我就手淫，而那这样的话，不论我怎样有节制还是会使我生病。我从未想过再去找一个情人。我对自己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兰斯洛特临终的自白。事实上也是我最大的骄傲：“我曾许久深深地爱过一个皇后。”我

怀疑有误。

删去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候。”

第一次去柯尔庄园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空前绝后最痛苦的时候。我第二次去时跟第一次一样我的神经系统极度衰弱。早晨穿衣都把我弄得精疲力竭，格雷戈里夫人来看我时给我送汤送水。

我没法干该干的活儿，就开始和她一起编那部正付印的神话信仰集。我生活在神秘之中。这些人似乎有一种古老的知识。啊，要是我能够，哪怕仅仅能和他们的谈话者面对面谈谈该多好。“那位长者，”格雷戈里夫人跟我说一个在林中路过我们身旁的老人，“也许知道古老的神秘故事。”我眼前开始出现充满智慧或者是美的幻景和梦。我后来的许多思想都建立在这样得来的一些词句上。有一次快要入睡时我问怎样解释那些关于“走掉了”的人的传奇故事，既然我和格雷戈里夫人知道这么多这种传奇。在所有这些故事中，男人、女人或者孩子被认为是由仙界带走了肉体，剩下的是被调换过了的孩子、老人或老妇，或许是一堆刨花变成他们的样子。我醒了，知道自己是躺在床上，旁边是熟悉的物品，却听到我口中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我们给睡着的人做了一个塑像，塑成的不是睡着的那个人而是像睡着的那个人，我们叫他伊曼努额那”。

一天下午我过一条小溪，跳跃着跨过去时有一种十分陌生的感情——我全部的想法都是异教的——完全依赖于神的意志的感觉。转瞬即逝。我对自己说：“基督徒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来似乎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上帝对每个灵魂之爱都是无限的、也是唯一的；没有一个灵魂能满足对上帝的同样的需求。”另几次我得到了一些诗词的片断，半是听来的，半是看见的。我一次在梦中见到一个年轻的牧羊女呆在许多羊之中，有山羊，也有绵羊。有人路过，说了一个她从未遇见过的年轻人的名字。我梦境中她站起身来叫着每只羊的名字同他们道别，然后登上旅途。看到这些时我似乎也听见了诗句，不过只有一句话我记下来了：“她只不过刚刚听说了他的名字，然而他似乎一直在她的怀抱里。”

有时我醒来时眼前似乎有精美的配有插图的书页。上面的画看似深奥具象征性，而当我试图读它时一切都消失了，只有一句留下来了。我记得是：“世界之奥妙如此简单，能用浆果汁写在一片草叶上”和“伊甸之河流于我们的河流之中”。有时我躺在床上半梦半醒，像人们做恶梦时那样平躺着，然而有一种好奇而欢快的感觉，我能在床边看到各种各样的形体：有一次见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自称伊旦，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另一次有一个少年和一位姑娘身着橄榄绿的衣服，面容悲哀而温柔；一次见到我母亲手捧一口茶杯；还有一次是一个女人拿着一张伊丽莎白女王王牌。

有性内容的梦十分稀少，无论是当时还是其他任何时候我都未曾叫我的恋人入这类梦来；我觉得对她我是过于敬畏了。一天夜里平躺着时听到一种声音，说要给我看一个秘密，一个关于生和死的秘密，但我一定不能说出去。

《爱尔兰西部的幻象和信仰》直至1920年9月才出版。格雷戈里夫人的序言日期为1916年2月。该书中叶芝所写的“巫婆、巫师和爱尔兰民间故事”注明是1914年，“史文朋、巫师与荒野”注明1914年10月14日。

Emmanuel，即弥撒亚（the Messiah），是Immanuel的变体，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译者注。

“一天晚上我醒来，一个年轻人发现我身体发硬，并听到我双唇之间传出一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像是我的：“我们给睡着的人塑了一个像，而又不是睡着的那个人，我们称之为伊曼努额那。”见《幻象》（1937；1962）第233页注释。

房间似乎变亮了，当我往床脚看时，我看见那里变成了宝石，而且这些宝石外表都十分类似——它们让我想起了儿时装柚汁的玻璃瓶上浮雕的果实。我一直没有把愈来愈明亮的光线与性联系起来，直到一切突然变暗我发现自己遗精了。

我梦见自己平躺在一个大圆房子的一个大石槽中。我知道这只是开始，有风吹过，似是从脚下上来的。周围是看不见的形体，从我的眼睛及身体的各个部位一阵阵影响我，十分痛苦。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我这样做是想检验出是否值得这样继续下去。”我知道我正经受着考验。另一晚上我觉得自己被从身体里带走进入了一个光明的世界，而在这种光明中（也是纯粹的幸福之中），有人告诉我将要给我看灵魂怎样进入他的化身。我看到神秘的组成部分以一定的秩序在我的灵魂旁聚集，整个过程都费尽心机，我一醒来具体情节就忘记了。只依稀记得我自言自语的一句话：“美将变成美的物体，真理将变成事实。”

我发现我能用符号来召唤梦，尽管最发人深省的梦是不召自来的。我睡着前就在枕上念苹果花的祈祷文。有时我要是在睡着以前努力地用符号（已记不清了）把我的灵魂送到毛特·岗那里的话，醒来就发现梦见下了一场宝石雨。有时在巴黎，她在同一天晚上也会有相应的经历，常常十分具体。我认为我们在感情世界里合为一体，这个世界因其本身的完整和纯洁而永恒，它的象征物即是主石。肉体的、性欲的感觉从不与这些梦相连，而且我注意到，生殖器的兴奋一旦结束，一个伊旦的形体就会出现。

我努力地向格雷戈里夫人描述一些幻像，奇怪的是却描述不出来。我感到发声困难因而不知所措。我很想告诉她一些美丽的景象，也不知为什么想告诉她。我记得当时读到的一些神秘故事并不经常能讲述出来，记得讲故事的人不得不在某句话中间停下来。甚至到现在，尽管有时我毫不吃力就能讲述，更多的时候我却讲不出来。有点奇怪的是我想写什么都能写出来。

四十一

威廉·夏普来到了图利拉。我现在觉得以前我从来没有正确地行待并恰如其分地评价过这个人，对于他来说这个流体性的世界就要流动了，并且要扰乱一切；我努力地掩藏起滑稽的感觉（那是从别人那里传染来的），让自己浑然不觉。看着他庞大的身躯、绯红的脸庞、英俊的脑袋上是硕大的一丛猪鬃似的乱发，谁都不会把不停地呈现于眼前的流质的生活神圣化，跟他一道散步时我心里在想：“等到了第三灌木丛我们就说，一个红色的精灵要跳出来了。”我们去了那个灌木丛他真的说了：“一个红色的东西从灌木丛中出来了。”一次我带他到一个仙堤开始召唤，等我努力地试图跟他说话时没有回音。他双手抱着一棵大榆树出神了。等他醒来他声称他的灵魂在树液里，随树液流遍了整棵榆树。到那时为止我从未怀疑过美丽的菲奥娜只不过是

叶芝把毛特·岗与苹果花相联系，如《朦胧的海域》和其他几首早期诗歌中所写的那样。

1897年深秋。

叶芝在1887年7月1日致凯瑟琳·泰南的信中说：“有人介绍我认识了《本世纪十四行诗》的作者夏普，我讨厌他那种带着软绵绵的知足神情的绯红的英国脸”。见《书信集》（韦德编辑）。

facry rath，古爱尔兰的防御工事，相传为神仙所建。

从属人格，因自觉的或半自觉的神秘化故弄玄虚（见附录中的信），弄得兴奋了它就似乎先以一个女人的形式出现。我呆在图利拉时主拜访他，记得马丁对他讲过的传说故事十分不以为然，前一天晚饭后他讲给马丁·莫里斯，这时是讲给基拉宁阁下和他自己听的，基拉宁间下无动于衷。他说他曾到国外某地去，看到菲奥娜由垦体变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进了屋，而在这种幻象中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她同他睡在一起，他说，就像男女在一起那样，几天后他的胸脯鼓了起来。于是体型几乎像是个女人。

四十二

我呆在柯尔庄园和图利拉时埃伊（即乔治·拉塞尔）也都在那里，他是另外一种幻想主义者。流体的世界更多是在他眼前而不是从他身体里淌过，没有给他的心灵蒙上阴影也没给他带来任何烦恼。不久前我把他介绍给了贺拉斯·普朗克特爵士，他后来成为农业组织社的核心人物。他着手研究农业银行的问题，六个月内他发现的问题比以前十年的还多。而他还对我说：“除了诗别的书我从未读过，怎么能胜任这项工作呢？”一开始贺拉斯·普朗克特主动给他职位可他拒绝了，因为他的追随者们需要他，尽管这比他在一家大商店当收银员的收入多上两倍多。后来他终于答应了，那是在我代表他的追随者同他谈了以后——想法是他们自己的，话也是原话——说他们会变成他的影子，要是他走了，说不定他们能找到自我。我们从都柏林艺术学校时开始建立友谊，近年来尽管还未破裂但也已变得有些紧张。他有宗教天赋，这种天赋的核心是认为所有的灵魂都是平等的：女王或者卖苹果的女人没什么两样，既然都只不过是永生的灵魂。而我一直关心的是人的能力，是能把人区分开来的东西。他眼中的我粗俗、伪善、甚至傲慢自大，而他似乎要在各种艺术中鼓励门外汉的精神。

我们的关系也由于最近一些别的原因变得紧张起来。他常在幻觉中看到前面有一个超凡的世界（即他所相信的自然之精灵），我希望他像史文朋那样记录下来，让他的洞察力得到一定的验证。对他来说这样做简直太邪恶了，也许转向分析检验了他的天才，他怒发冲冠；我坚持要象征性地分析理解他认为理所当然的真实的东西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后来他气消了，详细地描述了自然精灵不断上升发出的光亮，也描述了我的三个世界，即自然精灵或水的世界、天界及神界。因我在左右干扰了他，使他的幻象呈现一种他不喜欢的形体，一种明显带有象征性的形体——甚至有带翼的天使，我想他的

伊丽莎白·A·夏普在《回忆我的丈夫威廉·夏普》一书写道：“叶芝先生在1907年给法国苏格兰社团阿伯丁中心做的一场演讲中，这位爱尔兰诗人提到了他的朋友。他认为‘在许多方面看夏普有着一颗不寻常的单纯的心。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古老歌谣的代表。这位爱尔兰诗人觉得他的确当之无愧……他接着说威廉·夏普是他遇见过的最卓杰的通灵之人，他真的相信菲奥娜、麦克劳德是个从属人格——就像在心灵研究方面的书中读到的从属人格一样明显。许多时候他（威廉·夏普）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

叶芝没有列出这封信，手稿中也没有附录。也许就是第288页上说的那封信。伊丽莎白·A·夏普所引的就是那封信，与叶芝的话十分相符。

Sir Horace Plunkett (1854—1932)，1892—1900年议会成员。1894年他建立了爱尔兰农业组织社。

“可我，我的优点只是为有分析的思想下种种定义，既不能合上想象的眼睛，也无法管住我的舌头默不作声。”选自《人民》（裘小龙译）

幻像是不是比我能见到的高级，除了我睡梦中见到的之外，而对他睡眠中见到的幻象我一无所知。他认为每天夜里（就跟出生前一样），灵魂悬在空中如同挂在十字架上一样，静观自己的生命及其一切的哀怨并且对此听之任之，尽管对其了如指掌。他醒着时见到的幻象比我的高级是我从一次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有一次我俩同时看幻象但没告诉对方看到了什么，我只见到一个野人平卧在一个幽灵前，而他看到一个人的灵魂盘旋在半空的一个巨神前面。有一次我把他从病态的忧郁和诱惑中拯救过来。当时他在画柯尔庄园的掩映在树丛中的一个很深的死水塘，神情忧郁而沮丧。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跟他这种人在一起只能召唤而不敢给他一个符号，就劝他在炙烈的阳光下画花园。他重新高兴起来，告诉我他看到死水塘中有人影答应他只要不投水自杀，就给予他一切的智慧。他最受诱惑的不是在水塘边而是在夜里：那些影子永远都站在他的床前。

四十三

我时常去看毛特·岗。一次在贝尔法斯特（她去那里完成几项政治任务），有时在巴黎，更多的时候在都柏林。在都柏林，因为害怕暴露她，我从不去同一个旅馆找她，虽然她时常笑话我过虑了。有一次她抱怨说老是见到我在跟前。“我并不是说，”她说：“那帮人都很爱我，但是他们将会憎恨爱过我的每个人。”但是我总能得到信，被告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见面。一天早晨，我在靠近拉特兰广场的旅馆里醒来时，带着渐渐消失的幻象，我看到她的脸凑到我脸上，感觉到她像刚刚吻过我。早饭后，我在拿骚旅馆碰到她。我们决定当天呆在一起，并于下午去拜访一位年迈的芬尼亚运动领导人詹姆斯·史蒂芬兹。她问：“昨天夜里你是不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答道：“今天早晨我倒是平生第一次梦见你吻我。”她默不作声，但吃过晚餐我正准备回去时她说道：“我现在想跟你说发生什么了，昨天晚上我入睡时看见一个巨大的幽灵站在我身边，他把我带到一大群幽灵中间，你也在其中。我的一只手被放进你手里，并告诉我我们已经结婚了，之后我就不记得了。”然后，她真的第一次吻了我。

第二天，我见到她非常沮丧地坐在火炉旁，“我不该用那种方式跟你说话，”她说，“因为事实上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妻子。”我说：“你爱过其他的什么人吗？”她说没有，后来又说曾经有过一个，她得凭良心说。然后就一点一点地道出了她生活中的故事，道出了那些我曾经听说过的但不相信的被流言蜚语所歪曲了的事情。

19岁那年，她和一个亲戚一起住在法国南部时，她遇到了法国布朗热派的下议员米尔瓦那，他并没有极力追求她就立即爱上了他。后来他返回到都柏林，她父亲在那里有一个军事指挥部。一天晚上她坐在火炉旁思考未来

吕西安·米尔瓦那（Lucien Millevoye），法国政治评论家，《政党》杂志主编。

从本段开始到此的句子被删去，但为了叙述方便仍加上。

托马斯·岗上校在都柏林是陆军副官长。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在《再见，英黎士伐伦》中有下面一段描述：“她坐在那儿静如止水，曾经是爱国主义的两比尔（女巫）却未传过任何神谕；如今沉静而衰老；她深陷的眼睛如今变得悲哀，闪着微弱的失落的光亮；喜欢听到喝彩却从来不曾坦然地面对众人；陆军上校的女儿一如继往。”

的生活，她渴望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在父亲的书斋中，她发现了一些关于魔法的书，这一偶然发现使她相信：只要她向魔王祈祷，他就会帮助她，他对她来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因为在她童年时代她就想进修道院。她以奉献自己的灵魂作为代价来向魔王祈求能让她控制自己的生活。就在她祈祷的那一刻，时钟敲了12下，她突然觉得她的祈祷已经被听到，并且有了回答。不出两星期，她的父亲就突然死去；她心里懊悔不她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了，就在她来到巴黎几个月之后，便成了米尔瓦那的情妇。她经常离开他，因为不久性爱就开始使她厌烦，但她仍然十分爱他，后来他在很多方面令她失望。但是当我继续问一些问题时，她紧握双手，说得前后矛盾，并且说不应该谈这些事情。我发现，他曾经要她去做另一个人的情妇，以此来帮助他的政治计划，但被她拒绝了。后来一个小男孩出世了，就是我曾经说到过的那个养子——她认为性爱唯一的证明就是孩子。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的话，她或许已经完全同米尔瓦那脱离关系而居住在爱尔兰了。然而事实正相反，在孩子死后她也考虑过和米尔瓦那分手并且她还曾和另一个人订婚，但一周后又解除了婚约——我想，作为回报，或许与之订婚的那个可怜人该是我。失去的孩子也许可以转世重生，这一想法开始占据她的头脑，她带着幻想又回到了米尔瓦那身边。她生了个女孩，已经两岁了。我从她断断续续的话中知道，既然孩子已经出生，她和米尔瓦那再次分居。但她对于他是不可缺少的，“她根本不知道如果没有她的影响，他会怎么样”。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她是否想过在达到一个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他也许会从某个职位上就此一落千丈。我认为她当时正在尽职尽责做好每件事以安抚自己不安的良知，而后来格雷戈里夫人也使我确信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姐妹一样细心地对待她。如果她会来到我身边的话，那一定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出于她的良心。多少次静夜中，我静静地躺着，谴责着自己的行动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从高度的谨慎出发，而是出于害怕道德责任，我的思绪在信步漫游，净是些悲哀的念头，最终也没想个明白。

不久，我记不情是几天之后，我们坐在一起时她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你将得到一个梭镖’”。我们沉默了，两人眼前都同时出现一个幻象，直至结束，我们谁也没有打破沉静。她想象自己是一个巨大的石像，中间有道火焰穿过，我觉得自己变成了烈火，并不断地上升，并从智慧女神石像的双眼向外看。难道是隐藏在人类生活背后的生灵试图让我们结合吗？抑或是我们用自己的梦带来的？那时她常常充满了柔情，并且温柔地吻我，但当临行前一天晚上我向她提出结婚时，她的权答是：“不，这对我似乎是不可能的”，然后又紧握着双手说：“我对性爱感到恐惧。”格雷戈里夫人当时在威尼斯，便一接到我语无伦次的信后就立即赶回来了。她给了我钱让我去旅游，并告诫我决不要离开毛特·岗，直到她答应跟我结婚。但我告诉她说：“不，我已精疲力尽了，我不想再做任何努力了。”

伊佐特·岗 (Iseult Gonne 1895—1954)。

手稿末页中有一个“沮丧时写下的诗行”的头几行的草稿，字迹艰难辨认，如下所示（诗行前打一个X表示手稿中删去了这一整行）：X 月亮不再能够 X 绿色的圆眼，摇曳的身躯 X 月亮上那些黑色的豹影 X 月亮不再能够 X 给我送来绿眼睛的豹影和摇曳的身躯 X 月亮上那些绿眼睛的豹影 X 如今古老的兔子们在草丛中死去、所有的荒野中的巫婆和恋人都死去于是《沮丧时写下的诗行》，收入《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参见卷一裘小龙译作。

(叶芝《自传》前二十章由黄伟译，后二十三章由李平译)

日记（1908—1930）

W.B.叶芝
都柏林阿贝剧院
及
伦敦尤斯顿路沃伯恩大楼 18 号
私人笔记

1

为什么我该指责她在我的日子里
填满了苦痛，或者她近来
本已教会了无知的男人最狂暴的方式
或把小街扔在大道的身上
只要它们拥有等同于欲望的勇气？
有什么能使她平静下来，一副头脑
那高贵已变得单纯如一团火焰，
与 / 和美如一张拉紧的弓，一个
在如此一个时代并不自然的种类
高超又孤独而又严肃之极
为什么她本能做到的就是她本身？
是否另有一个特洛伊为她而燃烧？

1908 年 12 月

2

在巴黎 曾有一天我发现我好多天都找不到一点社交的理智，由于一个十分普通的人的十分普通的愚蠢。我在她说的每个字里都听出了虚荣与伤感这两个古老的敌人，而变得又粗暴又，相应[地]，愁苦。这是我最大的缺陷，根源在于背对着月球的火星。我必须小心观察自己，记下那些我可能有兴趣使其痊愈的错误。也许我该找出我讨厌的人直到我征服了这种急躁的好斗作风。失去自我控制总是没有借口的。它总是来自浮躁，来自一种精神恐惧，恐惧某个此时此地更为有力的人，即使仅仅是因为其愚蠢。对那些在我统治下的人我从不生气。我害怕陌生人；我害怕集体意见的代表，并如此愚蠢和粗鲁地发怒，夸大我感到和想到的一切。

3

[1908 年]12 月 13 日，一直在细看《诗集》第 卷。现在我看到“十诫”的毛病在哪儿了。主人公不应有一刻看似“Rosa, Alchemica”的主人公的影

《并无第二个特洛伊》。参见卷一王佐良译文及译注。

叶芝在巴黎度过 1908 年 12 月，创作《伶人女王》，教英语课和看望毛特·岗。

Mars in opposition to Moon。

出版于 1908 年 12 月。

子。他不是面具而是脸。他认识自己。他得到的不能是普通意义上的幻象。他本人就是中心。也许他梦想他在说话。没有人在对他说话。他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位置上。他不是多数的反动。巴黎的那个女人向玛琪揭示了什么？确实是脸与面具之间的某种妥协？叙述者拒绝这份手稿，因此绝没有看到它的内容吗？它纯然只是面具的准则吗？对某一副面具的选择？几乎不是，因为那将仅仅是一种对基督的新形式的摹仿。它正在成为面具后的面具吗？也许题目应该起为《面具与脸》。然而人的本性似乎准备着一种持续的变化，一群变幻不定的影像。一天是这个神下一天是那个神。

对某督的摹仿区别于“十诫”的自我认识。那又如何呢？基督只是另一个自我，但他是超自然的自我。

4

[1909年]1月14日。昨夜在艺术俱乐部有一场关于一个政治问题的辩论。我有一会儿倾向于使用争论仅仅来回答这个或那个发言人所说的什么东西。追寻着面具我决心只说异想天开和个人的事，以此逃避单纯的争斗。我这么做了，我发觉我较早想到过的所有论点都有这个那个人说出来。逻辑是架机器；大可让它自行运转；不可遏止地它会迫使那些在座的人们穷尽那主题。傻瓜像智者一样可能对任何主张说出恰当的回答。如果某个论点被忘记了，有人回家就会愁眉苦脸。你把钱扔到桌上，就收到这么多找头。风格、个性（被小心采用因而是面具而已），唯此方能逃开那阵讨价还价热，只是逃不开找零钱者的眼光。

5

要使这些笔记保持自然并在我的生活中于我有用，我必须防止一段笔记引出另一段。那么做就是让自己听命于文学。每一段笔记都首先必须作为一段随想出现，如此它才能成为我的生活。倘若基督或佛陀或苏格拉底曾经写作的话，他们会为一个逻辑的程序而舍弃生活。

6

[1909年]1月22日。我一直沉湎于乔治·卢塞尔周围的一个圈子，它典型地属于正在爱尔兰崛起的那个新阶层：时常在礼仪上并不缺乏教养，因而其头脑的发育不良就更其显著。每一种思想都是在某个工厂里制造的，上有它的原批发商的标记——所有那些思想从未在任何个人的头脑中以其现今的形式被思考过，是非个人的机械作用的产物——来自学校、课本、报纸，首先是这些。于是就有了最先想出无论什么东西的人绝对没有的那种信念，因为所

在“敬爱玛琪”中。

叶芝于1908年5月28日成为都柏林的联合艺术俱乐部的一员，在1910年6月29日成为俱乐部的副主席。

这个句子在后来一个变体中更清晰一些：“基督或佛陀或苏格拉底都不曾写过一本书，因为那么做就是用生活换取一个逻辑的程序。”《自传》，第461页。

有思想者在这点上都一样，他们走向真理心中充满了犹豫和怀疑，实验室的怯懦。信念来自重复，来自众口一词。这种头脑的发育不良的破坏性远大于向地板吐口水这种单纯的缺乏教养。一切魅力难道不都是继承的吗？无论是智慧的，风度的，或性格的，或是文学的？一个伟大的女士像一个伟大的诗人一样简单。两者所拥有的无不是既古老而又专属他们自己，两者除对他们自己以外对一切都满怀疑惑，对于一切可以改变的，对于他们仅仅思考的事。他们承担确定，对于这个是时尚，对于那个是见解，并将一切略微重塑一番。

7

一场交谈。我正在告诉杨小姐 内文森 是如何对我说欧洲再不会有军队打仗了，即使是在 1870 年交战的那些法兰西和普鲁士的军队。他说，“不是因为惠灵顿的农民不相信来生。他们还不够清楚得知道他们相信什么。他们战斗是因为个人想象力尚未被教育所激发。今天我们全都（我本人在其他论点中同意这一点）已经认识到能够发生在我们头上的最糟的事将是死去。”他曾经身历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危险的境地，多年来经历了欧洲的几乎每一场战争。杨小姐以一种不可测度的恩惠态度回答说，“从前男人们认为耻辱比死亡更糟。”

8

曾有一次我奇怪地因什么病而病倒了。我一直干得很勤，突然我发现自己不能使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任何严肃的主题了。然而在这一刻我还不能肯定这件事不是一种微恙，由吸烟过度引起，由我时不时加入的那种神经过敏的斗争所加剧：害怕因沉湎于外部事物而失去我的灵感。诗人之敌是那些造就好市民的产业。一个诗人是一个内外颠倒的好市民。我不知道这些紧张的发作是否是一个信号，在内部告诉我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离开这所剧院，或者只是仅仅伪装起来的陈旧好斗作风，因为我感到我被牺牲给了费，在他显示自己不甘居人下时就该严厉处理，是他令当今的安排变得必要的。如果是这后一个原因，我必须抗击它。倘若是曾为我做过那么多的格里高利女士犯下了这个错误，我相信是的，那么我必须怀着耐心和好意忍受后果。

9

今天报纸上对《吝啬鬼》的评论——星期四的《辛恩·费因》上的一篇文章——显示了对闹剧和方言的古老厌恶。由本质上是智力方面的暴发户的人们写就，它们对并非明显和出名地匙雅的一切都有点儿发怵。是对“布袋装”这个词的一种新形式的反对。我们的新秘书，我看得到，对莫里哀有一种深深的仇恨。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把那种想法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即我们对莫里

女诗人埃拉·杨（1867—1956）。

亨利·W·内文森（1856—1941），战地记者。

W·G·费要求阿贝剧院的导演们任命他为经理和演出人，这受到拒绝，于是他在 1908 年 1 月 13 日辞职。格雷戈里夫人的翻译初演于 1909 年 1 月 21 日。

哀的闹剧小题大作了。我们其实是大题小作。多年前西格尔森博士曾说起过我的《茉儿·梅吉谣曲》的最后一行，“为什么是蜡烛。一定是烛心”。为同样的原因那些作者们——在这一点上我尤其注意到那些年轻的——基本上就是把他们偶然想起的每个外国作家的名字放进自己的文章里。

10

今天我忽然想到 PIAL 从未真正理解过我的计划，或天性，或观念。接着那念头出现了，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和正在做的最好的事有多少是仅仅试图向她解释我自己？倘若她理解了，我就会少了一个写作的理由，而做如此劳累的事从不可能有太多的理由的。

11

要反对爱尔兰新的发育不良，它可能在几年中毁掉使爱尔兰在世界上有一个卓越名字的一切（“哦爱尔兰，最勇敢的战士和最美丽的女人之母，”博洛呼喊道，当他想到爱尔兰僧侣们在西班牙向他，一个圣经传播者，所显示的好客之情），我只能建立起一个次等或内部的个性，它是由我从我自身的传统中创造出来的，而这个性（唉，对我来说只在我的写作中是可能的）必须永远是优雅而简单的。它必须略微疏离令魅力成为可能的直接利益，而仍保持足够接近以便取火。它难道不就是魅力，也许，正因为它是远离机械作用的一种逃避？世界上那么多事物为利益争斗所统治，就是一种机械作用。报纸是机器的咆哮。争论，一旦寻求公认的胜利，便成了一种利益冲突。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首先不应该在为不朽叹息的书籍里争论，倘若他并不准备出发走向另一场外表的胜利。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变得粗鲁正是他吝于向小丑交出他的永久胜利之时。

12

我想到这个念头在一会儿之前
我一小时前突然想到
我的爱人无法理解
我已做的，或将做的
在这盲目痛苦的国土
而我想着它越来越悲伤
直到我的思想又一次澄清
回忆起我写过的最好事物
是把一切写得坦白
每一年我都曾久久呼喊
她只能全都理解
因为我已发挥我的力量
而词语服从我的召唤

否则这首诗

倘若她曾这么做——谁能说
本会有什么从筛子里摇下来——
我本会把可怜的词语抛开
而满足于活着。

[1919年] 1月22日

13

我刚收到一封信，告诉我可怜的 W。费和他妻子在伦敦已近于挨饿了。他们从美国回来时带着积蓄，大概是 40 镑，但这笔钱现在已差不多没了。我不住地自问我们是不是能把他召回阿贝。这么做将危及剧院的整体纪律，把那些一向支持我们的演员有权感到是他们赚到的钱付给他。然而他毕竟是一位天才的演员。他那一代整个的不是对艺术毫无用处，就是几乎如此。他，像大多数为了这个那个原因离开了我们的演员一样，成长于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在爱尔兰生活的平常事物之外的东西受到严肃对待，除了政治。他以他的全部天才无法严肃对待他自己的艺术。他无法逼使自己致力于此。他反而骄傲于经营管理，这使他在朋友眼中显得重要，而他对此又毫无自制力。奎因小姐，沃克小姐，还有其他人也都一样。政治令他们一无成果。他们无法严肃地致力于他们的艺术，他们也无法以纯粹的眼光看它，为了它自身而爱它。我们不会有好的作家，除非我们等到了多多少少是在我们自己的运动影响之下的一代人。对于其他人，艺术仅仅是国民生活节目中一个必要的部分而已。即使那些并非有意识的政客也深受普通观察事物方式的影响。即使是最崇高的政治动机也造就不了一个艺术家。

14

我姐姐说我父亲曾说过，“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她聪明或是因为他崇拜她，而是因为他喜欢她挠头的样子”。

15

[1909年]1月23日。昨天写的诗第二、三节应当是这样：

我已厌倦了太阳；
直到我的思想又一次放晴
记起我做过的最好的事
是把它做得坦白；

这是《词语》一诗的初稿。

玛伊尔·T·奎因，阿贝剧院演员。

玛莉·沃克，阿贝剧院演员。

记起每一年我都叫喊“终于
我的爱人懂得了它的全部
因为我已发挥了我的力量
而词语听从我的召唤。”

16

对我来说似乎爱，倘若它是好的话，本质上是一种纪律，但它需要如此多的智慧，以至所罗门与希巴的爱本应延续过圣经的全部沉默。在智慧的爱中每人都预见了对方崇高秘密的自我，并且，拒绝信任仅仅是日常自我，创造了一个镜子，在其中那爱者或被爱者都看见了一个形象，好在日常生活中摹仿。爱也创造面具。

17

我的爱人恼怒于近来
我蔑视所有卑贱的血
仿佛她不曾教我仇恨
以对一个小丑的吻。

18

我们的现代诗歌是想象的。它是年轻人的诗歌。最伟大时代的诗歌是对胃口与习惯的表达。因此我们选择在它们枯竭的地方。[1909年]1月24日。

19

什么事使我想起我在《通道》中忘了莫希尼的这段名言。”当我年轻时我很快乐。我以为真理是某种能从一个人的头脑传递给另一个人的头脑的东西。我现在知道官是一种头脑的状态。”

20

一段交谈。昨夜我遇见了比雷尔。有个富翁在那里，某人在讲述财富所能有的为善的巨大力量。富翁正谈论着在康诺特兴建一座鹿林。比雷尔说，“财富的力量很小，它真正能做的没有多少。”我说，“然而时不时地人们总会遇到某个有魅力的人。他喜爱所有美好的事物并且十分快乐，而倘不是某个太祖曾出卖他的国家换取金子的话他是不会拥有这些品质的。”比雷尔回答，“我相信财富偶尔——达尔文是一个例子——会使某人能够写下一本伟

毛特·岗与约翰·麦克布莱德的婚姻于1903年2月21日在巴黎开始，在1905年结束。此诗未发表过。一篇散文，最初以《智慧的途径》为题发表。

莫希尼·夏特尔吉，一位孟加拉婆罗门，叶芝曾于1885或1886年在都柏林遇见他。

奥古斯丁·比雷尔（1850—1933），爱尔兰政治家。

大的著作。”我回答，“哦，我想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它创造了我们从我们的阁楼窗子里艳羡地观望的美好生活。我们不应离开我们的阁楼，但要不是为了我们从窗口看见的东西我们是写不好的。”这时比雷尔回答说，“那么作家不过是寄生虫。”我注意到大多数其他宾客，其中有两三位法官，似乎，与比雷尔和那个富翁一样，都过于同情与焦虑而难以取悦；我本人属于其余的人。比雷尔和那个富翁对我们任何人都毫不在乎。我们谈话，他们任人与之谈话。

21

伯纳德主持 也在那里，一个富有魅力与智慧的人，但带有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主教牧师那种过于逢迎的态度，一种人们认为与深邃的精神境界并不相容的态度。我们讨论了自我实现与自我牺牲。他说经典的自我实现已经失败，然而基督教自我牺牲的胜利已将世界投入了黑暗时代。我提醒他有某个挪威神，曾被悬在一道深渊上一连三天，“一种对自己的牺牲”，来表明两者并非互不相容，但他回答说，“冯·哈特曼 讨论这个问题，即灵魂是否不能牺牲自己，甚至于失去它自己，为了某个善的目的。”我说，“那正是我的《凯瑟琳伯爵夫人》的难题，”而他说，“还有一个难题是一个民族是否应作出这一牺牲。”他思考的想必是爱尔兰。

22

当我重写《敬爱麦吉》时我清楚地看见交给那老人的消息必然是一系列似乎是专断的命令：一年的沉默，某些饮食戒律，等等。没有专制就不可能有宗教——就是那观念，因为不可能有最后的牺牲，即精神的牺牲。民刑推事应当拒绝照管那份手稿，在听说它包含的不是智慧而是获得超自然允准的专制，那确定一切的命令姿势之时，单纯的智慧必将死去，他知道，像任何其他活着的气息。树必将死去才能被制成一个十字架。

23

科伦姆借给了我他的《沙漠》。任意读了几页，够不平常的——激情，观点，天才的铸模。他没有意志，他把自己轮流交付给每一种感动，而尽管他靠为他的主题采取漂流与模糊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大机会，他并未体现他的意义。人们总要发问，这或那与主题有什么关系。他是乔治·卢塞尔那种令我愤怒的对生命的误解的一个牺牲品。卢塞尔，因为是个天才的人，比任何其他人需要更多的教育，而他自己读得少还教导他周围的人要读得少。怀着宗教改革家的所有狂热，他教导了很多人去蔑视一切不是出自他们本心的东西，靠臆想来做智慧的工作；而那些不含原创事物的头脑就怀着高敞反对每一个没有在第一眼就取悦他们的天才。一个奢华的梦想，一种精神顺畅取代了逻辑与意志。科伦姆那样一个敏感的、自然而然梦想的人，即使他没有有

约翰·亨利·伯纳德（1860—1927），1902—1911年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主持。

卡尔·罗伯特·爱德华·冯·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无意识的哲学》（1869）的作者。

意识地分享他们的观念。正是沉迷于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技巧受不到尊重，仅仅通过劳累的成就得不到赞誉，但如乌鸦般栖息着失望者的一切邪恶情欲的世界。没有什么受到尊重，除了成功——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小小成功——它们离艺术太远不值得羡慕，以及对未来的梦想，一个个在交谈中烟消云散。它尾那种偏离了生命，没有植根于那里为肉体或心灵建成某座房屋的年轻热情的残余。

24

我注意到当这些人采取任何种类的行动时，是采取某种极端的政治。部分地，我认为，因为他们从未学会那令最热切的天性接受可获得的事物的准则，即使是略有悲伤地；但更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任何不在遥远未来的成功，还因为，像巴尔扎克在《无意识哑剧》中描写的艺术家那样，他们渴望获得他们自己可以信任的声望。还有弱者对强烈激情的欲望。

25

卢塞尔忍受他们是因为他有宗教的天才。面对于宗教天才一切灵魂都有同样的价值：女王都不比种苹和的女人更高贵。他的政治天才并未影响他作为整体的心灵，而很可能他把他的政治天才的每一个提议都视为无价值而撇开了，因其会将人与人分开。一切分隔中最根本的，是在仅仅靠不断说“你们这些蠢才”来做它的工作的智慧者和令众生平等的宗教天才之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山峰与寺院对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文明死于一切给灵魂食物的事物，而两者都将死去，倘若那残余者拒绝狂野的话。

26

这一组织的一个错误是不断地为一种精神体验制造一种哲学观念。正是智性对灵魂的专注摧毁了那体验，因为印象处处都被意见所阻挠。我曾听到过它的一个成员，埃拉·扬，某日带着蔑视谈起某个不能分辨美与美的事物的人。我说要如此分辨是十分困难的。她说她发现那很容易。一个抽象意见和一种模糊情感对于她来说与神秘冥想的高超感觉似乎是一件事，后者只有两次，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曾被普洛克鲁斯所达到。他们中的另一个，诺曼在他的圣经课上对伊文斯说他很惊讶他对于“信念、希望和慈善”没有更多的可说了，因为他本人“能够继续研究它们三星期”。伊文斯回答说，“在三星期的沉默中能有更多的宗教。”对于他们，灵魂的体验不是以情感或欲望。或以事实，而是以意见获得的；而他们的意见，从不学无术中得来，归根结底是通神论课本上的陈腔滥调。

27

亨利·F·诺曼（1868—1947）、爱尔兰国家戏剧协会最初的成员之一。
爱德华，伊文斯，艺术俱乐部的成员。

任何被唾弃的真实生命获得奖赏只在被感伤之时，于是灵魂就同样被隔绝于尘世与天堂。

28

埃拉·扬：“我们有这样一只不可思议的猫，它那么有风度，以至如果小猫咪去取食物，它就会离开碟子。它不会打斗。它不会自作主张。而且，更有甚者，如果没有一块完全一干二净的餐巾铺在盘子下面，我们的猫就根本不会吃。我向你保证这千真万确。我经常注意它。即使上面只有一个小污点它也不会吃。”

29

当卢塞尔和我在艺术学院同学时，有一个奇怪疯狂虔诚的学生，时常在脖子上绕一串延命菊进来。卢梭借给了他一本通神学著作，《通道上的光》。他好几天不见，然后有一天看上去十分困惑地出现了。他还书时说，“你会飘进一道阴影的。”

30

在基督教中，在东亚是哲学的事物成了生后——生物学、戏剧。一出戏在被写作时经历了同一个过程。首先，如果它有心理深度的话，就有一捆观念，能够用哲学术语阐述的东西；我的《凯瑟琳伯爵小姐》，比如说，起先是那样一个道德问题，一个灵魂能否为一个善的目的牺牲自己？——但渐渐地哲学越来越被剔除，直到最终唯一能听出的哲学、倘若还有的话，就仅仅是这个或那个人物的表达了。当它完全成为生命时对于匆忙的读者来说似乎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Ghagavad Gita 是不是那个从中创造出了福音的“剧本”呢？

31

[1906年]1月26日。卢塞尔团体倾向于极端政治意见的一个原因，是一种长期靠牛奶食谱喂成的口味渴望强烈的风味。在英格兰其反应将是邪恶，在爱尔兰则是政治。

32

埃拉·扬：“哦，我不是因为那些图画才喜爱兰恩先生的美术馆的。我喜爱它是因为那样一种美丽的氛围。因为那毛玻璃。”

33

休·兰恩爵士（1875—1915），艺术收藏家。

“给[玻璃]一种粗糙表面使之半透明”，《牛津英语辞典》。

一切空洞的灵魂都倾向于极端的意见。只在那些建成了一个丰富的记忆世界和思考习惯的人们之中，极端意见才令可能性的感觉难堪。一切命题，比如说，都只将全部真理建立在一面之上，进入丰富的头脑只能造成混乱和扭曲，倘若它们根本上能够进入的话，而迟早头脑总会靠直觉胜过它们。

34

在准则与戏剧感之间有一种关系。倘若我们不能把自己想象为不同于我们实际的样子，并试图承担那第二自我的话，我们就不能将一种准则加于我们自己，尽管我们能够接受来自别人的一种准则。因而积极的美德、与对一种流行规则的被动接受相区别，就是戏剧性的，有意识地戏剧性的，是戴上面具。它是艰巨的完满生命的状况。人们不断注意到在非常活跃的性格中有一种摆姿势的倾向，或一种对于它们正在制造的效果的专注，倘若那姿态已经变成了第二自我的话。人们注意到它们在普鲁塔克的主人公们之中，也时常在一些曾试图靠古典观念生活的现代人中，比如在奥斯卡·王尔德，以及不那么明显地，华尔特·惠特曼这样的人。华兹华斯如此经常地平板和沉重，部分是因为他的道德感没有戏剧的因素，它是一种顺从，一种他不曾创造的准则。这增强了他在较好的一类损人，例如《观察家》的作者中，在所有属于机器的一部分而仍旧关心诗歌的那些人中的声望。

35

我的一生都萦绕着那个观念，即诗人应当了解一切阶层的人仿佛是他们自身的一份子，他应当将最大可能的个人实现与最大可能的言说知识和世界的环境结合起来。我记得自己在十五或二十年前曾经渴望，怀着这一目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农民遍游西方，再当一名水手去航海。但当一个人甚至惮于同一个陌生人谈生意，并且直到认识一个人达数月之后才没有别扭之感，因为他低估或高估一切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他的冒险不可能走得太远。艺术家越来越与众不同，越来越成为一个仿佛单靠自己的存在，但也越来越失去了对永远更为复杂的世界的掌握。有朝一日致力于发现知识，像某个朝圣者走向圣地，他会成为一切角色中最为浪漫的。他会戴上所有面具来表演。

36

悲剧仅是激情，而它不是从性格而是从动机，激情的漫游之中获得形式的；而喜剧则是性格的冲突。从喜剧中消除性格你得到的将是闹剧。闹剧是单靠偶然拼成的。（从悲剧中消除激情你得到的将是通俗剧。）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是混合的：莎士比亚是悲喜剧。喜剧是快乐的，因为对一个角色，一个人物面具的全部假设，无论是喜剧个人化的脸还是闹剧怪诞的脸，都是一种活力的展现，而一切活力都是快乐的。一个诗人创造悲剧是从他自己的灵魂，那个在所有人中都是同样的灵魂，而在一些时刻它没有快乐，如我们理解的这个词的意思，因为灵魂是一个流亡者而没有意志。它所达到的迷醉来自对大于个人、并且也许为所有仍然活着人不完全地看见的事物的沉思。悲剧的

面具既不包括性格也不包括人物的活力。它们与装饰，与埃及神庙的抽象图形有关。在心灵能够从它们的眼中望出之前积极的意志就消殒了，因此才有了它们悲哀的平静。快乐属于有为的意志，它克服障碍，获得胜利。灵魂只了解状况的变化。这些状况的变化，或这逐渐增大的意识，是现代文化的自我实现。我认为悲剧的动机同这些状况变化的联系更多于同行动的联系。我感觉到这但看不清我的道路。但我追寻真理过于深入了它的灌木林。保持与感觉，与日常思想贴近是我的事。然而悲剧的迷醉难道不永远是灵魂本身的某种实现或达成，是它的某种缓慢或突然的扩展，就像一口满溢的井？那不就是我们所谓美的意义？

37

[1909年]1月28日。悲剧的面具表现了一种激情或心情，灵魂的一种状况；仅仅如此。（音乐家或垂死奴隶的面具。）喜剧的面具是一个个人。（任何现代绘画。）闹剧的面具是一种活力；在此之中快乐的生命因它自身的过剩而变得肤浅了，它已驱走了思想。（任何怪诞的头。）于是这在某种意义上与三大阶级的支配性情绪有关，它们仿佛给悲剧、喜剧和闹剧点亮了蜡烛：贵族，中产阶级，以及平民——崇高，道德力量，劳作。

38

阿林汉姆和戴维斯是爱尔兰的两种爱。在阿林汉姆中我发现了对一个人成长之地的全部情感。在其中我感到像个孩子，我有时听到它出自我自己阶层的人们之口。戴维斯在另一方面着迷于爱尔兰的观念，有意识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尔兰是人为的，一个在数个世代中由一些普通人建立起来的观念。这一人为观念已经对我造成的伤害像那另一个对我的助益一样多。我试图使自己免受它的影响，而我的所有敌人都来源于我在其他观念中抗击它。农民思想的美部分地来自于它的自然，来自它不为这城市出产的人为思想所玷污。一个人不能在智识上总结一个民族，而当这总结由半受过教育的人们作出时恰恰这观念就令人充满惊愕了。我记得我九岁或十岁时走过肯兴顿大道时对斯利哥田野和道路如此热爱，以至我渴望——一个孩子的一种奇怪的感伤仪式——出自那里的一条道路上的泥土来让我亲吻。我没有政治；几年以前，我怀着愉悦读了一卷橙色诗篇，它属于我祖母的马童，而以同样的激情热爱着斯利哥的我母亲，她就在那里出生并被养育长大，如果她有任何政治的话，是反对分裂者。那爱是本能的，令灵魂自由不羁。如果我得以保有它并未感到年轻爱尔兰的影响，我就在我的作品里描绘了爱尔兰的一幅更为深刻的图画。辛格的天才之纯粹，部分是来源于保有这份本能并仅仅保有这个。情感总得到时间的辩护，思想几乎从来不能。它只能将我们带回情感。

39

威廉·阿林汉姆（1824—1889），Co.多内加尔的巴利莎农的诗人。叶芝曾在他的《爱尔兰诗歌集》作的序言中写到他的诗歌。

[1909年]1月31日。我昨天去看辛格，发现他生病了：如果他死去的话，这会令我疑惑：倘若他没有患上他对年轻爱尔兰主义的残余的长期、痛苦的误解，他能否活下去。即使他有一出戏演出成功，似乎也会令他得病。我的妹妹有一天提醒我这个，并劝我不要在他生病时重排《花花公子》。在一件事上他与格里高利夫人是我曾经认识的最强有力的灵魂。他和她一样都从没有一刻对我说起比不上他们的人的思想，像谈论他们自己的思想那样。我从不知道他们会失去对他们智慧自我克制。这里的所有其他人——即使是摩尔怀着他的全部蔑视——在大潮之上控制他们自己的思想都只有一个季节，而摩尔另外有一种极端的对抗性，使他即使是创新的思想都成为一个反应；而非一个创造。辛格和格里高利夫人两者都将自己孤立起来，辛格是本能地而格里高利夫人则是有意地，隔离于较贫乏的头脑的一切富有感染性的意见：辛格如此本能而自然地——当然受到一个病人的习惯的帮助——以至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被弃绝。格里高利夫人的生活对于她的弃绝来说过于充满活力而复杂了，不能不是蓄意的。我既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太健谈了，对任何掌握了我去弃绝我同道的思想抱有过多的信任，于是我只能远离灵魂的这些入侵，它在过去日子里也曾降临我，以一系列愤怒的爆发，其实是十足的愚妄。人们必须同意小丑，要不就保持沉默，因为他身上拥有多数人的力量和信心。

40

昨天汉德森在谴责莫里哀，几星期来他一直对我施压并鼓励奥古德小姐把一出糟糕的感伤戏压到我头上，它具有，或似乎具有，通俗的性质。我最终与他翻脸说，“汉德森，我不会听你的；我是个戏剧批评家而你不是。”一段愚蠢的坚持己见，因为我一直允许他说话并与我争论平等问题。我本该一直对他友好和有礼貌的，但我本来绝不应该允许对任何戏剧的讨论。有关爱尔兰事物的普遍共同性，他现在通过我自己的错误成了主要的声音，而且是剧院里唯一有效的声音了。我所有最糟的坚持己见与脾气暴躁的错误都来源于太不敏感和粗心，无法保持自己与男人女人之间的距离，在所有那些他们比不上我的事物上。一个人应当永远忍受胜于己者，但如果一个人有自制力和灵敏感觉，有时就应将友谊限于单独一个因素以发现胜于己者。我们对我们的爱人这么做，为什么不对朋友这么做呢？我们所有的愚妄都来源于意志的懵懂不醒。对友谊的因素的一个持久的选择，作为一项每日的创造，应是一种持久的欣喜，而一切力量和才能不就是一种欣喜吗？

41

当我们因某种褊狭的愚妄或愚蠢而变得不宽容时，应当看看那个男人或女人并这样想：“从那血液里可能还会出现某个天才之人，也许是一个种族的救世主。那愚蠢对他的存在也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42

格雷戈里夫人在种树；一年来它们占去了她许多时间。要到她的孙子十五岁后，才能砍伐它们。我们这些艺术家，我们不也在种树吗，要过上大约五十年我们才能有够多的价值？每天都注意到某种新的相似性，在出身高贵的人[那]长久确立的生命与艺术家的生命之间。我们从永久的事物中来并创造它们，我们所有的不是旧的血液而是旧的情感，我们在我们的头脑中携带了那社会的形式，贵族们在乌尔比诺或凡尔赛不时有某个短暂时刻将它创造。我们也蔑视群众并在它的手中受苦，而我们最为快乐的时候是我们在弗雷德里克公爵的宅第里有一个职位，在那里我们怀春谦早注视那骄傲的无梦的世界，知道我们的王国是无形的，以及在野心的第一次呼吸之际我们的梦就烟消云散了。倘若我们没有看见每日的美丽生命，我们像老翁老妇望着孩子们一样望着它，我们就会成为理论家——所谓的思想家——不然就投身于勉强的情感，某种感伤的倾泄“在坟墓的地带唱叹耶路撒冷。”没有我们的金雀花灌木林，我们的石楠花丛。我们怎能歌唱，而布辛克不是说创造一朵花需要一千年吗？

43

也许我们会在某个美丽女性的形象中发现我们的费拉拉。我们的乌尔比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有诗而只有对诗的爱。

44

我开始疑惑我是否有并一直有某种从我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神经衰弱。（我在我妹妹洛莉身上注意到我自己易于兴奋的性格，在她身上由阵阵长时间的抑郁所夸大。她有火星与土星对等而我有月亮与火星相对。在巴黎我感到如果压力再大一点我就会攻击那激怒了我的女人了，而我时常有些很长的时间，期间爱尔兰的事物——总是爱尔兰的事和人带来烦恼，足够的细小愚妄——令生活几乎不可忍受。感觉总是一样的：一种对活力、确定性，以及被一堵墙，被一个人要么屈服要么徒然地奋起反抗的某物所中止的变革力量的意识。它时常令我惊讶；它是否是疯狂的根源？它如此狂暴，而因我甚少对生活中的普通事务发脾气而更其如此。我不认为我曾经斥骂过我的管家，他绝非完人，在十一年里，或是十二年？然而，同样，我注意到我从前的孩子气似的不专注仍一如继往。我能以一千种方式心猿意马；我能一次又一次回到同一个主题，但我一次却不能给它许多分钟。昨天在一堂课后，一段法语交谈，我开始头痛，就像我大约八天前工作过度后那样。而我却多日没有做什么了。我在写下这个，就是一位朋友，我为他也为我自己而写，可能知道我的好处和坏处，而我会注意并改正。一个人至少能够扫视发怒的环境。我应当学会无论如何要在我的谈话中排除这种怒气，像我学会将它排除出我的写作与我的正式发言一样决然。在一个方面它曾帮助过我，因为对它的认识已迫使我将我的写作变得脾气很好，并且，我想，很和善。曾有过一段时间

“ She has Mars in square with Saturn while I have Moon in opposition to

“我正致力学法语，一位法语教师每天来一小时……”《书信集》（威德），第

他们对它深感畏惧；我不得不克制一种激进的愤怒。我完全作为一个作家通过我的风格感逃避它。一个人的艺术不是从自己灵魂里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吗？美不是对自我的一场胜利吗？

45

是在怎样的辛劳中，在怎样的生活里，在怎样的亚玛宗战争里，女人们，她们的美不止是肉体快乐的允诺和一条得到它的捷径，赢得了她们的美？因为卡斯蒂格莱奥涅在谈论高超的乌尔比诺思想时说到，一切这样的美“是灵魂之胜利的战利品与纪念碑”。

46

[1909年]12月3日。布莱克对克拉布·罗宾森谈话有一次曾说到他偏爱一个快乐的没有思想的人胜于任何聪明人，或某个这样的句子。它源于，我猜想，他对生活的赞美——“一切活着的都是神圣的”——源于他对抽象事物的厌恶。巴尔扎克，尽管在赞美某个美丽的出身高贵的女人时[他]使人认为他有同样的偏爱，却太过沉湎于他对意志的崇拜，它不可能是没有思想的，即使它能够是快乐的，而无法认识到那偏爱，倘若他有的话。尼采无疑在他想象“超人”像一个孩子似的时刻拥有它。我们艺术家为我们的艺术而受苦，倘若我们不是最为热爱生命，它恬然自适，并预先毫不思考就做出它的人性吩咐它去做的事，并且因而做得快乐。我们，如在生活中所见，是一种技巧，一个重点，或许是一个未完成的弧。那些我们有责任去珍爱和庆祝的是完整的弧。因为我们所见的生活并非事物的最终结局，我们靠个人劳作和意志达到任何种类的伟大之时我们就成了片断性的，并发现在积极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使命需要使用我们最高的才能。我们被迫去思想和表达而非实干。浮士德最终只能够开拓土地像农业理事会里的某个官员。的确罗密欧不应是一个智慧的或有学问的人，对我们来说他有天性就够了。我们看见了他全部的弧，因为在文学中我们需要完整的事物。我们的作品，我们对生活和激情的庆祝，应当在所有人的眼里，但我们被谈论得太多就不好了。普鲁塔克说到艺术家在国家中不应太出类拔萃是对的，因为年轻人是为战争和爱情而生，没有谁渴望像费迪亚斯。生活向神父忏悔并荣耀他，但我们向生活忏悔，并告诉它倘若我们年轻、美丽而富有的话我们会做的一切，而生活回答，“我自己从来不能够想到这一切，我的时间这么少。”而它在路上接受的正是我们的赞美，目光的将我们忘却。

47

我今晚必须在艺术俱乐部发言，又没有时间作很多准备。我选择“年轻人的观念”作题目，因为我以为那够模糊，届时能让我随便谈论我心头的几乎任何最主要的东西。部分是为了那发言，部分是因为与科伦姆的某些谈话曾引出了某些思想，我决定说说以下的东西。我会谈论一个年轻爱尔兰人的

“……他的浮士德在他的百年之后只是开拓土地像某个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或老年的伏尔泰。”《幻象》。

生活，他对某种宣传的逐渐吸收。青年的天性怎样令这变得轻而易举。青春总是贡献自己，扩展自己。只在多年以后我们才开始那崇高的工作，将我们的能量适应一个选中的目标，规戒我们自己。在爱尔兰一个年轻人仅仅遇到粗糙的，非个人的事物，令他与其他人相似的事物。一个人不能讨论他的观念或理想，因为他一个也没有。他没有审美文化的开端，他从不尝试使他的屋子富有魅力，比方说。感觉的缓慢完善，我们称之为趣味，甚至还不曾开始。当他将自己投入某个团体的工作时他只在将一切精美的，个人的才能抛开的程度上成功了。我本人为那种紧张感所苦，它出现在一个人同无知的，或者更其糟糕，半无知的人们说话之时。有一种持久的诱惑，不仅要过度简化而且要夸大。因为一切无知的思想都是夸大了的思想。我只能希望一个有才能和文化的爱尔兰年轻人在爱尔兰以外度过他生命中的十八到二十五岁——能向一个发展中的灵魂规定义务吗？——我也指望他在那些年里认识到自己。如果他能做到，我会希望他回来。然后我会描述存在于某个年轻的牛津人脑中的现代文化观念：拥有完善的趣味；感觉到了艺术能够传达的最微妙的情感。埋首于书籍的都柏林年轻人成了一个学究，因为他只相信外部的的事物。接着我会描述几年前往牛津的一场辩论，当时我对那个如此充满女性敏感的卓越的年轻人感到了那么多的怜悯。当然彼得所表达的文化的理想只能创造出女性的灵魂。那灵魂要变成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火盆。这文化其实是对自我认识的追求，鉴于自我是平静的，深思熟虑的，富有辨别力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在品味这世界时唤醒了我们的趣味以及我们对它的批判时，我们就开始认识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我的意思是，不是作为吝啬鬼或是挥霍者，作为地方法官或是律师，而是作为人，作为与世界上永久的事物面对面的灵魂。纽曼将文化定义为聪明的接纳性，尽管我不认为他用过这些字眼。这种文化在一些出身高贵的女人中产生了它最完美的花朵。它给了它的子孙一种极致的精美。接着我将比较文艺复兴的文化，它在我看来不是建立在自我认识上而是在另外某个自我——基督或悄撒——的认识之上，不是在精美的诚挚之上，而是在摹仿的活力之上。

48

我必须停止写作躺下来，或出去走走。我的才能总在我寻求严肃事物时刹车。我也有一点头晕、还有心悸。

49

下午 7：30。一个半小时或二小时以前奥古德小姐为剧院的事来看我。我离开了她几分钟；我回来时她说她看到了我的替身，但是很年轻，大约二十岁，领子很白，个子下像我那么大，正倾向书架像是要取下一本书。我在八年前常与毛特·岗来这个房间（纳索旅馆）。

50

[1909年]12月4日。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皆诉了我格里高利夫人的病。我起初没有认出是她儿子的笔迹，我的思绪游荡，我猜想是因为我身体不适。

我以为我母亲病了，是我妹妹要我立刻过去。接着我记起我母亲多年前就去世了，并且不光是家族正处境危险。她对我来说曾是母亲、朋友、姐妹和兄弟。没有她我无法认识世界——她给我踌躇的思想带来坚定的高尚。一整天失去她的想法就像一场房椽中的大火。友谊就是我仅有的房子。

51

[1909年]2月6日。格雷戈里夫人好些了，但用铅笔写道她“差一点就过去了”。她因过度劳累而使自己临近了死亡。一面于家务，因为从来没有几个女人干过什么事，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一面又给我们足够的戏剧，翻译的或是原作的，工作时常违背所愿，时常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那些卑微的半文人，或不如说是半新闻记者，那些从未被收买只因为从没有谁认为他们值一个价钱的爱国者的小圈子，却在到处窃窃私语着她利用她导演的职权来上演她自己的戏。当我同样想到辛格在此刻正死于他们的尖刻和无知，我相信是那样，我不知道我将我的风格定型为甜蜜与安详是否正确。接着福尔古斯的那行诗进入了我的脑际，“没有人寻求我的帮助因为我不属于我所梦想的事物。”也许永远和善的思想只在过去的日子里才是对的，那时一个人有一把无言的剑来履行他的下和善。在《花花公子》辩论那晚他们都在，沉默而怯懦，不坐前排座位因为害怕会要他们发言并面对群众——无论为哪边说话；而卢塞尔本人，他曾答应任主席，却以一个诡计拒绝了并加入美术馆中的其他人。整个文学都柏林没有人敢露脸，除了我自己的父亲，他向着，或不如说是当着，那咆哮的乌合之众甜蜜而简洁地发言。我反抗他们，他更为高贵——他忘记他们。

52

关于格雷戈里夫人，人们只能用莎士比亚说起另一个人的话来说，“他每活一天都死去。”

53

疾病已教会 / 将教会我这个
用他那可怜的灵魂 / 尺度
无论如何也不要惊慌
尽管火焰吞没了全部
既然我已看见它被
与一个灵魂相对权衡。

疾病向我显示 / 教导 / 显示这，

在1900年1月3日。

“……生下你的女王， / 曲膝下跪更多于站立之时， / 每活一天都死去。”马克杜夫材马尔康姆说。《马克白斯》 iii 。

“一个朋友的病”，手稿中的三个变体，第二个被整个删却了，第三个写在页边。参见卷一裘小龙译作。

用他那 / 那些可怜的尺度；
不要惊慌
尽管人焰吞食了全部
如今我已看见它被
与一个灵魂相对权衡。

疾病给我带来这
思想，在他那尺度之下
为什么我要惊慌
尽管火焰焚烧 / 已烧着了全部
世界，仿佛一块煤
如今我已看见它被
与一个灵魂相对权衡。

54

整个星期三我都听见卡斯蒂格利奥涅的短语回响在我记忆里，“不流泪它便从不能被说出，伯爵夫人也死去了。”那小小的句子，它——出现在列数他的死者时出现的地方——时常感动得我直到泪眼模糊，而我也感到了他的所有悲伤，仿佛一个人看见了生活的价值永远消逝了。

55

那些诉诸卑下动机的人是那些在史密斯·奥布莱恩失败后指责他被政府收买才失败的人的子孙。歌德所想的也是这样，当 he 说道，“爱尔兰人在我看来总像是一群猎狗，穷追着一只高贵的牡鹿。”

56

[1909年]2月7日。我与小伊文斯散步穿过山岭，我们谈论了宗教。他说，“再没有信仰了，从没有怀着信仰的人来上我的圣经课，除了你本人。如果人们虔信他们就会谈论上帝和基督。他们认为不谈这些事物是好的趣味，然而人们谈的总是他们关心的事。信仰令一个头脑充实。”我想到所有相爱者要谈论他们的爱的持久渴望，而相爱者们有多少争吵都来源于此。我说，“但也有卢塞尔的追求。”他激愤地说，“他们是窃贼。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摘取名字和思想，而这些从未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过。从未成为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没有崇拜。”他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我渐渐从他那里挖出了这些思想。“他们都是自我，都是假定。他们不知道在基督，或他们自己的神；或任何东西面前自贬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充满了生命。基督是如此充满了生命，它流入我们。整个世界对我们都生机勃勃。他们全都是自我，于是他们就蔑视那根本。”他说的根本的意思是，生命。自然。我说，“但

“但那不流泪便无法重复的事物乃是，伯爵夫人她也已死去。”《朝臣之书》。

威廉·史密斯·奥布莱恩（1803—1864），领导了1848年的失败的起义。

他们看见的形式是什么？”他回答，“他们只能成为较渺小的精神——他们所谓星际物的一部分——生活在他们身上并抽走他们生命的生物。”我说，“那么人不是喂养就是被喂养吗？”他说，“是的，当然。你没有注意到他们都是朝三暮四、思想细小脆弱之辈吗？你认识埃拉·扬。他们都像那样。是星际的流动物。那些人没有生命，生命已被吮吸一空。他们蔑视那根本，可没有人能做到这直到复活之后。当然有一些被选中的精神不必进入生命，但他们为数极少。啊！如果一个人能看到十九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都结了婚该多好。那会对通神学者有好处。他们都是自我，因此他们是以窃取的货物为生。”他那天较早时告诉过我当他以前登山时他怎样差点掉下去摔死。有人滑倒并把另一个人拖了下主，直到他用绢子吊住了两个人的重量——但当时他感到一个伟大的存在降临了并令他充满了力量。即使在危险过去后，回顾那危险他也没有感到失去勇气。他曾经充满了生命。

57

回程时伊文斯说，“现在生命是如此渺小。看看现代的士兵吧——他什么也不是——古代的士兵是个人物——他必须强壮并有技艺，他们是男子汉与男子汉的对敌。”我说，“有些像这样的书——莫尔特克的精彩如一场战役那样的观念，但不是人。战役的计划在古书里不那么动人，但一切都是人性的！”他回答说，“当种族不再信仰基督时，上帝就从他们中取走了生命，最终他们停止繁衍了。”

58

伊文斯本人浑身的肌肉力量和热情，使我想起本·琼生写的关于莎上比亚的文字，如人们相信的那样——“如此充满了生命他只能在生活中随存在成长”。他思想的不规则路线使他晦涩，本身就是它的一个信号。他如同一棵树充满了扭曲和转折。

59

[1909年]2月8日。有一天我正在讲述“年轻人的观念”，有人问我会向年轻的爱尔兰人推荐什么样的生活，我整个发言如果合乎逻辑的话应当引至的思想。我很高兴能够回答，“我不知道，尽管我对此思考了许多。”谁不怀疑完全的观念呢？

60

[1909年]2月8日。有一种星相学的意味，一个人的妻子或情人总是他身体里的一根肋骨做成的一个夏娃。她被引向他是因为她对于那激进的占星术代表了一系列星空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创造了一个因素，在他的性格或他的命

本·琼生的《品诗者》Vi136—7中贺拉斯论维吉尔的诗，“如此充满了生命 / 它将以存在聚集生活的力量 / 因而比如今更受敬爱地生活。”

运中，在与爱或婚姻相隔离的事物之中。无论这因素是善是恶她都因此而是它的外部表现，最快乐行具有如此的占星术，令他们能在他们的妻子身上发现在他们自己身上是善与快乐的事物，其他人必将发现恶的事物，不然一个人就可能两种亲和兼有。有时一个人可能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他的占星术的恶，而在将她从她本身的自我中解救出来时会战胜他自身的恶（就像西蒙·马格斯，他娶了一个娼妓）。其他人会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征服他们并塑造他们的善。生活的一切外部事件当然都同样是一种性格的外化，但不与妻子处在同一程度，她可能代表着整个影响之网的聚合。一个朋友如果被第十一幢房子的一颗强大星球所代表可能也一样，尤其是倘若“太阳”适用于那颗星球。我们是星光的镜子，我们将这光投向外部，作为偶然事件、磁性吸力、赋予特征、欲望。这光的外投正是那种神秘主义者谈论的落入圆周。

61

[1909年2月12日。通过暗示爱尔兰神话的哲学宣称一切力量皆来自肉体，一切智慧皆来自精神。西方文明、宗教和魔术都一样坚持强调力量，从而及于肉体，从而及于这三大信条——有效的法则，上帝化身基督，和魔法。东方苦行主义对这些的回答是对法则漠不关心，蔑视肉体，对无形者的冥思。追随东方思路的西方头脑变得软弱而空洞元物，因为他们变得不合于西方生活强加给他们的劳作了。每一个象征都是一个祈求，在一切世界里产生它的对等物。上帝化身基督牵涉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效率，还有现代抒情感觉，它将肉体给予了最精神性的情感。它造成了所有产生自个人意志的事物的一种实体止。然而，它并不造就国家的观念；那是来自于另一种召唤，多神崇拜的希腊和罗马。上帝化身基督的历史真实性无关紧要，尽管对那真实性的信仰对于感召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全部文明都是由一个看不见的催眠术士所作的一系列假设，人为创造的幻象结合起来的。对现实的认识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是一个秘密的认识。那是一种死亡。

62

一些作家，例如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向想象暗示了一种个性的热病，使崇拜永远不能达到完成。几乎所有具有伟大迷狂，或假装如此的现代作家都令人不能满足，而老作家们，比如克拉肖，总给人一顿饱餐。原因是老作家的意象都出自常识的心理，因此，无论他们的思想如何晕眩，都总有一种对正常人类和普遍律法的召唤。他们的意象表明他们是例外而不足为所有人摹仿。世界的风景在他们后面。

63

今天汉德森告诉我他认为《金考拉》用它的旧形式更好些。他不喜欢土语，或不如说我知道他打算这么讲，当时我打断他说，“旧版本取悦那些受过半

格雷戈里夫人的《金考拉》的修订剧本于1909年2月11日在阿贝上演。第一稿于1905年3月25日在阿贝上演，并在那年出版。

拉子教育的人，因为它的浮华词藻；新的则不能取悦，因为它的文学。”这是愚妄和鲁莽。对愚蠢的愤怒是情感中最耗人精神的，因为，知道它本身对那敌人并无多少力量，它在一瞬间就耗尽了情感的一切源泉。确实做到或是相信它能够获胜的愤怒总是有一种确定的量；对愚蠢的愤怒则是不确定的。没有什么东西如此难以克服，就我所考虑的而言，也不会更真切地荒谬，胜于我们要在并无必要确信的地方使人信服的渴望。我时常想到它是我身上的发言者；我希望使人相信而不是满足于使人服从。我其实会不受人服从而非不被人相信。这使实际工作过于耗人精神了，并且效果也更差。它在我们的下属中造成了一种争论的习惯，以及由此而生的抗拒的习惯。当我看人时，我发现自己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是两种之一：那些从早年开始就惯于服从而不提问的人，无论他们的圈子多么小，有一种品格。要使人信服的渴望在普通的交谈中，也是奇怪地破坏性的，在其中一个人从没有时间真正使人信服。分歧也许在于执行的与立法的心理之间。

64

[1909年]2月13日。没有懒惰就没有智慧。全速奔跑的人都既没有脑袋也没有心。

65

前一夜很糟的奥古德小姐昨晚在《金考拉》中作了出色表演。这出戏给了我最大的欢乐——色彩，言论，一切都有音乐，而有仆人的几场使人感到与那些伟人出奇的亲近和友好，他们在其他场合会很疏远——仅仅是比喻。第一幕，以往是最好的，现在成了最差的一幕；它太囿于外在了，我想。然而，我并不能肯定。我从这出戏中得到的愉悦使我更为理解了我多么讨厌《错过了潮水的人》和《城郊习惯》那样的戏，尤其是后者。当然还有像《乡村制衣人》那样的作品。如果当真可能的话我现在就会留在剧院直到我在那里创作了一大堆好作品。如果我们为翻译作品——我们还没有做——创造一种好的趣味，我们就能丢开平庸之作搞好剧院。不然，它观众的增加就会越来越使作品庸俗，因为今天爱尔兰平常的城市头脑希望的是表现它本身的庸俗，并会通过许多途径，私下的和公开的，把这种作品强加给我们。唯一的机会是诉诸自我完善的渴望，它在爱尔兰还刚刚开始。如果这能够被激起，剧院就能像我们以往塑造它那样经营。不然，它就必须为我们未来的影响，我们榜样的影响，而被允许完全从我们手中脱离，或终止。我们不应对任何妥协负责。如果我们搞外国作品不成功的话，就不可能持久地上演我们的作品。爱尔兰公众已被激发进入了一个民主嫉妒与羡慕的活跃状态，不会接受一两个作家的卓越性——格里高利夫人的，比方说。在它的当前阶段它讨厌，或不如说它负责表达的部分讨厌，一切个人的杰出性。它缺少慷慨大度。它

叶芝显然忘了描述第二种。

W·F·卡赛（1884—1957）作。

W·F·卡赛（1884—1957）作。

乔治·菲茨莫里斯作。

刚帮助任何男人或女人达到一个重要位置，就立即嫉妒了。奥利尔瑞很久以前就对我说起过这个。这感觉会有增无已、一旦它在那个人身上认出了自由思想，那戏弄生活并轻描淡写地表现大事的思想。它不信任一切不是清楚地组织和决定的事物，一切并非具有清楚逻辑的作品。一出有一个目的，或姑且说一个寓意的戏，就像一份报纸或一个演说那样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它害怕荒野。它会从一道陡坡直滑入大海，如果它接受了那恶魔般的教条，高贵头脑表面上的轻浮就是从中产生的，即真理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一个思想或一则背下来的三段论，也不是一种意见。它恐惧一切解放了的事物，又总是半沉迷于它恐惧的事物。它热爱华丽词藻因为华丽词藻是非个性的，预先确定的，它仇恨诗歌，后者的暗示性无法预见。它仇恨富人和出身高贵者的自由并不甚于仇恨穷人的幻想。它坚持一切规则因为它没有它们就活不了，它会将一切艺术与文学变成一块黑板来写它自己的教导。幸好，高贵的思想在世界上存在了这么久已经被如此地写滥了，已经被平常的头脑如此地遮蔽，以至最终它似乎成了奴隶们的安全读物，几乎有教导他们的价值。

66

一种思想必须不断地强加给所有自由的灵魂——首先就在爱尔兰这里——要反抗思想上的发育不良，就像我们父辈在他们更为闲散的生活里——在乡村的贫困之中，他们沉思得最多的单是这一件事，或在高楼广厦之中，都一样——反抗礼仪上的发育不良。这些都互相联系着，而即使我们被称以最坏的名字，最难忍受的名字，我们也必须保持泉水纯净。教育，报纸，一千种非个人性已经在世界里塞满了对曾经是金子的事物的摹仿——一种比暴发户的不知礼仪更坏的摹仿，因为他本会更偏爱金子的，倘若他发现了它的话。我们现在到处都是赝品。它被认为比真正的金属更好，而不仅仅是更易得到。

67

[1909年]2月17日。观念(也许甚至哲学也太直截了当了，如果不止是一种防御的话)是艺术家的敌人，因为它武装了他缺乏灵感的时到来对抗他的灵感。曾经是灵感的被头脑较笨重的部分系统化，并用以强化自己来对抗那较精微的部分。一种机制被创造出来，会攻击生活本身。艺术家在他系统化的思想从他的激情中冲出，如同冲出一片激烈的乌云之时，就已使自己粗俗化了，对于民族不也可能如此吗？也许一位伟大的通俗思想家，一个卢梭，一个伏尔泰，一个韦斯莱是一个不幸。他太聪明，太富逻辑，太确凿不移了。他使渺小者能够相信自己是伟大的，相信他们理解，直到他们搅混了所有的真理之泉。只有纯粹的艺术家的真理与一种生活的形式相似，因为它是一个视像并仅是一视像，才能毫不为害。他缓慢地逐步着手。他从来不必像勒南在他的《自传》里那样怀着如此的悲伤说，“那庸俗的牡蛎贩子是我的同盟。”甚至上帝都已发现不可见是必要的。

68

[1909年]2月23日。昨晚我给伊文斯读了考文垂·帕特摩尔的一段，在其中

他说我们不能教导另一人宗教真理，我们只能向他指出一条途径，由此他可能自己发现它。伊文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向另一人展示宗教体验，有关全部存在的，他就必将付出自己的存在，他会成为基督。只有他能付出自己。”

69

今天，第一次，我对一位演员发了脾气。辛克莱尔拒绝演指派他的角色。我犯了个错误；我的脾气只一分钟就过去了，交谈不得不延长。结果是没有了高潮；相反，我想必看上去软弱下来了。一个人不应发脾气。除非他确信会越来越生气直到结束。

70

又是头痛，由少量的工作引起。我开始想到多年来的担忧，试图做太多不同的事，已经搞垮了我的神经系统。多年来我总是怀着对一种有规律生活的深深渴望，在其中有可能不受打扰地过想象的生活。多年来我总有长段的时期怀有一种恐惧，一种精神丧失的感觉

[1909年]2月24日。11：15至1：00——剧院。1：30至4：45——书信及为阿贝读剧本。5：00——艺术俱乐部委员会。

[1909年]2月25日。11：30至1：30——艾尔弗莱小姐关于布景，然后是汉德森。2：00至3：30——读剧本等。3：30至4：50——书信。

71

[1909年]2月25日。我时常疑惑我的才能是否还会从这最近几年来各式各样的劳作中恢复过来。小哈拉姆说恶并不摧毁天才但诸般杂事却能做到。我徒劳地呼吁要求自由却一直越来越缺少内在生活。邪恶降临我们从事想象的人，戴着一切美德作为它的面具。我知道，肯定地，被娶妻生子和供养他们生活安适的渴望所毁掉的人多过我所见的毁于妓女和酗酒的人。勒加里埃尼在韵人俱乐部里时常说起他有意坚持当单身汉，还十分严肃地说他认为将他的家保持在那种规模上是他的责任。在他的情况下妓女们结束了美德所开端的的东西，但却是美德，不是妓女们，扼杀了他的诗才。我以为我自己是自由的，既不爱恶也不爱善；但善降临了我，给了我一个民族而非一个家。它给我留下了任何抒情诗的才华吗？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心须继续下去，可能有一个人在已经写下的诗行后面。我本该避免这事——但却陷身其中！

72

我在大约六个月前作了以下的诗，但写在这里以免散失：

也许有人曾指责你取走了
他们所关心的诗篇，在那个日子
双耳震聋双目视线失明
在闪电下，你离我而去；而我找不到

什么来作一支歌但国王们
头盔和刀剑和半已忘却的事物
如同对你的记忆——但我
会翻搅海中的王冠和头盔。

或它可以这样结尾：

但如今

你既已再次来到我身边我将把
头盔和剑和王冠抛进坑里
没有一个

你既已再次回来我要抛去，我要把
头盔和王冠和剑埋进坑里
如在一阵突然间的哭笑发作中
找到你取走的全部活世界

但如今

你既已再次到来我要把
头盔和剑和王冠抛入坑里
而在一阵突然间的哭笑发作中
在泥泞的土墩里将它们翻搅，

但如今

我们将出去——因为世界活着一如往昔
而在一阵突然的哭笑发作中
而在坑中翻搅王冠和头盔
但是亲爱的抱紧我吧——既然你已离去

或

我荒芜的思想已令我寒冷入骨。

而当我们在狂笑哭泣的发作中
将头盔、王冠和剑掷入坑里

但如今

你既已再次到来我们将出去并且
当我们在狂笑哭泣的发作中
将头盔和剑和王冠抛入坑里

但如今

我们将出去——因为世界活着一如往昔
而当我们在我们的哭笑发作中

或

狂笑，哭泣的发作中

将头盔、王冠和剑掷入
但是亲爱的抱紧我吧——既然你已离去
我荒芜的思想已令我寒冷入骨。

[1909年]2月27日，糟糕的一夜。早餐10：45。11：00至1：00，书

信及为剧院修订原稿。2：30至3：40在呵贝。4：00至7：00，书信。晚，阿贝。

[1909年]2月28日。书信。厌倦。11：15至1：15，书信。2：30至3：30，书信。

73

今晚我闲坐时，我的双眼太疲劳不能读写，我清楚地看见了我怎样不能仅仅改变联合艺术俱乐部的宪章以使俱乐部更富活力——所有的争论，所有的细节——还有怎样将那命令置于摇摆的意见之上，甚至置于如今已是敌对的意见之上，它会给予我力量在今后以其他方式塑造艺术俱乐部。一个最初的步骤——以避免使两个交战群体中的任何一个获胜——是选用某个人进入委员会，我得胜了；我看见胜利就在我面前，对于所有那些丝毫不理解纯艺术的人性的人们。接着我记起艺术家的弃绝是那些在其他人身上是美德的东西，而我并没有去找到我本来必须劝说的人。为什么我有这些我不能使用的才能？我知道我拥有它们，我也知道它们是生活的主要诱惑。放弃对财富的，甚至对家庭生活的想法是容易的，但放弃那些概括观念则艰难，通过它们意志投身于世界，那些未来胜利的闪耀降临到一个人身上仿佛他大声呼喊，那一切使他在一瞬间成了鹰族的一员。成为仅仅一只手和耳朵是困难的。我们最初的人仇恨那盲目吗，正是它使他远离了活力的遗忘？

74

[1909年]3月2日。两小时的无所事事——因为我没有借口，只有开始创造性工作，一场无法忍受的跋涉。海德拉巴的小萨洛希尼告诉我她父亲的花园里人们会遇到一个嗜鸦片者，他在梦中作诗，醒来后写下首页，但却忘掉了其余内容。他是唯一快乐的诗人。11：15至1：00，闲而无事。1：00至1：45，《伶人女王》。2：30至5：00，读剧本和写信。

75

[1909年]3月3日。几天前我去看海德医生。他谈起在《希思·费因》上对他和我自己两人的攻击以及它们的虚妄。他说，“我一段时期前曾祝贺马蒂恩成为一个重要政治团体的首脑，而他回答，‘我不想当，我想做我自己的工作。’我说，‘我也想做自己的工作’，接着他说，‘它最糟的是那些家伙不会离开我们俩哪怕五分钟，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喜欢它的话。’”海德太太这时加入进来说，“我告诉道格拉斯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应从他们那里拿任何东西。”

76

叶芝在这一条上写过：“没有能力反抗。终究转变了它。”

萨洛希尼·奈都·女诗人和国家主义者，是叶芝的“星期一晚间”的常客。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爱尔兰的政治阶级——低层中产阶级，爱国主义社团是从他们那里为最近十年抽取了他们的记者和领袖——正苦于仇恨的培植，作为他们运动的一种能量，一件被剥夺的事物，是生殖能量之割除的智识对应物。因此他们的声音才那么尖利。他们注视一切创造性的力量就像太监注视唐璜骑着白马经过冥府一样。

77

两小时的无所事事一如往常。占星术，前述的便条，坐着凝视火炉，然后约一个小时搞《伶人女王》。

[1909年]3月4日。闲散，踌躇的作品，几个好句子。糟糕的一天。

78

今晚汉德森对我说他总是以为爱尔兰的坏运气是来源于仇恨是我们政治的基础。可能感情是一种召唤，并以超出感觉的方式改变事件——创造好运或恶运。某些恨得太多的个人后面似乎总跟着出乎他们控制的暴力事件。毛特·岗一直被这样尾随着。说仇恨带来某些同伴并造成一种暴力行动的倾向来解释它是可能的。但有些时候似乎有着比这更多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一系列恶运。当然用文字符号来召唤已经教会了我，许多我们认为以某些明显效果为限的东西会影响整个存在。一场对阳光的冥思，比如说，就影响了全部的自然，从太阳的象征本性中产生出所有继之而来的东西。仇恨必然，以同样的方式，造成不育，产生许多会从对一个能够生出仇恨的象征中继起的后果。这样的象征所产生的会不仅是仇恨，而且还有伴生后果。至少我这么想。一种情感产生一个象征——肉欲的情感梦想水，比方说——正如一个象征产生情感。然而，象征也许比一种没有象征的情感更为有力。仇恨作为想象的一个根据，以一个人甚至不用魔法就能够解释的途径，帮助风干本性并造成性的戒绝，这在爱尔兰的年轻男人和女人中是如此普遍，有可能。这戒绝又反过来作用于想象，于是我们最后就得到了那奇怪的太监似的语调和脾气。在最近十或二十年里一直有一种对爱尔兰心灵的持久风干，用那片合成的尘云。

79

[1909年]3月5日。今天我看见辛格并问他的《戴德莉》完成多少了。他说第三幕好了，他在[第]二幕加进了一个角色并打算把他编织进军一幕。他将与孔楚巴一同上场，带着他的一些财产，后来在这幕结尾时回去拿忘记了的刀子——正好够让他可能被用在第二幕里。他疑惑地谈起他这个冬大的作品，认为它不太好，似乎只确切知道他的第三幕。我不想问更多的问题，怕他会看出我希望知道如果他去世的话是否有另一个人能完成他的作品。他病

叶芝写信给格雷戈里夫人，1909年3月8日：“我几天前写了一个便条，里面我把格里菲斯和类似他的人比作里凯特绘画中的太监观望着唐璜骑马穿过冥府。”《书信集》。这便条被转变成了“论那些仇恨《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者”一诗，《诗集》。

得太重，肯定不能亲自工作了，时间也会很长。

80

[1909年]3月6日。昨天遇见麦克多纳大——此人有某种文学才能，结果却很可能一无所成，因为缺少文化和鼓励。他刚为《领袖》写了一篇文章，并像我本人一样大谈爱尔兰这里的新闻出版业的破坏性，并为他的文章道歉。他对爱尔兰情绪十分消沉。他正以爱尔兰和盖尔联盟的原则经营着一所学校，但说他对联盟越来越不信任了。它的作家们正不仅以英语习语更以当今爱尔兰新闻界的思想习惯，一件极为非凯尔特的事物，传染着爱尔兰人。“联盟”，他说，“正在扼杀凯尔特文明。”我告诉他辛格大约十年前在《学院》上的一篇文章里早已说过这个。他认为国家运动实际上已经死去，语言将会重生但其中不会有他为之而热爱它的一切了。在英格兰这个人会以某种方式引人瞩目，在这里他正毁于机械逻辑和陈词滥调，它给了最空虚的头脑最大的力量，因为，作为“某种不同于人生的事物”它对与众不同的感觉或个人思想毫无助益。我的意思是在他自己的头脑中这机械思想正在像用一个铁滚筒一样粉碎着一切有机的事物。

81

爱尔兰的灵魂已经成为一团蒸汽，她的身体则是一块石头。

82

[1909年]3月7日。不管怎样我的思绪越来越耽溺于阶级的观念。爱尔兰已经变得不育，因为权力传到了那些人手中，他们缺少那种需要一定量的财富来保证代代延续，并将头脑从其他使命中解放出来的训练。一个绅士在某一方面是这样一个人，其原则观念与其个人需要和个人成功并无关联。在往日他是一个教士或一个贵族，就是说，他因继承下来的财富或职位，或是由于个人受戒而拥有自由。今天这些名字不同了，而我会将艺术家和学者放在教士一类中，而个人受戒现在已不足够，否则爱尔兰的 *hysterica passio* 就会成为灵感，或者也许它是足够的但没有继承下来的文化就不可能。因为没有文化或神圣性，后者永远是极少数人的天份，一个人可能戒除财富或任何其他的外在事物，但他却无法戒除仇恨、羡慕、嫉妒、复仇。文比是智识者的圣洁。

83

[1909年]3月9日。我一直在与埃尔弗莱小姐谈论绘画中的文学因素，并翻

托马斯·麦克多纳夫（1878—1916），诗人，因参加复活节起义而被处决。

“下议院与上议院对我来说都像是蠢才：他们在我看来是某种人生以外的东西。”布莱克，《写作全集》，第600页，参见第108条。

“但是大众的激愤，*Hysterica passio* 将这猎物攫取。”“帕尔内尔的葬礼”，《诗集》。

阅宾永著作中论东方绘画的书页，在其中他表述了它是多么传统，多么文学性的。绘画中对文学因素的反叛是与诗歌中的一种相似的反叛相伴而生的。他所谓美学流派的教条是由年轻的哈拉姆在他论丁尼生的随笔中作出的，而在我小时候主题的无足轻重还是金科玉律。一个法国诗人曾写过姑娘们在一个孩子的头发里抓虱子。有人猜想亨莱在他的“医院诗篇”中建立了一种新的现代艺术，尽管他不会如此宣称。哈拉姆争辩说诗歌是作用于某些十分敏感的人感觉之上的印象。这适用于那些纯粹的艺术家，济慈和雪莱，但对不纯的艺术家则不然，他们，比如华兹华斯，把通俗的道德与他们的作品相混和。我现在看见绘画中的文学因素，诗歌中的道德因素是两种艺术被接纳入社会秩序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手段，而非研究与展览的东西。高超的艺术是对某些英雄的与宗教的真理的传统陈述，它们世代相传，为个体的天才所修改而从未被否弃。个人主义的反叛出现是因为传统已经被降格，或不如说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赝品已被接受来取代了它。古典的道德伦理——在基督教化了的欧洲并不那么自然——在文艺复兴时已成为这一传统的一个有力因素，并从弥尔顿传到华兹华斯再到阿诺德，总是变得越来越固于形式和空虚，直到它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变得可耻——就像古典形式从拉菲尔传到学院派那样。无政府的反叛如今已到了尽头，而诸种艺术正准备重新宣布传统的道德伦理。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夜莺颂》，并不逊于《责任颂》，是根植于过去的，就像追溯至野蛮的民间传说的弥撒一样。夜莺最初是在什么殿堂花园里歌唱的？

84

没有什么艺术能单独统治人民——人民是靠一个由权威把持的生活理想统治的。当这理想被重新发现时，艺术、音乐与诗歌，绘画与文学，就会凑近到一起。

85

阿贝剧院将不能做到它的全部工作，因为没有公认的权威来解释为什么较难获得的快乐才是较高贵的快乐。年轻时我对民族运动的沉迷在于，我想，它似乎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形象，它能够给好的生活和好的艺术以权威。一个人不可能热爱一个顽强奋斗以实现自身的民族，如果这个民族的观念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他的头脑中的话。一个人总能在其他人的头脑中诉诸它。民族精神，就当今而言，正在消亡，因为拥有这综合思想的《民族》报的影响已经过去了。结果是像《金考拉》这样的戏（它得有某些诗歌和传统来帮助它，而一上演就引起了如此的轰动），只激发了微小的兴趣，而卡塞的戏剧却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唯有卡塞除了自己的思想外什么也不需要。

86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道德或文学的头脑，只在仇恨上是有力的。一个聪明人得不到一种综合的社会理想，或它在某些社会领域作为文化生存下去的残余物的帮助，就会成为一个刽子手。里凯茨一年前对我这样说：“艺术家开始

对接受公众使命踌躇不前是因为那几乎肯定的攻击会摧毁他们的名誉。”在爱尔兰，在有教养的残余没有力量左右公众舆论的地方，对于一切现代国家来说略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成了一个预兆，一个对将来之事的预言。

87

我不断地呼喊反抗我的生活。我夜夜不眠，思考着我必须从我的诗歌中，从主的收获中抽出的时间——昨夜我睡不着觉——然而也许我必须做到这一切，我会把自己投入一种行动的生活，不是为了表现传统的诗人而是那被遗忘的事物，那平常的行动之人。

88

我们要求对道德教条重新阐述，它应当为普通人所接受，但同时又清楚地超越他实践的力量，古典的道德伦理在其腐败中成了平凡活力手中的一件工具以打倒杰出的人们。一种真正的道德系统显然从一开始起就是那最杰出者手中的一件武器。天主教创造了一套只对圣人可能的系统——它持、的权力即来源于此。它对善的定义是狭隘的，但它并不以造就店主为目的。一种高尚的道德伦理应当是宽容的，因为没有哪一种可以宣布其律法，除了那些被其交战所耗尽的以外，而它们必须怜悯罪人。此外，它在他们的头脑中会采取一种个人形式，而他们会有发现者的怯懦，也许还有战士的礼貌。

89

对某些主题的偏爱在任何艺术中都是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契约的一个标志。

90

关于乔治·摩尔。

摩尔有一回受到缪斯造访
但害怕她会拒绝
一个沉湎于群鹅的老色鬼
他现在悠悠然转向小说。

作于很久以前但现在写下来，因为它浮现在记忆里，并且可能会在对那天真的人发怒的某个时刻逗我一乐。

91

[1909年]3月10日。昨天一种童年的激动突然回到我心中。我正看着一面巨大的红色旗帜，角上有一个米字旗，在一家商店门前飘悬在雨中。我突然记起了一种早已忘怀的愉快的激动：在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时，手指间抓着某人给我的同一种类的小红旗的激动。那时阳光明媚，我似乎闻到了一点涂

沥青的绳子的味道，我猜想是系在旗子上的。

92

我注意到奥占德小姐的排练有点懈怠。我注意到费的戏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是他们家庭中干智力劳动的第一代，尽管有强烈、清新年简洁的想象力和未受玷污的趣味，持久的努力对他们来说是艰难的。他们缺少后天习得的才能。他们大多数是天生的好脾气，但他们一旦被惹怒对他们的脾气就缺少一种控制。奥古德小姐，比如说，就不能将对某个演员的必要谴责与对他的愤怒区别开来；这损害了她的权威。反过来当然是正确的；一个人在发怒时应当尽量少地发现错误。

93

[1909年]3月12日。昨晚我妹妹莉莉告诉我一星期左右前的一个年轻女工梦见我妹妹洛莉结婚了。那里有餐桌、结婚蛋糕和打碎的酒杯。她醒来，接着又再次睡着做梦了。这一次她看见我妹妹洛莉躺在床上，在一个灯光明亮的房间里。有人抱着个孩子，屋子里有个医生，还有打碎的药瓶。露斯·坡莱克斯芬对一个精于释梦的女人谈起过这个梦，她说，“它意味着一场婚姻毁于一个骗人的女人，但又再次开始。”几天前洛莉自己梦见了似乎是三个尸体的东西在一张床上。一个脸向着墙，一个戴着个面具，一面粉红色面具像是一个孩子的玩具面具，而还没等她看得清第三个有人也在它脸上戴了个面具。她望着它们时脸向着墙的尸体突然动了起来。同一夜露斯梦见三个十分漫长的葬礼，她也梦见她认为是一个尸体的东西在[一张]床上。她认为那是她的一个最近去世的兄弟。她躺在床上靠着它，它突然动了起来。同一夜莉莉梦见自己收到了三份电报。我要把这段叙述出示给我妹妹，留了个空白给她修改，如果我记录有误的话。

我妹妹说以上完全正确。WBY。[1909年]3月26日。

94

[1909年]3月12日。民族感情存在着一种沉沦，它原本是十分简单的。你不能养活一个民族的观念，在没有民族宪章可尊敬，没有民族成就可崇拜，在人民头脑中没有它的一个模式的地方。在感情简单时你可以称它为“Kathleen-ni-Houlihan”或“Shan Van Vocht”，并热爱那形象，但为了生活的基本目的你必须有一套复杂的形象，将它造成一个如同建筑师的模型似的模型。年轻爱尔兰的诗人们用某些在其构想中颇为简单的形象创造了它，它们塞满了年轻人的头脑——托恩狼，布里安王，埃麦，欧文·罗，萨尔斯菲尔德，金萨尔的渔夫。它也回应了对爱尔兰人性格的传统诽谤，并导致了一种道歉的习惯，但它最有力的作品是为那些情感创造了可感的形象，鲜明得足以跟随人们直到上绞架。像以往必然的那样，所涉及的伦理观念是十分简单的，理解它们既不必研究也无需不寻常的天赋。我们自己的运动开始时试

萨拉·奥古德在 W·G·费辞职后不久担任阿贝的演出人。

图以一种更为深刻而持久的方式做同样的事。当我二十五或二十六岁时我梦想写作爱尔兰的一种 *Légende des Siècles*，起始于我的《奥依辛的漫游》，并且每一个时代都有点什么东西。约翰逊的作品以及更往后，格里高利夫人的作品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实现那梦想；而只在辛格开始写作时我才看见，我们的运动将不得不放弃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想象中的圣城，仿佛一个圣墓，或对于爱尔兰的头脑来说则是圣杯，还看见我们必须满足于表现个人。爱尔兰人民所受的教育还不足以接受任何比那种年轻爱尔兰的小学生想法更为深刻，更真实地属于整个人性的事物，作为爱尔兰的一个形象。当攻击由于农民的因素而开始针对格里高利夫人的风格时，我对此确定不疑。你只能创造一个种族的模型，它将激励这个种族作为整体，与例外的个人区分开来的行动，如果你与它分享对生活的某个简单的道德理解的话。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激励了英格兰的积极生活，但他们是通过例外的个人做到的，对于其他人的影响是间接的。我们不应试图创造一所学校。我们对于生活没有可以教给别人的理解。如果我们能创造这种族的一个构想，像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对希腊做到的那么高贵，它将受到基于某个琐碎立场的攻击，群众追随的或者是某种抄袭年轻爱尔兰的华丽词藻的心理，或者是显然属于英国通俗文学的感伤，为了良知的原因而带有一些爱尔兰思想和感情。

同时这民族对一个模型，对某种道德图解的需要，像在 19 世纪初民族感情正迷失于一种关于什一税和自治的宗教夙怨时一样巨大。盖尔人联盟的语法或《领袖》的工业主义，或《辛恩·费因》中对爱尔兰党的攻击都没有给这些情感提供任何可感的形象。然而几乎总是从格里高利夫人那里，从部分的辛格，从凯瑟琳·泰南和里奥内尔·的翰森，从奥格拉第，从我的作品里，都能撷取材料，以使一个有十分简单的道德观念的记者流派能够建筑起一种历史与文学的民族主义，像那古者的和更为高贵的一样有力。它们这时才能叫人们去爱而不去恨。

95

我告诉我妹妹我已经提出，如果通灵研究学会都柏林分会能安排的话，在巴果街闹鬼的房子里过夜。她说，“哦，我知道那幢房子。有一天我看见一辆家具货车载着家具开进去，十天后那幢房子就又空了；有一天我认识的某人在清晨正经过那儿，她看见窗台上有一个老妇人，吊在窗格上。她是看房人。鬼把她赶了出去，有一个警察正试着帮她下来。但虔诚的清教徒们说并没有鬼或别的什么，只有对过的修女院里年轻的见习修女们在夜里尖叫。”

96

把这之前一页我记下的事说得清楚些。在我们的年代我们不可能创造，如我梦想的那样，一个英雄的和激情洋溢的生活构想，值得别处和别的时代的人们研究，并将那构想变成爱尔兰人民的特殊梦想。爱尔兰人在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前必须做不长久的梦，而如果他们找不到它们，他们就会被那些半爵士们用他们卑劣的仇恨与妒嫉毁掉。有一个时候我曾想到一个为了所有眼睛

而生的高贵身体，一个为精微的理解而生的灵魂，以及，将两者结合起来，埃勒夫西斯节的礼俗。相反，人们却喊叫着要石头和蒸汽，卖弄学问和歇斯底里，华丽词藻和虚情假义。

97

为什么达到真理的奋斗取走了我们的怜悯，而克服我们激情的奋斗却又重将它恢复？

98

[1909年]3月14日。我相信正在死去的民族感情能够被激发达到它旧日的激奋，如果有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并且，如果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应该是在爱尔兰之外受的教育——在身边聚集了几个像他那样的人，去创办一份新的《民族》，它禁止一切人身攻击和一切假设敌手有一种卑微动机的做法，它为它的民族政策选择的不是那在抽象观念上似乎最值得向往的，而是那种在取得可能的最大多数受过教育者的支持时能激发想象的政策。爱尔兰正毁于抽象理论，而应当在一段时间内学会偏爱那可能显得是一个较差的政策的东西，如果它带给她更好的人。只要所有人都受命去攻击，并仅仅是攻击，领袖们就会本能地增加敌人的数目，以给他们的追随者可干的事情，而且是爱尔兰敌人而非英格兰敌人，因为他们更易受伤，也因为敌人越大仇恨就越深，因而力量也就越强。他们会给予这民族一个教派的狂热。这一政策，在帕内尔时代十分有力，已经结束的信号是民族党派正越来越飘荡进更软弱也更无知的人们手中。有能力的人通常并不加入显然无望的事业。星期六《每日快讯》在吉尔手下的成功证明有文化的生活的观念在这一时刻能够被变成爱尔兰最有力的。半打有一点钱，和一件远为难得的东西，知识的人，与无知者所有的同样激情联合起来，就能够改变爱尔兰的未来。

99

由天主教学校提供的教育对我来说似乎在一切普通文化问题上都是用教条来代替趣味。人们学习作家的生卒日期，名作的外在事实，而非风格的感觉和生活的情感。我碰见的出自爱尔兰天主教学校的年轻人，从没有一个在我看来没有受过他所学习的文学与文学史的伤害。人文学科什么也不能给予，除了它们的那种快乐，那也许正是悲伤的另一面。它们总是一种累人的沉思，而我们在年轻时就已准备就绪，在习惯形成之前，从沉思转向教条，它给了头脑一种感官的舒适。没有经过中学的青年男女就在我看来在另一方面则远比那些情教男孩女孩更富想象力，趣味也更好。我的妹妹们有同样的经历。天主教的教育似乎在摧毁她们从她们的宗教中取得的品质。乡土观念则摧毁中世纪的高贵性。

100

Eleusinia，为纪念得墨忒耳（农业女神）和她的女儿科列（珀耳塞福涅）而举行的古老的希腊节日。

[1909年]3月17日。库勒。当我进出我的房间时，我总经过一道覆盖着奥古斯特斯·约翰蚀刻画的墙。他是对学院派形式的极端反叛。我注意到，因为它们总在我眼前，一个女人，背部强烈地显示出肩胛，大鼻子的脸转过一半，还有一幅《喜歌》。在那幅《喜歌》中有一个男孩，发育不良而又笨拙，向一个两肩瘦削[以及]大肚子的女人伸出双臂。近处，还有另一幅习作，一个同样大肚子和双肩瘦削的女人。这全部五六十幅蚀刻画前后没有一幅不狂暴地打破我们从文艺复兴继承下来的比例法则的。这些身体是教士和女裁缝和学生的身体，一切饱受久坐生活沉重压迫的人们的身体，或是那些被某种劳作所压垮的人的身体。一个专门训练身体的体操家会在所有这些画中发现某种缺点需要克服，而当他克服了它们，他就是在每一种情形下使它们接近了那从希腊竞技场传给我们的古老的金科玉律，当它在场时，像任何其他文学因素一样，标识着艺术家与社会的一个协议，一个与他的时代共同抱定的目的，要创造自然同样向往的情感或形式。约翰所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的需要，对更为健康和物质的有益性、对适合生活劳作的身体的持久渴望，而是性格，是个性对一切令它与其他人相像之物的反叛。旧艺术，如果它[已经]达到它逻辑的结尾，本会走向创造唯一类型的男人，唯一类型的女人。在其中却会通过一种神化，凝聚了对于一切活力与一切激情的容纳，一个克利施那，一个基督，一个狄俄尼索斯，或将一切画进单独一个头脑，就像在全篇的末尾；而永远有一个诗性的画家，一个波提切利，一个达·芬奇，一个华特，一个罗塞蒂，创造出一个类型的脸作为他至高的成就，它随后将以他的名字闻名。新艺术创造了数不清的类型，但在这些每一个类型里对激情的容纳在某种身体或心灵的习惯之前就差不多已经消失了。那肩膀难看的女人，比如说，一种太强烈、太聪明的特点，有着为着无论什么激情而不能平静的人的聪明；还有那伸出双臂的小伙子将会，可以肯定，在一种部分他说仅仅是好奇的激情的短暂快乐之后，因身体的枯竭而沦入幻灭。到处都暗示了某种限制性的环境或癖性；到处都是那被学到的事实，而不是那似乎无边无际，仇恨一切并非它自己的活力。它是一种有力但无聊的艺术，颂扬的是落入分歧的沉沦而非进入联合的更新。甚至多少次以简单的双眼望世界的巴尔扎克，不也发现有必要拒绝给他那些他本可给予巨大激情的伟大女士和年轻情人们以性格吗？当美过去之后那就自己显示出来，是习惯的创造；在春天的花朵枯萎之后留下的是茎秆。美消磨性格，用帕特摩尔所谓的“火的热烈”。

101

正是这对激情的容量的缺乏，为一种愉悦男人的智力兴趣所补偿，使女人们厌恶所有的性格化流派。并使现代艺术家蔑视女人的判断。女人们为了同一个原因厌恶纯粹喜剧。喜爱莫里哀的女人何其少啊！

102

我的房间里挂着阿伦德尔印刷品，一大批波提切利、贝诺佐·戈佐利、乔尔乔涅、吉罗拉·达伊·里布利、梅洛佐·达·福尔利、曼泰尼亚、范·艾克家族的作品。这里到处是欲望的表达，尽管在范·艾克家族中新的兴趣已经

开始。所有这些人都有这样的身体，如此穿着以使一个可爱的女人或一个伟大的国王快乐。殉道者和圣徒们必须对他们所谴责的一切显示容纳之心。

103

奥古德小姐接受了一个邀请到一个由利特尔顿夫人主办的音乐会上演唱，而没有与我面量。她现在写信说这事将会损害她；我已经叫她别卷进去，宣称“微恙”作为理由推辞。对上帝拯救国王”的公开反对会从阿贝赶走我们某些最持久的支持者，我们不能光靠正厅后座来补偿。我已写信给利特尔顿夫人，对此问题基本上作以下声明：“这荒谬的问题不断折磨着爱尔兰的生活，并阻止两党联合外部的政治。责任主要在于那个有最多教育和官方力量的党。它坚持对此事施压，其中并不涉及任何原则，知道它即刻会引出民族主义者视为一个根本原则的事物，以及当它获得赞同时，它基本上是在自己的眼中贬低一位敌手来做到的。民族主义者投入这个问题的激情多是来源于这一事实，即如此经常地总是有某种物质利益能被个人取得，如果他让步的话。对此事的施压从联合派的观点来看是纯粹的愚妄，因为它将迫使民族主义者作出不效忠的声明，并在这个国家里将一个副职官员驱入了反英的政治之中。”

104

那一夜我正与格里高利夫人谈论帕特摩尔的颂歌，说我认为他的情绪比丁尼生的更高贵。她说，“丁尼生用英帝国代表上帝，用维多利亚女王代表处女玛莉亚。”

105

[1909年]3月18日。我敢说这些笔记，如果某道偶然的目光落在它们上面，会显得病态；但它们有助于我理解我自己，而我记得曾听一个搞科学的人有一次辩论说一切进步在开始时都是“病理学的”。我知道我已经有了道德上的收获。

别人给予我们的痛苦在他们后来的善行中消失了；一个人自身大错的痛苦，尤其是在它们伤害了他的虚荣时，则永不消失。一个人自己的行动是孤立的，而一个行动买不到对另一个行动的赦罪。它们总是现身在一种强烈抽象的判决面前。一个人决非一个整体，一个个性：对于自己，多年前的小动作在记忆中如此痛苦，以至一个人时常惊讶于一种仍旧未知的思想在“意识的门槛”下面一点的呈现。它发出一道隐晦的光像月亮升起之前，或落下之后一样。虚荣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一个人的精神身份，以至错误或那些伤害了它的东西，尤其如果它们来自于它的话，在记忆中比严重的罪更为痛苦，而我仍不认为这意味着一个人是十分虚荣的。一个人对别人做出的损害在变化的事件中夫落并消失了，也同样被时间所治愈，除非它十分巨大。回首往日，我发现只有一个冒犯对于我是像对虚荣的一次伤害一样痛苦的。它是对一个

不久后就死去的人犯下的。因为他的死它没有被变化之手所触及——宽容的自然没有把它从正义下解救出来。

106

作出又一次尝试致力于剧本 而失败了。我想它可能部分是健康的原因，因为我感到以往我在病倒的时候常有的轻微头痛。创作的情绪是十分脆弱的。

107

我想一切快乐都取决于有精力佯设另外某个自我的面具，一切欢乐或创造性的生活都是重主为某个并非自己的东西，某个在一瞬间创造出来又在玩一个游戏时持久更新的东西，像一个孩子的游戏，在其中一个人失去了自我认识的无限痛苦，一个被戴上的怪诞或神圣的彩画脸谱，让一个人躲避恐怖或审判，一个想象的农神节，使人忘记现实。也许世界的一切罪恶与活力都只是世界逃避一道无限眩目的强光。

108

[1909年]3月20日。毛特·岗写信说她正在学盖尔语。我见到她的盖尔语宣传作品会比任何我能想到的爱尔兰运动更早，除了某种装饰艺术的运动。我害怕她对一个意见的任何重新投入。女人，因为她们生活的主要事件都是贡献自己，把自己贡献给某意见，仿佛[它]是什么可怕的石头玩偶似的。我们对一个意见淡然处之，轻易就对它失信，而在忠实时也保留众多兴趣的习惯。我们仍旧，如果我们心灵和身体都强壮的话，以坚定而谨慎的眼光看世界，但意见却变得像她们的孩子或情人，而她们情感的性质越强，她们越是把别的一切忘个精光。她们变得残忍，仿佛[为了]保护爱人或孩子，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并非人命的事物而做的。最后意见成了她们身上那样大的一部分，以至仿佛是她们肉体的一部分成了石头，而她们的存在多半正失去生命。在过去那是她的部分力量，尽管她以她的头脑作出了这投降，她保留她嗓音的甜美和许多幽默感，然而 我只能为她感到害怕。女人应当将她们对玩偶的戏耍止于幼稚的快乐，因为如果她们再次玩起它们时。是在仇恨与恶意之中。

109

女人应当在面具中护发现足够的快乐来忘记玩偶而毫无悔恨。在面具后面总有一张活人的脸。

《伶人女王》。

在“为找女儿祈祷”(1909)中叶芝写道：“一种智力的恨是最坏的，那么让她想到意见受谴责。难道我不曾见过最可爱的女人生于多数之角的嘴里，因为她充满意见的头脑将那角和每一种善通过备受理解的无声天性来交换一个装满愤怒之风的风箱？”

《道路转弯处》。“爱尔兰剧院”今晚演出。一场不错而诚实的演出，与数月前《梅伏》的演出截然相反。内斯比特好，很平静而又有足够的情感。作者本人平静而有经验。演两个儿子的父亲的人不安又模糊，但一个好演员正在成长之中。男主角的兄弟好。整个是对北方生活的一场真正的研究。费茨帕特里克太太是这出戏大受欢迎的成功，但我不太肯定我并未在她的北方农民之下看到一个传统舞台伦敦东区人的 *mannequin d'osier*；然而，我不能肯定。观众使我回想起我们在圣泰莱莎大厅的第一批观众。他们对什么都捧腹不已，但对一行好句子并不比对一顶帽子从一个帽架落到一位演员头上笑得更多。他们当然对戏剧很不习惯，对微妙的作品更会毫无用处。但他们来自什么地方？他们是一大群观众，但我该认为召唤他们的是一种为国家服务的欲望，更甚于娱乐的欲望。他们当然，作为整体看，不是一群阿贝的观众，尽管有点像我们的“纸”。必须找出他们从什么地方来。那是星期六，但即使在星期天我们也不要这种未受训练的观众。我们的观众是相似的材料构成的吗？

这出戏在结构上是松弛的。第一幕“一个完成的行动”，于是像一出单独的戏，而“尾声”本可毫不停顿地在第二幕就跟上。作者作出停顿是因为他没有用对话作出连接的技巧。第一幕不应以烧掉小提琴为结束，它暗示了一个结束了的行动。我想小提琴应在幕落前被毁。碎片应当留在那里。这会使得漫游的小提琴手和他的小提琴更重要些。如果它随外面的音乐声而结束，那将使想象投向前面，或随这声响处于那求婚的统治之下。实际上，这出戏有对话和人物，但没有别的。

圆形建筑的权威，我注意到，支持了——尽管他们的服装是爱尔兰的，大多数戏都是盖尔人的戏或其相似之物——英国舞台上如画的农舍，只是墙上的横梁不像人们一直看见的那样放置。我几乎毫不怀疑布景画家是爱尔兰人，并像业余演员和剧作家和圆顶建筑的管理者一样，从没有见过墙上有横梁的农舍，他与他们一致同意尊敬传统。在阿贝有一个客厅布景，我们从未使用过，但霍尼曼小姐却被告知它对租用阿贝的业余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通常装着精致护壁板的房间，风格上是法国式的，在业余娱乐中人人都知道。它是最难弄得逼真的房间形式，因为浮雕上颇多木工活。显示这种浮雕的所有阴影必然与舞台上的真正照明相冲突。这布景很可能，从18世纪开始一个又一个的布景画家身上反映出来，也许是来自法国戏剧，因为我想它是法国客厅的样式，当时布景在英格兰仍是一件新事。

卢瑟福·梅恩作。此剧于1909年3月19日开始在圆顶剧场上演。

爱德华·马丁作。在1906年他被选为爱尔兰剧院第一任主席。

乔治·内斯比特扮演了罗比·约翰的角色。

娜拉·费茨帕特里克，扮演了格拉纳汉太太的角色。

法语“柳条篮”。——译注。

圣泰莱莎的绝对戒酒厅，都柏林克拉兰登街，叶芝的 *cathleen Ni Houlihan* 在1902年4月3日初演于那里。

被允许免费入剧场观戏的店主，他们以在商店橱窗里展示阿贝的海报作为报

安妮·E·F·霍尼曼购买并修复了阿贝剧院，之后又让爱尔兰民族戏剧协会在1904至1910年免费使用它，并提供资助。

回到“爱尔兰戏剧”的演出，一个演员，西甘·麦克默查达，他扮演威廉·约翰·格拉纳汉，显示了真正的表演能力但还需要严格得多的教导。他在一开始时听都听不见，后来重复了一个好效果，双眼好奇狡黠地向上一翻，望向观众仿佛要与自己亲切交流，直到令我心烦为止。他显示了一种扮演小丑的轻微倾向，否则就是太不放松，以至因过分焦虑而产生了那种印象。总体演出是粗糙的，但除了这可疑的持例之外，都诚实而真挚之极，贯穿着一种对生活的真正反映。没有什么像穿呵斯特大衣的演员中的一位扮演的简·格兰米那样，是对一种半是感官的而全然自我牺牲的爱的精彩表演，一件难忘的事物，但主要男角们也一样好。对这出戏的敌意描述去年秋天寄给了我，除了在它们涉及在初演时不了解其角色（而这一点我无法判断）的演员这一方面之外，肯定是不公正的。乔治·摩尔，我理解，谴责我刚看过的这场演出，但我想他对一切来自民间生活的事物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他与萧伯纳两人，像人们能凭他们的作品而预言的那样，都厌恶一切逻辑扭曲的事物。他们所有建筑都是在一个建筑师的办公室里以科学造成，由毫无乐趣的手建立起来。我没有看第一场演出，但听说它很糟。

111

[1909年]3月21日。我已读过泰勒的《欧文·罗·奥尼尔》，一本精辟的历史著作，对我来说十分有趣，因为我想我在欧文·罗身上找到了那种头脑的直率与单纯，在今天是清教徒与权势，也在他在基尔克尼议会中当今的敌手，当今的同盟者中找到了那懒散与模糊，在今天就是天主教。他在爱尔兰事务中是凯尔特天主教贵族的一个最后的代表，而且又单纯，由于个人活力的习惯与被并非远低于他的同人所接受的一个目标。但对我来说甚至比欧文·罗更为有趣的是泰勒。在这整部精辟的书中没有一个普遍意义的句子，没有一个短语因为智慧或美而能够脱离它的上下文；一切都从一个前提出发被辩论，而智慧和高贵的生活来源于自明的事物，来源于只需要陈述的事物。我第一次认识到我自己对一个我向来崇敬的人的敌意。他拥有爱尔兰天主教教育的学问，为一种几乎疯狂的活力所激发，它令他的头脑像一架聒噪而有力的机器。这学问来自智力的怯懦，来自害怕让头脑独处于一切都显得是异端邪说的印象之中，也来自政治与宗教辩证术的习惯。这学问摧毁宗教正如它摧毁诗歌，因为它摧毁一切直接的知识。我们品尝、感觉并看见真理。我们不靠推理将自己引向它。他站在他那一边恰恰是因为那些给了我，我希望，一点智慧，一点诗歌的事物，很可能认为我是阴柔的。一块石头总是比一个活物更硬，更富阳刚之气。他是个大演说家因为他嗓音的激情是自明的真理的一部分。他在演说时就变得像一个大演员在演一出坏戏。他的激情，他意思的高贵，有着普遍的意义，是智慧的一部分，尽管他的逻辑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一时的辩证术。一件仅仅编织起来的事物，像蜘蛛的网，而不是，像活的思想那样，叶与枝的一种复杂结合。

在1642年10月基尔克尼联邦之后奥尼尔是旧爱尔兰天主教的领袖。在奥利弗·克伦威尔于1649年8月15日登陆都柏林时，他是唯一有可能怀着任何成功希望面对克伦威尔的领导者。奥尼尔于1649年11月6日的死使天主教的失败成为必然。叶芝听指的著作是约翰·F·泰勒，《欧文·罗·奥尼尔》（伦敦，恩文，1896）。

邓肯一直在为一个书版的目的寻找我的纹章。我给了他饰章，一只戴着花冠的羊头。他发现一位利福德的玛莉·叶芝，去世于 1675 年；拥有以下的纹章：

大门画得并不正确，他想，因为他整个都是凭着描述画的，他从未见过纹章上有门。因为是个女人，没有饰章，但英语“叶特斯”有一个羊头。对纹章的描述，每个中央横宽带都有银白与黝黑相间的城垛。三扇大门相互遏制。我妹妹能否回溯到“玛莉·叶芝”？玛莉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姓，我们有亲缘，离利福德不太远，在北斯利哥。有些英国家族在中央横宽带上有三个羊头。

- x To lie no morex
- x To give up falsehood is to be undone
Who lies no longer is undone :
- x All though the days of my lying youth
Though all the lying days of youthx
- x I plucked the flower and blossom in the sun
I swayed my blossoms in the sun

Now I may wither into truth.

Though leaves are many, the root ' / is one

or

To give up falsehood isto be undone

(in which case read blossom for flower and take out
my inline2)

Though all the lying days of my youth

I swayed my leaves and flowers in the sun

Now I may wither into the truth.

不再撒谎的人被解开了：
穿过青春时所有撒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摇晃我的花朵

詹姆斯·邓肯、在艺术俱乐部创建时扮演了领导角色。

《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发表于《麦克吕尔杂志》作《青春与老年》，1910年12月，参见卷一沈睿译作。

此刻我会凋谢成真理。

尽管叶子众多。根是一个

或

放弃虚假就是被解开

（在这里写“花朵”代替“鲜花”并删去第2行中的“我的”）

尽管我青春时所有撒谎的日子

我都在阳光下摇晃我的叶片与鲜花

此刻我会凋谢成真理。

114

昨晚在“爱尔兰戏剧”我与我身边的男子交谈。他喜欢这演出但抱怨听不清句子。他接着说。“我也去过你的剧院。我喜欢你们的通俗戏剧，《郊区习俗》和那个法国佬写的戏，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我不喜欢你的神秘剧。”我以为他把我的一些东西装为“神秘”是自《阴暗水域》后发明的通俗指责，但发现他指的是《金考拉》。我说，“你为什么觉得那是神秘的呢？”他说，“哦，我对那段历史什么也不知道。”我回答道，“我年轻时每个爱尔兰民族主义青年对布里安·波鲁的了解像对圣帕特里克一样多。”他以为我谈的是农民并开始说起他多么害怕那种知识正在他们中间消亡。他显然以为那只是他们的事，像古围和被赐福的井一样。

115

[1909年]3月23日。我昨晚听说兰恩没有多少机会调动爱尔兰党帮助市政当局来履行他们付钱给美术馆的承诺。博兰德说，“我们都感到所缺少的一样东西是商业教育。”我敦促一个公共代表团去找瑞德蒙，要求通过一个法案，以及必要时暂时关闭美术馆。人们应当坚持一切此类的重要决定必须公开。如果爱尔兰思想的教育仅仅为了商业贸易，那决定应当记录下来以备未来之用。在我们当今的工业主义之后将到来的是反动，而工业主义越是被迫确定下来，反动就来得越快。此外，我怀疑民族主义者真会在公众面前承认他们接受了一个他们不能或不会支持的美术馆。如果瑞德蒙拒绝或者说他什么也做不到，像伊维阿这样的某个人就可能冲上前去，即使仅仅为了羞辱他的对手。向市政当局赠予的契据从来未签署过。

“...显然是莫里哀”，《自传》，第505页。

古代爱尔兰酋长充作居所和防御工事的土堡。

1907年休·兰恩爵士在都柏林创建市立美术馆，用以展出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他出借了三十九幅画，并答应建成一所专属的美术馆以收藏它们时就交出它们。同时都柏林市政当局在哈尔考特街存放这些画作。

约翰·P·博兰德，工业发展协会1907—1918年的副主席。

爱德华·塞西尔·吉尼斯，当时的伊维阿子爵，后为伯爵（1847—1927）。

[1909年]3月23日。麦克多纳夫今天来。对爱尔兰深为悲痛。说他发现在他与说爱尔兰语的农民之间有一个障碍，他们“冷淡、黝黑而沉默”并且“太礼貌”，他注意他学校里说爱尔兰语的男孩子们。在没有人看他们，在他们独处或与说爱尔兰语的花匠在一起时，他们都快乐、聪明而健谈；当他们遇到一个说英语的人或是一个学过盖尔语的人，就“愚蠢”起来。他们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给他读了我有关泰勒的笔记，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否一个天主教徒？我不认识任何天主教徒，除了几个牧师以外。全都近乎遵从，但他们是不是信仰者。这不会持久的。即使一些牧师也不信仰。他们‘形成他们的良知’，就是这句话。我在一所教堂里呆了九年，但我不得不放弃了。”我问起教堂生活，他说，“每个人都十分简单而且足够快乐。有时有一点妒嫉。如果一个兄弟和上司进城，另一个兄弟就会妒嫉，有时会喝得比对他们好的要多一些。”他接着告诉我拉福的主教已禁止任何人在他的辖区为盖尔人联盟服务，因为它的书记“亵渎了神圣的圣徒亚丹南”。那位书记说，“主教是一个敌人，就像他的辖区的建立者圣亚丹南，他试图以用拉丁语写作伤害盖尔语。”麦克多纳夫说，“两个老乡争吵时，一个说，‘我有一个兄弟会让你规矩些’，指的是拉福的主教，另一个说，‘我有一个儿子会让你头脑清醒的’，指的是洛格红衣主教。”

莫莉·奥古德今天来问我昨天在哪儿，因为辛格希望我去，如果他够精神的话。他“想作出安排”。他快死了。他们已停止给他供食。在他仍活着时是关闭阿贝还是让它继续开着？可怜的莫莉一如往常在做她的工作；也许这对她最好。我对辛格即将死去的感觉现在比他刚病倒时更少些。我习惯了这念头。也不觉得我可怜他。我可怜她。他正渐渐退出生命。我在疯人院看到塞蒙斯时也有同样感觉——我可怜他的妻子，他似乎已经死去了。一个人在遇见死亡时并不感到死亡是恶——恶，我的意思是，对于那死去的人。一个人的魔鬼沉默无言，像苏格拉底的一样，在他自己的死亡之前。在死亡的念头里降临的最狂烈的悲痛是想到，“岁月会滚滚而来，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看到那种高贵和那种美丽了。”这不就是怜悯未出生的众多活人而赞美死者吗？

[1909年]3月24日。辛格死了。在清晨他对护士说，“再与死亡战斗已经没用了”，于是他转过身死去了。我今天下午造访了医院并问副护士长他是否知道他快死去了。她回答，“他可能已知道好几星期了，但他不会对任何人这么说。他不想小题大作。他就是那个样了。”她又说，嗓音中充满感情，“我们为他尽了力。”

米歇尔·麦克鲁埃里，在圣恩达教堂。

女演员梅尔·奥尼尔，萨拉·奥古德的妹妹；她已与辛格订婚。

[1909年]3月28日。斯蒂芬斯先生，辛格的妹夫，说他没有感到痛苦，只有巨大的虚弱。在星期天他询问医生并确知了自己即将死去。他第二天告诉他的妹夫并十分开朗，甚至还开了些玩笑。在晚上他看了莫莉，对她说要坚强，并把她送到我这里，让我安排他的写作。早晨我听见他的死讯时一场大风暴正在猛刮，我怀疑是否在他死去时它就早已开始了，那个早晨格里高利夫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压抑，确信某种邪恶正在降临，但为她的孙子而害怕，害怕他会生病。另一方面，我妹妹洛莉在早餐时对我的另一个妹妹说，“我想这对辛格会很好，因为昨晚我看见一艘平底船与一场风暴搏斗，随后它驰入宁静和明亮的阳光，我还听见龙骨在岸上磨擦的声音。”人们记得到蒂尔·那·奎格的航行，肯定是灵魂在死后向它的安息之地的航行。

我一直在浏览他的诗作，并又读了一遍第21页上的第一首，“我自问我是否已病死。”他们肯定在那里，他的“白痴”敌人们。反对一切法规的劳伦斯在《花花公子》剧后冲上化妆间告诉演员们他们不应在“如此可耻的一出戏”里演出；霍洛威，他总是使用他对团体的相当大的影响以及在对公众演讲时反对辛格；那里也有那些软弱的朋友们，他们假装相信但不提供任何帮助。那里还有奥多诺乌，他的讣告把辛格的作品说成仅仅在承诺上是重要的，谈论那些赞美它们的人的“夸大其辞”，随后又宣称它的作者在巴黎如此熟识辛格（然而日期的误差却有两年），每天与他共度许多钟头，与那个骄傲而寂寞，几乎像骄傲于他的天才一样骄傲于他的古老血液，只有寥寥几个朋友的辛格。还有康诺利，协会——它送了个花圈——的书记，他的敌意与《希恩·费因》上的攻击关系颇深。它是，引用汉德森的话，一个“规模小但是精选的”葬礼。有人曾向我引述：

该如何让那葬仪在那时被说出
那安魂曲在那时被歌唱
由你们，你们这些为邪恶所观望的
由你们这些为诽谤之舌谈论的
它曾将天真折磨至死
天真已死去，死得那么年轻？

然而这些人来了，尽管只是愧疚；他们看他的戏剧，尽管只是厌恶；他

哈里·断蒂芬斯，辛格的妹妹安妮的丈夫。

“……在葬礼上”《自传》，第508页。辛格的诗“一个问题”指“活的白痴”。

W·J·劳伦斯（1862—1940），戏剧史家。在1907年2月4日关于《花花公子》的争论中，他根本谴责叶芝上演这出戏，并说它应当立刻取消以“尊重公众舆论”（《爱尔兰时报》1907年2月5日）。

约瑟夫·霍洛威（1861—1944），建筑师。戏剧欣赏者，日记作家。“可怜的辛格，他在人品上是一个文雅而可爱的人，但根本不像他的作品。”霍洛威，《日记》。

D·J·奥多诺乌（1866—1917），《爱尔兰爱书人》的编辑。

们说起他的名字，尽管只在诽谤中。兴旺发达的爱尔兰从未看过他的戏剧，也从未说过他的名字。除了库勒，他曾被请到哪家农舍去过吗？有谁曾请他赴过一顿晚餐？我时常希望他长寿到能够享受那种与懒散、迷人而举止文雅的妇女的交流，巴尔扎克在他的一篇献词里将她们称作天才的首要慰藉。

121

他知道怎样去恨，这就是证明：

“致这个作家的一个敌人的姐妹，她不赞成《花花公子》。”

主啊，迷惑这乖戾的姐妹，
用污迹和水泡挫败她的额头，
索紧她的咽喉、肺和肝，
在她的腹中给她一记磨擦。
让她活着挣她的一日三餐
与多子的罪人一起在快乐峰：
主啊，快作出这判决，
而我是您的臣仆，——J.M.辛格。

当他给我看这时，他露出快乐的目光说自从他写下了它，她丈夫就酗酒，招妓，染上了梅毒，并将它传给了他妻子。格里高利夫人给了我这首[诗]。害怕他的家庭会毁掉这首诗，她把它抄了下来。我不知道他怎么了解这对夫妻的事的，但他十分真诚并总是就事论事，各个方面都十分单纯。

122

在巴黎辛格有一回对我说，“我们应该联合斯多葛主义、苦行主义和迷狂。其中两个常走到一起，但三者却从不。”

123

我相信我对他说过的什么也许向他暗示了那首诗，“我自问我是否已病死”。毛里斯·乔伊频频攻击他的作品而又承认他是一个天才之人，他攻击它是因为，我毫无疑问，他想与身边的人搞好关系。当辛格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时，乔伊也在那里，我告诉辛格每当我向任何人谈起他的病，那人总会这样说，“毛里斯·乔伊真是倒霉，”直到我再也忍受不了并猛地爆发出来，“我希望他死掉，”而当时我正像某人对我说的那样。被“全城”指责为“没有心肝”。人们不断地询问乔伊怎么样了，我发现，但几乎没有谁来问辛格的情况。两三个星期后辛格写下了这首诗。我毫不怀疑我的话在他头脑中开启了有关傻瓜成名之道的想法，尤其因为我曾预言乔伊会成名。他目睹了我在那题目上的愤怒。和辛格同时接受治疗令人感到是纯粹的侮辱。乔伊的病的确为他赢得了那么多同情，以至他被任命为霍拉斯·普伦凯特的私人秘书，

一个小诗人和文学记者，艺术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而如今在他打高尔夫球时，他有时会以他最近养成的英国口音，向某个有求于某某大人物的球手说，“我跟他很熟，我会在那方面为你进一言的。”

124

我对斯蒂芬斯说，“在剧院毫无疑问他糟糕的健康状况始于《花花公子》的麻烦。即使他有一出戏演出成功也使他生了病。”斯蒂芬斯说，“哦，不，辛格这家是十分强壮一族。”然而，他以为辛格的结局因他母亲几星期前的去世而加速了，当然在像辛格那样的人身上一切为习惯支撑的情感都十分强烈。

有两种天才。像拜伦。像歌德，像雪莱那样的人具有完善的个性、积极的意志和为那意志服务的所有才能；还有像哥兹密斯，像华兹华斯，像济慈那样没有多少个性，多少个人意志，只有热烈而沉思的想像的人。后一种的好处在于他们写下的一切都是性格的一部分，但他们时常无力面对事件。他们漂泊着经过生活，时常只有一种可见的力量，从生活与思想中抛弃一切会使他们从其工作中分心的东西这样一种力量，并且仅仅是这一种，只要它是一种消极的行动，辛格，如果年轻时就结了婚，我没有多少怀疑，就决不会写作或想到写作。我怀疑他甚至是否会对一种像我们的运动那样的运动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很容易拒绝任何与自我表现无关的消遣。我相信在早年他的家庭曾徒劳地试图让他有一个职业。他是个漂泊的、沉默的人，充满了隐藏的激情，而他肉体的软弱增强了这种印象。我想他热爱野蛮的岛屿因为野蛮人似乎是他隐秘梦想的化身。他的力量是道德和想象的，而不在于他意志的控制之下。他被《花花公子》骚动可怕地动摇了，在它的第一夜迷惑又兴奋，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这在他的作品中没什么两样。当它过去之后他既未因蔑视而夸大其辞也未因怯懦而轻描淡写。他继续实行他的计划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以一种较不通俗的形式修改了《补锅匠》，但写出了一出美丽、安宁的《戴德莉》。他的力量在于性格，而不在于意志，厄运动摇了他身体的性质而让他智力与道德的性质不受打扰。为了同样的原因，一方面几乎不知道其他作家的存在——格里高利夫人和我都不知道他对我们的作品如何看法——一方面他却日常交谈中有着最完美的谦卑和单纯。对于他，任何种类的坚持己见都是不可能的。外在的自我，那面具，那角色，是一道阴影；性格才是一切。

125

在《花花公子》麻烦的那晚他对我说，“某某人，”指他的一位朋友，一个年轻医生，“说，‘我能做的一切就是不让自己从座位上跳起来，从正厅后座咆哮的人们里指出我正在为其治疗性病的人。’”

126

爱尔兰的周报都以短小并且大多数都是吝啬的启事报道辛格的逝世。有一个

在这一条上叶芝写道：“毛里斯·乔伊此后潜逃了，留下一大堆债务。WBY。1912年1月。”

暗藏的盖尔人联盟的歌唱者，曾是反对《花花公子》的领袖之一。他在同一天去世。《辛恩·费因》在同一篇文章里报道了两人的死，而将其中的四分之三给了恣事者。对于辛格他们只有吝啬的词句，不出所料。

127

莫莉告诉我辛格在进埃尔皮斯 之前，曾去看过斯蒂芬·麦克凯纳 和他的妻子。并告别说，“你们不会再见到我了。”那些诗篇有些是很居以前写下但最近修订过的。

128

赞颂

i

他是那些从不移动的灵魂之一，在其中有一个持久的“最后一日”，一种持久的庆祝和走向审判。

ii

他不对男人和女人说话，像较小的作家们那样请求他们的判决；但，认识到自己是判决的一部分，他沉默不言。

iii

我们怜悯生者而不怜悯像他那样的死者。他已从他患病的身体上升进入了英雄的喷泉。我们被时间所烘干。

iv

他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于是躲避一切只除了有关他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切知识，并快乐直到那尽头，甚至在他去世的下多几小时前还开点玩笑。就仿佛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事物从他那里逝去，而不是他从我们那里逝去。

129

贬斥

[1909年]4月2日。

他有天才之人的自负，尼采将其比作一个有孩子的女人的自负。无论是我还是格里高利夫人都不曾因为他工作而从他那里得到哪怕一句恭维或者，我想，感谢。在《海亚辛斯》后格里高利夫人在戏结束的一刻就回家去了；并不等待朋友们的祝贺，去为他取晚饭（因为他几乎总是生病和虚弱）。他对大获成功的《海亚辛斯》所说的全部只是，“我本指望更喜欢它。”在他迷人而谦恭的风度之下，在生活的几乎所有事物里，一种对他自己的梦的完全沉浸。我从未听见他赞扬任何作家，活的或是死的，只除了某个法国闹剧作家。对于他来说什么也不存在除了他的思想。他不会为它而高声要求什么，他从不说起我在愤怒时太过经常他说起的那些带来信心的事，但人们知道他

辛格在那里去世的私立医院。

斯蒂芬·麦克凯纳（1872—1934），辛格和叶芝的朋友；古典学者，普罗蒂奴斯的译者。

《海亚辛斯·哈尔维》，1906年2月19日初演于阿贝。

珍惜的不是别的。他对坚持己见太自信了。我有一回对乔治·摩尔说，“辛格总是胜过你。因为你有短暂但可怕的一瞬间，在期间你承认其他作家的存在。辛格则从来没有。”我不认为他厌恶其他作家——他们并不存在。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个自私者——他对生活的普通事各太富同情也太单纯了。在艺术方面他所知道的语言只有他自己的。

130

我常嫉妒他的专注，正如我嫉妒魏尔兰的恶。没有其种恶或缺，一个天才之人能否作出完全表现他自己所必须的，对世界的彻底否定？你是幸福或至少是被赐福的，西奥的老盲人，“石头岛屿”。

131

昨晚的两出戏，《时间》，一个幻想故事。略显高贵，略显深沉，充满暗示，以及《叉路》，一个没有暗示或高贵性的逻辑作品。我认可后一出戏是因为它的中心意念，尽管显得是纯粹的迷信，是独创性的，并且似乎是一种面向生活的观点的开始。在四份早报里《时间》受到谴责或忽视而《叉路》却得到了巨大的赞扬，比我们至少一年里上演的任何一出戏都多。然而没有一份早报提到或者，看起来，理解了这出戏的中心意念。其中两份声明女主角的失败是她丈夫的错，其他的则隐含这个意思。他们偏爱单纯的逻辑，即使在他们不理解它之时，胜于暗示，唯有它才是文学的基础。讲出一个逻辑命题，最平常的头脑也能完成它。暗示对于最丰富者是最丰富的，于是艺术在一种如此的民主中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他们误解了罗宾森的命题，幸好是因为他的通俗性，并将这误解完成直到一切都平淡无奇为止。在另一种意义上那种接受典型的属于爱尔兰下层中产阶级头脑。他们让他们的头脑居留在逻辑之上，而静静地接受（尽管实际上是无视）那些他们会视为，如果他们想到它的话，一种彻底的迷信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怎样将宗教观念与他们的新闻报道结合在一起的。

在《时间》中一种激动了我的思想是“只有女人和伟大的艺术家热爱时间”是为了他自己，其他人出卖他换取金钱或类似之物。但布莱克的“被展出的裸体的美”，可见，可闻的智慧，对开店的逻辑家们意味着什么？他们怎能热爱时间或任何事物，除了白昼的结束？

132

这句话在《自传》，第 512 页中出现为：“你是幸福或至少是被赐福的，”西奥的‘石头岛屿的老盲人’。”出处是拜伦，《阿比多斯的新娘》，ii26-7：“一切——除了不朽的梦，它们能欺骗/西奥的石头岛屿上的老盲人！”叶芝将此段与出自致阿波罗的荷马式颂歌的另一段联系起来，他引用于《自传》，第 151 页：“一个盲人：他居住在石头的希俄斯：他的歌要永远成为最美丽的。”希俄斯破认为是荷马的出生地。颂歌的提洛节部分被归于希俄斯的辛奈索斯。

《时间》，诺雷斯·夸奈尔（考纳尔·欧里奥丹）作，以及《叉路》，勃诺克斯·罗宾森（埃斯麦·斯图阿特）作，1909 年 4 月 1 日演于阿贝。

当汉德森成了树篱上的蚱蜢，以及一个每日的负担时最好不在。

133

我生性多疑，我怀疑斯蒂芬斯。他上星期在我问他辛格是否作出了他的遗嘱时对我说，“他说他太虚弱了，但我说完全我知道他的愿望，于是我写下了一份遗嘱并带来两个证人，他就签了它。”我现在知道一年以前辛格作出过另一份遗嘱把他所有的钱留给了莫莉。然而，新的遗嘱也许仅仅涉及他母亲去世那无可能落到他手上的东西，但斯蒂芬斯从未向我提到过遗嘱的性质，罗伯特·辛格也没有，我发现，对莫莉说过。然而，她头脑相当简单，或也许是除了她的损失之外对任何事都太漠然而不在乎它。她今天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它全部花在他的作品上。”他们可能猜测她知道，我也知道，于是保持沉默。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人。

134

今天莫莉告诉我他常说起他即将死去，其实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如此，并努力想完成《戴德莉》。有时他会变得十分沮丧，认为地不能完成它，这时她会在他的房间里为他表演它，他就再写一点，接着他又会再次沮丧，这时那演出就会再次开始。

135

莫莉给了我那些诗篇的日期。《女王们》在约克路时，1908年。《一愿》，1908年。《在一个周年纪念上》很旧了。《格伦克里的橡树》在1907年。《一个问题》，1908年。《在格伦库仑》是旧作。《墓志铭》是旧作。《前奏》是旧作。《在五月》是新作。《在一个生日》。旧作。《冬天》，1908年。《读罗萨德后的墓志铭》，1908年（写于德国）。翻译恰作于托宾小姐来爱尔兰之后。

136

昨晚萨拉·奥古德梦见她被支付了薪水，并在其他硬币间发现了一枚巨大的银币，她认为是一枚十先令，当她将它翻过来时上面有一只狮子，十分明亮，轮廓很凸出。我记得她在《金头盔》后有关狮子的旧梦。我想这个梦会带来好运。

“而蚱蜢将成为一个负担，而续随子浆果将失败，”《传教士》，5。

1909年2月13日。在遗嘱中辛格给莫莉·奥古德留下了一笔80英镑的终身年金，其数量在她结婚后将降至52英镑。他将他的财产其余部分留给了爱德华·M·斯蒂芬斯和爱德华·H·辛格。第159条涉及这一问题。J.M.辛格的兄弟。

1908年2月2日，辛格搬到了都柏林拉斯迈恩斯约克路47号一所公寓。

阿格涅斯·托宾，诗人，翻译家，艺术赞助者；塞蒙斯、叶芝、康拉德、辛格的友人。她于1906年9月前来都柏林。

我妹妹莉莉说洛莉的船 不像只真船而像《阴影水域》的船，一种寓言性的事物。她在她的梦中知道它与辛格有关，也许他乘坐着它。也有一个衣着鲜明的姑娘，但她似乎随着船靠岸而消失了。有关那姑娘的一切都有点混乱，事实上全都有点混乱，直到船在明亮的日光下靠了岸。[1909年]4月3日。

我看到在《时间》，即暗示，与《叉路》，即逻辑之间，有着一种文明以及艺术的差异，暗示的文学，对于最丰富者最为丰富，不属于建立在争辩之上的社会秩序，而属于一个生命为存在本身所统治，最富活力的就是最有力量的时代。闲散、财富、特权丁就是最富活力者的一种土壤吗？逻辑的文学，在最空虚者中最为有力，平息生活，统治一切为一个金属的前提服务，尾民主的。尾刚刚开始阅读的世代的艺术。他们在头脑中装满了推理正如他们装满他们空空的房屋，里面没有过去的任何事物，装满机制的家具。我以往常想法国和爱尔兰的民主，正如约翰·奥黎尔利说过的那样，遵循着一种逻辑的演绎一直到其尽头，无论它造成了什么苦难，因为他们是凯尔特人。我现在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因与过去的某种断裂而失去了自明的真理；“被展出的赤裸之美”。英国逻辑家们也许也一样无知，但更为怯懦，然而他们有萧和那些对易卜生的乏味翻译，两者都是路障。

罗宾森 将成为一个著名戏剧家，如果这个剧院维持得够长的话。他不像萧那样好辩，尽管他对生活的表现根本上是逻辑的，因而才有他对激情的掌握。激情在决心行动时是逻辑的。而在暗示性戏剧中肯定不是有着适于冥想的足够松弛和懒散和那些表面无关的事物，就是有着一场合唱，而观众，时间父亲的热爱者，理解浮士德对那消逝一刻的最后呼叫的人们若没有丰富闲散的头脑，则两者都不可能。

“男人穿上衣服下去，脱下衣服上来。”

一个爱空想的女人昨天对我说，“如果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说。真诚地，‘这消逝的一刻就像我会认识的任何一刻一样好，’ 我们就会瞬间消灭或与上帝合一。”我猜想这是因为欲望会达到一个尽头。逻辑不就是欲望之足吗？

第 119 条。

勒诺克斯·罗宾森（1886—1958），包括《白头男孩》，《爱尔兰戏剧》和《远方的山岭》等数部戏剧的作者。从 1910 到 1914 年以及再次从 1919 年到 1923 年他是阿贝的经理和制作人。

[1909年]4月5日。从格廷·达斯与麦吉一同走回家。谈到邓萨尼。蠢得讲了我如何采用了邓萨尼的两个想法并为他的戏剧写了一个剧情概要。以为我已治愈了自己这一类的夸耀。我为什么想要麦吉的好评？我是怀疑自己，或者那只是一个要证明我们所谈论的卢塞尔没有成果的欲望？一种不大友善的欲望。到家时脾气不好——一直在埃及的砖窑里。麦吉说什么都用一种略微争吵性的形式。这意味着灵魂因缺少自明的真理而在挨饿。好的交谈打开自己像泉水或是像黎明，而一切有效的争论，一切仅仅逻辑上的言论，则必然发现自己处于趋向于两人或更多人都熟知的事实与经验。双方都隐藏起了新的与丰富的东西。

142

在《辛恩·费因》上一篇十分小气的辛格讷闻上说，他的所有剧作除了《向海的骑手》都是在身体不好时写下的。那位编辑，我丝毫不怀疑，有意捏造了这一点以为他自己的攻击开脱。《向海的骑手》是紧接在《狭谷的阴影》之后写的，后者曾被格里菲斯激烈而虚伪地攻击过，否认他自己的话并压下了辛格答辩的紧要部分，即这出戏建立于其上的民间故事。

143

行动的人身上与文学的人的风格相对应的因素，乃是道德的因素。书籍留存几乎完全靠的是它们的风格，而在死后其影响激励起运动的行动的人，是这样的人，他们对抽象法则与高尚情感的执著使他们超脱于切近的环境之上。米歇尔写散文比戴维斯更好，弗尔古森和曼甘诗更好，德阿凯·麦克吉通俗诗更好，芬坦·拉勒对政治事件看法更深入，奥康奈尔更有力量，米盖尔更为雄辩，但唯有戴维斯影响了一代代的年轻人，尽管米歇尔更为狭隘也更多过失的本性时不时地与之抗衡。戴维斯不仅在他的诗篇中展现这道德的光辉——我怀疑单是那能起多少作用——而且以他的行动，比如说，对他在皇家

叶芝在都柏林附近敦德伦切尔奇镇的教堂路上的家。

“约翰·埃格林顿”是W.K.麦吉的笔名，他是爱尔兰国立图书馆多年的助理馆员。他的写作包括《英国爱尔兰散文》（1917）、《爱尔兰文学画像》（1935）和《AE回忆录》（1937）。

爱德华·J.M.普伦凯特，第18世邓萨尼男爵（1878—1957），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

《闪烁的门》，1909年4月29日演于阿贝。

2 SamueIXII31：“而他抓住里面的人，将他们投到铁的锯耙之下，铁斧之下，叫他们穿过砖窑：他将这施于所有 Amrnon 的子民的城市。”亦见于布莱克。《菲鲁莎莱姆》，画页 89，15—18：“Gihon 的埃及，众口 / 相传的，埃塞俄比亚，利比亚，Rcphaim 的海， / 我看见奴役的琐碎细节，在 / 被毁的砖窑中。”《写作全集》、第 734—5 页。

1909年4月3日。

这是指《爱尔兰人联合报》上的一场冲突，它始于一篇编辑评论（1905年1月7日），说这出戏“能称做爱尔兰的东西并不多过一个中国佬，如果他在自己的访客帖子里印上“帕特克·奥布莱恩”的话。”在1905年1月28日号上，编辑将这出戏描述为“从退化的希腊传来的一声污秽的回响”。这场争论在2月4日与11日号上继续；在后者中编辑发表了辛格的信而没有登出与它一起的阿兰故事。

爱尔兰学院中的政治对手的尊重。他的诗篇只是对他在行动中展现的原则的解说。人都取决于自我战胜，而如果仅仅被写下就有点明显，有点老生常谈的思想，在匆匆的事件中被坚定遵守时，就变得富有说服力，甚至不朽了。并非行动的人的作家，其自我战胜就是风格。

米歇尔的影响，尽管并非全部，主要是一个作家的，风格的影响，力量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的活力。奇怪的是米歇尔殉道者的生活，得到风格的支持，比丁上从未上过囚船，并且写得不那么好，并未达到改变法律的人静静的光辉有力量。

144

对任何伟大事物欣赏的行为总是一种自我战胜的行为。这是我们不信任不曾某个危机关头认可其原则的安详的道德家的一个原因。他会受烦扰，甚至有些崩溃，倘若他作出了那战胜的话。在一个危机关头证明了自己的人也许在言词中是安详的，因为他的战斗并不在言同互相拼搏的冥想之中。

145

昨晚我妹妹告诉我辛格的这本书是他们在一个星期五开印的唯一的一本书。他们试图避免但做不到，而且印得不好。他们尽其所能。结果也做不好。

146

今天在爱尔兰公众生活中道德因素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天主教教育的恶劣，以及有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数量的稀少。形式感，无论是帕内尔还是格拉坦 还是戴维斯，积极生活中的形式感，在爱尔兰总是请教的。奥康奈尔，一个伟大的天主教人物，缺少形式。自我战胜的，高尚的力量一直是请教的，多多少少是一件卓越的事物。所有悲剧作家都是请教的——奥康奈尔是位喜剧作家。他有迎合市场的，集市中的小丑的天才。

147

莫莉刚告诉了我三个预兆之象。几年前，当剧团在英格兰进行那六周的巡回演出时，她、辛格和阿瑟·达莱 坐在一家茶馆里，她看着辛格，突然看见似乎肉从他的脸上掉了下来，她看见的只是一个头盖骨。她告诉了他这个，这令他震惊万分，从此后她就不再让意象像以往那样在她眼前自己成形了。辛格那时还很健康。去年又一次，但是在手术之前并且在她没有恐惧的一个时候，她梦见她在一具棺材里正被放入墓中，而“一个古怪样式的十字架”放在棺材上面。（剧团在他的葬礼上送了一个鲜花的十字架。它被放在墓上。）她也把这告诉了辛格，它令他烦恼不已。然后在手术后某个时候她梦见他在一艘船上。她在岸上，他向她挥手，船就开走了。她渴望追上他但做不到。

亨利·格拉坦（1746—1820），爱尔兰政治家，立法独立运动的领袖。

都柏林小提琴家，曾为阿贝演出伴奏。

她有一天说她与他在乡间散步时一个老妇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他说“也愿上帝保佑你，”她问他是否信仰上帝，他说，“不。”她说，“但必定有谁创造了这一切美丽事物，”指那些金雀花和飞鸟。

接着我们谈起他在阿兰做过的一个梦。他曾告诉过她也告诉过我。他梦见他在那些石头堡垒中的一座里跟着奇怪的音乐跳舞，他无法停止舞蹈，醒来时十分疲惫。当他把它告诉我时对我来说似乎他相信，或半信半疑，他的灵魂那一夜离开了他的肉体。

[1909年]4月11日。阿冯的斯塔福德。数星期前托宾小姐写信给我说塞蒙斯的疯狂正在经过的阶段是相信他在天堂之中。所有的大诗人都在那里，来自其他时代。他正帮着准备接待斯温朋。天使要站成三个一群。现在斯温朋死了。李斯特小姐（姑且说是布伦和另一位李斯特小姐）也有几个月感到他快要死去了。

前天我遇见一个年轻诗人叫刘易斯，他是奥古斯特斯·约翰的崇拜者。他悲叹约翰当前的状况，即为挣钱画了很多肖像，并认为他的作品正在堕落。他说约翰的情人找了另一个崇拜者，一位十分聪明的年轻画家，他并不欣赏约翰的作品，而这影响了她。于是她不再给予约翰旧日的“顺从的崇拜”了，而这对约翰很糟，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报复，因为约翰不想娶她。刘易斯十分气愤并认为约翰会离开她。“他有什么欠她或她的孩子们的？”

与里凯茨和莎农共进晚餐。里凯茨说起辛格的去世带给他的悲伤——“那所有工作的结局”。我们谈起约翰和现代天才之士混乱的或崩溃的生活，和意

在1909年4月6日叶芝启程赴伦敦和阿冯的斯塔福德短期旅行。

1909年4月10日，约瑟夫·霍恩，写到《作品集》（1908），说“总体上，英国出版界为这个版本开了个很好的招待会，而在斯温朋去世（1909年4月）的次日在街上遇见他妹妹时，叶芝挡住她说：‘我是众猫之王。’”霍恩，《W.B.叶芝1865—1939》（伦敦，麦克米兰，1962年第二版），第230页。

佩尔塞·温丹姆·刘易斯（1884—1957），小说家，画家及诗人。

查尔斯·哈兹尔吾德·莎农（1863—1937），画家和石版画家。

里凯特日记中的一则（1904年4月23日）为：“[叶芝]带来了辛格，我很喜欢他。他有一张亲切、平凡、然而富有魅力的脸，充满人性的双眼和粗糙的头发。辛格的脸色使我想起高尔基，带一点尼采的格调。在以

大利画家们如此不同的生活。他说在那些日子里“天才之士受到关怀”，而如今生活的压力太重了，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直到某种不幸降临——疯狂或死亡。他接着说起。像他常说起的那样，在现代生活中缺少艺术的必要位置，并说，像他常说的那样，“归根结底，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曾是教皇的新穹顶。”

153

在我们所有的公众艺术——建筑、戏剧、大型装饰——中的一个困难是，有太多不同的趣味要满足。某种趣味肯定是厌恶并到处讲述它的厌恶；而于是因为其余趣味的沉默——半是麻木，半是厌恶冲突，半是与攻击的容易相比防守的困难——造成了公众趣味的怯懦。一切创造都需要一种心理去生产，一种心理去享受；戏剧难得几次能在一小时左右里创造这一种心理，但这总是越来越困难。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像一个孤独个人的心理，勇敢得无可衡量——一切对于它都是可能的。在我的时代唯一受到热情欢迎的建筑是威斯敏斯特天主教堂；是宗教创造了这一心理，我猜想。关于韦勃在牛津街和里金街上的新楼人们听到的只是店主对商店玻璃橱窗空间太小的抱怨。

154

里凯茨说，“每个为世界做任何事的人都是十分讨厌的，令人愉快的人是那些世界为之做某事的人。”

155

“战争是众人之父也是众人之王，有的他将之造就为神，有的造就为人，有的被捆绑而有的得到自由。”赫拉克利特。

“不朽者是凡人，凡人不可朽，两者都生于对方的死而死于对方的生。”赫拉克利特。

156

[1909年]4月15日。我问奥尼尔小姐她是否有什么话促使辛格写作了“一个问题”，她说，“他时常和我开关于死亡的玩笑。有一天他说，‘你会参加我的葬礼吗？’我说；不，因为我不能忍受看见你死去而其他人仍旧活着。”

157

我请斯蒂芬斯昨天或今天来看我，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很可能使他疑心了，

后的生活中他会发展起一种与巴尔扎克相似的特征。”《自画像》，第104页。

断片 25 和 66：“战争是众人的父和王；有的他已引领为神，别的则成为人，有的他造就为奴隶而有的得到自由”；以及“不朽有成为凡人。凡人成为不朽者；他们互相生于对方的死而死于对方的生。”《赫拉克利特》，菲利普·惠尔赖特译。

像他使我疑心了一样，为什么每当我试图与一个个人商讨时总是失败呢，因为我对一个与我格格不入的委员会拥有权力？我说得太多了吗？我太热心了吗？我知道我的错误在某个方面是来源于形式的感觉不见了。这我是从任何种类的会议的规则中得来的，但为什么我有这种缺乏？我曾多少次徒劳地尝试治愈自己，以至我应该拒绝一切商讨，无论多么紧急。我本应写信给格里高利夫人来看斯蒂芬斯。斯蒂芬斯本人谈得太多，很可能这就是我怀疑他的原因。我想我的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每当我与一个个人相处时我总是要么喜欢要么厌恶，然而委员会却是一件事物。人要控制自己的头脑。没有反斥的激动，在事物之间。另一个也许是我的臆想先于我的政治思考，而在一个会议上较长的演讲给了我时间。我的形式感总是我生活与艺术中的帮手，因为我以木星为我的行星中最高者，但为什么它不帮助我与个人相处，直到我真正与他相熟？即使我的友谊也有一个危险的中心海域，在最初的印象与亲密情感之间。

158

另一方面昨天我下了决心彻底改造艺术俱乐部，并包括解散委员会，由一场委员会的无记名投票通过。

159

[1909年] 4月17日。格里高利夫人以及随后奥内尔小姐刚看过斯蒂芬斯。我的怀疑部分是正确的。在由他执笔的遗嘱中，他的儿子，还有一个年轻男子，就人们能够理解的程度而言，继承了版权，而斯蒂芬斯如今正在读着《补锅匠的婚礼》来看特里是否被允许上演它。他反对出版《一个问题》，但无法制止它，至于我们是否获准上演《花花公子》还不肯定。我未获准编书或看文件。这一家族反对任何种类的戏剧和我很可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斯蒂芬斯在辛格去世后第二天对我说，“我知道他想见你，来处理他的写作，我们则仅仅急于执行他的遗嘱，”他也对格里高利夫人这么说了。计划有过一个变动。奥内尔小姐对他说，“如果你禁止我们演出《戴德莉》和《花花公子》，你就毁了我的一生。它们是为我而写的，它们在伦敦上演是我展开一个事业的唯一机会。”她说起辛格想找我，而斯蒂芬斯“十分惊讶，仿佛他以前从未听到过一样。”格里高利夫人以斯蒂芬斯的权威告诉我，辛格在去世那晚两点时想找斯蒂芬斯，但在被告知他会活到早晨后就放弃了。我们今天获准上演《戴德莉》了；奥内尔小姐要浏览手稿。奥内尔小姐一年继承大约80英镑。

160

奥内尔小姐说在去年辛格有时会说他快死了。接着在与她说话之后又开朗起

《补锅匠的婚礼》由午后剧院首演于陛下剧场，伦敦（毕尔鲍姆·特里是那里的主管），在1919年11月11日。叶芝发现演出“可耻”并在第一幕后就离场了。

来认为自己完全没事，他向麦克凯纳太太（也不是我以为的麦克凯纳）道别是在第一次进医院之前，在一年以前。他在交谈一开始就谈起他的婚姻，接着在他要离去时说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再也见不到麦克凯纳太太了。星期二。在他去世前几小时，在他告诉了斯蒂芬斯他即将死去之后，他对莫莉说起（为什么，她不知道，也许是为了令她安心，她想）要去住寄宿舍并请护士中的一位到那里照顾他，并说，“这样你就能更多看到我了，”还有，“我会活到有朝一日看护你的。”这解释了那天她在讲述了他们如何停止供他食物之后为什么会对我说，“也许他会活下去的。”

161

下午。现在似乎不是家庭，而是斯蒂芬斯被损伤的虚荣。”导演们想什么事都做，而我将是主子。”他显然把我的提议当作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是驱逐他的尝试，于是读起了辛格，看来是第一次。他读《补锅匠的婚礼》来看他是否会让特里上演它，似乎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可反对。他似乎正享受着一种出入意外的权力形式。不，我决不与不足三个人商讨，其中一个还是主席。

162

[1909年]4月17日。格里高利夫人不像我（我总是把许多美德赋予一个陌生人）猜想她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多多少少是个傻瓜，在一小时内就让他把遗嘱出示给了奥内尔小姐并使《戴德莉获得批准。她毫不怀疑一个傻瓜能够受驾驭，而我却在一个人性的象征前发窘，似乎需要所有的宗教和哲学才能将它激起。在我能够穷尽这些主题时我被打断了。

163

[1900年]4月19日。昨天与利特尔顿夫人共进午餐，并向利特尔顿将军引述了内文森关于现代军队的意见。他说，“与此相反，想一想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有教养的人们之间的战斗吧；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像半岛战争那样的战斗。”他接着将军人划分为三类：一，卤莽者。如果是兵，这些人是愚蠢的；如果是官（这一类里兵比官更多），则是疯子。这些人属于那种唯有在炮火下才会快乐的人。二，不喜欢战斗并对战斗结束感到高兴，但勇敢地坚持到底的官兵。三，那些如果危险很大就根本不想战斗的人，这种人在士兵中比在军官中常见七倍。

164

他也说及他在战斗中从未见到一个死亡的预兆不曾实现。

165

[1909年]4月22日。我那种老感觉又来到脑海中，在过去几天里。我对户外的空气和宁静有一种深深的渴望。我被斯蒂芬斯留在这里，批准《戴德莉》的消息还没有从他那里传来。

166

狄金森小姐 告诉我昨晚有一群艺术俱乐部的成员希望抗议邀请上尉夫人 因为这会使俱乐部沾上政治性，建议向委员会进行一次私下抗议，因为公开抗议从俱乐部的观点看会像邀请本身一样的不妥。它会受到误解，并且似乎令俱乐部成为一个政党。

167

反复无常的斯蒂芬斯昨天对罗伯茨说，“我发现很难与那些阿贝人接触。”他在三点到四点批准了《戴德莉》。

168

昨天戈加蒂医生 告诉我他从医生那里听说（他曾在辛格住进过的同一所医院，而且也在同一时间）那是癌症。我说，“他们说不是，对他家说的。”他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人们会恐怕它有遗传性。”他有两处患癌症；他的肝发病了。肯定出了什么事故，否则他能多活五个月。他在最后两天充满了希望。戈加蒂补充说，“但一旦一个人知道自己肯定要死时；他时它的关心少而又少”——意思是，我猜想，人因虚弱而漠然处之。辛格颈部早期的肿胀乃是，戈加蒂听说，起因于坏牙（贫穷的普遍怔候之一）。

169

[1909年]4月23日。《戴德莉》昨晚到来了，但充满了错误和混乱。星期二早晨格里高利夫人打电话说她和我（都在都柏林等着做这项工作）看不到原本不能继续按修订本做。他那天过了一会回答说他会星期一3:30到办公室。她现在已写信要求在明天早晨看到手稿。他肯定是个傻瓜，而又傲慢无礼。他寄给格里高利夫人附有原稿的信里对这些天的耽搁没有任何道歉。《戴德莉》被保证在辛格去世后一周送到，然后是稍晚一些，然后是上星期一，然后是昨天三四点钟——答应有笔记和第一稿但只在昨天深夜（星期二）交出了这最后一稿。誊写得很糟而又毫无用处，而尽管他知道他正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不方便，他却想敷衍我们直到星期一。

170

马贝尔·狄金森，《昨天的都柏林》的作者 P.L.狄金森的姐妹。

乔治·罗伯茨，小诗人，曾是芒塞尔公司的经理，这家出版社成立于1905年：它出版了《约翰·M·辛格作品集》（1910）。

奥利佛·圣约翰·戈加蒂（1878—1957），医生，才子，参议员及诗人。

给 AE，他希望我赞扬他的一些诗人，我自己的模仿者。

你对我说我时常开口扬声。

称赞别人曾说及或歌唱的事物

倘若我称赞这些人我会交上朋友，

但告诉我狼狗可会称赞它们的蚤子。

或

你对我说我时常开口扬声

称赞另一个人曾说及或歌唱的事物

倘若我称赞这些人我会交上朋友：

但告诉我狼狗可会称赞它们的蚤子。

你说既然我时常开口扬声

赞扬另一个曾说及或歌唱的事物

对这些人如此行事可谓明智：

我会遵命

但哪儿见过狼狗称赞他的蚤子。

171

[1909年]4月27日。邓萨尼城堡。斯蒂芬斯根本未应答格里高利夫人的信，尽管她在其中说她辽留在都柏林，对她自己和别人都很不方便。我们现在已决定（由诺雷斯·康奈尔提议，他刚读过剧本）再没有时间把《戴德莉》在伦敦上演了，并将此写信告知了斯蒂芬斯。这是个巨大的损失。奥内尔小姐认为斯蒂芬斯这样表现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想要辛格的作品来赚钱。我提出力这个家族无偿担任编辑等等可能引起了他的怀疑。我第一天看见斯蒂芬斯就这么做了。但即使这也不是他傲慢无礼的理由。这个人已经，似乎正是如此，化友为敌。

172

格里高利夫人，为了仔细阅读手稿——她仍期望收到斯蒂芬斯的信——让她的孙儿离开她去盖尔维，在星期一她收到一份关于这个孩子的电报令她非常担忧，并且因没有和孩子在一起而焦急担忧得病了。奇怪的是辛格，她为他做过那么多事，并且如他所知受过那么多苦，竟会让她处于这个代理人的耽搁和侮辱之下。辛格总是太沉湎于自己而不会对别人想得很多。

“致一位诗人，他想请我称赞坏诗人，他的和我的模仿者。”《诗集》，第105页。AE告诉奥利佛·爱德华兹说叶芝头脑中想的是詹姆斯·斯蒂芬斯和帕德莱克·科伦姆。事实上，叶芝后来对两者的评价要高得多。

这第三个变体系用铅笔写下。阿兰·威德在日记此处夹进了一个活页，用铅笔写了如下备注：“W.B.叶芝在斯洛恩广场的女王餐厅午餐时向我朗读了这首诗，我想是在1909年的夏天。最后一行当时是：‘但告诉我——野狗可会称赞他的蚤子。’”

弥斯公司。

去卢塞尔的星期日晚会——每个人都不是太高就是太矮，不是佝偻就是一边高一边低。一个女人有着女人身上可怕的东西，一个兴奋的嗓子，和一种缺乏自制的智慧，有一个脖子肿大的坏诗人。有一个相貌像林地农夫的人，一遍遍把谈话引回到辛格的错误，即在《花花公子》中使一个姑娘崇拜一个摧残“母山羊”的人。别的他什么也不反对只除了这一件事。他宣布阻止英国佬交出地方自治的正是他们因农民骚动时时牲畜的伤害而认为“爱尔兰残忍”。爱尔兰人准都不应该写哪怕一句后来帮助他们。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这个人的一个幻像，他曾在印度，我想。年复一年地与一队无尽的二等兵争论这一个题目。最后我说，“当一个国家造就了一个天才时他决不是它想要或相信它想要的，他永远不像它对它本身的观念。在18世纪苏格兰相信它十分虔诚，十分道德而又十分阴郁，而它的民族诗人彭斯出现了，却不谈论这些事物，而是谈论欲望、宴饮和沉醉的欢乐，爱尔兰自从年轻的爱尔兰人起就将自己交给了辩证术。每一个生活的印象或想象的冲动，都被审视以确定它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爱尔兰的光荣或爱尔兰的政治要求。渐渐地真诚的生活印象变得不可能了；一切都是人工的辩证术。再没有一种不偏不倚的想象，只因为赎物天生激动人心就以之为乐。辛格是被埋葬的火的突进，一切被否定被拒绝者的一场爆发，一种狂怒的公平，一种冷漠的汹涌悲伤，就像彭斯，他的作品是要说人民并不希望说过的一切。他能够这样做因为天性令他对政治观念无能为力。”那个林地农夫没有回答，他并不理解我，我敢说，但这一晚余下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把同一件事说了又说，他什么也不反对，除了那有关“母山羊”的一段。

我昨天告诉格雷戈里夫人我要来时，她说，“我很高兴，因为你需要在正常而单纯、有良好教养的人们中间过几天？一个人总是不时地需要这个作为头脑的休息。他们不必聪明。这正是我要去拉亚德夫人家的原因之一。”（她过几天要去威尼斯，）

邓萨尼爵士刚向我描述了他的工作方式。他写作第一本书时，他口授因为他写得不够快，而想法很可能在被写下之前就消失了。他会以一个十分纤小的想法开始，而其余的会在他写时源源而来。都是幻像，显然，但现在他用手

在页末叶芝写道：“不，一个杰出的诗人；我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好作品。”

佩吉恩对肖恩·基奥夫说，在《花花公子》的第一幕中：“如今你在何处能遇见像达宁·苏利文那样的人，他被一把刨刀击中了眼睛，或是马库斯·奎恩，上帝让他安息吧，因残害母羊而被判六个月徒刑。”

“……爱尔兰人谁都不应该写一句话来让他们[英国佬]继续作此想”《自传》，第520页。

艾尼德·拉亚德，亨利·拉亚德爵士的妻子。

写了。（我很累。我仍未适于大量工作，明显之极。）

176

[1909年]4月29日。我听得不够。我原想多多写下邓萨尼的思想，而尽管他说了很多我思想中仍未得到它，不仅是我说话，因为如果我在一间屋子里默然不语我仍旧没有真正倾听。一个词暗示了什么东西，于是我随想下去。我总像一个孩子在角落里玩着砖头。

177

今天我要在艺术俱乐部读一段关于“当代抒情诗”的话。我要从韵人俱乐部的书籍中选一些读——普拉尔、约翰生、道森——之后是来自斯图尔吉·摩尔的引文，并解释，在斯温朋-罗塞蒂-莫利斯运动的丰富之后，我们怎样不去寻求丰富或活力，而是形式的精确，我们是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并拥有更多的激情，因为有比第一次——布里奇斯、多布森、兰恩的浪潮——更多的信心，我们寻求新的题材，而我们许多人是过着激情洋溢的生活的人，表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先驱者更富沉思。更为宁静。当今的运动不是行情的。

178

[1909年]7月8日。我在两夜前梦见了这些思想：如果人们虐待我们的缪斯我们为什么要抱怨，既然他们在海伦仍活着时给予她的一切只是一支歌和一个玩笑？

179

[1909年]8月7日。很长时间没有写笔记了。是害怕在我必须创作的一个时候给我的头脑一种批评的癖性。

180

[1909年]8月7日。诗的主题。“动摇之房”。世界将如何获取，倘若这幢房子颓败，即使有一百幢小房子更胜于它，因为这里权力[曾经]前进或是徘徊，释放出能量，精确；它曾给一个遥远的人民慈善的统治，而仍在它的屋檐下，活的智慧因它来自远方的后裔的陈旧记忆而变得甘甜？世界将怎样变得更好，倘若欧鹤的巢兴旺而鹰的房子却已崩溃？

在一封致弗洛伦斯·法尔（1909年3月？）的信中叶芝谈到了最近的一场神经衰弱。

维克托·普拉尔（1863—1929），皇家外科学院图书馆员。

叶芝在此处停止为条目编号。

他正在写作《怜人女王》。

柯尔公园·叶芝正在那里消夏。

威廉·格雷戈里爵士（1817—1892），格雷戈里夫人的丈夫，曾是塞伦的州长。

此条及下一条参见诗歌《关于一幢被土地之乱动摇的房子》，《诗集》，第106—107页。

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自己完全不慎重。一会儿是那种陌生的，令人陶醉的事，亲切的感觉；一会儿是无节制的喜剧感控制了我；在每种情况下我都忘记了一切谨慎。这以及我的懒散是我所有的最可耻的错误；对于懒散我有纪律以逐渐克服它，但对于另一个，却什么也没有。我不能对谁说，”都告诉我吧，因为由于我的不慎重我需要一种大秘密的纪律，而旧的秘密已经不够新，再也不足以激发想象了。”当它们崭新之时它们都有其危险的时候，我自己的通过同情，而别人的则通过我的喜剧感。我想是表达的激情大大减弱是保持沉默的力量，而构成了实际生活最有活力部分的上是人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一个人所说的可能无辜的，除了它的不慎重：而另一个人的恶意会滥用它，正像我告诉兰恩卢塞尔不会做画作的选家，因为当他喜欢一个人时就会过分高估他的天才，这话传到卢塞尔耳中就成了我在指责他的工作。

183

[1909年]8月17日，去过了都柏林——见过奎恩并把一切挑明。我对他在巴黎的一位朋友的种种下慎言辞已成为一个谎言建筑的基础。如通常那样（通过在第一幢房子里以一个信号被所影响以及作出自我怀疑），我接受了针对我的最坏的情况，并在十分钟内做出了数十年的悔悟。奎恩处于一个坏女人和一个好女人之间，那坏女人无法管住她天性中的一切，更无法管住她的想象和言词。

注。必须查一下诞生前的凌日看看是什么使星期一、星期六和星期五如此充满了。8月11日有它诞生前的凌日。初步，以及临近的狂暴的方面，但这影响在一个特殊时刻因某种原因爆发了，当然恒星可能拥有秘密并保存它；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与城堡的争吵看上去像和和为下一个十月的混乱而跳的魔鬼舞蹈，还有革命性形象的方面，会使以后几天也变得混乱，但现在我不相信那革命性的形象——对我来说它似乎甚至比莉莉用它作出的进步更为奇异。

不必寻求更多的解释。诞生后，整个月份实际上是固定。

184

W.叶芝的剧争则更其痛苦。奎恩与叶芝因多洛两·寇特斯而唇枪舌剑，大吵大嚷以至不欢而散，奎恩认为叶芝一直在随便而恶意地说他与她之间关系的闲话，并且他指责叶芝企图抢夺他的女友。”奎恩（1870—1924），美国律师及艺术收藏家。

即假公济私。

通过月亮被火星影响（月亮在第一幢房子并在一个王星信号中）。

“必须查一下诞生前的凌日看看是什么使星期一，星期六和星期五如此充满了火星。8月11日有它的诞生后凌日。月亮 quimcunx 火星初级，以及临近的狂暴的火星方面……与城堡的争吵年上去橡太阳和火星月亮为下一个十月的混乱而跳的魔鬼舞蹈……不必寻求更多的解释。火星，诞生后，整个月份实际上是固定的，与前进的月亮相对。”（“与城堡的争吵”指的是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与都柏林城堡，爱尔兰英国政府的中心，正在进行的争吵，有关阿贝上演萧的《揭露布兰科·波斯奈特》，它最终于1909年8月25日上演。十月的混乱是占星学的：叶芝的星图显示一种互相争吵的地位配置，连接着的月亮与水星越过他前进的火星。威廉·莉莉是《基督教占星学，在三卷中略为述及》（伦敦，1659年第二版）的作者，叶芝应已写下“革命性形象”及“前进”。）

[1909年]8月27日。在《塞姆海恩》上写点关于对观念的爱与对国家的爱的联合。有这个没有那个很容易，仇恨这个为那个服务也很容易，但如果它们结合起来人们就到了一个伟大时代。《塞姆海恩》还应摘引专利法的精粹表明萧的戏剧正是从中而来的。它也应坚持免于受检查并引用劳伦斯论爱尔兰检查制度的文章的基础。与观念至为有关的，也许是8月27日星期五《辛恩·费因》上的文章。“伦敦怪物”是它对萧的戏剧的描述。

185

[1909年]9月。主题：抱怨困难事物的蛊惑，它败坏自发性乐趣，它也浪费时间。把行末“difficult(困难)”重复三遍，并以bolt(门闩)、exult(狂喜)、colt(雄驹)、jolt(颠簸)押韵。可以这样想，带有野性的翼翅而未驯服的雄驹必须出于骄傲拉一车石头因为它是困难的，并结束于否定戏剧、帐户、公共竞赛——一切仅仅是困难。

186

[1909年]9月8日。对于工作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早上。霍尼曼的信耗尽了我的情感力量。结果是我能够做的小小的好工作已令我的头脑晕眩。上个春天的激动。

187

[1909年]9月16日。头脑不太舒服。两天前格雷戈里夫人在他们谈起她的孙儿1921年要去哈洛时，说道，“到那时他的祖母会在哪儿呢？”我想起这幢房子，慢慢完善着自己和其中的生活，在总是不断加剧的劳作紧张之中，继而想起它很可能正在沉沦，通过彬彬有礼的无能，或不如说是纯粹的意志薄弱。因为能力在年轻的格雷戈里身上并未失效。而我对自已说，“为什么生活是对某种绝不发生之事的持久准备？”即使一个俄底修斯似乎也只是

1909年的《塞姆海恩》数期均已不存。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就萧的戏剧所作的一份声明发表于《箭报》第5期，1909年8月25日上，根据1905年专利法可由阿贝上演的那几类戏剧中的一种，是“由爱尔兰作家所写或有关爱尔兰主题的戏剧”。

W.J.劳伦斯、《爱尔兰检查制度：其历史的叙述》，《自由人杂志》，1909年8月24日。劳伦斯关于萧的戏剧的评论发表于《舞台》，1909年7月2日。

《辛恩·费因》(日报版)1909年8月26日号赞扬了萧的戏剧(“一出道德戏剧”)和它在阿贝的演出，但8月27日号却登了一长栏“萧的戏剧”，刊载：Feargan Ainm”(即无名氏)的观点，包括以下内容：“有一个突出事实对我来说直很清楚。我们现在还不希望在爱尔兰有这种戏剧。我们对它还没有准备，我尽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永远对它没有准备那会是事物的一个快乐的情形。让萧先生继续诓骗英国观众吧、他们没有橡信念那样不方便的東西。叶芝先生在阿贝将此剧上演创造了一场轰动。但他由此并没有为走向这个国家里缓慢成长的一种民族戏剧的运动做出任何贡献。他给了我们一种伦敦怪物的趣味。如此而已。”“对困难事物的强烈爱好”《诗集》，第104页。参见第209页。

“……压在我自身生活的天平上的一切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是对某种绝不发生之事的一种准备”，《自传》，

准备；再想想废墟之备受尊敬吧。那不总是伟人和强者的悲剧吗，他们在结局之前看到了渺小与懦弱者，在友谊或在仇恨之中，将他们推出自己的位置，毁灭他们建成的事物，仅仅在头脑的轻率中做出这个或那个？

188

[1909年]9月16日。

一位比雷尔

他认为他是那些律法的主宰

它们令他的灵魂成为仅仅一只寄生虫 / 仅仅成为一个空虚的

灵魂因为

他被养育成为那戏法的主宰

它将一只活生生的跳蚤变成了一只扁虱。

昨晚在晚餐时尝试将罗伯特·格雷戈里的一个笑话变成韵文，但太野了不可能很好。我描述了与比雷尔的一段很久前的对话。

对于某个中年官员

或

在别人思想的一场兴旺的模仿中

他考虑矫正他的世界 / 将一切事物处理得

正确

再也不做寄生虫

既然他已是那戏法的主人

它将一只跳蚤变迟了扁虱。

本身不值得发表，会显得仅仅是政党政治而已，但可能在白菜的陈旧笔记中最后出现，名字缺失。“年轻时曾是个活跃的话匣子的内阁大臣”足够用来形容了。

189

第 106 页。参见斯蒂芬·麦克凯纳《日记与书信》，E·R·多兹编（伦敦、康斯太勃，1936）第 193 条及后一段，第 112 页：“从没有。我想，一个人天生，比起我。更是个侍者：我就像围在佩纳洛普身边的希腊王子们。一个十年求婚者：我总是在头脑中等待着某个从不敲响的铃敲响，等待某个从不发生的奇异事物发生。”

此处字句不清。

叶芝在此处用铅笔加上：“诗的韵脚：preparticon（准备）、generation（世代）、station（车站）。”未见此诗留存。

参见第 20，21 条。

威廉·F·白菜（1857—191），爱尔兰土地委员，旅行家和寻欢作乐者。他在者柏林厄尔斯巷 3 号的公寓是艺术家和政治家的一个聚会之地。

一年前写的诗 的修改稿：

我荡漾在俗丽的船尾
一把舵桨的粗端
而我能转向的每一处
人们在岸上奔跑

尽管我已让众人肃静
没有一个人母之子不在说
“那尸衣中的人形是什么
在一张俗丽的床上。”

而游鱼在边缘吐着泡
在下面为那东西喊叫
它有如此一种羔羊的尊严
以死亡的甜蜜之名。

尽管我把手指竖在唇间
除了歌唱我还能怎样？
而鱼群和众人 and 俗丽的船
整夜不停地在喊叫；

在闪烁的海中央喊叫
带着迷狂的气喘叫它的名字
因为它有如此的尊严
以死亡的甜蜜之名。

190

[1909年]9月20日。

为《伶人女王》第三幕记下的想法

爱的英雄主义是要感觉、惊悸然而坚持；要去做一个人知道是必须的事，即使貌似冷酷，貌似一个敌人，而同时总在燃烧。或，轻薄的情人们很容易在恋爱中聪明。他们戴着他们的面具而毫不痛苦；他们不必将自己一分为二。这对嫉妒的伶人女王会显得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微妙感觉。她将有权利如此谈论，而不是英雄。

半行：“痛切轻如鸿毛之物的血亲。”

191

“他的梦”，最初发表于《民族》，1908年7月11日，加有如下注释：“几天前我梦见我骂着一艘十分欢乐而精美的船行在某条狭窄的河水上，两岸有许多人，在船中央一张床上有一个人形。人们指点看那人形并发问，在我的梦里我唱出诗句，我醒来后就消失了，只留下这片断的思想，‘我们召唤它，它有如此种羔羊的尊严，以死亡的甜蜜之名。’我从我的梦和我梦的情感作出我的诗，差不多能够说，像布莱克曾说的那样，‘作者处于永恒之中’。”《诗集》，第99页。

[1909年]9月20日。一个闲散的男人没有思想。一个男人的工作通过他思考；另一方面，一个女人得到她的思想是通过一个男子的影响。男人对于他的工作是女人，它赋予他的思想以生命。

192

老剧作者采用老的主题、甚至也不尝试以任何很新的方式安排寓言。他们沉湎于表达，就是以最接近和精致的话来说。新的剧作者发明他们的主题并厌恶在安排寓言中有任何习惯性的东西，但他们的表达普通得就像他们最初学习写作的报纸一样。

193

[1909年]9月22日。我在第三幕的开场，那里会出现那象征性的饮酒，难道就得不到那思想了吗，即生活，除了迷狂之外，是为了决不发生之事的一场永久的准备？

194

[1909年]10月。在星期六晚上看了《哈姆莱特》，除了主要的“奥菲莉亚”那几场；错过了这些，因为我必须出去到阿贝一会儿，没什么遗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的哀惋，在[被]上演时，总是没法打动我。我回来继续看哈姆莱特在墓地，那里我的愉悦又开始了。我感到在《哈姆莱特》里，就像总在莎士比亚中那样，我是面对着一个灵魂，他徘徊在被风暴吹打的圣洁之门槛上。那门槛难道不总是可怕的，甚至罪恶萦回的吗？当然莎士比亚，在最后那些似乎是闲散的年月里，决非平静的乡村绅士，享受着，如道登之类人所想的那样，一种不值得的辛劳的暂时性报偿。也许他最终在它本身之内，而不是在它激情洋溢的阴影里寻找智慧。可能他跨过了门槛，然而却是为了在琼生的一次宴饮。当然人们常在他作品的此处或彼处发现——不是在《亨利四世》的结尾吗，比如——对因智慧而甜蜜的乡村闲居的赞美。

在我把工作填满生活的持久努力中我是否也许正在背离自然？我的心灵是否像在闲暇日子里一样丰富？诗人的劳作是否也许只是一场舍弃？倘若他寻求纯粹——免除他生活的一切只留下诗歌——灵感难道不会降临？人靠辛劳能否接近上帝？他将自己交给了心中的纯粹。他一无所求，除了专注。

195

“它然而可能是原创性的”被删去。

“意志”被删去。

参见第187条。

马丁哈维在都柏林皇家剧院上演的《哈姆莱特》，在1909年10月23日星期

爱德华·道登（1843—1913），都柏林三一学院英语文学教授：《沙士比亚，其心灵与艺术》及其他研究的作者。

[1909年]10月27日。我一直在寻找某种16世纪的威尼斯式服装，如《面具》中所绘的那样——全都异想天开；身体形状被隐藏或伪装起来；女人穿长紧身胸衣，男人穿塞得满满的紧身衣。生活变得如此闲散而庄重，以至男人和女人们穿衣时毫无身体活动之想。他们不再有多少劳作了。人们感到，倘若他们仍旧战斗和狩猎，他们的想象不会在这些事物上。同样的事不也发生在我们的情感上吗，当我们变得爱好深思，并从而将它们从实际用途中解放出来？它们同样变得奇异绝伦并创造出了诗人与艺术家的奇怪生活。

196

星期六，[1909年]10月30日。昨晚我计划请列奥纳德·斯威特，在他的学校结束时，负责阿贝一段时间。格雷戈里夫人想要一位爱尔兰人。我回到家在床上写下这首诗：

爱尔兰人，倘若他们偏爱
爱尔兰人胜于外国佬
而那外国佬正有
他们最需要的头脑伎俩
为他们的所有痛苦放大
爱尔兰的胃而非她的头脑

197

[1909年]11月9日。

1. 爱的一个理想：怀着一切欲望去爱而仍像一个经历过欲望的老人一样温柔。

2. 有一天凯里甘对我说，他读《戴德莉》里的几行，开头是，“那里站着永生者，老李尔和安古斯”等等，这时他感到它们对于角色来说太长或太沉思性了。他说“那里站着永生者由此来警告我们。”我必须改变奈西对信使说话的场景，使它更为诗意。我可以把挑战重写成这样：

在这里无人能在我们之间除了我们的剑
因为我找不到真理，在任何

戈登·格莱格的杂志。

格雷戈里夫人在《我们的爱尔兰戏剧》（纽约，普特南，1913）第93页中部分摘引了叶芝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封信。像辛格一样，格雷戈里夫人反对在阿贝任命任何英国舞台指挥。叶芝写信给她：“我想我们应当接受温德莱涅的推荐，除非我们有某种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如果这个人不是爱尔兰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如果选择是在于填饱我们民族的胃，还是通过输入精确的知识扩大它的头脑，我主张在当前暂且蔑视它的胃口……我本该说我告诉温德莱涅好脾气是至关重要的，而他说他推荐的那个人是位素食者，而萧伯纳说蔬菜对控制脾气极好。”J. E. 温德莱涅（1868—1930）在伦敦萨佛伊剧院与哈莱·格兰维尔·巴克一同任经理。1907—1908年，此后往黑马凯特皇家剧院。列奥纳德·斯威特未受任命。1910年勒诺克斯·罗宾森被任命为经理和制作

不是铁铸的舌头上。

信使

我是孔楚巴的人

不接受口信除非是他吩咐我。

198

昨晚，艰迟走回家，在经过运河桥时我感到一种欲望，要把一枚我珍视胜于我所有的任何事物的戒指扔进运河，就因为是她给我的。它出现了一两刻，但几乎就像我在圣马力诺时感到要把自己扔下悬崖的欲望一样强。有一回在我与一个亲爱的朋友散步在一座树林里时，手里提着一柄斧头，那冲动有一刻采取了一种凶杀的形式，它在我抓着斧头而非斧柄的一刻消失了。我父亲说当他在一辆公共汽车顶上，而有另一辆经过时，他想从一辆跳到另一辆上。在每一个心灵里是否都有暴烈的疯狂，等待着某次纽带的崩断？

199

[1909年]11月9日。我想重写《箭》，这第二节：

高大而高贵但有着脸和胸
色彩精美如苹果花

200

1909年12月7日。

让它变成无论什么只不要仅仅成为声音
那非王思思想道，他之后成了王
因为他没有听见任何
以一个词权衡并不仅是噪声的声音
然而古老的罗曼史善良得终让他获胜
不知在何处不知用何法，以至我忘却了
他有的只是火炮。而我们以为
清清楚楚甜蜜地点亮了一个故事
却败于你所发出的誓言
发自很久以前瞬间的愤怒中
而我没有你的信仰我如何知道
在那远过坟墓的眩人的光里
我们会发现一事物，如我们所失般的美好——
那不断的善良，日子的平常言谈
人人之间习惯性的内容

1910年1月6日。好几天重感冒，乱梦不断。星期一醒来，凌晨梦见我在都柏林而想去英格兰，但乘的是艘三层桨战船。我向一群人，阿贝的成员们，提议乘这艘战船，有一些时髦的年轻人站在桌子的另一端。我看见时髦的人们互相耳语并微笑。他们不使用我能听见的争论，但否决了这个提议。我想他们是在互相歪曲讲述我的动机。提议不得不放弃了，而我这么做毫无悔意令自己吃惊，但是说道，“人有一千个主意只有一两个得到实行，然而我是对的；人无法理解《奥德赛》，如果他没有乘过一艘三层桨战船航行的话。”它不是阿贝需要资本的一个信号吗？

星期二早晨我梦见我醒在一张床上，某人或某事告诉我要帮助两个人，我也知道名字——女人的名字。我要祈祷以能够帮助，于是我跪在床上——由一张无形的手扶起来。我在祈祷时看见那两人的身形，一个是成年的女人，但消失了，接着是一个孩子[的]身形，接着我梦见我入睡了，在我的睡眠中我的灵魂或阴影走进某个遥远的村落，在那里它或是我站在许多村童中间。我要帮助的那个孩子在哭，我知道我要教它祈祷。那孩子看到我和其他人，但我似乎对于他们并不陌生。当我开始教它一段祷文时，我通过孩子们的评论知道那祷文对于他们是不寻常的。我停下，因为我想到，“如果我教这个孩子一段不寻常的祷文它会受到迫害。”我听任自己被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仿佛我在犹豫或是言语迟钝。我发现那个村庄，东方某一处的人，我想，是向埃利胡或埃利雅祈祷的。我教完了祷文后，我随那孩子漫游到一座花园，安慰它，但即刻我就凭它迷醉的脸知道它此刻已经知道我不是像它一样有肉身的人。我理解我正在消失。它说，“你不会再来了吗？”我说，“如果你非常需要，你可以呼唤我，但我不一定能来。你的言词不会传到我这里，除非我那时睡着了。”这时看到她并不理解。我说，“我是个幽灵。我只在某些时候才允许前来，”这样她才理解了。少顷我看见一个男子跑过花园的小径。他来找那孩子，我迈步上前，作出最后努力举起手臂，因为我正在消失，来使我自己能被看见。我看见他恐惧地停下又跑掉了。一会儿之后我醒了过来。

在星期日或星期一的晚上我梦见我看见 PIAL 的墓碑，但陈旧而覆满了青苔。我读不出日期或年代。我想有一个 3，之前有一个 6 或 4，我想，但当我试图去读时，我开始醒了。

《王与非王》，《诗集》，第 102—103 页。此诗有关比尤蒙特与弗莱彻的同名戏剧，其中阿巴塞斯王爱上了他的妹妹潘茜。在第二幕第一场中他力辩他受不了“兄”与“妹”的名目了。自认为压倒了反对他的势力，他暴怒地说：“让他们做随便什么，只要不仅仅成为声音。”故事情节很和善：阿巴塞斯后被发现是领养的孩子而非国王，因此他可以娶潘茜并成为国王。“你发出的誓言”可能指的是“初稿”中的轶事，第 134 页。“你的信念”：毛特·岗于 1897 年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叶芝 1 月 3 日星期一在活伯恩大厦。

叶芝致他父亲，1909 年 10 月 10 日：“我们正努力取得足够的资本来买通霍尼曼小姐，并且继续到 1910 年以后。”《书信》（威德），第 535 页。

12月10日。又一个怪梦。一艘缓慢开行的驳船，一艘蒸汽驳船，和一辆公共汽车并排行驶着。驳船由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和一位姑娘指挥。公共汽车司机正指责他们偷了四个紫水晶中的两个。他们激动地抗辩着。“太可怕了；全完蛋了，”等等。司机一口咬定。少顷我看见那两个年轻人，我知道他们是两个情人，单独在一片类似荒漠的地方。他们在用一种狂野的爱尔兰方式悲叹他们的命运，赞颂他们的生命与他们的关系。有一刻我以为他们被抬起在两个十字架上。那女人的言词我记得最清楚。在狂野地悲叹一番后她抱怨那年轻人没有像她那样好的权利来悲叹，或是因为这个他悲叹得不够，我忘了是哪一个。“从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有如此的关系，绝不会有任何人有如此的死亡，如此巨大的船舶失事。”（我不认为他们的死亡和船难是立刻发生的。他们似乎更是在悲叹这种指责会使他们与他们所关怀的爱和生活相分离——那高贵、美丽的生活，如在我看来的那样。）我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说，“波美拉尼亚，”我想；某个模糊的，野蛮的地方。那日个梦如此真切，以至我醒来一会儿后我还责备自己没有出钱来帮助他们偿还赃物，而继续在头脑中检查我的事务来搞情我本来能够付出的东西。在我醒着躺在床上时他们与十字架上的窃贼的某种联系萦绕在我的脑际。

12月15日。《悲哀的戴德莉》。我很担心这出戏，而在星期四格雷戈里夫人和我都感到了我们疑虑与恐惧的压力。它会不会显得仅仅是支离破碎的独白？第二幕是不是易于领悟？观众似乎喜欢它，而在最后一幕某些段落深深打动了。我想在坟墓边的争吵，它最后的那句，“很可惜我们要错过坟墓的安全，而我们正踩着它的边缘，”以及戴德莉对争吵的帝王们说，“与傻瓜们的争吵一同再走远些”是像任何人曾经写过的一样高贵而深邃的戏剧。在第一夜想到这是辛格对死亡，他自己的死亡的幻想，就使一切都痛切之极。“坟墓的肮脏”，“死亡是一件邈远的亨，尽管死去的是一位女王，”以及类似的，在我眼前呈现出垂死的他。我记得他在最后几周内极端的仁厚，那种正驱除敌对竞争与雄心壮志的气氛。昨晚观众很少——仅仅在10英镑以下——也没有第一晚的活跃。没有人对我说起重要的事。有人认为最后的争吵过于激烈了，有人则挑出那些给他的话语增添味道的粗俗的农民词语，说是“当然根本没给对话增添什么，而且十分丑陋”。还有人反对戏剧服装中那些小东西，它们意在回应这些词语，用朴素的或属于田间的事物来改变堂皇的习俗，或使人相信这些人真是猎人。没有人理解了任何东西。当时在我观看表演时我看见奥多诺万和奥内尔小姐也像其他人一样地不动感情。奥内尔小姐有个人魅力、哀惋，甚至卓越，想象、美丽，但从没有感情——从没有强度；从一个沉思的头脑中什么也没有产生。一切都只是观察、好奇、取

显然是1910年1月10日之误。

1910年1月15日之误。《悲哀的戴德莉》最初于1910年1月13日在阿贝上演。

“(初演)”，《自传》，第523页。

弗雷德·奥多诺万，饰演奈西。

悦的欲望。她的脚从不触及那永不改变的石头，生命那一侧的秘密之所；她的天才展现自己，像所有其他人的一样，好社交、摩登，一种喜剧才能。她拥有哀惋，通过一位喜剧演员能够达到的最接近悲剧的性质，因为那意识到了我们的在场并会赢得我们的怜悯。她没有激情，因为那眼光超越人类而不求怜悯，甚至无求于上帝。它认识，证实，达到，蔑视，统治，并在它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时最为强有力。

204

12月16日。昨晚奥内尔小姐把她的表演提高了这么多，以至我开始想到她可能确有某种真正的悲剧力量。我仍在巨大魅力与卓越中发现力量之缺乏，那不确定的摇摆的灵感，也许更是来自于建构的缺乏，由于思考或经验的缺乏，而非情感本身的缺乏。有些段落她什么也没有做，或在她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外部喜剧冲动的地方，我现在想到，更是因为这些是习惯性的，而非因为她无法从自身之内创造出情感。主要的失败是在结尾。她在奈西死后没有显示出对所发生之事的足够感觉，足够的正常绝望来显示一种逐渐的发展，进入最后发言的狂野而非尘世的感情，尽管这些最后的发言本身是说得十分精彩的。那些出现在人们想要惊慌，愤怒，或另外某种悲剧情绪的地方的小小的外部动作主要是在第一幕与欧文的那一场里。我星期五的不佳印象可能部分是来自观众，人很多而且，我想，厌烦，昨天的观众——正厅后座几乎全满——热情而感动，再一次将我对戏剧和运动的希望激起到极端的高度。

205

12月16日。我本应注意到我在12和13日曾经“土星背对着激进的火星”，并对剧院的一些麻烦感到了很大的阴郁怒气。S·奥古德迟到而不道歉，格雷戈里夫人对她在戏里的工作厌烦，萨莉是主要的麻烦。我也应该注意到戴德莉在第二幕的金袍使她看上去瘦削而苍白。如果她下次再穿它，她应该把妆化得更红润一些。

206

[1910年]1月17日。几夜之前我在半梦或全梦中得到一种新的诗歌思想。我会写一首我已想了很久的诗，有关一个离开了克莱格里的奥伊宾而在克隆塔夫死去，并将人们有时对于爱尔兰的全部痛苦感情注入其中的人。仙国的生活将是我的抒情诗生活。我想到以同样方式处理库楚兰和凡德，通过 Maeve

显然是1910年1月16日。梅尔·奥内尔饰演戴德莉。

1910年1月16日。

Mars in opposition to Saturn radical。

萨拉·奥古德。

在此条中1月应作2月。

杜布兰·乌阿·阿塔凯恩，尽管受克莱格·里亚斯的奥伊宾的哀求，仍前去战斗并在克隆塔夫战役中死在慕尔卡德身边；许多与此故役有关的爱尔兰传说

cause 作出某种预见从他魔幻的睡眠中唤醒他的需要。

1月11日或前一天或后一天会带来某种麻烦，某种争吵。是《哈姆莱特》和《花花公子》的一个坏日子，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不会很糟。（不，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很忙，但没有争吵。）

在诗中如我的梦计划的那样，奥伊宾要悲叹山上被弃的舞蹈。这种情形曾像一个负担般出现，至少是好几次。

207

[1910年]3月7日。重写了

哦谁也不曾爱过除了你和我
因为在那里牡鹿和牡鹿的夫人号叫。
哦快去水边的树林里
那纤弱迈步的牡鹿和他的夫人叹息
当他们唯有观看自己的形象
谁也不曾爱过除了你和我
哦快去那零乱的树林因为那里
我会把那些爱人们全都呼喊出来并且号叫。

208

[1910年]3月13日。康格列弗对“幽默”的定义：做任何事的一种独特而不可避免的风格，为一个人所特有，他的言行以此与所有其他人相区别。“激情在那一性中太强大了，使得幽默无法进行。”追溯丰富的英国幽默到粗鄙的感觉和失礼。把幽默与“习惯”和“做作”区别开来，它们是从外部获得印象的，并且作为一种模仿延续。谐趣与幽默不同，是其表达的一部分。

209

[1910年]3月。

困难事物的迷恋
已经汲干了我血脉中的精气并将
自发的欢乐与自然的满足
撕离了我的心。有什么东西令我们的雄驹得病
它必须，仿佛它并无神圣的血液

《绿色哈姆莱特》1910年2月10日初演于阿贝，作为《花花公子》的开台戏。

字句不清。

“零乱的树林”第一稿曾不带诗题发表于《红汉拉汉的故事》（顿艾默出版社，1904）。《诗集》，第92页。

这在康格列弗中更为清晰。幽默是“做或说任何事的一种独特而不可避免的风格，仅为一个人所特有并出于自然；他的言行以此区别于其他人的言行……但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对我理解为女人中的真幽默有任何观察。也许激情在那一性中太过强大，使得幽默无法进行……”《文集》，蒙太格·索默斯编（伦敦。南索奇出版社，1923），第卷，第165—166页。

也不曾在奥林匹斯山上跳跃在云端之间
在鞭挞下悸动，奋力又流汗又摇摆
仿佛它拉着铺路的碎石。我的诅咒，对于
必须以五十种方式建立的戏剧
对于这一日与每一个骗子和傻瓜的战争
对于这一日的书信 / 剧院事务 / 在书信往来，
人事管理。

我发誓在黎明再次降临前
我要找到马厩，抽出门闩。

生活是对从未发生之事的回忆和对决不会发生之事的希望。

对于
安排着这个 / 那个，喊出那调子
我今夜发誓，除非没有月亮
要找到、等等。

或

安排着那个，并将这纠正
我发誓除非今晚没有月亮
要找到马厩，抽出门闩。

210

当亚当为野兽命名时，有一只野兽他忘了命名，或者是，把它误认为某匹普通的马，命名错误；于是当时光流逝人对有生命和运动之物具备了许多知识，但对这种他们不知名的造物他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无法指称它，看到过它也无法互相告知。那种造物允许我们称它为飞马，但它不回应它或任何名字。

211

[1910年]4月5日。论对《花花公子》之攻击

Once, when midnight smote the air
Eunuchs ran through Hell and met
Round about Hell's gate to stare
At great Juan riding by
And like these to rail and sweat
Maddened at his sinewy thigh.

以前，当午夜重击空气
太监们跑过地狱聚集

在地狱的大门周围注视
伟大的胡安驰过
而像这些要挑剔和出汗的人
为他壮健的腿股发疯。

“ 亚当的诅咒 ” 的修改 ，

for whose mild sake
Many a man shall find out all heartbreak
In findint out that it can murmur so.
or
Many a man shall light upon heartbreak
In finding out that it can murmur so.

为了他的温和缘故
许多人要发现全部的心碎
在发现它能如此低语之时。

或
许多人要点亮心碎
在发现它能如此低语之时。

在我的 “ 命令我的心它不要畏惧 ” 里把 “ 骄傲 ” 改成 “ 寂寞 ” 。

212

[1910 年]4 月 18 日。

倘若有谁走近
当我年轻时
我怀着仇恨与恐惧颤抖
我曾想 “ 他亲爱地搂着她 ”
因为他亲爱地搂着她
并怀着仇恨与恐惧颤抖
但是哦那绝对错了
倘若他能经过她身边
以漠然的目光

2

我就此写作和锻造
而如今头发已灰白因

3

《论那些仇恨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者》，《诗集》，第 124 页。参见第 76 条。
《诗集》，第 88—90 页。

为她有炽烈的血
当我年轻时；
而如此甜蜜地傲然阔步
仿佛走在云端
（一个被歌唱的女荷马）
生活与文学似乎
仅仅是一个英雄的梦。

213

[1910年]5月。科莱维尔，卡尔瓦多斯。

啊时间能够触及这一种形式
它能够显示荷马时代将什么
培养起来作为一个英雄的代价
“ 她的生活难道不就是风暴
画家们不会画出一种形式
有如此高贵的轮廓？”我说
如此一颗精美高昂的头颅
如此多的严肃与如此的魅力
直到他们激起我们的那种力量？
啊但是最终到来的和平
当时间触及了她的形式时到来

一首诗的主题。任何年轻男子致任何女人。

你说你对于我无足轻重
没有爱在我的心中
这难道是如此渺小，你的明眸
你欢笑的唇，你充满风趣的嘴，平息了
青春狂烈的头痛？

214

[1910年]5月11日。

哦心平静些吧因为
骗子和傻瓜都无法打破
不求他们喝彩的事物
为了一个女人的缘故
倘若工作显得足够
于是她将你的力量更新
一头狮子曾梦见的一个梦

“一个被歌唱的女荷马”，《诗集》，第100页。

Les Mouettes，科勒维尔、毛特·岗在诺曼底靠近卡尔瓦多斯的住宅。

直到旷野高声喊出
你俩之间的一个秘密
骄傲者与骄傲者之间的秘密
什么，你仍将得到他们的赞美？
但这里是更高傲的文本
她双眼的迷宫
为她自己的陌生所迷惑
她的梦想赋予的一切是如何
赢得了诽谤与负义
从一模一样的傻瓜与骗子那里
永远并且比这些更糟的错误
然而她，在她身边歌唱着
半狮，半孩在安宁之中。

215

[1910年]5月。Les Mouettes，科勒维尔，诺曼底，昨天下午，风雨交加，我们全留在室内——克莱太太、伊索尔特、毛特·岗；毛特·岗和我卷入了有关《辛恩·费因》和它对辛格的攻击，以及围绕着剧院第一次分裂的基本环境的古老争论。我注意到这场陈旧的争吵是她感觉强烈的一个分歧。我正为了这个原因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卷入其间，想要最后说服她，在这么久以后已不可能确定的是非之外，它是根本性的。我别无选择。我整个的运动，我作为一个文人的正直，也同样被卷入了。想着她，我就在想，在一种意义上像爱尔兰；有儿年在头脑中还是我青年时代和其他人的青年时代的浪漫政治的爱尔兰中最好事物的总和，我必须留心在重新创作有关辛格的散文时以一篇论述民族文学及其目的的声明来结束它。

我必须触及这些事物。一切出于一个有意识的政治目的而创作的文学长远来看都以创造一种不思考的服从习惯和一种不信任自发冲动的习惯来创造软弱。它以自由的名义造就出一个奴隶的民族，为了它自己或为了其个永恒的精神需要而创造的文学可以为政治家所用——据说是但丁联合了意大利——但它很少能有即刻的效用。（在她和[我]争论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实际的运动是从表达得足够长久以便成为普遍的情感之中创造出来的，但文学在于发现；它绝不能重复，是那种因为一个情感被发现为有效而重复它的企图使得一切地域性的政治文学——德国的民语文学，比如说——如此地肤浅。文学也是由赤裸裸的真理的幻像所激发的，但她打扮起自己然后才出门上路。这对真理的打扮是实践的[一个]必要幻像，诸如戴维斯的“经得起蒂派拉里的轻率冲锋的部队并不存在”。倘若这是真的就没有必要把它写下来。

但这一切仍仅仅是攻击。我必须描述，对于一个民族的活力，那种完全

“反对无价值的赞美”，《诗集》，第103—104页。

毛特·岗的一个表姐妹，她们共有科勒维尔宅。

叶芝正在写一篇散文，计划作为毛恩塞尔版的辛格作品集（1910）的序言。然而他在与主编乔治·罗伯茨的争论之后收回了它，参见第234条。叶芝坚持第四卷要包括一些仍有必要修订而不应收入一个确定版本的篇目。这篇散文后以《辛格与其时代的爱尔兰》为题单独发表（夸拉出版社，1911）。

自发情感的习惯和轻率投入未来的习惯，和那种来[自]情感发现之快乐的创造渴望的效果。这在像辛格作品这样的戏剧中意味着所表演的人们的一种基本权力感，因为一切戏剧人物在情感或诗意的劳动中都是创造者。与此相对照的是爱尔兰小说家们理想化的农民阶级的软弱。积极的恶的再现总是被人引以为乐，在强有力的时代；如此的恶，一种对人类的与神圣的律法的蔑视，是一种力量的形式。人人都靠它来学会服从，之后蔑视才能靠激情而被提升为智慧并成为智识的一部分。

我接着要继续解释罗伯特·彭斯和司各特的成果及其缺乏观念，他们对生活的外部与独特的观字，所创造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有那种独特性的桩份。一个民族只能在最深刻的思想中被创造，在它最深刻的头脑——造就了它的文学（而其造就为时很长）——之中，它们先是使自己成为根本的和深邃的，然后在艺术中实现自己。以此方式他们将他们[时代]的统治思想激起为民族的行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多见——靠的是他们朝向某一情绪和思想的欲望的苏醒，这些统治的头脑自身对于它们并未意识到，他们创造民族性格。歌德、莎士比亚、但丁、荷马如此创造过了，还有许多其他人在较低的水平上。外部与独特的或政治的作者使他们国家最强有力的智慧空白（在苏格兰的情形里，英格兰挤进了它的虚空），而满足于塞满褶裙和风笛，报纸和指南，最少创造性的日子。

创造越是无意识，就越是有力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比方说，应当保持他对实际事物的有意识目的。但他应当养成并总是在周围发现，也许最多是在妇女的头脑中，由他本国的伟大诗人创造并与其联系起来的情感之高贵。倘若一个人并非天生就具备这个，如果他去做别的事的话就无法得到它，因为它会充满他的一生。这就是在我的《国王的门槛》里辛恩昌要为他未来的子孙准备的黄金烛。正是这种文化使得英雄的诞生成为可能，但它总是在被遗忘时最为有力，在某个至关重要的危机之中有一丝隐约想法出现在士兵或演说家的头脑之时。一切通俗艺术，另一方面，以仅靠这个就被记忆力目标，靠着意志阻挡了创造的活力，它需要的是一切。

旧时代通俗写作之美的一个原因是人民较微妙的情感是由宗教组织起来的。并未将它们留为空白。它们总存在于深处，与通俗艺术息息相关。很可能在一个新文化通过印刷书籍，一个新的宗教感通过哲学与科学传播开来时，通俗艺术又会好起来。那时它会仿佛仅仅是一个作为民族的全部艺术的伟大艺术品的一部分。现代通俗诗歌是孤立的，比如朗费罗的艺术，而基本上它是一种屈尊俯就，一种蓄意的简单化，它应当是一个人民之人的作品，将他自己完全表达。

216

[1910年] 5月16日。昨天我问毛特·岗——我们去了很多教堂并上了圣米歇尔山——发现她每到一个教堂都向上帝祈祷，问她祈祷什么。她说，“我为新的大学祈祷很多。”她也向圣米歇尔进了一支蜡烛。

两天前，我们正在科勒维尔这里穿越一条小溪时，她告诉我六个月以前

她儿子 出生时她曾在这里野餐过一回。有一天，带着他第一次经过这里——他 岁——他说，“我们就在那里点火的。”他不可能通过任何平凡的途径知道这个事实，伊苏尔特证实了这个故事。她也听见了这些话。两人也都讲述了有一天在她们从未去过的一个地方他怎样说道，“那儿上边有一道小溪，”的确如此，尽管对他来说要听见水声太远了。她们说他现在已夫去了这些稟赋。

217

在论辛格散文中通过这一事实解释天才的优郁——病态——即一个天才之人观看世界，就像亚当一样，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他与死亡和变化面对面，挣脱了隐藏它们的习俗和常规。他把世界反映在一面陌生的镜子里——对于他也许不是陌生的——这一事实使我们也在一瞬间看见了它们仿佛我们就是亚当。他因此有了他的双重效果：他令我们分享他的感觉的真诚，他令我们分享他的幻像的陌生。他向我们展示一幅图画，像一位画家可能做的那样，它在一面镜子里颠倒过来，我们可能把它看成实际就是如此。但这陌生渐渐消散并仅仅留下他的真诚。然而，陌生时常是作家最初成功的原因，也是它们最初失败的原因。然而，每个作家都有他的镜子，是他真诚的创造。他是不同的。

218

然而在圣米歇尔山上我看见了一种不同的艺术，一个神奇有力的活生生的事物，由一个工作了数百年而只留给个人一个很小余地的社团创造而成。难道没有通过有力的情感而获得了有机活力的群体吗？他们与乌合之众，一切具有微妙灵感者的敌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普通思想是我们在爱尔兰城市中的敌人，而在乡村却会变成我们的朋友，倘若我们有同样的象征？我无法看清楚，但想到那差异就像一座寺庙与一个现代城市之间的差异一佯。我本会说必有一种思想与肉体的纪律，但乡村人只在他们的民间传说里对此有一点十分模糊的感觉。一件事我的确看到了。联合的原则必是来自并持久地诉诸那最深邃的，它必将把所有人的全部生命包容于它的圆环之内。缺少这个，它就会是一种口语意义的习俗，仅仅一种礼仪或一种群众暴政；灵魂将处于持久的反叛之中。年轻的爱尔兰主义，由于一种屈尊俯就，一种有意的简单化，只有消灭或创造出一种新的暴政。对一项事业的牺牲并不心然升华灵魂，除非那灵魂是那事业的一部分。人无法拥有一种年轻爱尔兰意义的民族艺术，即一种因为显然是对所有人相信与感受之事物的一种表达就立刻被所有人认作民族性的艺术，尽管可加以模仿，因为没有一个现代民族是一个像寺庙一样由规则和纪律，由一份所有人都理解的确定的价值表格，或者甚至，像西方的农民那样，由感觉和思想的习惯建立起来的组织。我是否正确；没有一种习惯的组织吗——一个由民间传统维系起来的种族，比方说？而这如今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古老得足够成为习惯的思想无法面对现代生活，塑造

辛恩·麦克布莱德，1904年1月26日出生。

叶芝的空白。

有教养的人，而一个纪律的组织迄今为止一直证明在现代世界里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将自己与世隔绝。当我试图创造一种民族文学，为了那一切，我真正的意图不就是仍旧要创造这不可能的事物吗？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总是激励自己工作，去想象一个在思想与感觉上像古希腊、罗马和埃及一样是一个联合体的爱尔兰；并仇恨乌合之众，他们只在歇斯底里[的]时刻，在为它服务，而非为个人服务之时才是一体？我因此不是在一个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任何意义上都是不民族的吗？他说民族指的是一帮并非由内在的、精美的和高傲的事物，而是由他们服从因为他们必须服从的法律和权势维系起来的群众。我因此必须满足于做一个艺术家，一个团体，辛格、格雷戈里夫人，[的]一员——不，这些人之外没有其他人了——他们表达某种与行动并无直接关系的事物。我们三人构想了一个爱尔兰，它将一直是想象的，比我们构想了自己更为强有力。个人胜利仅仅是从乌合之众中隔离，作为我们在那想象之地归于自然之前的一个必然步骤，那地方仿佛是西方的一个固于传统的人民，独立于美国或伦敦，并生活在它自己的王孙治下。

219^以

[1910年]8月。

亲爱的罗伯特：我希望你理解我在私人生活里并无本能。我以推理将它们全部排除，而推理行动十分缓慢而且困难，并不得不穷尽这问题的每一方面。首先，我已经在自己身上，通过分析，摧毁了本能的愤怒。当我二十岁或再大一些时，我被亨雷家中的谈话所震惊。有一天我决定倘若谈话再一次那么糟，我会走出去。我没有这么做，第二天我推想了这件事，并劝自己说我想到走出去是出于虚荣而不这么做是出于恐惧。当我回首往事，我看见一次又一次我被阻止去做某件自然的，有时还是正确的事，不是因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或行动的分析，就是因为对我自己情感的自我猜疑的分析消灭了冲动。我根本无法臆造出能够促使我行动的冲动，除非它如此突然以至我不得不立即行动，如果它影响了个人生活的话。整个上星期每当我的冲动告诉我应当怀着愤怒要求古斯道歉时，我的分析就说，“你这么想是出于虚荣。你想要做一件富有激情的事，因为它激起了你的骄傲。”

我有一回被一位亲属告知我父亲曾干过某件可耻的事——当然那是荒谬而不实的——我怀着颇有兴味的恐惧发现我正冷漠地争论着那可能性，并解释（向我自己，我很高兴说）为什么那不可能是真的。在非个人的和公众的事物中，因为那里这种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并不到来，我具有冲动。我会解释它说它是我成长起来的世界——你总是生活在确定的社会关系中，而我只在

“我们三人单独在现代再次将一切置于那唯一的测验之下，高贵者与乞丐的梦。”“重访市立美术馆”，《诗集》，第369页。

^以 下几条是因埃德蒙·古斯爵士寄给了格雷戈里夫人一封侮辱性信件的事而产生的。问题是被提出颁给叶芝的英国王室年俸。格雷戈里夫人和她的儿子罗伯特感到叶芝应当要求古斯给予一个彻底的道歉。

罗伯特·格雷戈里（1881—1918）。

“实际的”被删去。

确定的观念中——但这时我的家庭对我来说似乎有超过足够程度的平常冲动。我甚至靠自我猜疑的推理进行我的写作。我原想以我写下其他笔记的同样方式写下这一篇。然后我说，“我真的在向罗伯特·格雷戈里解释我自己。我害怕直接写信给他或直接和他谈话，于是我写这篇笔记想到某个机会可能让他看到它。于是我会写下它仿佛是写给他的。”自此，在写下它时，我已想到这是一种不真诚，因为我已理解我正试图向自己纠正自己，甚至胜于向你。

我要你理解一旦一个人将一件事置于区别于冲动的理性之下，他就在玩弄它即使它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我因为自己在生活中玩弄过的事物羞耻，比因为别的任何事更甚。

多年来我全部的道德企图总是一种在我身上重新创造实际本能的努力。我只能构想它，就像是构想一种表演。

有一件事我希望你理解，就是我从未受任何对与古斯争吵的恐惧所影响。有一些时刻、想到那封我相信已经投寄的信，我就想古斯很可能会阻止我得到那笔年俸。我从未在那一问题上犹豫过；我可以怀着真诚这么说。我仅仅是以一种菲个人方式思考那个问题并谈论它说我会想到较好的方面，并在权衡我的信时试图回忆起古斯的善行。

但是，归根结底，我写下的没有什么会令你感兴趣。你会仅仅说，“他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母亲，她受了古斯的侮辱。”是的，你会是对的。麻烦正在于此。只有我一直在思考的自我不是自利。

1910年8月2日

220

I

不，像我打算去做的那样，追索我使自己写下那三封我的确写下的信的推理步骤是没用的。全都是，我仍旧认为，正确的信，除了它们本应当个经思考就完成。立刻并且没有任何显示出我头脑的态度并使每个人苦恼的讨论。私下的个人在行动之前不应需要一个教堂会议。

我总是看到这一件事，就是在实际生活中面具比脸更多。我相信我说话时所怀有的自我谴责更多于自我辩护，当我说道，“生活中有些时刻人必须说，‘某某一个行动证明某某人是恶棍或蠢才’而不说‘某其人曾经用这个或那

“哲学”被删除。

“我的头脑如此工作。当我更年轻也更自然时我最初的冲动会是愤怒，但如今则只有惊讶。我说，为什么古斯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他突然发疯了吗？我不断地思考又思考想看出这是什么造成的。我放弃了那个问题。”被删除。

个善行显示自己既不是恶棍也不是蠢才，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一个人必须说，”某某人绝不可能做出某某事情，’即使一个人的想象猜测了一道无尽的环境行列，在其中任何人都可能受驱动去做任何事。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写和说他的理性所否定的事物。”此外，人必须不断地感觉和相信他的理性所否定的事物。我如此不幸，我只能把这构想为一种戏剧表演。我感不到足够的情感来据此行动，只有微弱的抒情情感，它仅仅间接地影响生活。于是有了这困难，就是词语在我手上是一种调查的手段，而非一种行动的手段。

221

哦生活的主啊，给我对某事的信心吧，即使它只在我自己的理性之中。我现在绝不能相信别的任何东西，因为我已谴责了太多罪恶的冲动。我知道理性几乎是一件褻读的事，向一种存在之无限的呼告，而我们是有限的社会生物，是半人工的。二十次；不，一百次如果我行动是凭着冲动并有违理性，我本会创造一个比非个人的理性能给予的更美好的是非世界”，一种更个人也更富激情的生活。理性是钟摆的停止，一种死亡。生活是一种持续的不公正。

“是的，但我本该离开我的世界。激情的人必须相信他服从理性。

222

我记得曾在布伦，在我看到古斯的信一两个小时向自己说过，我要给古斯写一封长信，向他指出他做出了一件羞耻的事，但这样做没有愤怒，因为我记得对我的某次善意，以及他对阿瑟·塞蒙斯很伟大和富有耐性的善意。我想问是否有某种误会。于是我开始看到他当时并不是他自己，因此想他会明智地回信也毫无用处，以及格雷戈里夫人自然十分愤怒，于是我写信就必然显得好像我以这一个行动判决古斯，彭辛奈罗必须向彭辛奈罗说出他的想法，否则即不是君子。那支他有时用交叠的双臂把握的手杖本会好得多。它本来无论如何不可能指望来权衡是非。它是木头做的。

223

我缺少同情吗？我忘记了一封不会伤害我的信深深伤害了她吗？不，我想我知道这个，也知道是她热情地为我服务召来了这封信。我想它就像是我写下的。

224

[1910年]8月6日。作为《伶人女王》的一个简写。黄马丁应当怀疑的不是塞内卡的一个追随者，而是某个低级小丑，挑拨人民反对他们。某个低下的

“.....在克莱尔海滨一个荒凉、多风的地点”：叶芝致约翰·B·叶芝谈到布伦，1909年7月？17日，《书信集》（威德），第532页。布伦的格雷戈里宅邸是“弗尔农山”，由安·格雷戈里富有魅力地描述于她的《我和你；在柯尔的童年》第 章中（杰拉兹十字，科林·斯麦兹，1970）。

喜剧诗人。

225

[1910年]8月6日。我刚将这封信寄给古斯：“亲爱的古斯。强迫一个人在两种忘恩负义之间作出选择究竟对不对？你对我倾注过善意，然后你侮辱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她曾给你的一封信寄去了一封礼貌而得体的回信（因为我看过她写了什么）。你没有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因为那位朋友，不希望我争吵，将它抽出了邮包。我刚听说这件事，你的道歉到来时我的桌上有一封多少较为温和的信的草稿。对于一位如此多才的作家来说：你的道歉写得不好。我把你的信出示给了罗伯特，格雷戈里，并且在他的提议下，没有给他母亲看。然而，我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226

[1910年]8月8日。格雷戈里夫人今天再次谈起此事。我说，“我觉得杜马斯的人很好笑。他们因服从一个法规而为善与作恶。他们从不对任何道德问题思考一下——一切都由他们的法规确定了。他们求知想心十分愚钝。谁也没有一刻有一点现代头脑。”她说，“一个法规是必要的；没有时间推想事情。”我从她的语气中知道她又想起了古斯事件，接下来她就说起了它。当我回首整件事，我开始看出格雷戈里夫人和罗伯特曾指望我立刻行动起来，遵守一个法规。不该问“古斯为什么会这么做？”不该其实更糟地，对他的性格和动机感兴趣，我本应处于一种十分简单的头脑状态。我本应怀着蔑视谈论他，或怀着蔑视写信给他——别无选择。那整个态度对于我是如此陌生，以至当被指责因不以那种方式思考而缺少一切正确的本能时，我在古斯的问题外又加上了我自己的问题，说道，“我是否缺少高尚行为的本能？”如今我看到对于我没有可能做出其他举动。自从我十五岁开始思考时起，我就嘲笑那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仿佛有一个法庭，一切错误行动都在那里根据它们的合法报应受到审判。我一生里，像每一个艺术家一样，都为属于一个更高贵的世界，为选择了缓慢、危险、劳累的道德判断而自豪。然而当那法规化身两个朋友在我面前呈现时，我动摇了，我怀疑起了自己。我怀疑因为我谈话。在沉默中我本能够思考清楚整个事情，把我的犹豫留给自己。我本能够诉诸古斯身上最好的品行，也许能使那些会反目为敌的人们和好，或无论如何我本能够提醒他回想起自己更好的自我。我的父亲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会做他自己。我既没有像一个艺术家那样处理这件事，也没有作为一个世故的人去做。我听任自己接受彭辛奈罗的法规而下遵守它。没有什么有强烈激情卷入的事应该，如果人能够自禁的话，以普遍原则来处理，仿佛那是一个礼仪问题。格雷戈里夫人和罗伯特都是朱庇特式的人。所有这类人都创造法规或是生来就拥有它们。然而人是否曾做荒唐之事而不知道正确的过程？我可以回忆起就在见到古斯的信后——我正从海边走回家——就好像有一个

在《伶人女王》的一个早期手稿变体里黄马丁（塞普蒂莫斯）对巴拉赫说：“我全都看得见，某个流氓，某个笨蛋，仿效塞内卡来唆使你们这么做——只在市集里写作戏剧。”（爱尔兰国立图书馆，手稿 8764(4)。）在布伦。

声音对我说，“别和任何人谈论它。直截了当；立刻给古斯写信。要抗议，但要作为一个写给一位犯了错的老朋友的人。但是，首先，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它。”我听到这个时，我就知道我不会去做。我太怯懦。太不信任自己。于是，道德本性与那法规远远没有任何关系，它开始就弃绝了它，并以倾听细小的，几乎秘密的，未普遍化的思想来得到力量。但在勇气的所有形式中这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种未普遍化的思想从无任何支持，除了在它自己之中。

我不停地与格雷戈里夫人或罗伯特谈起此事，我知道他们以为我犹豫不是因为我希望做得正确，而是因为我认为古斯可能对我有用。如果我原先保持沉默的话我本来能避开那一点的。

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它是我与格雷戈里夫人曾有过的一次重大争吵，因为是第一次源起于对生活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作为一个喜剧作家，她身为艺术家的生活并未在她身上动摇传统的标准，如悲剧艺术会做到的那样。此外，她从来不是艺术家世界的一部分，她属于一个政治世界，或属于一个仅仅是社会的世界。

为什么我写下这一切？我猜想我可能最终学会了在生活的每一种情形下我行我家；随着我年长起来而在自己身上发现并创造出那种事物，它之于生活就如同风格之于文学：道德的光辉，行动与思想中一种普遍意义的个人品质。

我现在看得到我是如何失去自己的。”我一直试图在我自己身上重新创造出激情，”我写道，或是这样的词句。是的，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应该从理性本身之中流淌而出。我的天才将会消失，如果我以普遍标准做交易的话，而彭辛奈罗也是古老的；他们在罗马的废墟里挖出了他的一尊雕像。

一切生活是否一种经验的斗争，赤裸，手无寸铁，怯懦但不朽，反对普遍比的思想；只有此中的那种个人历史才是世界历史的反面？我们看到一切艺术和社会从经验转到普遍化，而年轻的则是始于普遍化而终于经验，就是说不是我们所谓它的“结果”，它是普遍比的。而是随着它的呈现，它的活力。一切好艺术都是经验；一切通俗的坏艺术都是普遍比。

227

“摘下燃烧的黄金的面具
它有翠绿的眼睛。”

“哦不我亲爱的你如此大胆
要发现心灵是否狂野又智慧
却不冷漠。”

“我只想发现会发现什么
爱还是欺骗。”

“但正是面具驱策你的头脑
而后又令你的心敲打
那不在背后的事物。”

“因为可能你是我的敌人

我必须发问。”
“哦我亲爱的让面具去吧
有什么要紧如此仅仅燃起火焰
在你我之中。”

“但恐怕你是我的敌人
我必须发问。”
“哦不我亲爱的让一切去吧
有什么要紧如此燃起的只是火焰
在你我之中。”

228

但每一个有力的生命接着走它的路
为心灵之眼的目光所蒙蔽
因出自心灵的呼声而失聪
不会有蹒跚的双腿和摸索的双手。

229

层云围绕坠落的太阳
那闭上了他燃烧之眼的威仪，
弱者把手放在强者所做之事的上面
直到一切曾被高举的都跌落在地
而混乱继和谐而来而
一切都处于一个共同的水平
而于是啊朋友，倘若你伟大的种族曾受统治
而因此这些事物已如此变本加厉
你要以伟大为你的伴侣。
尽管我叹息是为了孩子们。
这些是层云围绕着坠落的太阳
那闭上了他燃烧之眼的威仪。

230

这一段完全被删去。

“面具”最初以“一出未出版的戏剧中的一首抒情诗”为题发表，那出戏是《伶人女王》，在《绿色隐士及其他诗篇》中（夸拉出版社，1910），《诗集》，第106页。“在主观的人们中（在所有那些人，即那些必然从自己的肠子里织出一张网的人们中）胜利是一种智力的每日再创，重新创造出外部命运所攫走的一切，于是命运也就是分析；而我曾称为‘面具’的是对一切出于他们内在本性之物的一种情感分析。我们开始生活在我们已经把生活构想为悲剧之时。”《自传》，第189页。

“和解”的另一变体。

“这些是层云”，《诗集》，第107—108页。那位朋友是格雷戈里夫人。

酒从口中进
爱从眼中来
那是我们所知的一切真相
在我们年迈和死去以前
我举杯到我的嘴边
我望着你——我叹息。

231

1911年5月25日。在斯特拉福，《花花公子》震惊了許多人，因为这个斯特拉福是一群自我改进、自我教育的观众，这意味着堕落的和平凡的一群。如果你开始教育你自己，你就被迫要有一个理想，而如果你下是一位天才之人，你的理想就会[是]一种老生常谈并阻止心灵的自然冲动，它自然的尊敬、欲望、希望、崇尚，总是半无意识，几乎限于肉体。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一份宗教责任，逃脱了智力的事物。经常是如此胜于它的替代品，自我改进。

232

[1911年]8月17日。五月在巴黎写的诗。

拟龙沙诗风

好克劳宾·奥伊宾（道格拉斯·海德）注视我们的情形
当我们高傲而虚伪千百人说道
如果我们保持那飞翔他们将离开这地方
而同是那千百人另一天却在嘲笑
因为我们用平凡的事物创造我们的艺术
如此尖锐你会梦想他们会渴望审视
他们的全部生命进入翼翅的某次飘动。
你曾上下逗弄他们，以书喂养他们
并对他们深知入骨。传给我们——
我们会保守秘密——一个新的取悦伎俩
这个普洛透斯有没有一个马笼头
他变幻反复如他多风的海洋
或者是否一个也没有，最受人爱戴的
但他们以此嘲笑我们时我们再次嘲笑。

233

“进酒歌”，《诗集》，第104—105页。此歌为《米兰多利娜》，格雷戈里夫人对戈尔多尼的La Locandiera的改编作品而写：它最初于1910年2月24日在阿贝上演。

“在阿贝剧院”，《诗集》，第107页。龙沙十四行诗是“Tyard . on me blasmoit, a mon commencement”。海德的笔名，“可爱的小枝”的爱尔兰语。

S.S. 西兰。[1911年]9月8日。我在未昆士城时，在火车上注意到一个沉默的，穿着相当考究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粗俗。不是他的脸，他的脸倒十分正常。我发现那是它的动作。他只从头上动。他的手臂和手，可以说，直接服从脑袋而动，倘没有那从一种对[一个]要触摸和抓注的物体的重量的形状的感觉而来的本能移动的话。在姿势中有太多的直线。结果是一种粗俗的精密的印象，一对明显与琐屑者对一切深沉和古老和简单事物的蔑视。

我注意到新手在台上有时就这样动作。他们被告知拿起什么东西并在他们这么做的方式中显示出做这件事的观念对于他们比做这件事更为鲜明。有一种批评才能的演员尤其是如此。人们会得到一种性格薄弱的印象。我正在观察休勃莱小姐，看她坐在椅子上的僵硬是来源于此还是因为她在生活中就是僵硬的。那天我观察她坐进一张椅子上，看她的身体是否仿佛在碰到它之前要感受它的尺寸和地方。如果她的身体不是存贮了大量这样的印象。她将绝没有表演的能力，正如她的生活中将绝没有动作的优雅。但她可能拥有它们而人为地阻止它们。在我写时我透过小屋门看到一个女人在用一把勺喂一个孩子。她什么也不想只想着孩子，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表情。这会是美丽的表演。另一方面她说话——她在与身边的谁说话——对此她并不感兴趣，是单调的，音律上很薄弱。它仅仅是头脑中的一个目的，礼貌使之必不可少。

234

[1912年]1月4日。前天晚上去看乔治·摩尔，是在W.F. 白菜的催促下去的，大怒而归。回来一大半路程是步行，好使头脑平静下来以便入睡，即使那时也感到睡觉无济于事，于是一直坐到三点。摩尔有几个朋友；英国佬走得很早，除了G. 摩尔、摩尔上校和乔治·卢塞尔之外谁也没留下。我没有走，因为有一件事我想向摩尔请教。摩尔骄傲他说起他曾写给比查姆一封信，原因是某一场华而不实的争论，有关一篇比查姆接受了却不打算发表和付给报酬的文章，因为他已放弃他编辑一份评论杂志的念头——赔了钱。摩尔写道他干什么也不如指挥他父亲的歌剧更合适的了，“它使女仆姑娘的肠子歌唱”。他把这重复说了两遍，他对它的诙谐如此自豪。接着他与卢塞尔开始敦促我与乔治·罗伯茨和好。我讲了他与爱德华·辛格的协议的故事，以及他对我本人的苛待，并说这与欺诈并无二致。乔治·摩尔说，“哦胡说，叶芝，谁都会做那样的事的，”摩尔上校说，“不，不是欺诈，仅仅是尖锐的实践而已。”我接受了这纠正，接着卢塞尔开始为罗伯茨辩护——那仅仅是头脑糊涂等等。他讲得很激动，我已经太多次听他为恶作剧者或无能者辩白了。我发怒了，并描述了头脑糊涂的奸诈，他的黑暗总是只有一线光亮，他的自私自利；在那里，尽管单单在那里，专注从不游移。我越来越生气，

在1911年9月12日，叶芝与阿贝演员们一同从昆上城（今科布）乘船至波士顿，他们要在那里开始他们最轰轰烈烈的巡回演出。他与演员们只同行很短一段时间，并在格雷戈里夫人在都柏林耽搁了几天后到美国加入此行时回到了爱尔兰。此次巡回在《光辉的年代》中有详细描述，第108—139页。

尼克·休勃莱小姐在格雷戈里夫人的请求下于1910年11月回到阿贝。她取代了麦伊尔·奥内尔，后者在美国巡回演出中生了病。

毛里斯·摩尔上校，乔治·摩尔的兄弟。

因为我知道我正在给人一个坏印象，显得是仅仅因私人厌恶而贬斥罗泊茨，也知道有某种乖戾的本能使我不可道出那真相。就是我愤怒是因为罗泊茨的诡计使得辛格在世界记忆中的形象不如它原本应该的那么完美。为什么我总是把我的动机呈现得比实际的坏呢？那无心的陌生人总是卢塞尔的朋友，因为卢塞尔表白他的动机总是不厌其高。这本能或固执是什么？我发现自己一遍又一遍在把我的行动呈现为基于某个仅仅是聪明的动机之上，而真正的动机却足够高尚的。是不是对易得的热情的厌恶，还是因为写作，在其中风格，情感的高贵，就是目的，它持久的压力要求休息？在将某物置于恶意的光下时，在释放瞬间的怒气以及随后的一切夸大时，我时常感到我是以一种有意的自我纵容这样做的，或者是仿佛一条控制带崩断了。于是又一次本能似乎比理性更深，仿佛在道德的本性中总是有一个必须保守的秘密，一种野性的 geasa。在公开演讲，或任何正式讲话时，我逃避，恢复风格。

235

1912年4月3日。

于听闻新国立大学的学生在加入了古 Hibernians 阵线之后，正参加它反对不朽文学的运动时作：

何处，除此还有何处骄傲与真理
它们渴望用自己换取报偿。
要站起来嘲笑怯懦的青春
在束缚不计后果的中年。

236

[1912年]4月10日。昨晚去了温布尔顿的剑桥宅子，去参加瑞耶德小姐的降神会。包括我共八个人，加上哈泊太太和哈泊小姐。我们环屋而坐，不互相挽手或接触，但被告知把我们的腿平放在地板上。有通常的喇叭，[瑞耶德]小姐在我右边隔着两个人。完全漆黑一团。我们坐了很少几分钟，这时我们被溅上了某种液体——我感觉它在我头上手上，几滴。通灵人说那是洗礼。接着从喇叭中传来一个十分洪亮的声音。它来找“盖茨小姐”。或是通灵人听见那声音是这么说的。我说那是我。接着那声音说，“我从童年时就与你在一起。我们要用你的手和脑。”“你拥有关键，”或，“你是关键的头脑”，我忘了是哪句。“我是写作者莱奥——写作者和探索者”。我试图通过度问得到更多。“他生活在什么时候；18世纪吗？”他接着说，“喂伙计，”或是这类暗示不耐烦的词语，“我是莱奥，写作者。你知道，写作者莱奥。”当我说我不知道时，我以为他又说，“你会在罗马听说到我的。”然后他走

参看第 215 条。

geas，复数为 geasa、爱尔兰语，意为“施于某人的魔法”。

“听闻我们新的大学的学生加入反对不朽文学的骚动”，《诗集》，第 105 页。

“盖茨”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小说《月孩》中指涉叶芝的名字。

莱奥·阿弗利卡奴斯，意大利地理学家。他成了伴随叶芝的精灵。

了。在他之后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从中听不出多少清晰的话。这声音突然被那十分洪亮的声音打断了，它告诉我“在我的椅子上坐直”。我当时前倾着。在这一刻那影响中断了。一个受惊的女士已经离去，这时又有两个离开了。我们再没有得到什么，除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有两次手被触摸，我左边的某人有一次，以及我看见一道模糊但无误的光在我面前，大约像一个六便士面包的大小，形状也一样。那两个女士离开后，通灵人坐到了我身边。然而她在那声音告诉我在我的椅子上坐直时并不在我身边，而且太黑她看不见我。

237

[1912年]5月18日。当人生的任何部分剩下来未被表达，在许多人心中就有一种表达它的渴望，而如果这表达被人为地阻止了，那渴望就变成病态的，而如果有教养的人不成为它的声音，无知者就会成为。由于这一缘故出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江湖郎中式的神秘家和写在每个人墙上的猥亵词句。

238

[1912年]5月24日。

苦干而致富
是整夜与一个
肮脏的巫女共眠
之后又被
疲惫而枯干地
带给一位久被
爱慕与追求的美女
满怀绝望。

苦干而致富
不正是与一个
肮脏的女巫共眠
直到被榨干之时
被带给
一位久被爱慕
与追求的美女
满怀绝望。

239

为 A.S. for P.R. 1912，第 629 页誊写《议事录》。在头脑中控制罗伯特·海

“巫女”《诗集》，第 135 页。
美国心灵研究协会。

斯洛普拍一帮群众的报告照片，说，“接着我随群众·起走，”表示它以某种方式共有它的观点，成了他的过去。

240

1912年10月。我注意到在梦中我们明显的主观情绪几乎限于十分基本的恐惧、悲伤和欲望。我们没有复杂性或对我们状况的任何概括意识。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的不安就显然从我们自己身上被转移到了梦的意象之上。一个由性欲望创造的意象，比如说，当我们的健康不佳时，会成为一个有一张肿胀的脸或某种不良行为的女人。事实上，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常看见扭曲的意象。我猜想控制的思想的形式，同样肤浅代，与我们梦中明显的思想是相似的。同一感在两者中变弱于同一点。

241

1913年7月。现在证明了精神身份——因为ER一事是最终确定的——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难题。为什么最近五十年里不见具有文学或玄思之精深的句子通过任何通灵人之口说出，或也许是自古就是如此，因为普鲁塔克曾谈及他所信仰的希腊神谕的不完美表达？通灵人我指的是独立于，或者是淹没了，通灵人有意识意志的精神冲动。我将这重新阐述为这样：一切通过感觉而来，区别[于]来自明显自由的头脑活动——因为当然有诗的灵感——的信息都是不完美的；就是说，一切客观信息，一切通过听觉或视觉而来的信息——信笔书写，比如说——都没有玄思的力量，或无论如何与最佳状态的头脑活动不可同日而语。一切客观的——而且这对于一切有着最大程度的客观物质化的事物更为真实——都暗示一种镜像生活，或有时是一种片断的意识，仿佛从远处投来，或从一个与此界并无真正相似之处的另一界投来。然而，思想与表达的力量对于实际事物是足够的，在其中精神时常胜过我们，如它们总在实际知以方面的作为那样。唯有在思辨、理智、头脑的最高选择方面，它们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头脑在似乎与它们的生活直接接触，就是说没有任何通过感觉的理解时，并不接受有关实际情况的信息。

242

如果已年长的你是最早的死者
无论黄金树或是沁香的菩提
都不会听见我活着的足音，我也不会踩过
那里，我们曾打造将要击碎时间之牙的事物
让那些新面孔玩弄他们想玩的把戏
在旧屋里。对于他们所做所说的一切

ER，一个有自动书写天才的年轻妇女，在叶芝的1912年笔记簿，一份毛特·岗在1912年圣诞节赠送的礼物中曾有描述。描述的一部分题为“精神身份”：它提供证据说精灵在死后仍保持其身份：精灵，在ER一事中，包括托马斯·克里奇、约翰·弥尔豪斯、亨利·拉金，以及托马斯·埃默森。叶芝遇见ER是在1912年春。

我们的阴影仍会漫游花园的砂砾
生者似乎比他们更阴暗。

1912年12月

对于他们将做将说的一切

我们的阴影仍漫游花园的砂砾
生者似乎比他们更阴暗。

243

我为格雷戈里夫人的美国之行 烦恼，我对此有一种坏运气的感觉。我希望我有她的星座。（她近来生病很多，在回家时把手严重弄伤。1913年7月。）

麦特拉医生 今天来看我。我告诉他萨罗吉尼 的兄弟曾对毛特·岗说，“我们能干什么？一个身为我们种族精神领袖的人写了一首诗来欢迎国王。”麦特拉的脸充满兴味。他说，“我想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国家议会请泰戈尔为他们写一首有关国王的诗。他那晚想试过但没做到。他第二天早晨很早起来写了首诗，一首美丽的诗，尽管不属于他的最佳作。他把它给了我们中的一个说，‘有一首我写的诗。它是写给上帝的，但你们可以把它交给国立议会。他们会高兴。他们会认为它是写给国王的。’[1912年]12月28日。

244

1913年1月。我告诉灵媒我曾通过想象几何符号与一个月亮在一个女孩的头脑中召来了一个洞穴中的狄安娜，她并没有看见它们，因为她的双眼是闭着的。我没有预见到狄安娜。她的恍惚太深了，我又试图通过很微弱地进行一次驱魔来将它减轻——一个愚蠢的行动——结果是那女孩受惊并说道，“狄安娜生气了，你太快把她赶走了。”她没有看见我的姿势，而且如果她看见了也不会理解。我问狄安娜[是否]是一个符号，然而她的行动仿佛她是活的：那么符号是活的事物吗？他说，“她完成了你的思想，就像你如果追溯你的线索的话会做的那样。”

那么加果象征的视象只是完成自身的思想，并且如果像我们现在必然想到的那样，它的所在仅仅是物质本性，并且如果思想事实上已被拍摄下来，

“新而孔”，《诗集》，第238页。此诗写给格雷戈里夫人，黄金树和菩提树在库勒 公园里。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勒》对公园里的黄金树有详细描述。

为指挥阿贝的第二次美国巡回演出，并为休·兰恩计划中的美术馆筹集钱款。

D.N.麦特拉医生（1878—1951），1901年起任卡尔楚塔的马约医院住院外科医生。1912年他在爱丁堡王家医院，也在西伦敦医院开设外科研究生课程。1925年他建立了孟加拉社会服务联盟，泰戈尔从1925年至1930年任其主席。他是“杰出的孟加拉医生”，叶芝曾于1912年夏与之讨论泰戈尔的诗（《散文与引言》，第387页）。泰戈尔结国王的诗的轶事曾在埃兹拉·庞德1913年1月给他父亲的信中被复述，其中这位医生被不确地描述为“拉宾德拉那斯的一位学生”（《埃兹拉·庞德书信集》，D.D.派吉编，伦敦，费伯与费伯，1951年，第49页）。

萨罗吉尼·奈都，女诗人：她的著作包括《时间之鸟》、《金门槛》及《断翼》。她的兄弟是哈林德拉那斯·查托帕德雅（查特尔吉）。

那么象征的思想是否像一切思想一样，是一个现实，在本身之内进行它指定的过程，当冲动在于或地上赋予，在我们看它运动的时候运动像我们看见它时一样运动，是两个现实之间的中间世界，一个一致的地带，daimons 的活动？

245

乔治·摩尔在《英语评论》上一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中攻击格雷戈里夫人和我本人。格雷戈里夫人曾威胁要指控一项诽谤行为，而摩尔已经道歉并收回了一篇有关她早年改宗的言论。有关我的言论对于任何行动都太模糊了，尽管同样地不真实。几年前我在摩尔的一次讲演中作了一次发言，兰恩那时为此感谢了我，说正是那一次发言可能达到某种好的效果。它是呼吁爱尔兰贵族支持兰恩的美术馆，后来我听说它冒犯了阿狄劳恩夫人。摩尔将这变为一次向中产阶级的攻击，很可能将它与一次发言相混淆，它并没有听过但可能听说过，是在国立文学协会作出的（那次发言被报道，我想是逐字逐句地，在《爱尔兰时报》上）。然而，他的报道却不过是写小说。他为中产阶级进行了老生常谈的辩护，对批评家一阵嘲笑，因为批评家是他们的，是唯有贵族或者也许劳工阶级才有权利去批评的一种虚伪。我所用过的“资产阶级”一词并非一个贵族的谴责术语，而是，像人们在本·约翰生中找的老“市民”一样，是一个艺术用法的词。“上帝创造了贵族，上帝创造了教士，上帝创造了穷人，但是谁他妈的创造了这些人？”14世纪的一位诗人写道。

然而，摩尔是个天生的煽动家，而且哪方面也不比他对富人的热爱更是如此。他总是对某一群人怀有激情，总是蓄意地挑拨他们反对某人。他分享群众的物质主义，和群众一同仇恨任何作为不可转让的天赋的特权。他可以

“环绕一切精灵的可感世界。”被删去。

“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英语评论》，第X卷，第167—180及360—364页，1914年1月及2月。有关格雷戈里夫人被宣称改宗的内容如下：“一个忠实的清教家庭，如果不是别的，罗克森伯洛·帕尔斯家确实如此。萧·泰勒太太是格雷戈里夫人的姐妹，两人在那些往昔的日子里都是热烈的灵魂召唤者；但奥古斯塔在结婚后放弃了传教工作，而我们乐于想到威廉爵士在乘马车将他的新娘领到库勒时时她说，‘奥古斯塔，即使你没有作出改变，你至少动摇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信仰。罗克森伯洛的土地已经为播种清理干净，但基尔塔丁可以等。’”（第175页）。

格雷戈里夫人1914年1月17日写信给摩尔：“我的怀疑开始于我必须加入一位受虐待的妇女反对两个教会之时，但那说来话长。”（伯格藏书，纽约公共图书馆）

欧莱芙，阿瑟·爱德毕·吉尼断爵士（1840—1915），阿什福德的阿狄劳恩男爵的妻子。叶芝寄给休，兰恩诗作“致一位富人，他应允对都柏林市立美术馆第二次捐赠，倘若它被证明是人民所要的画作”的一份抄稿，说：“我已试图将阿狄劳恩信中的论点归于某人，她反对捐助是因为地方自治以及劳埃德·乔治，还有更多归于像阿狄劳恩之类人的基本论点，即他们不应捐助除非有一种公众要求。”《书信集》（威德），1913年1月1日，第573页。

摩尔于1911年10月27日写信给尊敬的詹姆士·O·汉内（“乔治·A·伯明翰”）谈论《爱弗》：“评论者们把我的著作看成一本话旧的书，然而我采用了这么多材料，铸造了它就仿佛我是在写小说，而我书中的人们都不是个人而是人的典型。爱德华·马丁，比如说，像无论什么能够达到的一样典型地属于爱尔兰；他对我来说似乎反映了爱尔兰的风景，天主教风景，而作为一个文学的纨绔子弟的典型人们找不到一个比叶芝更完美的模特了。”（爱尔兰国立图书馆，手稿8271。）

想象自己很富有，他想象不出自己会有好的风度，仅仅想到这样的风度就会带给他一种渴望，要侮辱某人。他看风格，或对之的追求，也用一样的眼光。另一方面他拥有煽动的才能，与逻辑有密切关系。当逻辑作主而他的个性在此刻平静的时候，他具有智力的诚实与勇气。这种非个人的情绪交替着个人虚荣的狂妄，在其中他看见世界上每一扇关着的门，用他的拳头敲打它们，向窗口尖叫。如果他的虚荣尚未使自制成为不可能，用一种哗众取宠令人震惊的欲望来代替[作为]天才最初辛劳创造的孤独的话，他原本可能成为一位大作家的，或无论如何能够成为像任何有完全外在的想象力的人能达到的那样伟大的作家。我在一切介于艺术的与日常的自我之间的艺术家身上见到的那种对比，在他的情形下太过粗糙和简单了，日常的部分太过强大，而他的无知——而无知时常有助于外部的想象——剥夺了他一切自律。

我曾被告知所有姓摩尔的人都共同的粗糙来自母亲家族，马约乡绅，很可能在教养和职业方面属于半农民，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具有教养、力量和古老世系的人。他母亲的血液显然影响了他与他的兄弟，正如农民的血脉影响了爱德华·马丁。一直有着一种互相矛盾者的结合，以及因此带来的不结果实。在马丁身上人们也发现了一种本应呈现出创造力的智慧，但在马丁身上不育性是彻底的，尽管不像摩尔他有自制与趣味。他只败在词语上。就仿佛他被放进了错误的身体。两人都是爱尔兰文明因爱尔兰天主教妇女的缺少打养而落后程度的例子。一个爱尔兰大主教徒不会与一个清教徒结婚，因此妇女们一再地阻碍了天主教家庭向着某个高雅世界的提升。爱尔兰天主教的整个系统贬低有能力与出身高贵者，如果它抬高农民的话，而我相信它确实如此。一种长久的文化持续性，像在库勒的那样，从中世纪起在哪一个天主教家庭里都无法产生，也从未产生过。

石头村庄。1914年1月。

246

一个好作家应当简单得没有错误，只有罪恶。

1914年10月

247

上星期一杜普拉茨夫人说她要死了——她的话是“消失”——在下一个12月2日或12月5日之间。庞德和斯特吉·摩尔在场。

1915年11月23日

现在克莱尔·杜普拉茨健康状况极好。

1917年1月23日

《光明》的编辑星期六带来一个洞察力过人者。她不知道我的名字（我甚至贴了一张褐色纸把门牌盖上）。她一进来似乎就心神不安。我听见她低语起死亡，接着她对我说我会遭海难。（我一段时间来一直忙于休·兰恩的

“魅力”被删去。

科勒曼的哈奇，在苏塞克斯，叶芝曾在那里度过12月和1月，埃兹拉·庞德作为同伴和秘书。

《光明：通灵、玄奥与神秘研究刊物》，E.D.道森·罗杰斯编。

事务，他接触了许多通灵人。然而，那洞察者并不完全接受这个解释。)接着她告诉我我会有一个儿子，也许不是婚生的，并去一个遥远的国土。她猜对了我是个诗人和作家，但拐弯抹角问了很多而且极尽恭维，十分迟钝，甚至暗示了王室血统(前生)。

1917年1月23日

248

Annunciation

Now can the swooping Godhead have his will
Yet hovers, though her helpless thighs are pressed
By the webbed toes; and that all powerful bill
Has suddenly bowed her face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All the stretched body's laid on that white rush
And feels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Being so caught up
Did nothing pass before her in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宣告

此刻那突袭的神王本能达到他的意愿
却盘旋着，尽管她无助的大腿被压在那带蹼的趾爪下；而那力大无穷的喙已突然将她的脸按在他的胸前
那受惊的手指如何能将
那被羽的光荣队她松动的腿间推开？
那瘫倒的身体躺在白色灯芯草上
感到陌生的心脏在躺卧处跳动
一阵悸动传向脏腑，自那里浮现出
倒塌的墙，燃烧的屋顶和塔楼
而阿伽门农死去.....

被如此捕获
在空气中是否无物经过她面前？
她是否以他的力量获得了他的全知
在那漠然的喙能任她落下之前。

“丽达与天鹅”，最初发表于《表盘》，1924年6月，参见卷一周英雄译作及译注。

1923年9月18日

The/swooping godhead is half hovering still ,
Yet climbs upon her trembling body pressed
By the webbed toes;and/that all powerful bill
Has suddenly/bowed her face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olry from heer loosening thighs
All the stretched body/laid on that white rush

or

Her bodycan but lean on the white rush
His falling body thrown on the white rush
Can feel etc.

But mounts until her trembling thighs are pressed
By the webbed toes ; and that all powerful bill
Has suddenly bowed her head on his breast
Now /that her body s laid on that white rush
x All the stretched body,laid on that white rushX
x Now that whole
Now that her body,on the white rush
Can feel

那突袭的神王仍半是盘旋着，
然而攀上她颤抖的肉体，压在
带蹼的趾爪下；而那无所不能的喙
已猛然将她的脸按在他胸前
那受惊的模糊手指如何能把
那被羽的光荣从她松动的大腿间推开
整个摊开的身体躺在那白色的灯芯草上

或

她的身体只能斜倚在白色灯芯草上

或

他落下的身体砸在白色灯芯草上
可以感觉到，等等。

但攀缘而上直到她颤抖的大腿被压在
带蹼的趾爪下；而那无所不能的喙
已猛然将她的脸按在他胸前
此刻她的身体躺在白色灯芯草上
此刻她的身体，在白色灯芯草上
可以感觉到。

Final Version

Annunciation

The swooping godhead is half hovering still,
But mounts until her trembling thighs are pressed
By the webbed toes ; and that all powerful bill
Had suddenly bowed her head/Has hung her helpless body,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Now that her body s laid on that white rush
x All the stretched body ,laid on that whiterush x
x Now that whole
NOW/how that her body , on the white rush
Can feel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x Being so caught up/Being wrought so
So mastered by the brute blood of the airX
x Being wrought so
x Did nothing pass before her in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er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WBV September 18 , 1923

A/swoop upon great wings and hovering still
x He sinks until
x He has sunk on her down , and her hair
x The great bird sinks , till
The bird descends , and her frail thighs are pressed
By the webbed toes ; and that all

终稿
宣告

那突袭的神王仍半是盘旋着
然而攀上她颤抖的肉体，压在
带蹼的趾爪下；而那无所不能的喙
已猛然将她的头 / 已将她无助的身体，压在他胸前
那受惊的模糊手指如何能把
那被羽的光荣从她松功的大腿间推开
此刻她的身体躺在白色灯芯草上

她的身体此刻/如何，在白色灯芯草上
可以感到那陌生的心脏在躺卧处搏动
脏腑中一阵悸动在那里产生
倒塌的墙，燃烧的屋顶和塔楼
而阿伽门农死去……
为空气的残忍血液所如此驾驭
她是否以他的力量获得了他的全知
在那漠然的喙能任她落下之前。

WBY1923年9月18日

巨翼一记突袭并仍在盘旋
那只鸟俯冲，而她软弱的大腿被压在
带蹼的趾爪下；而那一切

249

当希巴女王忙碌时
所罗门王默然
“忙碌的女人，”他沉思
“是个凶蛮的野人。”

希巴女王在忙碌
所罗门王默然
因为一个忙碌的女人
是个凶蛮的野人。

250

终稿

Leda and the Swan

x A rush, a sudden and A rush, a sudden wheel,
and hovering still

The bird/sinds down , her frail bare/frail thighs
are pressed

By the webbed toes, and that all powerful bill
Has/laid her helpless face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All the stretched body s laid on that white rush
And fee1s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Being so caught up

So mastered by the brute blood of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丽达与天鹅

那巨鸟沉落，她软弱的大腿被压在
带蹼的趾爪下；而那力大无穷的喙
已将她无助的脸按在他的胸前
受惊的模糊手指如何能将
那被羽的光荣从她松动的腿间推开？
摊倒的全身躺在那白色灯芯草上
感到那颗陌生的心在它所在之处跳动。
脏腑中一阵悸动在那里呈现
倒塌的墙，燃烧的屋顶和塔楼
而阿伽门农死去了。

被如此捕获

如此被空气中残忍的血液所主宰
她是否穿上了他的全知与他的力量
在那漠然的喙能任她落下之前。

251

1930年10月30日。昨晚我看见丹尼斯·庄斯顿上演的《李尔王》第二部分。几天前在我看第一部分时我以为我的不佳印象一部分可能是疲劳，但昨晚更增加了我的厌恶。上演想象性戏剧应当受制于确定的原则。首先，必须具有可视性与可听性，而如果这些缺少的話什么不可能是对的。可视性的缺少如今是所有业余演出人的祸因。他们已学到他们应当避免写实画风的布景，然而却坚持写实的灯光效果，它们把他们的全部戏剧生命牺牲给了仅仅一个暗淡或断续灯光的如画时刻。旧的绘画布景要好得多，它们能赋予一种灯火的光辉。我想要迫使丹尼斯·庄斯顿上演某出莎士比亚戏剧在每一幕都用上所有的舞台灯光。他仍可以抛弃写实绘画，他可以通过风格化的布景取得他的效果。

我有一回看乔治·麦克唐纳家演出《天路历程》，布景是羊毛布置在漂

“……我被《李尔王》驱入的愤怒状态，我想它只有看得清一半而且每个人表演都很糟。过了半我就累得呆不下去了，但今晚要看第二部分。”时芝致格雷戈里夫人。1930年10月29日，《书信集》（威德），第778页。丹尼斯·庄斯顿（生于1910年），演员，戏剧家，《老妇人说“不”》、《黄河上的月亮》及其他戏剧的作

乔治·麦克唐纳（1824—1905），诗人与小说家，《北风背后》（1871）、《公主与恶鬼》（1872）及

白帆布上，并且总是打全光，结果很美丽而简洁，总是最好的，从不“风雅”。我自己的《沙漏》，打全光演出，除了在天使上的地方有略微一点也许不必要的暗淡，以它不同的方式也是简洁而美丽的。克莱格 有一回写道我可以在排成一个半圆的一英尺幕布上画枝条图案来制作一个森林场景。这样一个场景的灯光，如在《沙漏》中的那样，证明是美丽的。舞台有而美工没有的灯光，总是必须考虑到。我反对的是自然主义的效果，每个笨蛋都能创造出来，把自己强加在诗人与观众之间的效果，旧时的绘画布景从不这样做，它使得所有或某些演员在需要人们全部注意的时刻半隐半现。

听不见有的只是没有能力清晰发音，但有很多是出于舞台布置，为了一些图画效果而用一种讲台截除了我们小舞台的里面一半。在所有主要场景中一个演员必须站在这里面对另一个演员，后者就转身背对观众。灯光的缺少更令人听不清，因为耳朵没有得到姿势与表情的帮助，而耳朵后面的头脑就迟钝了，因眼睛的紧张而不专注。有助于一出戏的整个运动的图画效果被牺牲以在背后的幕布间得到一个空间造成天空效果。有时候一出戏会失去了生气，如果不能使演员的身影呈现于某一种色彩之前——白对黑，红对黑，诸如此类。阿贝的黑天鹅绒幕布无论如何应当有过一回被用作这样一个背景。

服装的毛病在于演出人与装饰工人方面普遍缺少戏剧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很可能装饰工人从不知道任何人亮相是在什么背景之前——有一种杂乱灌木丛在一个圣泉边的基本印象。不如回到旧阿贝的原则：两种颜色加第三种以强调，每种颜色在布景与服装中同样轮流成为重点，一种颜色总是在背景中占主导地位。这使罗伯特·格雷戈里得以在格雷戈里夫人的《金考拉》中建立起一种极为美丽的效果，而一切只需大约二十镑。但至关重要的永远是全部或近乎全部的灯光，因为演员优先。一旦接受这一点“风雅”就不可能了。一场搅扰与阻碍演员的演出必须立刻被抛弃。

强烈的自然主义灯光效果似乎极力适合散文戏剧与迅速演出的短暂过场，在那里台词与效果并不冲突。我过去以为不可能在一座画出来的城堡之前谈论燕子“生育的摇篮”，但衬着一片黑夜或阳光灿烂的天空说出的什么话都不会比“谁杀了考克·罗宾”更需要注意。

某些不正确的台词很容易听清——这也很“风雅”。背景有的本身很好，尽管好得从来不是地方。在现代环境中料得到会把石南的背景弄成暗的——很可能我会认可它，尽管黑暗使得我曾见过的每一次疯狂场景的表现都成为失望。我会偏爱这样一种展现方式，计词语做所有的暗示。一个演员怎能成功地与一架鼓风机对抗？很可能莎士比亚用的只是几声雷鸣，它是世代相传下来的，而且总很有效。

252

1930年10月30日日：修改《幻像》。

用“必然”代替“命运”。

天体将“必然”赋予真理——“必然的真理”。精神是真理或联合。“精

其他儿童故事的作者。

爱德华·戈顿·克莱格为阿贝在1911年1月12日演出《沙漏》准备服装与布景。

《马克白期》，118。

神是天体”——真理见于一个“其他”。“天体与精神”在人的意识中发现的必然。第一个说“它是真的因为它在”，第二个说，“它在因为它是真的”。真理是必然的。激情是注定的。

(陈东飏译)

“观念，它们决定什么是必然的，在天体之中。它们是‘构成性的’，否则观念就是精神与天体的结合。”
被删去。

1930年日记四则

诗歌主题。4月30日

友人之死。描述一个人的悲伤混合进一种想法，即自己某些愚蠢的话语和行为的见证人离去了。

描述接近基督教第一个千年终结时的拜之廷。一具行路的干尸。街角的火焰。那里灵魂得到净化，锻打出的金鸟歌唱在妆色的树上，在港口，背向恸哭的死者，它们也许要负载这些死者进入乐园。

这些主题在我脑海中已盘桓有许久，尤其是后一个。

伯克 在他丧失激情的时刻仅让人觉得可以忍受，但不论斯威夫特 说什么都情趣盎然，让人感到他的生机和清晰。我想个中原因是斯威夫特总是用英语来思想，而且在这种语言上他学问深厚。他那个时代看上去最有个性的作家，像以韵文写作的蒲伯，还有那些伟大的雄辩家们，他们用法文或拉丁文思考。在我的阅读中，我发现了多少我思想中的英语和爱尔兰语的原创性呢？这是我思想的第一语言，其中不存在这种原创性。原创性所为与我的思想究竟关系如何？习语仅仅是我寻觅的一小部分，因为当我发现思想出自历史环境时思想就益发生气勃勃。历史环境影响到我的生存环境，或者，情况大概差不多，某种思想由我祖先或许认识的人首先想出来。我祖先中某些人或许见过斯威夫特，大概我那要求与金主教比邻而葬的休古恩璃特的祖母同斯威夫特和贝克莱 都讲过话。我戴着一种理想的表情，由我所拥有的一切——肉体 and 相似的精神——支撑着。当我继承下尽可能多的思想和情感，甚至民族与家族的仇恨与骄傲时，我好像最接近那种理想的表情。

我们的诗歌和散文往往抽象而且有一种舶来品的味道。我对法语所知有限，然而过去我觉得我的句子有一种法语的形式。不过，我也不应机械地强调什么是英语，什么是爱尔兰语，因为若如此强调，我们也便不再能发现新的丰富性。我想到在摩门教 那至上的仪式中摩门教徒赋予其祖先以智慧。可我们的语言和思想匆匆忙忙就与过去分手了，甚至即使我们并不用外语来思考问题。在斯威夫特的文字中，我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不论他用什么样的语速说话，其音色和习语都充满表现力。他说话，我们在闲暇中倾听。

伯克，不论他写一本小册子还是准备一篇发言，都是为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而写，而斯威夫特则写给餐桌或火炉边的人——由此诞生了他的生机和自然平易。而在另一方面，是集聚的人群，是特殊的场合，激发了伯克的澎湃激情。

任维尔。7月23日

我一直在大谈特谈我的长途乘车旅行，即使我嗓子哑了我也不停下。为

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作家。生于都柏林。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格列弗游记》的作者，生于都柏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劫发记》的作者。

乔治·贝克莱（1685—1753）英国哲学家，生于爱尔兰。

摩门教，1830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初期行一夫多妻制。

什么这样？完全是因为我胆小，因为我感到另一个人在评判我，因为我赋予他的沉默以所有可怕的性质。由于被评判所以我必须诱引我的评判员。

致米歇尔的校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儿子现在 8 岁多，即将开始学习希腊文，并且将受到柏利兹方法的训练，好使他尽快阅读所有故事中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奥德赛》，从伊萨卡登陆直到结束。有了对语注的需要，语法就将到来。当他长大，他将读给我听那些伟大抒情诗人们的作品而我将给他讲柏拉图。不要教给他任何拉丁文。罗马人是古代的堕落之徒，他们只有文学形式而没有内容。他们毁了密尔顿、17 世纪的法国和我们自己的 18 世纪。而我们的校长们直到今天还以拉丁眼光来读希腊文。希腊文，如果我们仅以我们本自年轻的眼光去接近，将会重新激发出我们的青春。应该尽他能力所允许尽量教给他数学。我知道伯特兰·罗素肯定说什么什么错，且看他是一个如此轻浮的人。但我懂数学，我无法证明这一点。我不想让我的儿子也如此不可救药。不要教他任何地理学知识。他在阿尔卑斯山生活过，渡过许多条河流。到他 15 岁的时候我将打发他去爬苏加洛夫山。不要教他任何历史知识，我将带去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如果一家商业剧院允许的话。我还将给他所有大仲马的历史小说让他阅读，而如果读不下去别的他就是一个傻瓜。不要教他什么科学，他可以从报纸上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个绅士所要了解的。如果你教他希腊文和数学，又能使他记注他已知的法文和德文，你就做了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如果他打好了希腊文基础之后还想学爱尔兰语，让他学——这将清除他眼前的拉丁文瘴气。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让我的孩子被课程或被你所束缚，让他走出学校变成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半瓶子醋，那么就让你的灵魂被捆绑在红海海底。

（西川译）

四 年：1887—1891

(节选)

我不能理解我曾感受到的那种魔力哪里去了——那时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学龄儿童，在贝德福公园那些未完工的日子里游戏，有一回曾跌在了一块颜料上面，弄黑了两只手，于是在白色的栏杆上留下了我的两只手印。

而我那时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前拉菲尔的。在我十五、六岁时代父亲向我讲了罗塞蒂和布莱克，并把他们的诗歌交给我读；在一次去斯来哥的路上，我在利物浦的一家画廊里观摩了《但丁的梦》(Dante's Dream)，罗塞蒂画这幅画时已经雄风不再，于当时的我来说已不甚悦目，它的色彩，人物及其浪漫的建筑结构有损他其余的所有画作。当我父亲——或许是因为被年轻时的某些记忆所打动——从诗歌传统中选择一些题材时，他会不久就倦怠下来，然后半途而废——永远是这样捉摸不定。我目睹了变化的一点一点到来，也耳闻了被刚刚步出巴黎艺术院校的年轻人渲染了的说辞：“我们必须画我们眼前的东西”，或，“一个人必须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们会说。如我谈起布莱克或者罗塞蒂，他们就会指出其败笔并让我去崇拜卡鲁罗斯·杜兰和巴斯蒂安-勒帕热。然而，他们同时也是非常孤陋无知的一群人；他们不读书，因为一切都无足轻重只要“知道怎样绘画”，以反抗那据说把时间浪费在大多事情上的一代人。我起初以为只有我一个在怨恨这些青年人，怨恨他们对过去的轻蔑和他们对未来的垄断，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发现其他一些同龄人和我所见略同，青年人以一种训练有素的士兵的机械眼光去打量眼前的事物是不妥当的。其实青年们的争执不是针对过去，而是针对现在，针对现在的长辈们如此昭然的权力，如此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强权。其实，难道青年真的竟会爱这么一种未来，在那里再也看不到如今躲在橡树叶子警的被迫害的王权，尽管肯定会出现大量无产阶级的修辞？

我只在一件事上与我的其他同龄人不一样，我的宗教情绪很重，并且，由于我所深恶痛绝的赫胥黎和廷德尔剥夺了我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宗教，我造就了一种新的宗教，差不多是一种绝对灵验的关于诗歌传统的宗教，是关于一堆故事的宗教，是人物和情感的宗教，与其最初的表达密不可分，由诗人和画家借助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一臂之力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我向往有那么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下仅可以在绘画和诗歌里不懈地发掘这一传统，而且还可以在砌在壁炉架周围的瓷砖里，在挡风的幔帐中发掘它。我甚至产生了一个信条：“因为那些虚构的人物是由人的最深刻的直觉中创造出来的，并以此作为人的尺度和规范，所以，任何我所能想象得到的出自他们口中的话或许都最为贴近真理。”当我倾听的时候，他们似乎总是在诉说一件事：他们，他们的所爱，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插曲都充溢着超自然的东西。若不是提香之前的画家们掌握了肖像画法，并在绘画中充斥他们顶礼膜拜的圣徒

卡鲁罗斯·杜兰(1838—1917)，法国画家。

巴斯蒂安-勒帕热(1818—1884)，法国现实主义画家，以描绘农民生活见称。

赫胥黎(1825—1895)，英国哲学家、科学家。

廷德尔(1820—1893)，爱尔兰物理学家。

和圣母马利亚的肖像的话，提香的那幅我情有独钟的肖像画《阿里奥斯托》会具有那种如同等待某种完美结局的庄重神情吗？在 17 岁上我已是一门炮弹满膛的旧式铜炮，任凭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出膛，我的发射是否命中目标是另一回事。

不久，一乘双座小马车载着毛特·岗小姐驾临我们在贝德福公园的房前，她是由费稔会领袖老约翰·奥拉瑞（John O'Leary）介绍到这儿来的。她对战争本身大加激赏，仿佛战争并非为了缔造某种德行，却是在它本身的刺激中存在着某种德行。这让我父亲感到恼火，在她与我父亲争执时我站在她的一边，这更让我父亲恼火，尽管他可能理解——抛开争执涉及了卡鲁罗斯·杜兰与巴斯蒂安-勒帕热这个因素不谈——像我这么年轻的男人是不会对一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什么异议的。今天，她的魁梧身材和不变的外形轮廓使她看上去很像我会让弗洛伦斯·法尔扮演的先知，而在当时，她像是《春天》的古典化身，维吉里安（Virgilian）的赞美“她行如女神”是专为她而发出的赞叹。她的肤色光彩照人，如同苹果树花中流泻出的光，我记得第一次见她那日，她站在窗前一大簇这样的花前的模样。在后来的几年里，当她往返于柏林和巴黎之间时，我总是见她被一笼子一笼子的鸟儿包围着，有金丝雀和各种雀类的鸟儿，狗、鸚鵡，有一次还有一只来自 Donegal 的羽毛丰满的鹰，不管她的行程是多么匆忙，逗留时间多么短暂。

从贝德福公园走大约一刻钟，在去里奇蒙德（Richmond）的大路上住着亨利。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师从他开始受教育。罗斯恩斯坦所作的一幅他的石版肖像画与我的其他朋友的肖像画一道悬挂在我的壁炉架之上。画面上他呈立姿，但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跛腿，他向前倾着，将肘部撑在什么稍事点染的物体上——一张桌子或一个窗台上。他身材魁梧头颅富有力度，凌乱的头发向上翘着，短短的胡须和鬓角显得不规则，脸上挤出皱纹，目光充满自信和沉着，稳稳地凝固在什么目标上，这一切如同在半梦半醒的冥想中，正是我记忆中的他的样子。我看过他其他的肖像画，同样如同我依稀的记忆，就仿佛他只有一种样子，让所有的人一目了然。他是最具人性的人，我常常说他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人性——而且像被挤压和敲打成了一种单一的态度，差不多是被某种颠覆性的境遇磨练出来的一种姿态和一份演说。我在任何事上都与他相左，但我对他的崇敬难以言表，我不喜欢他的诗，但一些早期的脱胎于旧式的法国样板的诗除外。他的诗不规则而缺乏韵律，这让我联想到廷德尔和赫胥黎，还有粗陋无知的巴斯蒂安-勒帕热那空洞的目光农民般地盯紧她自己的大皮靴：他的诗中充满了无精打采的刻划，仿佛

弗洛伦斯·法尔（？—1917），女演员，叶芝的朋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波提切利的代表作之一。

W.E.亨利（1849—1903），爱尔兰诗人。

罗斯恩斯坦（1872—1945），爱尔兰艺术家。

在描述为他截过肢的哪家医院病房。我渴求最强烈的激情，与评论毫不相干的激情，一种久远的，曾被人在半梦半醒之际或在仆仆旅程中吟唱的诗体。不仅如此，他受先拉斐尔派的影响，就如同一些人受到房间里一只猫的影响，虽然初识时他声称没有政治取向和信仰，但他很快就成了一个狂热的联合主义者（Unionist）和帝国主义者。我在谈及他的诗时常说：“他就像一个有着缺憾的出色的演员；可如果萨尔文尼去扮演那个掘墓者，谁还会看上哈姆雷特一眼呢？”我这话或已解释了大部分他的所做所讲。我的意思是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激情演员——角色表演多年来对我来说都毫无意思——而一个激情演员会表达某种灵魂的特质，一再地加以以人格化，就像一个伟大的诗化画家——提香，波提切利，罗塞蒂——会用一种美来给他的伟大作依托，至于这种美，我们今日已用这些人的名字来命名了。爱尔兰（Irving）这个英语舞台上的硕果仅存者（在现时的英格兰和法国已是绝无仅有了），除了他对智慧的那种荣耀的表达之外，别无打动我的地方；而尽管我只见过萨尔文尼一面，我就认定他的天才是一种动物性的高贵。亨利，这个口齿不大伶俐的人——他自称“过于拘谨”——由于个人口角纷争所扰而建筑起一种强有力的襟怀博大的形象。以致借着闪电看它时，这形象便成了他的真实面目。他的部分观点是一种潜意识的机械装置，总是希冀将生活带到戏剧般的转折点上和表达之中，糅合到技巧中去，在那里，自我的真实面目会找到它的语言。没有对手就没有戏剧。由于他是我父亲那一代的人，在他年轻时，罗斯金主义（Ruskinism）和先拉斐尔主义是唯一可能的对手。当一个人自作自受地从芸芸众生之中找到和自己如出一辙的对手，并成天冷嘲热讽时，他如何能怨恨自己的成见呢？在他轰轰烈烈地进行帝制宣传时，他有一次对我说：“告诉那些爱尔兰的年轻人，这一伟业必须进行下去。他们说爱尔兰不适于自治，这是无稽之谈。它和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适合，但我们不能答应。”接着他谈到他期望找到一家都柏林报纸做编辑工作。这或许说明了当时正在开始用盖尔语宣传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代文学——所有的下需要一丁点政府的东西——尽管海德（Hvide）博士当时尚未加入什么联盟，他梦想暴政，但是是 Cosimo de Medici 那种的。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在折叠门隔开的两个房间聚首。我记得那里挂了些来自丹麦大师们的照片，其中一个房间至有一张桌子总是摆着熟肉。我现在只还记得其中一位名叫邓恩（Dunn）的长者，那是一位相当沉静而又睿智的人，是亨利的老朋友。我们那时还是年轻人，在自己或在外界看来还都一无所成，而亨利是我们的头领和知己，有一个晚上，我发觉他独自一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年轻的 A 君——，”他嚷道，“刚刚来向我讨建议，我是否该认为他和 B 夫人私奔是明智的呢？”“你非常明确地要管这事吗？”我问他，“一定要管”，“好吧”，我说，“既然如此，我拒绝给你任何建议。”B 夫人是个美貌的才女，如同威尔士 Triad 对 Guinevere 的说法：“热衷于被猎取”。我想我们对他是言听计从的，这多少是因为他明显不在我们

萨尔文尼（1839—1915），意大利演员。

Cosimo de Medici（1389—1464），有名的艺术赞助人。

的长辈的一边。我们的争论或许有不同的立场，但争执的结果似乎比立场更重要，而他的信心十足的神态和他的演说使我们或许是第一次坚信了胜利。除此。如果他当真指摘我们私下里敬仰的某人——对我来说他确实这样做过——他从不忘了将此人同我们所不屑的人或乎联系起来。有一次我见他刚刚从利物浦或曼彻斯特的某个艺术机构回来，“艺术的救世军主义”，他这样称呼它，并对一些他认为崇拜透纳的市议员进行了一番可笑的描述。他憎恨一切罗斯金赞赏的东西，所以才挖苦特纳，而次日当看到那个市议员在画廊的另一端欣赏某些先拉斐尔作品的时候，他便又挖苦先拉斐尔的东西。到了第三天，亨利发现这可怜的家伙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目光凄凉地凝滞在地板上，他同样也吓唬我们，我自然不敢——我想我们谁也不敢——夸赞他所不齿的哪本书或哪幅画，不过他总是让我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没有他的赞赏，我们中间没有谁能干好工作或者做出这种许诺。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天晚上的会议，见面的有查尔斯·怀卜利(Charleswhibley)《黄金时代》的作者肯尼斯·格莱姆(Kenneth Gra-hame)，现在已经成名了的小说家巴里·培恩(Barry Pain)，艺术评论家及有名的辩论家史蒂文森(R.A.M.Stevenson)，后来成为内阁部长和爱尔兰总书记的乔治·文德海姆(George Wynd-ham)，和比我们其他人都大上十岁的奥斯卡，王尔德，但是那面孔及名字对我来说都模糊了。有时一面之交的面孔会清晰如昨，但在许多星期天的晚仁碰到过的某个面孔倒可能淡去了。吉卜林有时会来，但我从没见过他；还有斯泰普尼阿克(Stepniak)，那个我在其他地方而不是那里相熟的虚无主义者，说：“我外出不能多于一年一次，那太累人了。”亨利在我们之中出类拔萃，因为他使得我们把他当成我们的决断者，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判断既不会沉睡，也不会被软化或更改。当我想到他——我的眼中一直存在作为人性基础的那种对照法——我便看到他的跛足，仿佛他是个锻工，不懈地炼造着供他人使用的刀剑；当然我还总会想到C某，一位白面绅士模样的出色的古典学者，却如同我们军中横刀立马的侠客，当亨利创办了他的周刊时——先是《苏格兰人》，继之是《国家观察者》——这个小伙子撰写那些文章和评论因其狂野的穿透力而声名大噪；若干年后当《国家观察者》气数已尽，亨利快要死去，我们这帮不法分子的老巢也呈人去楼空之势时，我在巴黎见到了郁闷而又穷困潦倒的他，“什么人也不会雇用我了”，他说：“你们的师父不在了”。我答道：“你就像古老的爱尔兰故事中的那根长矛，须得一直泡在罌粟汁之中。好不致让杀人的罪名落在自己身上”。我为《国家观察者》写了我的第一首出色的抒情诗和一些尚可一谈的论文，并且按我签定的，我的作品多少有些自由发挥的余地。亨利时常修改我的诗，圈掉一行或者一段，然后写上他自己的东西，而我心安理得地相信，他也对吉卜林这位当时早已成名了的诗人的作品删删改改。起初，我确实为作品被改写而感到羞耻，觉得别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只在文章中的格言，古训，以及所有这些编辑的特点牵涉到教区风尚和埃及已夏的鸦片时才开始查证。

透纳(1775—1851)，英国著名风景画家。

查尔斯·怀卜利(1859—1930)，英国学者、批评家、记者。

肯尼斯·格莱姆(1859—1932)，作家。

吉卜林(1865—1936)，英国著名作家。

斯泰普尼阿克(1852—1895)，俄国作家。

我并不非得听命于修改，因为韵律一般是很棘手的；而在散文方面我能避免难以接受的意见，在这方面我只写些鬼怪故事，都是从我母亲 或洛斯的某个水手那儿听来的，于是亨利发现我非得在一块调色板上调出适合我题材的色调不可。但要是他把每个“has”都改成“hath”的话，我会随他的便——我们难道不是一直沐浴在他的慷慨的阳光中的吗？在一封赞赏查尔斯·怀卜利的作品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年轻的伙计们超过了我，写得比我强，”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则夹了我的《梦回仙境的人》：“看看我的伙计们写出了多漂亮的东西。”

那时我常见到王尔德——是1887年抑或是1888年——我无法确定这个时间，但我当时已发表了我的第一本书《奥依辛漫游记》，而王尔德尚未发表他的《Decay of Lying》。在我们初次见面之前他已经评阅了我的这本书。尽管书中有意昧含混、言语模糊之处，他还是无条件地给予了激赏；而比任何评阅更宝贵的是，他曾就此书发表议论；而且他开始要我去和他一道吃圣诞晚餐，我猜他是以为我在伦敦孑然一身罢。他那时正嫌弃起棉绒质地的东西来，甚至包括袖口上翻卷的那部分，而且开始小心地依照当时的时尚着装。他住在柴尔西（Chelsea）的一幢不大的房子里，其建筑师葛德文 将它装饰成惠斯特勒式（Whistler）的典雅风格，一扫中世纪或先拉斐尔的痕迹。没有薄金上镶着肖像的柜门，没有孔雀蓝，没有暗黑的布景。我隐约记得一间有着惠斯特勒风格蚀刻画的白色窗格，还有一间是餐室；清一色的白色椅子、墙壁、壁炉架、地毯，除了桌子正中的一件赤土陶塑像下面放的一块宝石形状的红布；以及——我记得——塑像上方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只红色罩影的灯。他这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光或许是过于天衣无缝了，我还记得我曾想过：他和他的娇妻幼子的和谐完美的生活暗含了某种刻意的艺术组合。

在饭桌上他把自己的特征都追究到他的国家身上，借此来褒贬自己：“我们爱尔兰人过于诗化因而成了诗人；我们是一个悲壮的失败民族，但我们是继希腊人之后最善言辞的人。”晚餐之后，他读给我《The Decay of Lying》的校样，谈到叔本华分析了作为现代思想特征的悲观主义，但是哈姆莱特发明了它，“由于一个傀儡曾经悲怆过，世界陷入了哀伤”，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哀伤’改为‘悲怆’呢？”他回答说需要在句子的结尾音色饱满，而我不把这当成个借口，反觉得这个例子表明了有根于他的写作的那种模糊的印象性。只有当他说话，或者当他的写作直接反映他的言谈，再或是以某种简单的童话面貌出现时，他的用词才恰到好处到足够捉住一只敏感的耳朵。他使我焦躁不安——尽管没有到亨利带给我的那种焦躁程度，因为从他那家出来时我从不致自觉愚钝。他将他喜欢的每个人的脑子都吹嘘一番；他让我给他讲长篇累牍的爱尔兰故事，然后将我的讲故事的本事与荷马的相提并论；一次，当他在调查问卷中将他自己描述成“19岁，职业大才，体弱的神童”时，一位刚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年轻记者问：“那我该怎么写呢？”于是被告知应当写成“职业神童，体弱的天才”。然而当我穿着颜色太黄的皮鞋——没涂黑的皮革当时正在开始流行——登门造访时，我从他盯着它们的眼光中意识到了它们的夸张；另一天里，王尔德让我给他的小男孩讲个童话，我刚讲到“从前有个巨大的怪物”，这孩子就尖叫着从屋子里跑出去了。

参见《自传》第二章注。

王尔德脸色阴沉，而我则因为让孩子受到惊吓而无地自容。当我因为每月几个先令的报酬而为一家地区小报打听某些文学趣闻时，我被告知，撰写文学趣闻不是件绅士做的工作。

尽管与荷马相提并论将时间轻松愉快地打发掉了，但如果他用一句“是个很长的故事吗？”来打断我——而亨利就会这么做——我也就不会就此被扰得心神不宁，我在他这位睿智得一如遗世独立的人面前感到腼腆。我记得，他曾驳斥那种对他的成就或能力的广泛崇信，我认为他是诚恳的。某种形式的成功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不再是这个季节中的狮子，而那时他尚未发现自己创作喜剧的天赋，我认为我是在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认识他的，他的名字从不与丑闻沾边，他的能言善辩在他的圈子里越来越有名，而他似乎生活在对自己的原生状态的陶醉中，一天他开始提到：“我一直在虚构一个基督教的邪说，”然后他以某个早期基督教阐述家的风格讲了个情节详细的故事，关于基督怎样在钉在十字架上之后苏醒了过来，逃出了坟墓，在世上生活了很多年，洞察基督教的荒谬。一次，圣保罗造访了他那个城市，他独自留在木匠棚子里没去听他的布道。于是其他木匠注意到，不知为何，他总把双手遮掩着（暗指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留下的疤痕——译者）。几天之后我看到了王尔德，在他面前的地板上散放着各色的罩褂。一位传教士解释说，他不反对不信教的人工作日里赤身裸体，但他坚持在教堂里要穿衣服。他用一辆车把这些罩褂带来，好让这唯一一位声望远扬中非的艺术评论家挑选一种颜色；于是王尔德坐在那儿仔细摆弄着所有的罩褂，表情中带着一种教士般的庄严肃穆。

我记不清是准第一次把我带到凯奥斯葛特（Kelmscotthouse）旁的那间厥舍中——那里是威廉·莫里斯在汉莫史密斯（Hammersmith）的住所——把我带到每星期天晚上在那里进行的社会主义联盟的讨论会上，很快我就成了这个小群体的成员，我们做完帘后就和莫里斯共进晚餐。在餐早上我时常碰见沃特·库兰，爱沫利·沃克（Emery Walker），以及考伯登·山得森——他印刷过许多精美的书籍——偶尔还见到现在菲茨威廉（Fitzwilliam）博物馆工作的萧伯纳和考克莱尔（Cockerell）。好像还与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普林斯·克劳泡特金（Prince Kropotkin）打过一两次照面，在那里还会常常遇见些多少受过点教育的劳动者，他们言谈举止粗鄙，回回必来无疑。有一晚，或许因为我做的比平时的交谈多了些什么，他们中的某个人告诉我说，我一晚所放的厥词比他过去整个生活中所听到的还多。我不过更偏爱当时正处事业高峰期的巴奈尔，而不是被国际政治败坏了其爱尔兰影响力的麦克·戴维特（Michael Davitt）罢了。我们围坐在一间屋子里的一张长长的、未经刨光和喷涂的、新木制成的叉架桌旁边，那屋子里悬挂着罗

参见《自传》第一章注

库兰（1845—1915），英国画家、诗人、社会主义者。

山得森（1840—1922），英国画家、书籍装帧设计家。

萧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作家、戏剧家。考克莱尔（1869—1962），曾任莫里斯的秘书。

。

塞蒂作的莫里斯夫人的肖像画《石榴树》，一面墙和部分天花板用一块大篇幅的波斯地毯罩住。莫里斯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地毯都是为了那些进门前脱鞋的人们而设的，而且多用于帐篷里的地面上。这房子让我有些失望，因为莫里斯是个上年纪的人，终是满足于搜罗漂亮家什而不是布置一间漂亮的房子。我看过一两次他的画室，仅仅在那里，我基于罗塞蒂的作品而建立的所有有关装饰的认识因一个大大的碗橱得到了满足——那上面有伯恩·琼斯（Burne-Jones）所绘的、得于乔叟作品的一个图景，但即使那里也还是有看上去实属随便的物件，或许一把椅子或一张小桌，大概是为了让妻女感到惬意而草草购得的。我在孩提时代在我父亲的藏书中读到过《地上乐园》的第三册，以及我不那么喜欢的《The Defence of Guenevere》，但都没有读完。

《再也不会发笑的人》似乎一直是我最为津津有味故事集，直到我父亲指摘我在莫里斯与济慈之间更偏爱前者并为此生气动怒，搞得我很不自在。他破坏了我的乐趣，因而我现在读书时总伴随着质疑，然后以弃之不读告终；而其时莫里斯也尚未写出那些在他身后变得如此烧心悦目之至的浪漫文章——那些让我慢慢品味，不忍一口气读完的文章。后来是莫里斯本人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对他的迷恋起初是由于他的言谈举止，那其中一些小巧不言的东西唤起我对住在斯来哥的祖父的印象，但不久就发现了他的纯然天性和怡然的快乐，从而将他看作我心中的英雄。今天的我不再将他的诗歌成就看得很高，除了一两处妙笔或灵感；然而，假若哪位天使给我这个选择，我会宁愿放弃我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的生活而选择他的生活、他的诗和他的一切。他的肖像的复制品与亨利及其他友人的肖像一起悬挂在我的壁炉架之上。那灰色的大睁的双眼，像某种沉浸在梦中的野兽的眼睛，让我联想到提香的阿里奥斯托的那双睁着的眼睛，而那宽大的生机勃勃的身躯提示着一种头脑，那是无需靠智力来保持清醒的，尽管它会把自己交付给每一个迷狂的幻想：中世纪的梦者。是“仙国的傻瓜……像山峦一样辽阔而狂野”，是决然的欧罗已的化身，同时又半带着对佛陀的静默的冥想的记忆，与那种孱弱摇摆的、处心积虑的理性思考毫无共同之处，除了我们的时代中某些著名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那样的冥想是无法洋溢在心灵之窗的。莎士比亚自己预示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变迁，那是世界整体气质中的一种变化。尽管他称他的哈姆雷特“愚蠢”，甚至“缺乏生气”，但他在他的指间插入了锋利的匕首和投枪。

莫里斯的梦中世界与其他天才人物的一样，是同日常生活相对立的，但他对这种对立从未察觉，所以他对智识式的痛苦一无所知。他那不曾为思虑或诡辩掏空的悟力完全听命于手和眼，只要他喜欢，他就以一种“没听说过”式的泰然和洒脱处之，如果有时他的风格和语汇显得单调乏味，那会不是因为别的，一定是他放弃他的本色了。与乔叟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不同，他的语言的编织，纹理的经线是别开生面的——如果说它的纬线是已获知了的话——他的年龄赋予了他一种从抽象中释放出来的语言，当熟练而又缓缓地写起来时，它只有回到它的充沛的生命力中去。

他那种对照格的梦境的根源是清晰可辨的：一个身强力壮、脾气暴躁又从不懈怠的人——他不是圣诞节那天将一块烤坏了的梅子布丁扔到窗外去了吗？——一个比我们的世界中任何一位智者都快乐的人，他自称“空洞的一大的懒散的歌手”，创作出多种新的忧伤的形式，以及苍白的人物，比如骑士以及伯恩·琼斯的淑女们，在洋洋四十卷中他们从来没有，哪怕一次，显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在都柏林的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野餐会上曾经有一个莽

撞的人，为了证明平等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对唯一的一位没改变信仰的人说：“我生来是个绅士，可现在，如你所见，是兼容并包的。”于是因此留下了创伤，二十年后仍隐隐作痛，我听到对他这样的说法：“他总是唯恐做错什么，而又总是错”。他写些篇幅冗长的故事，在那里面他的人物们通过凄婉的困境向彼此表露几近天衣无缝的圆熟老练，除此他显然不写别的题材。

他并不像亨利或王尔德那样突出自己的形象，这是因为他把自己全部的想象都用在创造和工作上，对自己的认识则少得可怜。他用想象来寻求创造和工作的新条件；而我，不顾那些在少年时代威慑了我的一般的科学法则，能够看到一些——比如——每次巨变中所进行的想象，并相信：第一条飞鱼跳起来不是为了寻求对空气的“适应”，而是为了逃出海面的恐怖。

X V

我有各种女性朋友，我可以单为了讨论我的一些思想而在度晨5点打电话给她们，而这些思想我不会流露给一个男人，除非对方的思想不相上下，同时也多少由于他们的茶和烤面包片给我省出了回家的车票钱；不过，和女人在一起时，除了与她们亲密的思想交流以外，我是胆怯害羞的。我坐在博物馆前的一条椅子上喂鸽子，有几个女孩坐在近处，把我的鸽子逗引过去，彼此相对大笑看低语。我愤愤然地直视着前方，过了一会儿便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地走进了博物馆。而那之后我时时琢磨她们是否漂亮或仅是非常年轻而已。有时我对自己讲些以自己为主人公的非常冒险的爱情故事，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则盘算出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而有时又会将不同的理想掺合起来，等划一种被时不时的堕落减轻了艰苦程度的清心寡欲的生活。我那时仍然怀有着在斯来哥的童年时代形成的野心，要摹仿梭罗(Thoreau)在劳夫·吉尔(Lough Gill)的茵纳斯弗里(Innisfree)小岛上生活。当我满怀乡愁地走过弗里特街时，我听到了叮咚的水响，看到商店橱窗的一个喷泉，有个小球在喷之口控制着平衡，于是开始想起了湖水。从这突发的记忆中产生了我的诗《茵纳斯弗里岛》。这是我的第一首抒情诗，它的韵律的任何一个细部都是我自己的音乐。我那时已开始将节奏和韵律松弛下来，以此作为对修辞的逃避、对修辞带来的拥挤的情绪的逃避，然而我仅仅是模糊地、间或地明白：为了我的特殊的目的，我必须仅用普通的造句法，除此以外不用别的什么。几年过后，我不会再以那样的惯常的古语风格来写第一行了——“起身离去”——也不会最后在最后一节中运用倒装法。有一天路过新法院——这座建筑因为是哥特式而为我所仰慕。莫里斯曾说“它不是很好，但比他们搞的其他任何东西都好，所以他们恨它”，我突然因那沉重的巨石感到压抑，便想：“方圆数里的石块和砖瓦环绕着我”，很快又补充道：“如果施洗约翰之类的人再现，并对此有所思考的话，那他就会让所有这儿的人们走出去，到荒野中去，让这建筑一空”。那种想法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价值，但在当时则有如茅塞顿开，以致仍然记忆犹新。我在牛津花了几天的时间为一个出版商抄写柏吉欧(Poggio)的《Liber Facetiarum》的一份17世纪的译本，抑或

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主张回归自然，代表作有《瓦尔登，或林中生

柏吉欧(1380—1459)，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

是玻里非利 (Poliphili) 的《Hypnerotomachia》，我记不清是哪个，因为两个我都抄录了——然后熬得面色憔悴地回到我那为此惶惶不安的家人中间。我一直只靠面包和茶水度日，因为我想，既然古代时就发现了蚱蜢和蜂蜜的营养价值，那么我的灵魂足够坚强到不需要比这更丰盛的东西。我总是计划一些大的动作，把整个世界放置于天平的一个秤盘里，把我的灵魂放置于另一个秤盘里，想象世界会打在横杆上。30多年过去了，我从没见过哪位具有感召力的文人不需什么兴奋剂就能凛然直面这个大都市；而二、三年或二、三十年后——依各人的固执程度而定——所有人都认识到：我们所成就的——如果我们真的成就了什么的话——就如同我们在做着的一条饰带上原封不动地扎上了些针脚。从兴奋剂中我只得到一项无以比拟的优势：我可以将破袜子染上颜色，使之不致从鞋里暴露出窘相来，一面脑子里满是最为高傲的想法，想象着我自己和我的破家当在某个遥远的什么地方，“苍穹之下……是风筝和乌鸦的城市”。

伦敦在我眼里一无是处，让我总是记起罗斯金曾对我父亲的某个朋友说过的：“我去大英博物馆工作的路上，见到人们的面孔一天比一天堕落”。有一次我说服自己：同样是去博物馆的路上，我所看到的与他所见的那种情况不同，一些上年纪的妇人的面孔令我惊恐——那些面孔已下会在那儿了，或者如果还在的话，我也会擦肩而过毫不察觉——那些因喝了过多的啤酒、吃了大多的肉而长着双下巴的妇人们肥胖的，长着斑点的脸。在都柏林我时常见到瘦骨嶙峋，扬头走路的老太太们，大声地自言自语着，因为酗酒和困顿而发疯，但她们是另一种情况，她们浪漫。达·芬奇画过这种样子的妇女，画出的身体也是那副样子。

Xv

我已见过了我辈之中绝大多数的诗人，在《奥依辛的漫游》出版不久之后，我曾对那位为了先令而再版了一系列书籍的编辑——他曾让我编纂过爱尔兰神话故事——说过：“我越来越嫉妒其他诗人，除非我们彼此相识，并分享彼此的成果，否则大家都会彼此生出嫉妒。”他是个威尔士人，后来成了一位矿业工程师，名叫昂纳斯特·里斯 (Ernest Rhys)，是位威尔士作品翻译家、诗人。他的诗经常深深地打动我，尽管我记不起还有没有别人读过他的诗，他可能比我大十多岁，并且通过他的编辑工作掌握了所有肯为七八个英镑而编书的人，在我们之间我们建立了吟诗俱乐部，在那几年里，在弗里特街一个叫切希尔乳酪店里，我们每晚都在楼上的一间有着抛光地板的房间里聚首。莱昂内尔·约翰逊 (Lionel Johttson)，昂内斯特·道森 (Ernest Dowson)，维克多·卜拉 (Victor Plarr)，昂纳斯特·莱德弗德 (Ernest Redford)，约翰·戴维森 (John Davidson)，李察德·里·伽里恩 (Richard

L. 约翰逊 (1867—1902)，不太有名的诗人。

E. 道森 (1867—1900)，诗人。

卜拉 (1863—1929)，诗人，编辑。

E. 莱德弗德 (1882—1920)，诗人。

约翰·戴维森 (1851—1900)，诗人、剧作家。

LeGallienne) , 罗莱斯通(T.W. Rollesion) , 塞尔文·伊梅治(Sel-wyn Image) , 爱德温·爱利斯(Edwin Ellis) , 约翰·陶德亨特(John Todhunter) 一度每次必到, 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 和赫伯特·霍恩(Herbert Horne) 则偶尔缺席, 而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 虽然加入却从不露面, 弗兰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 来过一次但从未加入进来; 有时, 如果我们在某个私人住所碰面, 我们偶尔这么做, 奥斯卡·王尔德会来。邀请他到切希尔乳酪店一向是徒劳的, 因为他厌恶玩世不恭的社交圈子。他曾对我说: “奥立佛·施莱纳(Olive Schreiner) 现在正住在 East End, 因为唯有那里的人们不戴面具。但我告诉她, 我住在 West End, 因为我在生活中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面具。”

我们朗读自己的诗作给大家听, 互相评论切磋, 佐以葡萄酒。现在当我谈及这个俱乐部时我有时会说: “我们有怎样怎样的主张, 曾经与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有过怎样怎样的争吵, 我们给自己制定过怎样怎样的目标”, 仿佛我们有许多哲学主张似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现在耻于承认我曾有过这些主张, 而当时每当我开始谈论我这些主张时, 我们那间屋子就陷入一种阴郁的沉寂之中。一位年轻的爱尔兰诗人——他妙笔生花但举止令人无法忍受——若干年后说: “你谈起话来不像诗人, 而是像个文人”, 若不是所有的那些“吟诗俱乐部”成员们一直谦谦有礼, 若不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过牛津或剑桥的话, 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同样这么说。我那时满脑子都是思想, 常常是非常抽象的思想, 一直渴望着能充满幻想, 因为我上的是艺术院校而非大学。即使我果真上的是所大学, 并且打下了英语文学和英语文化的所有古典基础——所有那些一旦拥有便将人的思绪从浮躁中解脱出来的博大精深的学问——我便会不得不放弃我的爱尔兰题材, 或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传统。由于缺乏足够的公认的先例, 我必须为我所做的一切寻出某种理由来。几乎从一开始我就明白, 过于沉溺于理由, 就会从骨子里显出不很高贵; 因此, 一旦可能, 我就会隐埋这些, 如同人们隐埋一位有争议的祖先; 然而看到我的祖国还没诞生, 这一切道理都显得无济于事。我属于那种注定不会有完美成就的人, 而且在一种诅咒之下——事实也正是如此——像某种鸟类, 把筑巢所需要的时间花在用青苔、树枝还是地衣为妥这类的争辩上。里·伽里恩和戴维森, 甚至席姆昂斯(Symons), 一起步就显出见识的狭隘, 但他们的狭隘是可以化解的, 而我的则无可救药; 而所有更年轻的人们所共有的信念(拥有这一信念的首要人物是约翰逊和霍恩, 他们的人格对我们影响颇巨), 便是对所有的可以解释和争论的思想以及所有一般法则的反抗。刚刚从巴黎来的席姆昂斯有时会说: “我们除了印象什么也不关心”, 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笼统的概括, 所以只能是放空炮, 谈话时时陷入“你喜欢某某的最近出的那本书吗?” “不, 我更喜欢他的前一本书”之类。我认为, 若不是那些有什么就说什么的爱尔兰成员, 这俱乐部是不会熬过最初那困难重重的

R.L.伽里恩(1866—1947), 作家。

罗莱斯通(1857—1920), 爱尔兰作家。

伊梅治(1849—1930), 艺术家。

爱利斯(1848—1916), 诗人, 曾和叶芝一起编辑过布莱克的著作。

以下几位均为俱乐部成员, 一些不太有名的诗人。

几个月的。我那时对斯温伯恩是一种看法，对勃朗宁是一种看法，对丁尼生是又一种看法，他们的作品在我眼中充满了我所谓的“不纯洁的东西”，即对政治，科学，历史以及字教的好奇——而现在我为我当时这种“文人”式的看法感到羞耻，为我对这些诗人自有的河床样式所持的漠视而感到痛心——并认为我们必须再造纯洁的作品。

我们的装束大部分情况下同我们的交谈一样无甚新奇，虽说我当时其实穿一件棕色的棉绒外衣，打着松松垮垮的领带，还披一条老旧的披肩——那是 20 年前被我父亲淘汰后，又被我那斯来哥出生的、行动如同季节一样摸不着头脑的母亲保存下来的。在这个俱乐部里，除了里·伽里恩领带松垮、席姆昂斯有一条很新的几乎时髦的披肩以外，没有别的成员会穿有异于“英国绅士”的服装露面。“一个人应当十分不起眼才是”，约翰这样对我解释。那些在服装上最亦步亦趋赶时髦的人，一般说来在字体上则最与时髦不沾边——总是纤小，工整。一位诗人——叫什么我忘了——写的是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字体。在数年之后，席姆昂斯成了我的一位知己，我对道森和席姆昂斯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我仍一向无法对约翰·戴维森的英格兰式的粗鲁和暴烈表示释然，尽管我和他频频谋面，但我一开始就倾心于莱昂内尔·约翰逊。他和霍恩、伊梅治还有其他一两人合伙雇了一个男仆，合租了菲泽瑞广场的夏洛特街上的一幢房子。这是一伙典型的过渡时期人物，他们做着他们的前辈在享清福时做过的事，将此作为一项学问和精致品味的收获。他们全都是前拉菲尔派，有时在他们中某个人的房间里，你会遇见一个前朝遗老一样的衣衫破烂的人物席梅昂·所罗门，他是先拉斐尔画家，曾是罗塞蒂和斯温伯恩的朋友，但当时刚刚从某个低等的公寓出来。由于一项犯罪行为，他遭受了长期监禁，这使得他终日酗酒，在痛苦的深渊中不能自拔。某夜当他被介绍给别人时，在昏暗的烛火下，对方将他错认为是另一位所罗门——那是位成功的学院派画家和助理研究员——他怒发冲冠地质问道：“先生，你怎么竟敢把我当成那个江湖骗子？”尽管没有一个人听过最微弱的乌鸦的叫声，也没有谁让任何一束赫胥黎、廷德尔、卡鲁洛罗·杜兰、巴斯蒂安-勒帕热这种老树枝上滴落的最微小的鸟粪溅到身上，我还是开始怀疑他们的温吞，甚至落伍。出于这种疑虑，我一直与霍恩没有亲密起来，他后来成为研究 15 世纪意大利生活的最伟大的英国权威，还写了一本够水平的关于波提切利的著作。他在若干艺术领域都是个行家，曾经为 Marble Arch 附近的一个墓地设计了一个因尼哥·琼斯（Inigo Jones）样式的小教堂，尽管现在我认为他的小教堂是件绝妙之作，但它的样式落伍了一个多世纪，无法勾起我这二十二、三岁的人的兴趣；我贬斥他倒向 18 世纪——

教导一批

傻瓜去打磨，去嵌刻，去修剪，去适应

直到，如像雅各的那些机巧的枝杈，

他们的诗行被反复推敲。

还有一种狂热推延了我和这样两个人的友谊——他们现在都是我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我的主要的指导者。有个人——可能是莱昂内尔·约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曾被封为宫廷桂冠诗人。

翰逊——把我带到查尔斯·里基茨（Charles Ricketts）和查尔斯·香农（Charles Shannon）这两个名人的工作室，我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幅香农的作品，上面是一位女士和一个孩子，都身披绸缎滚边的盛装，让人想起那令人厌恶的世纪。由于我的眼中尽是些更具神话色彩的母亲和孩子，所以对此嗤之以鼻，还告诉香农说，他画的不是一位母亲和孩子，而是等待着拜访者的优雅人物，我觉得这么说是对他猛烈的抨击。有人在 Germ 中写过，画着一只松鸡和一个苹果的图画只是一幅食物的图画，这种对主题的无动于衷令我如此愤怒。主题自巴斯蒂安—勒帕热以来就是所有艺术评论老生常谈的话题，以致我有些时候除了主题之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以为，对一个人自己来说，无论他爱上的女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扒手还是定期到英国教会领圣餐的人，只要他爱得深切便无所谓。可是，对于他的亲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所有的邻人来说——这些都绝非是无所谓的事。确实有些时候，如同莫里哀作品中的某位父亲，我全然忽视了恋人的诸般情感，甚至拒绝承认：稍微的堕落，或许恰是稍加点缀的色彩，可以增添刺激，尤其是如果这种关联不是长久的话。

在这些生于激情死于悲剧的众多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当中，T. W. Rolleston 这位安详沉静的人似乎总是不得其所；是我把他带到爱尔兰去的，当时想日后在那儿给他安排个工作。我听说年轻的都柏林工人们溜出作坊去观看第二个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Davis）途经此地，甚至我还记得由三、四个人酝酿的一个计谋，要推他为“国内外爱尔兰种族的领袖”，而之所以如此全是因为他有着通常的相应特征；说到底，毕竟，亚历山大大帝和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据说都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而基督教的奠基人恰是不高不矮一介六呎的男儿。我们爱尔兰这些人的想法和那些戏剧、歌舞中一样，没能认识到，从大自然最初预见到巴斯蒂安—勒帕热的降生那一刻起，她就将伟大的创造力仅传给了一种人，即那些因为放纵或者好奇而面孔扭曲的人，或者那些大智若愚的人。

我那时已经见到了使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成为文学史上的悲剧的所有人物，而我们无论是天赋还是运气似乎都不相上下，彼此之间甚至缺乏个性分别。记得有个晚上在切希尔乳酪店——那天晚上来的诗人比平时要多——我说：“我们之中谁也说不成功者会是哪位，甚至也说不出哪位有或者没有天分。关于我们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的人太多了。”

我已经描述了王尔德、亨利、莫里斯摹仿或试图摹仿的形象——那种形象总是与自然的我（the natural self）或自然世界相悖。但我还没讲到我那时是否为自己找到了某种形象。我对自己所知寥寥，对自己的反面所知就更少：也许为我做饭的女人或那个把我的文章扫走的女人比我知道得更多。也许由于自然将我造就成了一个爱热闹的人——到处寻找谈话的场合，时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准备否认最值珍视的自然的法则——所以我热爱孤傲的事情。年少时，我每日到教堂司事的女儿那里学习写作，在她的学生读物里我

查尔斯·里基茨（1866—1931），画家、艺术评论家。

查尔斯·香农（1886—1937），画家。

发现了一首诗，它带给了我无以伦比的喜悦：那是一段译自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诗体文字，是鸟儿对人类的讥谑。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的思绪沉浸在热衷交际的雪莱的关于一个年轻男子的梦中：被悲伤漂白了鬢发的他在孤独的象牙塔中研读哲学；或者雪莱关于一位老人的梦：学贯所有人类知识的大师，隐身于地中海岸的某个遍布贝壳的洞穴中。其中有一个段落一直萦绕我的耳畔——

有些人把他杜撰成伊诺克：其余的人则梦见

他是亚当前的人，并已捱过了

世代的轮回和兴衰。

抱守着真理的圣贤，身经严苛的禁戒，

战胜肉体背叛带来的苦行，

静思默想、求索不倦，

在人的时代无法企及的岁月里，

便已得到了权力和科学

掌握了那些强大、秘密的事情和思想

那些他人所惧怕和未知的东西。

马穆德（MAHMUD）

我会与这位老犹太交谈。

哈桑（HASSAN）

你的愿望现在是沉静的了

让他知道他在哪里的海边洞穴中栖居

“在女妖中间，难以接近

比你或上帝难以接近！谁若质疑他

必得在日落时独自远航，滔滔的

海洋环抱着安详的岛屿睡去，

当年轻的月亮像此时一样西下，

夜晚的空气在波浪之上弥漫；

当那蜂儿飞舞的岛上的松树，

Green Erebinthus，扑灭了蓝宝石般的海水中

他那镀金的船首的熊熊的阴影，

于是这孤独的舵手必得放声大哭

“Ahasuerus！”而周围的洞穴

会回应“Ahasuerus！”若他的祈祷

得以允诺，一颗黯淡的流星便会升起，

在玛摩拉海的上空为他照亮；还有一阵风

会从呻吟的松林里冲出来，

伴着风是一场和谐的风暴

妙不可言，引导着他

穿过柔软的黄昏驶向博斯普鲁斯；

于是，天造地设

顺应了他们的会谈，

那犹太人出现了。敢当此勇者无几，但只要谁有胆量

谁就能赢得这渴望中的圣餐。

早在都柏林时，我就已经被通神论者所吸引，因为他们断定了那个犹太人——或与他相似的人——的真实存在。抛开赫胥黎、廷德尔、卡鲁洛斯·杜兰和巴斯蒂安—勃帕热所可能想见的任何情形，我看不到任何与他的真实性相悖的东西。最近听说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sky)从法国或印度来，我便感到是对此加以探寻的时候了。如果智慧确实在这世界的什么地方存在的话，那毫无疑问是存在于某些孤独的头脑之中，对我们并不负有什么义务，只与上帝交流，宠辱皆忘。被单一思想和品味捆扎在一起的所有的人们，难道不都相信这种人的存在、并对他们或他们的影子心怀崇敬——他们曾拒绝把这种崇敬献给慈善家或博学者——吗？

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我时常见到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穿棕色棉绒外套的男子。他面容削瘦坚定，身材像个运动员。在我得知他的名字和他的研究性质之前，他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不久我便经人作了介绍——但已记不清具体在哪里、被什么人介绍的了。他叫李寰·马瑟斯(Liddell Mathers)，但不久，他在“塞尔特人运动”(Celtic Movement)中得名麦克格雷格·马瑟斯，接着就干脆被称为麦克格雷格了。他是《揭开犹太秘法的面纱》一书的作者。他的学术研究内容仅有两个：巫术及战争理论，因为他相信生来就是个中校坯子，和那老犹太人相比，仅在智慧和力量上略逊一筹。他从大英博物馆抄录了大量有关巫术仪式和训诫的文稿，还要到英国大陆各图书馆去作更多的抄录。我主要是通过他才开始某些研究和体验的，这使我坚信：心像从某种比意识或潜意识记忆更深的源泉中涌现在心灵的眼前。我相信，在最初时他的心灵并未有与长相不合之处——虽说在以后的岁月里二者脱节了，就如唐·吉珂德的情形那样——在巨大的贫困之中他葆有了一颗高傲的头颅。有个每天晚上和他一起作拳击运动的人告诉我说，许多星期以来他总能击败马瑟斯，尽管马瑟斯一向比他强。直到很长时间后他才得知，那些星期里马瑟斯一直在挨饿。我记得，在我们初识时他曾对我提到一个有时自称为“炼丹生”的团体——在其成员间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1887年的5月或6月，在夏洛特街的一间工作室里，我正式加入了这一团体。当时正值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于是被塑造、与世隔绝起来。马瑟斯是此团体的核心人物，是天生的教诲者和组织者。他属于那种煽动富于想象的行动人——很少是通过语言，更多是通过他们自身。我们支付少量的年度订阅费用，以及几个先令的房租和文具，而手头紧的人连这些钱也不必掏。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宽宏大度。在马瑟斯那儿我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牛津郡教士。尽管马瑟斯介绍他时称：“他把我们和古代的高手们联合在一起”，他却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张惶失措的人。这位老人把我叫到一边，好对我说：“我希望你不惊动神灵——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我听说，即便那些游魂最终也会和我们作对的。”我问：“你见过妖怪吗？”“噢，是的，有一次，”他说，“我的房子的地窖下有个炼金实验室，安在那儿是为了不让主教看见。有一天我往那儿走时，听到另一个脚步声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我身边。我转身看到一

马瑟斯(1854—1918)，一个学通灵术的学生。

个女孩——那是我年轻时曾看到过的人，不过早就死去了。她要我吻她。噢，不，我不会那么做的。”“为什么不？”我问。“噢，她或许会控制我。”“你的炼丹探索有成就吗？”我问。“是的，我有一次造出了长生不老药。一位法国炼丹术士说它的色味都正”（该炼丹术士或许是 Eliphaz Lévi。他在 60 年代访问过英国，他什么都可能说过），“但是这不老药的最初效力是指甲松动、头发脱落。我担心我可能做错了，担心会发生别的事，所以我将其闲置于架上。我原想，我老了的时候会饮用它，可另一天我取下来时它已经干了。”

我与马瑟斯初识后不久，他便崭露头角，在弗莱斯特山一家私人博物馆作了二、三年的馆长，还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哲学家亨瑞·柏格森的妹妹。他在弗莱斯特的住宅很快成了一小批人的一个浪漫场所——弗洛伦斯·法尔——她也正式加入了“炼丹士”——我，还有十几个师兄弟。法尔是个好奇心盛的人，我想，是她第一个带来了一本讲述神功奇迹的书，而且半是挖苦半是新奇地带来的。马瑟斯曾带她去散步，路过一片有羊群的地方时对她：“看那些羊群。我快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公羊了，”说话间那群羊就跟上他来；另有一天他试着演法，在空中挥舞着一柄共济会的剑，想止息一场雷阵雨；接着非凡的奇迹果然出现了。他曾给她一块纸板，上有一个彩色的几何图形，让她将它举到前额处，她于是便看到自己在海上的一处峭壁上行走，海鸥在头顶上尖叫着。我并不认为公羊的故事不可能为真——我自己甚至还几度试过在一只猫的面前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为的是去逗引它——但仍然有可能是羊群偶然的移动胡弄了她。但是在那最终的奇迹中是什么迷惑了她呢？接着不久，另一件如出一辙的事很快就轮到了我。他给了我一个有图形的纸板，我闭上眼睛，景象缓缓浮现上来。但那种视觉并非如黑暗被利刃一劈两断般的突如其来的奇迹——那种奇迹多是女人的特权——而是我无法控制的一种精神影像升起在我面前：在古代废墟之上，一片沙漠之间，黑色的提坦（Titan）用双手撑起身来。马瑟斯解释说，他向我显示了某种蝶螈类的生灵的象征符号，所以我见到了它们。而显示这种象征符号其实并无必要，他想象一下它们原本就足够了。早在 1887 年的某个时候，我就在日记中写道，布莱瓦斯基夫人所谓的“大师们”是些“精神恍惚的名人”，我肯定是指我的黑色提坦那类生命，只不过生命力更长、力量更强大罢了。在我幼年时，我在都柏林的皇家爱尔兰学院的案头发现了一本有关日本艺术的小册子，读到有位了不起的画动物的画家，他画在寺庙墙上的马在天黑后溜下来，践踏了邻人的稻田。清晨有人来到寺庙，被滴到头上的水滴吃了一吓，抬头看见那些画上的马身上仍然挂着田里的露水，于是“吓得一动不敢动”。

我很快就掌握了马瑟斯的象征符号系统，发现对于相当一小部分人来说——我可以通过某种无法分辨的特性挑出他们——视觉可见的世界可以完全消失，而受象征符号召唤的世界会取而代之。一天，独自乘坐火车的三等车厢途经维多利亚附近的泰晤士河时，在火车恰好穿过铁路桥中部时，我闻到燃香的气味。我当时正在去弗莱斯特山的路上，莫非那燃香的气味是马瑟斯从某个神灵那里招来的？当我在布莱瓦斯基夫人那里闻到这种香气时我曾怀疑是否有某种机械装置、某种隐秘的香炉，但那种解释再也不可能了。我认为他的蝶螈不过是一种影像，而我刚刚发现了气息和影像之间的相似。那种

一个曾在 19 世纪 60 年代访问过英国的法国人。

香气一定是思想创造出来的，可是我怎么能肯定那令我惊讶的香气是来自我自己的思想呢？而且，如果思想能够影响嗅觉，为什么不也影响触觉呢？后来在那群拜倒在马瑟斯面前的学生中，我发现一位曾在梦中与一只猫搏斗，醒来时发现胸前尽是抓痕。在那些抓痕和那被踩了的稻田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吗？看似如此，但不一定。我们的实验会给我们的想象带来什么样的成型的法则呢？

我作了太多的笼统归纳，我对此感到羞愧。我想，我生命中的事是做个艺术家、做个诗人，没有什么能和此相比。我拒绝读那些激发我作总体归纳的书，也拒绝见这方面的人，但并无什么结果。我作的祈祷仍像童年时代作的一样多，尽管时间和地点都与过去有别。我还开始祷告，希望我的想象力从抽象之中解脱出来，并像乔叟的想象力一样被生命占据。我又继续在这种折磨中煎熬了十多年，只有当我的抽象思考幻化成画面或戏剧化起来时，我才感到欣慰。我的这种煎熬培养了我的早期诗歌，赋予它以一种多愁善感的成分，这一成分是通过拒斥诗歌对任何思维能力的参与而得来的。即使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也是逐渐才开始运用归纳概括法的，那已自此成为我在爱尔兰所做的或应做的一切的基础。以我所知，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软弱的，我相信我们 20 岁时的理解力囊括了我们所能发现的真理，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那些从不经意的烦躁或瞬间的念头中获取的、属于我们的真理。在生命的进程中我们发现，某些想法使我们在受到挫败时支撑住了自己，或使我们得以战胜自我或他人。正是这些经过了情感的考验的思想，最终被我们称为信念。在那些主观的人当中（也就是在那些非要在他们自己的肠子里编出一只网的人当中），胜利即是对所有那些被外在的命运夺走了的东西的一种日复一日的智力再造，因而是命运的反面；而我所谓的“面具”，是所有那些出自其内在属性的东西的一种情绪化的对立。当我们已经把生活看成悲剧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了生活。

（刘怀昭译）

青少年时代的梦幻（节选）

由于我对自己想法以外的事都兴趣不大，所以难于管教。我的几个叔叔和姨妈都曾试图教我念书，由于无能为力，又由于我比起那些读起书来毫不吃力的孩子们大得多，他们便认为我天赋不够，而我也自此这样以为。若不是因为后来的事，他们的这种看法或许会存在下去，我父亲那时一直呆在家里，从来不到教堂去，这使得我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鼓起了勇气拒不出门。我总是很虔诚，想到上帝，念及我自己的罪责时就会满眼泪水，但我恨教堂。我的外祖母试图让我学会踮起脚跟儿走路，因为我走起路来好像总是踩着脚，那样做带给我走出那地方的快感。后来当我识字了的时候，我从赞美诗的字里行间找到乐趣，但一直不理解唱诗班何以要花费三倍于我的时间才唱到尾；礼拜仪式中我所喜欢的这部分，即讲道以及启示录和传道书的一些章节，并不能抵销所有的那些繁赘和长时间站立的疲乏。我父亲说如果我不去教堂他就教我念书。我现在觉得，他那是看在我祖母的分上想让我去可又想不出别的法子。他是一个暴躁又缺乏耐性的老师，用识字课本砸我的脑袋，使我在第二个星期天又决定去教堂。然而我父亲已经对教导我发生了兴趣，只不过是功课挪到了一周中另外的日子，直到他占据了我飘忽的心灵。我相信，我关于他的第一个清晰的印象仅仅是第一课开始前的几天凭空想象出来的。他刚从伦敦回来，在婴儿室的楼梯间跑上跑下。他须发浓黑，半边脸因为含着一枚无花果而凸出来，为的是曝出一颗坏牙里的疼痛。有个保姆（有一个保姆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同从伦敦来）对另一个说，她听说用一只活青蛙治这个比什么都管用。继而我被送进一所由一个老妇人开的私塾，这老妇人把我们排成队列，她有一根台球棒一样的棍子，长到够得着后面的几排。当我上完第一次课回来时，我父亲仍然在斯来哥。他问我老师教了什么。我说老师教我唱歌，他便说：“那就唱一个。”我于是扬起脖子唱道——

小水滴，
小沙粒，
汇成大海
造就良田

于是我父亲就写信给那老妇人，说再也不要教我唱歌，后来其他老师也被如此告知。不久，我姐姐来往了好长时间，她和我去一条贫民街道上的一栋两层的房子，那里有个年长的贵妇人教我们拼写和语法。当我们做好了功课时，她就让我们看一柄她父亲得赐的剑——他曾在印度或中国带领过军队——并拼读出刻在银质剑鞘上的一长串赞文。待我们再去她的房子或她的家时，我俩将一把大伞举在前面，俩人都紧抓伞把，透过伞罩上一个被老鼠咬出的圆洞看路。等我已经把识字课本烂熟于心了，我就开始在一间称作图书室的屋子里消磨时间，尽管我已记不得那里有什么书了——除了几本我从未

J. B. 叶芝(1839—1922)，在成为一位画家前曾学过法律。1867—1880年生活于伦敦、都柏林，1880—1887迁往伦敦的贝德福公园，后来曾移居美国数年。

翻过的旧小说和一套 18 世纪末出版的多卷本的大百科全书。这套大百科全书我颇读了不少，还能记得其中一大段讲的是不论木化石看上去如何，它都不仅仅是一种形状新奇的石头。

我父亲的不信神使我开始思考宗教的依据，而且此事带给我的焦虑挥之不去，因为我不认为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宗教。我认为，我那时所有的宗教情感都与云彩以及明媚的天空中云霞明灭的瞬间联系着，这或许因为看了些类似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圣经》图画。至少我还记得这让我感动得泪下的景象。有一天我找到了为信仰辩护的确切根据。有一头奶牛行将分娩，我去了那奶牛所在的田里，在那儿有几个农夫打着个灯笼陪着它。第二天我听说奶牛已经在凌晨时分产下了牛犊。我向所有的人打听牛犊是怎么生下来的，由于没有人告诉我，我便认定无人知晓。它们是上帝的馈赠，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显然从没有人敢去观看它们的到来，小孩的降生一定也是如此这般。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成人，我要等着直到看到牛犊或小孩的降生。我确信那时会有一朵云彩和四射的光芒，上帝会带着云中的牛犊从光芒中走出来。这想法让我心满意足，直到那一天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来串门，在一个马厩里和我并肩而坐，解释了所有的性别的机制。他是从一个稍长的男孩那里了解到所有这些的。那男孩是个变童（他自己怕是不知这词的意思）。他的描述，如我现在所察，就如同他在讲述物质性生命的任何其他事实，这让我难受了好几个星期。当这第一印象消磨掉了以后，我开始怀疑他所说是否属实，然而有一天我从那本大百科全书中发现了一段——尽管我对那些冗长的同半懂不懂——印证了他的说法。我那时并不知道足够的他与那稍长的男孩的关系，所以还不至震惊到什么分上，但这是孩提时代梦想的第一次破裂。

我对死亡开始产生认识，是当我的父母和两个兄弟及两个姐妹来往的时候。我在图书室里听到奔跑的脚步声，又听到有人说我的弟弟罗伯特死了。过了一小会儿我和姐姐坐在桌边，很开心地画轮船，把旗子画在桅杆的半截处。我们一定听说过或见到过海港的轮船旗子是半悬着的。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听到人们议论说，在弟弟死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和仆人听到招魂的幽灵在哭。很可能就是在这之后，每当祖母去看望卧床不起的老人们时，我便告诉她我不想和她一起去，因为他们就要死了。

大约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是在一个峭壁之巅，所以在暴风雨的天气里，雾气就会在夜间浸入我的床榻——因为我把门和窗户上的所有玻璃都卸了下来。一种对户外旷野的文学激情在我身上持续了若干年。后来的一两年里我们有了一栋俯瞰海港的房子，那里的壮观景象之一就是往来的捕鱼的船队。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佣人，是个渔夫的妻子，还有一个粗大的红脸膛的姑娘偶尔做帮手，她在我母亲到教堂去的时候吃掉一整坛果酱并归罪于我。这样的安排一直持续到我所写的这段日子之后好久，一直到我父亲偶尔走进厨房，看到一个临时雇来帮忙的姑娘因为将要离开我们的另一位佣人而掉眼泪，于是许诺她们永远不必分开。我毫不怀疑我们那时住在靠海港的地方是为了我母亲。我们小的时候，她拒绝带我们到海边某处去，因为她听说那里有个供游泳的人更衣用的浴箱，但她喜爱渔村里的各种活动。当我想到

她的时候，眼前几乎总是浮现出她端着杯茶在厨房里和我们的仆人——那个渔夫的妻子——聊天的情景，聊着户外那似乎是唯一有趣的话题：豪斯的渔民，或是洛丝的渔民和领航员。她不读书，但会和那渔夫的妻子彼此之间互相讲述或许荷马讲过的故事，陶醉于突然间的跌宕，并为一些富于讽刺意味的地方相视大笑。在我的《塞尔特人的黄昏》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作《村鬼》，讲的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下午，而许多精致的故事都因为我没及时记下来而散失了。我父亲总是向我和我的姐妹夸赞她，因为她不矫情。她会写信给他讲述反动的云层带给她的快感，但她对画儿不感兴趣，从不去看展览，那怕有他的画作展出。她也不去他的画室看他一天的工作，无论是现在还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对这一切都记忆犹新，但此后的事就不甚清晰了。直到她在一次中风中丧失了思维，于是，终于解脱了财务烦恼的她，在伦敦的一扇窗前找到了喂鸟的至上的快乐。我父亲会说她总是激情洋溢，而这是他的主要赞辞；有一回他对此补了一句：“没有哪个挥金如土的人会养出个诗人儿子，虽说吝啬鬼倒可能。”

一个男孩子一生当中举足轻重的事件是性的觉醒。他会一天里洗好几遍澡，或是在天蒙蒙亮时爬起来，光着身于在横在两把椅子间的棍子上跳来跳去，却几乎不知道，更不会承认，他已经开始从他自己的赤裸中获取快感，他也不会理解这种变化，直到它大白于梦乡。而他或许对他头脑里的那些更为重大的变化从来都不甚了了。

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时，我正破壳而出似地接近 17 岁。当这发生在那些梦游的乡村女孩子身上时，她们就到处扔盘子或是揪着长发如同颇特盖斯特（poltergeist）附体，或者成了纯属装神弄鬼的小巫婆，全被那奇妙的欲望操纵了。当我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似乎发现，我的激情，我的爱和我的欲望并非是我的克星，并非是一种搅扰和侵袭。相反，它们是那样美好以至我那时不得不持久地独自一人与之相守，来全身心地关注它们。现在我第一次注意到，在我的记忆里，我独处时所观察到的要比和他人在一起时的情形来得清晰。

一个牧人曾指给我看在悬崖的通路约 150 英尺以下高出海面数百英尺的一个洞穴，并告诉我，一个已死了大约 15 年的被逐的佃户，名叫马阔姆的，曾经在那儿住了许多年。这牧人还指点给我嵌在岩石中的一只锈迹斑斑的钉子，那大概是用来悬挂木质的屏障以抵御风蚀和恶劣的天气的。在这儿我储存了一罐可饮料和饼干什么的，在暖和的夜晚不回去睡觉，而是以躲避飞蛾为由溜出来到这洞里睡。到那儿去须经过一处凸起的崖壁，这对脑筋尚可的人来说算不得什么，虽说从高处望去它狭窄陡峭；一个陌生人看见我攀缘而上便提出了劝告，这加倍了我冒险的快乐。可是，当我在一个银行节的假日里在我的洞里发现了恋人们，我便不再对它感兴趣，直到我听说，有人在拂晓时分看到马阔姆的鬼魂依偎在洞口他点燃的篝火旁边。我曾一度试图按照我读过的有些书上说的，把鸡蛋埋在篝火下的土里煨烤。

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会躺在豪斯城堡一块荒野之地的杜鹃花丛和乱石中睡去。后来，我父亲说我夜里必须有一半的时间呆在房间里，意思是说我应当在我的床上睡点觉；但由于我知道我会因为太困倦太舒适而贪床，我便常

常守在厨房的火边熬上半宿。捕风捉影的事在学校里到处都是，有时我听不懂课，教师就会拿我夜宿的习惯取笑。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致逐渐减退，不久就自忖：“这完全是个误会。”我记得我很快就对我的标本感到厌倦，经年的收集后仍一无所知，我便开始相信了我第一次在斯夹哥的圣约翰教堂时听到的，即我已经由于一个课本吃尽了苦头，且照着了解灌木和树种的所罗门的样子做了，那么我一定自有我的智慧。我照例扛着我那绿色的捕捉昆虫的网兜，但却开始自我陶醉于一个圣贤，神人，或是诗人的感觉里。我心里有许多偶像，当我攀登那峭壁时我就是冰川上的曼弗雷德（Manfred），就是孤灯随形的阿萨纳西斯（Athanases），但不久我就选择了阿拉斯特（Alastor）作为我崇拜的主要人物并渴望分担他的忧伤，甚或最终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如同他漂流着消失于两岸青山中缓缓流动的河流之上。当我想到女人时，我就把她们虚拟成我所喜欢的诗歌中的那些形象并在短暂的悲剧中爱恋她们，或诸如《伊斯兰叛乱》中的那个姑娘，伴着她们的恋人们到海角天涯，无家可归无牵无挂无法无天的女人们。

X

我父亲对我思想的熏陶那时如日中天。我们每天早晨乘火车去都柏林，在他的画室里吃早餐。他在约克街的一栋住宅中租有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个漂亮的18世纪壁炉台。在吃早餐时他读一些诗人的片段，并且总是诗或剧本中最激动人心的章节。

他从来不出于思辨的兴趣而给我读某一章节，而且确实是一点也不把诗歌的概括化或抽象化放在眼里，无论如何如何慷慨激昂。他会朗诵《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前几段台词，但从来对著名的第四幕中恣意的抒情不以为意；另一天他会朗诵科里奥拉努斯 Coriolanus 中的一幕，在那一幕中（Coriolanus 来到 Aufidius 的房中，告诉那些鲁莽的仆人们说，他的家在苍天之下。从那以后我看过许多回 Coriolanus 的演出，书也读过不止一次，但那一幕要比其余部分生动，且我听到的总是我父亲的声音而不是爱尔兰文（Irving）或本森（Benson）的。他甚至不屑于一段精致的抒情，除非他能在刻意营造的美的背后感觉到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而且他一直在寻找某种可心的日常生活的特征。当神灵们唱出它们对曼弗雷德的嘲讽，曼弗雷德答道：“哦，甜美而忧伤的声音”的时候，父亲告诉我，神灵们即便是在发怒时也不会丢弃它们精神上的甜美。他觉得济慈是个比雪莱伟大的诗人，因为不那么抽象，但他并不读济慈，对任何由于绘画的影响而产生于现代的那些最美妙的诗歌也都满不在乎。一切都必然是言辞的理想化，兼之某些时候的激情之举或梦游般的幻象。我还记得他说所有沉思默想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高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除了伟大的诗人，所有的作家都在此列。回想起来，似乎我那时只是零碎地观察到了他的思想，而时至今日我才开始发现那一直隐藏着的连贯性。他不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理念诗歌，也不喜欢华兹华斯，除了他全部诗歌中的某些章节。一天早上在吃早餐时他称他从一位华兹华斯学者的脑袋的形状中——他正为这位极受尊敬的教士画肖像——发现了一个追名逐利者的所有动物本能。他对拉斐尔的形式美嗤之以鼻，认为那种平和

并非一种规整了的激情而是一种矫饰，还对拉斐尔的追求快感和沉溺于自我的生活予以攻击。在文学方面他永远是先拉斐尔派的，并在学院派尚且四平八稳的时候，他就把给学院派形式以冲击的一些原则率先带到文学中来。

他不再给我读故事本身，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是有关文体风格的。

我开始在出访或串门的时候不时地出洋相。有个我从小就认识并喜欢的女人说我变得愈来愈糟。我希望自己聪慧而又谈吐不凡，有篇关于年少的 Ampère 的文章助长了我的雄心，而我独自一人时笨手笨脚的情况更是愈演愈烈，简直苦不堪言。我那时已开始模仿着雪莱和爱德孟·斯宾塞进行诗歌创作，一个剧本接一个剧本——因我父亲将戏剧诗歌拔高到各类诗歌之首——我还创作出精彩而不连贯的情节来。由于我不懂书里讲的诗律，所以我的诗句缺乏推敲，尽管不少浑然天成的诗行颇有乐感。我写的时候慢慢地读出来，而只有当我把它们读给其他人听时才会发现其间并无通常的乐感，亦无韵律可言。但尽管如此其间仍闪烁着观察力；因为即便当我不再为飞蛾所扰的时候，我仍然留意于过往的一切；小飞蛾们怎样在夕阳中飞来，然后怎样只剩下些大蛾子，直到晨曦之中小飞蛾们重又飞来；以及什么鸟在夜间啼鸣，如在梦乡中的呓语。

X

在斯来哥，我后来仍然去度假的地方，我曾和我舅舅乔治·波英斯芬住在一起，他是从巴利那 (Ballina) 来补我退休的外祖父的空缺的。我外祖父已不复有他的高宅大院，他的老伴威廉·米德尔顿死了，而且还有些法律上的麻烦。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有钱，儿女们也都结婚远走高飞了。他有个俯瞰海港的高大而一无如洗的房子，而他则整天无所事事，只会因为看到清运淤泥的船只停靠的不是地方或者因为从冒出的烟中察觉出轮船燃的是劣质煤而生闷气，同时还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坟墓的修建。那里有一处米德尔顿的坟墓，墓墙上刻满了米德尔顿家族的名字，波莱斯芬家族的则几乎空白。但他说：“我不会和那些老朽躺在一起”，因为他不喜欢米德尔顿家族中的某个人。其时已有人看到他的名字以烫金大号字体刻在了新建的坟墙上。他差不多每天都散步到圣约翰教堂的庭院为止，因为他喜欢每一件事都像船上一样干净利索，也正因如此他要亲自关照自己的墓，好使建筑工不致加上些无用的装饰。不管怎么说，他的能干和胆量仍不减当年。我在乘一艘商务船去洛丝时看见他从舵手手里接过方向盘来，驾驶着轮船穿过了海峡沿壁的一处沟壑，跨过了沉沙，堪称壮举。在行程终了，他驾轻就熟地将船靠向洛丝的码头而没有通常情况下的蜿蜒曲折或牵拉缆绳。他在感冒的时候吸鼻烟，但从来不抽烟，也不饮酒；在他 80 高龄的时候他的医生建议他使用某种兴奋剂，他答道：“不，不，我不想养成个坏习惯。”

我弟弟已经部分地取代我而在我祖母那儿得宠。他有那么几年一直生活

Ampère (1800—1864)，法兰西学院教授。

米德尔顿 (?—1832)，叶芝的曾祖父。

在她那里，并在斯来哥的一所学校念书，在班里他一直是倒数几名。我的祖母不在乎这些，说：“他心地好，不忍心把别的孩子甩在后面”。他没事的时候就成群的小伙伴们到处跑，是这些领航员和水手们的孩子们所拥戴的小头目。他们玩赛驴，或赶着驴子列队而行。干这种活计可是要求脑筋绝对的好使，因为这些驴子顽固不化。除此他还开始以他的画让人们发笑；在他今天作品的半数中我都能辨认出那些我曾经在洛丝或斯来哥码头见过的面孔。他在那儿的生活是很远的事了，但他的记忆似乎还和他当初眼睛所看到的一样清晰。

在巴利索付尔 (Ballisodare) 发生了一件事，它将我送回到童年时代的迷信里。我记不得那是什么时候了，因为那时期发生的事情就像在孩提时代的一样杂乱无序。那时我正与几位表兄妹一道住在 Avena House，那几位兄妹包括一个长我几岁的男孩，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以及一个比她大得多的或许是她姐姐的人。那位和我同龄的女孩时常对我讲起她在巴利索代尔或洛丝见到的异象：一个三、四英尺高的柱拐的老妇曾走到窗前往里窥望她；她有时在路上会遇到有人向她打听“某某怎么样了？”提到的都是她家的成员，尽管她无法解释，但她知道这些不是现世的人。一次，她在一个熟悉的地方迷了路，待她重又找到了路的时候，她随身携带的属于她兄弟的那支手杖上镶着的银饰消失了。村里的一位老太太事后说：“那些人中间一定有你的好朋友，银饰代替你被取走了。”

尽管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我这里要讲的肯定是准确的，因为就在前不久，她写下了她那些不经意的记忆，与我所记丝毫不爽。那日她正坐在一台旧式的镜子下读书，而我则在房间的另一处读着。突然我听到某种声音，仿佛有人正把大把的豆子抛向镜子。我让她去隔壁的房间里敲敲墙壁的那一侧，看看声音是否是从那里出来的。在我一个人的当日，从另一面墙的壁饰那里传来一声巨响，在靠近我头顶的上方炸开。那天稍晚些时辰，一个佣人听到一个重重的脚步从空旷的房子里穿过。那夜，当我和我的两个表兄妹出去散步时，她看到几棵树下的地面光芒四射，我什么也没看到。但接着不久，我们过了河，沿着河沿走，靠近一个旧的墓地，据说那儿有个被消灭了的村庄，我想是在 17 世纪的战火中吧。突然间我们都看到，在水流湍急的河面上有一个光点在移动，就像一只熊熊的火把。过了片刻，那女孩看见一个人向我们走来，在水中不见了踪影。我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被耍弄了。尽管看似荒诞，那总归或许是什么人在水中举着火把行进，但我们能看到，在七里之外的 Knocknarea 山脚下，一个小小的光点开始沿着山坡向上移动，我用手表掐算了时间，在五分钟后那光点到达了顶峰。我经常爬那座山，知道人是不会有如此飞快的脚步的。

自那以后我漫游古堡仙山，向老人们打探灵异，当我精疲力尽或郁郁不乐时，就开始渴望真托马斯 (True Thomas) 那样的发现。以我的头脑我并不相信人的灵与肉可以被挟走，但我在感情上相信了这些，而乡民们的信仰也顺应了这一切。一次，当我爬进第三处洛丝的一个古堡的石窟的时候，随我同来的一位船员在通道里招呼我：“你还好吧，先生？”

一天晚上，在我自斯来哥那条路上走近洛丝材时，有一团火在我右侧七

八英尺高的绿堤上迸发出来，紧接着另一团火光从 Knocknarea 遥相呼应，我疑虑重重地匆忙赶路，但内心里却不得不相信我再次见到了在巴利索代尔河边见到的火。我开始时不时地对人们讲，一个人应当相信任何已被各个国度和各个时期所相信了的东西，只在具有大量实证以后才摒弃了其中靠不住的部分，而不要一切从头开始，只接受自己能证明的东西。但我时刻准备否定或嘲笑我信仰中的隐秘的盲信部分。在我读了达尔文和赫胥黎并相信了他们所相信的那些之后，我由于在自己一边有了权威性的理论，便总想与任何人进行辩论。

从我们最初到达都柏林开始，父亲就时不时地带我去见爱德华·多顿（Edward Dowden）。他和我父亲那时一直在网罗朋友，可能是想要再续他们的旧谊。有时候我们被拉来吃早餐，吃完了我父亲会让我朗诵一首我的诗。多顿善于鼓励人，从不说溢美之辞，也从不敷衍了事，有时他还会借书给我。那整洁而又富丽的宅子里一切都极有品味，在那里诗歌堂而皇之地得到鉴赏，这些使得都柏林一度让人还可以接受，而且大约有那么几年，多顿于我是个浪漫的化身。我父亲则不会分享我投注的热情，而且很快我就发现他在这些会见中不耐烦起来。有时他会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要多顿投身于创造性的艺术，并会挑剔他所认为的多顿生活中的败笔。我现在才明白，他是借关于先拉斐尔派的讨论在朋友身上找寻自己侥幸的东西。他会说：“他不会相信他的天性”，或是：“他受了他的下属太多的影响”，或者他会赞赏多顿的诗《弃决者》，以此来证明多顿本该写些什么。这并没有带给我什么影响，因为我已经为那忧郁的罗曼蒂克的面庞想象了一个与之相称的过去。我对他那些有着斯温伯恩（swinburn）修辞痕迹的诗句十分当真，并相信他曾痛苦而又不见客于世俗地爱过。当我通过我的艺术实践发现，某些关于女人之爱的想法是一个流派所属的时候，我仅仅是改变了我不着边际的想象，转而把他想成个睿智之人。

我那时不断被一些哲学问题所困扰。我会对我的艺术学校的同学说：“诗歌与雕塑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激情永驻”；于是某人会应道：“没有激情我们会好得多。”或者我会一个星期困在这个问题里焦虑不安：艺术使我们更幸福吗？抑或使我们更易感，因而更不幸？我还会对休斯（Hughes）和谢泼德（Sheppard）说：“如果我不能肯定它们能使我们更幸福，我就永远不再写作。”假如我对多顿提起这些，他会以谐谑幽默的调侃的口吻将问题抛到脑后：他似乎屈就于所有的人和事，从而成了我的圣贤。我那时差不多要领教到，一个写抒情诗的人必须是由自然和艺术造就的满身传统架势的人，是一切生命的情人或圣徒，智者或耽于声色的人，甚或仅仅是个恶作剧的人；除了这种毫无幸运所言的运气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在他面前展开世界所积聚的底蕴。在这种想法可能成为知识之前它只是一种直觉。

当我父亲称多顿的嘲讽为懦弱时我被惹火了，而多年后他的印象仍未改变，有几个月前他写给我的信为证：“那就像与一个神父交谈。说话的时候得小心别让他想到他所作出的牺牲。”一次早餐后多顿念给我们尚未发表的

多顿（1843—1913），都柏林英国文学教授，叶芝父亲的朋友，《雪莱的生活》一书的作者。

《雪莱的生活》中的一些章节，我这个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奉为宝书的人陶醉于他所朗读的一切中。可是，当他解释说已不再对雪莱感兴趣了——若不是过去对雪莱家属的一个承诺，他不会写它——的时候，我感到不寒而栗。在它发表了以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针对其中某些流于习俗和过分吹捧的地方挖苦了一番，而我父亲和我从道登的这些地万看到了一个明智的人因为要掩饰他的冷漠而暴露的扭曲和笨拙。

尽管我的诚信受到动摇，但是我真正开始感到愤怒，失望，并使自己进入一种争吵或半争吵状态是当他竭力劝我读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的时候。我当时已通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浪漫故事以及一些巴尔扎克作品，根本没那分心思喜欢她。她似乎对生活中所有使人雀跃的东西都有一种怀疑和嫌恶。而且她还知道如何运用她的中维多利亚（mid-Victorian）时代的娴熟技巧的权威性，或者出于这种教养的习惯性思路来渲染她的嫌恶。因此我这个未曾逃脱我所嫌弃之事的魔力的人一边展读她的书，一边惶惑于随便什么我直觉所了解的辉煌灿烂之事。她给我带来困扰和恐慌，但当我向父亲谈及她时，他用一句话将她一笔带过：“唔，她是个嫉恨美男子和漂亮女人的丑女”；然后他开始夸赞《呼啸山庄》。

直到有一天，我搞到多顿的一束信笺，我才发现多顿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种对抗。60年代我父亲曾经从菲兹若伊路（Fitzroy Road）写信说，几位兄弟——他这里指诗人爱德温·艾利斯，奈特施普以及他自己——是“嫌恶华兹华斯”的；而多顿则不念及下一周会带给他别样的情绪和嫌恶，兀自回了封伤人的庄严肃穆的信来。父亲回复说多顿过分相信悟力，说所有有价值的教育都不过是对情感的一种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激动，“在一个完全情感化的人内部，”他写道：“情感的最细微的苏醒是一种和谐，在这里，每一种情感的每一根弦都颤动。激动是一种不够充分的情感化天性的特征，是只不过一两根琴弦的刺耳的震颤喧哗。”生活在一个流于同伴对话的愉悦的夸夸其谈的时代，一个说话和写作不是为了引导大众而是愉悦于发现真理的时代，他在二人都是20多岁的年纪时就已认定：多顿是明明白白的一个乡巴佬。

直到开始进行通灵研究和神秘主义哲学学习，我才开始从我父亲的影响下挣脱出来。他一向是John Stuart Mill的追随者，因而对罗塞蒂的信念——即，到底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所谓——没有同感。而我，通过对通灵这种大众科学的反作用力的新的研究，开始为我心底的思想找到了同盟者。

有一次在多顿的客厅里，一位仆人禀报了我过去的大学校长的来访，我当时一定是脸色苍白或是满脸通红了，因为多顿带着一种戏谑调侃式的、友善的口吻带着我来到另一个房间，在那儿我一直逗留到客人离去。几个月后，当我再次遇到这位校长时，我便勇气有加了。我们在街上照面时他说：“我需要你去对某某施加些影响，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某种神秘主义上面，那样他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著名女作家。

奈特施普（1841—1902），画家，叶芝父亲的朋友。

的考试要不及格了。”我感到十分忐忑，但还是尽量说些诸如人世的孩子比出世的孩子聪明一类的话，他唐突地道了声“早安”就走掉了。我并不认为那时的我就学会了油腔滑调，我只不过是惶恐不安罢了。不管怎么说，他使我愤愤不平。我的新旧盟友共同支持住了我。“中介性的审问”是我一向拒绝的，因为它意味着对学生和老师的小恩小惠，而且仅此而已。我父亲教育我在就学期间从不虑及将来或任何实际的结果。我还记得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绅士的定义就是一个不被下一步的事完全占据的人”，而这位师长竟想阻挠我的朋友对一切真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的探索。我这位朋友那时在学校中念最后一年，他是个喜欢表现的人，在整个爱尔兰已出尽风头。而那时他和我正在读赖肯巴赫的《超自然的力量》，以及通灵会刊发的文章。我们有很多时间是在Kildare街的博物馆里度过的，我们将手放在玻璃柜上进行传导，感觉或者相信我们体会到了超自然力从那些大大的晶体之中流溢出来。我们还蒙起眼睛找别针，或是在约克街的屋顶下见面时向炼丹社呈读有关我们的发现的文章。我们在我们这个组织成立伊始就提出，伟大的诗人们在他们最细微的瞬间所断言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对一种可信的宗教所能作出的最大程度的贴近，而他们的神话体系，他们的水和风的精灵都只可能是精确的真理，我曾怀着这种想法阅读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还曾希望藉此精通各种文学。不久，我因为把真理定义为“至高无上者的戏剧般恰当的表达”而引起父亲的不悦。当时如果让我定义“至高无上者”的话，我或许会说：“我们只可能像荷马在寻找一种主题时找到奥德赛那样去找他。”

当我给我的这位朋友拿来Renan的《基督的生活》和一本《佛教密宗》时，他已给一些传道团体写信要去南海，他把两本书都推辞掉了。然而几天后，在凯尔代尔街图书馆里他不经意地要去了《佛教密宗》一书，于是成了一个密宗佛教教徒。他给传道组织写信撤回他的申请，然后作为一个小沙弥加入了通灵会。这时他因我的狂热不足而不快了，或许是受了我父亲的怀疑主义态度的支持，我一直站在那两本书之间的某种立场上。我说，虽然我不怀疑我自己的头脑，但我不晓得“哪个人会天生就信念坚定”。他认为这是个天大的玩笑，尽管我说得很认真。有一段时间里他令我为自己的世界及其狂热的不足而感到羞愧，想知道知道他那事事都与信仰相关的世界（他的父亲是个臭名昭著的奥兰治党头目）是否比起我的世界并不好多少，他自己企图使另一位喜欢自我表现的聪明的小伙子来一次顿悟式的皈依。那小伙子现在已是都柏林的一位数学家，仍然身高不足五英尺。后来的一天我见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问他：“他对你的话听不进去吗？”“完全不是”，他回答，“我只谈了一刻钟他就说他信了”。那些被考试烤得焦灼不堪的心灵无疑是干渴的。

圣三学院的一位东方语言教授，一位波斯人，有时到我们的社里来讲些东方术士的事。他小时曾在一汪墨水中看到了一群精灵用阿拉伯语唱歌的幻景，它们唱道：“诅咒那些不信我们的人”。我们还劝动了一位贵族哲学家从伦敦来，在我们中唯一一位有自己的住房的成员那里小住了几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使我的模糊的思想得以印证的哲学，于是它立即显得逻辑缜密而又浩瀚无边。他教诲道，意识不仅在表层上铺展开来，而且在心底的观察和沉思默想之中还会在纵深维度上运动。这位长着一副典型的基督脸庞

的美男子幽默地和我开玩笑说，我在早餐的时候就去他那儿提问，然后被第一个来访者打断，然后静静地等到晚上 10 点，11 点，直到最后一个来访者走了才叙述完我的提问。

我那时便开始与一个由奥德汉先生成立的俱乐部时相过从，不是因为天生喜欢，而是出于一种隐衷。我企盼自己成为一个沉着的人，能像哈姆雷特那样和敌意较量，能够眼都不眨地直面一头狮子。刻薄的辩论在英格兰已经不合时宜了，但在爱尔兰还仍是我们交谈的方式。往这个俱乐部里，联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会彼此打断、冒犯对方，而不会受到公共场合正式的、传统的辞令的限制。有时他们会话锋一转，讨论起社会主义或是某个哲学问题来，仅仅是为了在一种新的形式下捕捉旧的情感。我谈起话来轻松顺畅，直到遇到某个粗暴的人，便缄口不语，或是把自己的意见夸张到荒唐的地步，或是踌躇茫然，甚或任某种社团情绪把自己卷走。我会在事会上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逐字推敲自己的言辞。因为发觉自己只是在和亲近的人相处时才会沉着自若。我便时常到一个陌生的房子里去，在那儿我知道我会出于培养自己的目的可怜兮兮地呆上一个小时。我并未意识到，哈姆雷特的沉着自若不是来自教育培养，而是来自漠视和震撼人心的情感的美，而缺乏英雄气概的脑筋也只能从古人身上找寻这种沉着。

从辩论中，从奥·利里的谈话以及他借阅或赠送给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我接触到了所有那些我后来着手的東西。我开始了解到大量关于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诗人的情况。现在看来如同天书的一些作品我当时读得兴致盎然，而且还在寡淡呆板的生命中找到浪漫的东西。我并不是骗自己；我知道他们的语言时常是冰冷而抽象的，而我，尽管从没想要去看济慈和雪莱的住处，却会到处打听 Inchedony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卡拉兰用它作过一首 Child Harold 风格的劣等诗的题目。我记得一次辩论之后回到家中，我对某个大学生说：“爱尔兰摆脱不掉从她当年的军事文明和用拉丁语祈祷的教会（意指罗马天主教会——译者）那里学来的习惯。那些流行诗人们还没能碰到她的内心，她的诗歌一旦产生将是出众而又孤独的。”奥·利里曾经对我说：“无论是爱尔兰还是英格兰都在任何艺术方面良莠不分，但与英格兰不同的是，当好的事物被择出来的时候，爱尔兰不会对之心怀憎恨。”我便开始盘算：一个人如何才能在蜡变硬之前用它把正确的影像封住。我早就注意到，在曾经产生过如此众多的政治殉难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并没有我所知道的爱尔兰清教的那种品味、礼节和庄重，而爱尔兰清教似乎除了要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外别的什么也不想。我于是想到，如果我们要有一种使爱尔兰流芳后世的民族文学的话，我们或许该将这两部分整合起来，而我则通过一种尖锐的批评、一种欧洲姿态从狭隘的区域主义中解脱了出来。

奥·利里（1830—1907），爱尔兰政治家。

卡拉兰（1795—1829），爱尔兰诗人，翻译家。

青年爱尔兰社 (Young Ireland Society) 的一个成员给了我一种报纸，想我或许会读读上面的一些文章什么的。我便开始懒散地阅读上面的诗，那些诗将爱尔兰的海滩描述为落叶归根的垂死的游子眼中所见的模样。我热泪盈眶，虽然知道这些诗写得很糟——模糊、抽象的语言一如人们在报纸中所见。在诗的末尾我看到署名是个回到爱尔兰后不久就死去了的流放的政治家。这些诗之所以打动了我是因为它们饱含了一个人在生命中心潮澎湃的瞬息的真实思想，而当我和我父亲见面时我满脑子都是这种心得。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用我们思考时所最贴近的语言来将我们的思想付诸文字，就像给一位亲密的朋友写信一样。我们不应对思想作任何的矫饰；因为我们的生命赋予它们以力量，恰如戏剧中的人物赋予语言以力量。在英语文学中几乎消失殆尽的个人语言可能和戏剧一样，是摆脱修辞和抽象的绝好的方式。但我的父亲除了戏剧什么也不想知道；个人语言只不过是自我主义而已。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但又不知如何去解释这种分别。自那以后我尝试着去恰如其分地写出我的情感在生活中的本来面目，而不去作什么粉饰。“如果我能够做到真诚、做到语言自然，而不致像一个小说家那样天花乱坠、夸夸其谈而又单调乏味”，我对自己说，“我应当作个诗人，如果阴差阳错能让我的生活饶有兴味的話；因为这已和文学毫不相干了。”而当我重读那些曾带给我许多烦恼的早期诗歌时，除了应景的浪漫，无意识的吟唱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一个人要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才能足以相信，乃至明白自己的感觉。

大概是在我们回伦敦之前那年，一个天主教朋友领我去了一个设在一个年轻人家中的降灵会。那个年轻人不久后因为涉嫌费稔党而被捕，后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他和他的朋友每周一次地团团而坐，期待神灵的降临，其中一人还发展出了通灵术。一只盛满书籍的抽屉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跳出桌子、墙上的画会移动。我们约共十几个人，主持者开始演法，直到通灵者端坐在椅子上熟睡过去。然后熄了灯，我们在微弱的火光中坐等着。很快，我的双肩开始扭动，然后是双手。我本可以轻易地阻止之，但我对此新鲜而又好奇。过了几分钟，扭动剧烈起来，我便制止了它。我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然后周身像一只突然放松了的发条一样扭动起来，继而向墙上甩去。我再次止住了扭动并坐到桌边。所有人都开始说我是个通灵者，还说如果我不去制止的话，便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我记得巴尔扎克曾经为了这种体验而想试试鸦片，但终因担心失去意志力而没那么做。一次，我们正手拉手地围在一起，我的右手使我身边的那妇女的手碰到了桌子上。她大笑起来。继而通灵者从昏昏的睡眠状态中很费力地醒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告诉她有大难临头。”他站起来，开始围着我作一种手势，仿佛正把什么东西推开。而我则开始与这种驱使我被动活动起来的力量进行无济于事的抗拒，我的动作是如此剧烈，把桌子也给撞坏了。我试图祈祷，但连一句祈祷词也想不起来，于是大声地重复着——

“为了人的最初的不驯和这果实
为了那禁忌之树的枯朽的滋味
将死亡带到世上，以及我们所有的苦难……
歌唱吧，天神缪斯。”

我的天主教朋友离席到角落里念起了一段主祷文和称颂圣母玛丽亚的祷词。继而一切都陷入沉寂和黑暗之中，我什么也看不清。第二天，我对别人描述了这件事，如同从一个纷扰喧嚣的政治集会走出来踏上了一条幽静的乡村小道。我自忖：“我神不守舍但也只有听之任之了。”然而当我将目光转向壁炉时，我见到了微燃的火光，便又想：“不，我没有神不守舍。”接着我看到黑暗中的一些模糊的形状，想：“那是些精灵吧”；但定时时见他们只是这些唯灵论者和我那念着祈祷词的朋友。通灵者用苍白的声音说道：“我们捱过了恶神。”我问：“你认为它们还会来吗？”他答道：“不，再也不会了，我想。”于是孩子气的我自负地以为是我将恶神们赶走了。

几年以后我不再去降灵会了，也不会掀翻桌子了，便不时自问那种传遍我的神经的强烈冲动是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或许是某种危险的东西——呢，还是如它看似的那样来自自身之外呢？

我靠捐助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奥·利里找了很多捐助人，还有一本故事集。当时我接到祖母去世的噩耗，赶赴斯来哥参加葬礼去了。她曾要求见我，但因为被什么事耽误了我未能成行。她听说我正属意于一位美丽而受人崇拜的女人，担心我因为穷而不敢论及婚事，便想嘱咐我：“女人对钱毫不在乎。”我祖父当时也行将就木，只比她多活了几个星期。我去看他，见到病中他英俊的脸庞添了几分清秀，还注意到他能根据一般人毫无察觉的日光和温度的一些迹象预报天气的变化。当我坐在那几时，我过去孩提时代的恐惧重又袭来，我离开时如释重负。我和住在祖父对门的叔叔一起呆了数日，一天回到家我们遇见了祖父的大夫。大夫说没有希望了，并说得让我祖父知道，但我叔叔不答应。他说：“让一个人知道他快死了会使他发疯的。”这位医生无奈地劝说道，他从没听说哪位患者不在知情后更加镇静起来。我听着，又伤心又气愤，但我叔叔总是对人性评价不高，他那惊人博大的宽容源于他不对任何人寄予希望。在他打算妥协之前我祖父撑起了他的双臂喊道：“她在那儿”。然后倒下断了气。在他死去之前，那所房子里原先的那些从不吵闹忙乱的佣人们开始做起了小偷小摸的事；在他死后，因为壁炉架上的一些毫无价值的摆设品的安置发生过一起口角。

几个月来我沉浸在我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虽然不是不停地在写，但每天都浮想联翩，悲伤而又惶惶然。这并不是说我实现的梦想太少了，因为我并没有什么看望；但当我想到我所读过的所有那些书，还有我所听到过的那些醒世之言，以及我带给父母和祖父母们的焦虑，加之我曾有过的那

些希冀，我感到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天平上你量的所有生活都似乎是为了某件从不会发生的事所作的准备。

[1915]

(刘怀昭 译)

